



ISSN 1882-6571

# ICCS 現代中国学ジャーナルIV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2016年3月

ICCS 現代中国学ジャーナル編集委員会 ICCS-JMCS editorial board

愛知大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

〒453-8777 愛知県名古屋市中村区平池町四丁目 60 番 6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ichi University  
4-60-6, Hiraike-cho, Nakamura-ku, NAGOYA, Aichi 453-8777 JAPAN



ICCS現代中国学ジャーナルⅣ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Ⅳ

---

◆第4巻第2号

国際ワークショップ「グローバル社会のなかの中国」開催にあたって 高橋五郎	1
(論文)	
百年視野：天下觀和東亞社會的國際關係 金觀濤	3
中国官僚資本主義体制の成立 矢吹晋	9
中国農業のアフリカ進出の現状と要因 —農業援助，貿易，直接投資— 高橋五郎	27
華為技術(ファーウェイ)と聯想集團(レノボ)の対日進出 —中国企業多国籍化の二つのプロセス再論— 中川涼司	45
靠海吃海的忧患与解困—山东荣成市人和镇院乔村调查 张士闪	55
汉服运动：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亚文化 周星	61
Korean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Trend and Future Perspective Jongkeun Park	68
大震災が提起する電力システム問題 —反省点、対応の動向及びこれからの論点整理など— 栗原史郎	75
中国の経験と日本の経験 —福島第一原子力発電所事故発生の解明と原子力政策の将来を念頭において— 大澤正治	84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基于文化属性的思考 陈红娟	92
从牟宗三的“政道”“治道”观到当代中国政治治理的方向 汤忠钢	99

反省的现代性：从《坂上之云》看现代中国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席伟健	108
(研究ノート)	
中国テレビドラマというプリズム	
—『裸婚時代』から見る転型期社会における婚姻をめぐる諸問題— 楊韜	117
(寄稿)	
シンポジウム「日本現代化の過程, 経験および教訓」の総括 劉岳兵	126
(投稿エッセー)	
劉曉波へのノーベル平和賞授与は間違いだったのか? ジョン・ハミルトン	131
(投稿論文)	
孔子学院—中国模式的語言文化推广机构 戴蓉	136
Economic Growth of Industrial Sector and Strength of Environment Regulation —A Convergent Analysis Cheng Zhang, Jun Wang, Huiyun Chen	144
中国の食肉製品輸出企業における中国国内販売へのシフト要因 —対日輸出に関する規制の観点から— 佐藤敦信	161
暴力纠纷的意涵—对皖中江庵镇暴力现象的文化解读 邢朝国	169
中国乡村时间民俗的变迁—以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川底下村为例 王鹤	187
(投稿調査報告)	
喪葬仪式中“传灯花”的习俗—以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川底下村为例 王鹤	194
編集後記	202
◆第5卷第1号	
(論文)	
過渡期中国はどこへ向かうか—中国の大国化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 加々美光行	203
关于当今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路径 宋进	213
乡村诉讼：从事件到文本—从一起离婚纠纷看中国法律的运行机制 刘正强	220
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思潮の変容と国語教育改革 武小燕	242



## 国際ワークショップ「グローバル社会のなかの中国」

### 開催にあたって

愛知大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  
所長 高橋五郎

1990年代に始まった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の最初の波は、周知のとおり日米欧が起こしたものであった。その直後、日本は経済のみでなく社会全体がバブル崩壊でつまずき、欧州はEUの性急な拡大とともに停滞し、アジア金融危機がアメリカの停滞を予告した。そして10年後の2008年、ついにアメリカ的経済モデルの破局の予告ともいえるリーマン・ショックが起き、欧州の金融危機の連鎖を併発し、いまなお予断を許さない状況が続く。この危機は底知れぬ深まりさえ見せつつある。一方で、FTAやTPPなど、二国間あるいは多国間地域共同体形成のおおきなうねりが起きている。

改革開放、社会主義市場経済、走出去政策、WTO加盟、FTA締結加速、G20参入と台頭等々、中国も徐々に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の世界に向かって歩みだし、その一員としての地位を固め、グローバル社会の完了期に達したいま、その中核的な担い手として世界をリードするまでに成長した。長い間、途上国の盟主として自他ともに認めてきた世界における位置付けは決定的な転換を遂げ、中国はグローバル社会の主演としてそれをリードする存在へと脱皮、名実ともに大国の地位にのし上がったといえる。

ここで、我々に課せられた課題は以下である。

第一に、グローバル社会そのものの検証という課題である。グローバル社会はきわめて多くの矛盾と、なお予期し得ない波乱要因を多分に含んでいる。グローバル社会の形成は、従来の土着の世界に存在した「地域の輪」に強引に侵入してくるアメリカ的な市場経済原理の強制という矛盾、国境を超えて容易に飛来してくる他国の社会的ルールや文化から生じる摩擦や不協和音等の波乱要因が多数存在する。グローバル社会は、こうした点を含む多くの検証すべき課題を抱えている。

第二に、グローバル社会に関連して中国国内で生起する動きと変化、すなわち中国では、グローバル社会が進行するなかで政治・外交、経済、社会・文化、環境等の分野がどのような行動を見せているのか、またどのように変化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課題である。

第三に、グローバル社会における中国自身にとっての国際的な視点、すなわちグローバル社会における中国の存在、中国の役割、中国の今後を多方面から考察することである。

多方面とはいっても一定の制約があり、本ワークショップでは政治・外交、経済、社会・文化、環境から接近することにしたのである。

今回のワークショップには、内外から、多数の各分野における中国専門家にお集まりいただいた。時間の制約から、上掲課題を十分に討論するには自ずと限界があるが、今後、論文という形式をもって、「ICCS 現代中国学ジャーナル」上で公開していきたい。

## 百年視野：天下觀和東亞社會的國際關係

金觀濤<sup>1</sup>

### 摘要

本文認為，儒學的天下觀在前近代一度成為中、日、韓三國對世界秩序的想像。但是，把國際關係建立在儒家倫理之上並沒有帶來和諧。在某種意義上，一百多年前的甲午中日戰爭就是東亞三國具有不同中心的天下觀造成。天下觀帶來衝突的歷史表明，任何一種道德秩序一定預設了中心，今日世界的國際關係是不可能建立天下觀之上的。

### I. 天下觀和等級秩序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互相競爭的世界秩序受到越來越多的懷疑和批判。鑒於二十世紀民族主義及國家主權的無約束性曾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一些人認為，今天應該用基於仁愛和道德的天下秩序代替國際法支配的民族國家秩序。儒學主張的天下觀又引起人們重視。最近，天下觀的提倡和研究者不乏其人，特別是在曾以儒學作為共同政治文化的東亞。

現代社會的國際秩序可以建立在天下觀之上嗎？這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政治哲學的探討，二是歷史研究。現代國際社會由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組成，一般說來，擁有主權的獨立個體要組成的秩序，只能依賴法律和契約，基於道德仁愛的天下觀是不能形成國際秩序的。本文的目的是把該命題放到歷史上去，證明儒學的天下觀沒法帶來東亞的和諧與和平。事實上，只要具有長程歷史眼光，就可以發現基於道德的天下秩序無法脫離是以某一國為中心的引力場，它會導致國與國之間嚴重的衝突。一個多世紀前爆發的甲午中日戰爭就是明顯例子。

為了探討天下觀和東亞社會之間的國際關係，首先必須明確天下觀是甚麼。「天下」一詞在中文文獻中使用很早。周代將周天子統治的範圍稱為天下，春秋戰國時期，孔孟賦於「天下」以道德含義<sup>2</sup>。自儒學成為中國文化大傳統以來，世界便被視為應是儒家道德秩序的實現，這就是天下觀。儒學將道德建立在血緣的親疏遠近之上，從「親親」推出「尊尊」，形成了等級制的家庭倫理。將天下視為一家就是將等級制道德放大到國與國關係之中。這樣，「天下」作為等級制道德的實現，其本質必定只能是一種等級秩序。

首先，將宗族的親疏關係映射到國與國關係中去，產生了宗法上的擬血緣制關係。它潛含著親疏遠近的等級制，國與國不可能是平等的。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擬血緣制關係是以父子關係為基本前提，然後延伸至舅甥（翁婿），叔姪，甚至兄弟關係等，四鄰諸國與中國之關係就有親疏之別。」這樣天下觀隱含著將儒學發源地作為世界中心，將世界各國分成不同親疏遠近的道德等級。在該等級制結構中，「對於外臣而較親近中國地區，是運用中國本土的郡縣制，官僚制原理來貫徹。其具體的行事，便是朝貢與冊封；但對外臣而較疏遠的地區，不適用郡縣制，官僚制原理，所以

只見朝貢而無冊封」<sup>3</sup>。也就是說，天下由「內臣地區」，「外臣地區」，「暫不臣地區」同心圓等級結構組成。所謂天下觀是把世界看作以某一個中心所構築的同心圓政治秩序。

表面上看，天下觀強調道德與和諧，因道德原則具有普世，外夷只要學習儒家道德，亦能納入「天下」這一沒有邊界的共同體，成為華夏的一部分。這裡，國與國之間似乎是平等的，加上在道德上人種，語言等區別不具本質意義，天下觀不應存在等級差別。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道德水平從來存在著高低之別，外夷之所以別於華夏，這是因為沒有接受教化，在道德上是低於華夏的。換言之，天下觀中的等級不僅由親疏規定，還由其接受儒家倫理程度(或自認為道德水平高低)帶來。

在天下觀中，各國道德高下取決於接受教化程度。在儒學發源地中國看來，別國道德水平高低由它離中央王國這道德中心之遠近而定。換言之，中國是實現儒家道德倫理的禮儀之邦，它處於道德的最高等級，因而是世界的中心。外國則根據道德水平高低和接受儒家道德的多少分成夷和藩，處在天朝帝國的周圍。在這幅圖畫中，世界是以華夏為中心的，不是由平等民族國家組成的集合。故天下觀亦被稱為華夏中心主義(Sinocentrism)，處於中國周邊的各國只是中國教化對象。同樣，東亞各國只要接受儒學作為政治文化，用天下觀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都可以把自己視為道德水平比別國高，是世界的中心。這樣一來，同樣是天下觀，必定有不同中心，蘊含著各中心之間的衝突。

## II. 前近代「天下」的三個中心

自漢代以後，儒學的天下觀就是中國對世界秩序的看法。中國當然自認為是天下的中心，即中國實行郡縣制的地區屬於天下觀第一個同心圓。朝鮮是受中央王朝冊封的，屬第二個同心圓。日本在唐代是朝貢國，屬第三個同

心圓，但元朝以後就不朝貢了，處於第三個同心圓之外。當日本和朝鮮接受儒學後，也形成了自己的天下觀。該天下觀雖然同樣作為儒學對世界秩序的想像，但卻有著不同的中心。歷史證明，天下觀自從成為東亞共同世界想像那一天起，就存在多個中心，而不是和諧的。

在宋明理學產生之前，日本和朝鮮雖然十分注重引進儒學，但由於佛教的競爭，儒學一直沒有在這兩國扎根成為不可動搖的官方意識形態。只是當宋明理學(特別是程朱理學)出現，意味著儒學已可以消化佛教，儒學才終於壓倒佛教成為東亞的政治哲學。也就是說，在宋明理學成熟之前，天下觀只是中國對世界秩序的看法，而到明代之後，由於宋明理學成為東亞的政治哲學，天下觀在某種程度上被日本和朝鮮所認同。為了說明天下觀本質上是多中心的，讓我們來分析一下日本和朝鮮接受程朱理學後，他們所理解的天下秩序。

日本對「天下」的認識源自中國，但一開始就和中國不同。早在公元五世紀，日本已接受「天下」一詞。當時日本脫離了中國冊封體系，故將天下理解為天皇統治的範圍，即只限定在日本列島<sup>4</sup>。十六世紀後，程朱理學傳到日本，儒學得以戰勝佛教成為官方意識形態；日本終於形成了基於儒學的天下觀。這時，日本的天下意識越出日本本土，開始指向東亞。表面上看，中國為儒教發源地，當之無愧是天下中心，但日本卻不這樣認為，在程朱理學中，改朝換代受到質疑，日本一直以天皇萬世一系而自傲。日本的朱子學者甚至批判孟子，視其著作為假，湯武革命更是大逆不道。這樣一來，日本一直以來就以自己比中國更接近儒家道德精神自居。江戶時代日本的天下觀雖同樣以儒家道德實現作為其範圍，但道德中心不是中國而是日本。這一切十分典型地反映在日本大儒山鹿素行的思想上。山鹿素行為了反佛接受了朱子學。他四十歲開始提倡古學，但到五十歲時就主張必須將日本視為道德中心，成為提倡「日本主義」的先驅。山鹿素行之所以認為日

本才是天下之中心，這是因為中國易姓三十次，朝鮮兩度亡國，四度易姓；只有日本天皇萬世一系，故唯日本「才確實可稱為中國之地」<sup>5</sup>。

朝鮮一直是中國的冊封國，和中國的關係比日本近。而且朝鮮接受的程朱理學比日本更接近中國儒學的正宗。朝鮮士大夫堅決反對日本儒者提出的如果孔子和孟子帶兵來打日本該怎麼辦的問題，他們堅持理學的普世性，反對將儒學「民族主義化」。對朝鮮儒者來說，儒化的中國明朝天下是塊聖土，他們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保衛它<sup>6</sup>。正如一位韓國學者所說：「韓國的理學雖來自中國，但它却比中國的理學更為周密，更為正統。在中國，反對朱子之學的明代陽明學派和泰州學派及清代的漢學從未允許朱熹的體系像它在韓國那樣擁有這種文化上的壟斷權」<sup>7</sup>。那麼，朝鮮的天下觀是否和中國一樣，始終把中國視為天下的中心呢？否！雖然在明代，朝鮮一度承認中國為天下中心，自稱小華；表面上是接受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但清兵入關給朝鮮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致命的一擊，朝鮮士大夫認為中國已亡，滿清統治為夷狄，當然亦不可能是天下的中心。這時，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就轉化為朝鮮為儒學正統的天下觀。在中國士大夫心目中，清取代明只是改朝換代，不影響中國是天下中心。而對朝鮮而言，朝鮮成為儒家道德當然載體必定意味著它成為天下中心。

由此可見，在前現代東亞三國雖都接受天下觀，把世界秩序視為儒學的道德秩序，但卻都把自己視為天下的中心。三個中心必定蘊含著國與國的衝突。因為天下觀不重視別國主權和國際法，這樣只要全球化衝擊的來臨，人類成為一地球村，它們相遇時立即產生了爆炸。我們發現，在某種意義上講，1894年發生的甲午戰爭正是中，日，韓三種不同的天下觀把全球化納入自身視野的結果。

### III. 甲午戰爭爆發的思想原因

今日一談起甲午中日戰爭，中國學者立即將其定位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它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第一步。這種說法雖然正確，但不能解釋為何戰火是在朝鮮點燃的。韓國學者從中國和日本在十九世紀末不尊重朝鮮主權來說明甲午戰爭的原因，但不能解釋朝鮮為何要把中，日兩國軍隊引入本國。其實，背後的思想基礎正是東亞三國不同的天下觀。

為甚麼朝鮮積極主動地擔任了點燃中日大戰的導火線角色？長期來，歷史學家對朝鮮十九世紀下半葉看來互相矛盾的自殺性行為感到不解。一方面韓廷和西方及日本簽訂一系列條約，將自己置身於民族國家爭雄的條約體系中。另一方面將日本勢力引入朝鮮半島，促使改革；與此同時又利用中國對其歷史上的冊封，要求中國干預其內政以維系朝貢關係。這一系列互相矛盾的政策結果是引火燒身，使得朝鮮半島成為中，日，俄衝突的聚焦點，加快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的進程。我們發現，這一系列看來互相矛盾的決策均出於朝鮮獨特的天下觀。

如前所述，朝鮮的天下觀本是一種忠於理學以「中華道」獨一無二繼承者自居的思想。自從朝鮮認為中國已被夷狄佔領自己是天下中心後，該天下觀一方面使得程朱理學成為朝鮮民族認同符號，另一方面產生了對中國朝貢關係工具性運用以追求自身獨立自主的意識。換言之，國際法和朝貢關係同時成為爭取朝鮮獨立的工具。正是在這一思想背景下1876年朝鮮和日本簽訂《江華條約》，釜山，元山和仁川相繼開埠，該條約以承認朝鮮為自主之國來否定中國的宗主權。朝鮮政府於1881年派遣六十二名官員赴日兩個月考察日本，這些人回國後，有十二人出任政府要職，推進朝鮮近代化<sup>8</sup>。當統治階層中出現親日派的「開化黨」時，這就加劇了與以韓王之父大院君為主的保守派鬥爭。和開化派針鋒相對，保守派利用中國的朝貢關係來抵禦不斷壯大的日本勢力。1882年



夏，大院君鼓動兵變，日本決定派兵朝鮮問罪，韓廷立即要求中國也以宗主國撫綏藩國的慣例，出兵代韓戡亂。由此可見，朝鮮以自己為中心的天下觀產生了對國際法和朝貢關係的工具性運用。1885年，日本派伊藤博文與李鴻章訂定了《天津條約》，約中規定，朝鮮一旦發生變亂，雙方在行文知照之後，均可出兵朝鮮。甲午戰爭的禍根亦自此種下<sup>9</sup>。

至於中國出兵朝鮮，無疑是出於捍衛東亞殘存的朝貢關係，其指導思想是經世致用對中國天下觀的改進。這一點當時人人皆知。甲午戰敗後，有很多人在追究戰爭責任時指出這是因過份干預朝鮮內政引起。張佩綸認為袁世凱為誘發戰爭的「罪魁禍首」，責斥說：「雖曰中朝，而一味鋪張苛刻。視朝鮮如奴，並視日本如蟻，怨毒已深，冥然罔覺」<sup>10</sup>。張佩綸用「如奴」，「如蟻」來形容袁世凱對朝日兩國的飛揚拔扈，雖為斥責之詞，但也離實際情況不遠。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為了保衛在東亞殘存的天下秩序(周邊對中央王朝的朝貢關係)，對朝鮮國內事務進行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干預，其結果和日本發生面對面的衝突。正是在干預朝鮮內政中，二十三歲的袁世凱初露鋒芒，誘擒大院君，紮營三軍府，並為朝鮮代練新軍。1884年，親日派金玉均，朴泳孝勾結日人，發動甲申政變。袁世凱又斷然決定帶兵入宮，拯救韓王，恢復李熙政權。此後，袁與主張「聯俄制日」的李鴻章內外呼應，積極強化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袁在朝鮮的地位，儼然如「監國大臣」，控制朝鮮的內政與外交<sup>11</sup>；「韓人稱之為袁總理」<sup>12</sup>。在袁世凱主持韓政十餘年中，「朝鮮事無鉅細，凡與所謂宗主權有關係者，袁氏無不積極加以干涉」<sup>13</sup>。史家在討論袁世凱干預朝鮮內政時曾有這樣的評論：「此次派兵乃自元朝以後中國干預韓政最積極的表現，同時可說是中國改變對韓政策的轉捩點，此後，中國的朝鮮政策乃驟轉積極」<sup>14</sup>。問題的關鍵在於：為什麼十九世紀後半葉，中國會發生自元朝以來從未有過的對朝鮮半島

之干預？只要我們放寬歷史視野，可以看到從元朝到晚清，正好是宋明理學的天下觀形成以及經世致用對其強化。也就是說，甲午戰爭的爆發當然不能僅僅歸咎於袁世凱的個性和少年氣盛，也不是李鴻章的失誤。它是經世致用的天下觀將全球化納入自身視野的結果。

日本侵略朝鮮和中國亦是出於以日本為中心的天下觀嗎？表面上看，日本近代的「征韓」出於明治後獨特的日本民族主義。然而，深入分析表明，日本近代民族主義將日本視為亞洲中心，力圖領導亞洲反對西方，其思維模式正是日本式的天下觀。必須注意，以日本為東亞中心的日本式天下觀一直理藏在江戶時代日本政治思想的深處。一旦西方衝擊來臨，主張理性與儒家道德二元分裂的徂徠學迅速演變成日本現代思想的框架，成為引進西方現代政治經濟制度的正當性基礎。日本對世界秩序的看法，是基於徂徠學的進一步發展。徂徠學本暗含日本比中國更接近聖人之道，即日本是東方價值的真正體現。泊園徂徠學與日本國家主義教育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sup>15</sup>。換言之，日本是用自己的天下觀來代替由民族國家組成的國際秩序，獨特的大東亞觀念開始膨脹。特別當日本強調東方抵抗西方時，日本就成為大東亞的中心。由此可見，在日本前近代變型的天下觀中，已醞釀後來日本侵華侵朝，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基礎了。

日本的「征韓」觀念，「是由『神功皇后征伐三韓』的傳統與儒教中的華夷思想的傳統混合而成」，後來則把從萬國公法中獲得概念，加以現代包裝，說「雖言征伐，亦非胡亂征之，欲遵世界之公理」<sup>16</sup>，即是日本大東亞意識典型表現。其內容有二，一為將朝鮮變為日本附屬，二是破除中國在東亞建立的朝貢關係代之以日本為中心。故隨着征韓付之於行動同時是全面挑戰東亞殘存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秩序。1874年春，日本出兵台灣。這是明治時期日本第一次發動對外戰爭。在戰後談判問題上，日本政府立場強硬，申令不得有「絲毫妥

協」，訓令要旨是「應利用此蕃機會，切斷琉球兩屬之根源，打開朝鮮自新之門戶。此乃朝廷微意之深秘大計也」<sup>17</sup>。副島種臣是代表日本出使清朝談判的特命全權大使，他故意「拒絕行三跪九叩頭禮儀」，有意挑戰中華帝國的華夷秩序；他的顧問李仙德，則曾獻策變台灣為日本的殖民地，在同行前往中國的船上就賦詩說入侵台灣是「保護海南新建蕃」<sup>18</sup>。這裡，「新建蕃」一語正道破日本用民族主義包裝的天下觀是要擴張領土的本質。從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日本國的天職」，「新日本的使命」，成為日本政治精英的口頭禪。

由此可見，從 1870 年代中日琉球之爭和日本征韓論出臺，再到 1890 年代末的甲午戰爭，都出於同樣的邏輯，這就是具有「天下觀」道德內涵的大東亞意識。因此，作為近代日本非戰論者而聞名的思想家內村鑒三(1861-1930)，才會在甲午中日交戰之時就寫〈徵諸世界歷史論日，支關係〉一文，稱日本軍事侵略行動為「義戰」<sup>19</sup>。擔任甲午戰爭外交指導的陸奧宗光(1844-1897)，在 1895 年出版《蹇蹇錄》一書中也說，戰爭是由「西歐之新文明與東亞之舊文明間之衝突」引起的。請注意，新文明和舊文明之戰之所以可冠為「義戰」，其道德根據絕不是現代民族國家和國際法，而正是日本的天下觀——大東亞意識。其準確解讀是：對中國和韓國而言，日本自稱代表更為先進的現代；而對西方，日本則以代表東方價值自居，並要代領東亞抗爭。

#### IV. 長程歷史視野的意義

甲午戰爭以後，這種以現代民族主義為包裝的基於日本儒學的日本式天下觀進一步膨脹，把日本推向侵略亞洲發動太平洋戰爭的軍國主義道路。而朝鮮的天下觀中以自己為儒學唯一傳承的精神融入韓國民族認同中，成為民族解放的動力。甲午戰敗使中國人意識到儒學的經世致用不能抵禦西方現代衝擊，中國開始

了波瀾壯闊的社會現代轉型。隨著儒學受到質疑，中國放棄天下觀，走上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和革命之路。

表面上看，儒學作為東亞社會前現代的政治文化，在二十世紀東亞社會現代轉型過程中已退出歷史舞台。三種天下觀導致東亞三國的嚴重衝突，主要是十九世紀末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們以百年為視野考察東亞國際秩序，就會發現儒學的深層結構一直支配著東亞社會的現代轉形，使其和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不盡相同。如前所說，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思想基礎是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主義，它來自於日本天下觀對其民族主義的塑造。其實，進而言之，日本之所在明治時代能順利學習西方政治、經濟制度，成為東亞最早的現代民族國家，和日本儒學的獨特結構有關。早在江戶時代日本儒學已實現政治理性和儒家倫理的互相分離，徂徠學就是其代表。正是徂徠學的基本結構規定了日本近代民族主義的性質，這就是一方面學習西方現代政治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強調天皇以及日本儒學作為民族認同符號，其後果必定是把日本當作亞洲之中心，主張領導具有共同儒學傳統之東亞對抗西方侵略。

中國儒學不具有倫理和政治理性二元分離之結構，故學習西方現代政治、經濟制度比日本困難。雖然在清王朝統治的最後十年，中國亦接受了將儒家倫理與政治理性二元分離的中西二分二元論意識形態，模仿日本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但嚴峻的社會整合危機由此引發。最後新文化運動否定中西二分二元論，建立了馬列主義和三民主義兩種革命意識形態。中國不得不通過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建立黨國完成社會再整合。無論是國民黨三民主義意識形態還是毛澤東思想，其深層思維模式都是道德一元論，和中國傳統儒學同構；用革命意識形態實現社會整合存在著傳統王朝更替的影子。革命意識形態的道德內容雖和儒學不同，但把世界秩序想像為道德秩序卻和儒學的天下觀一致。正因為如此，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共產黨把

中國視為世界革命中心，進而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其本質均出於新道德載體應是世界中心的理念。劉青峰稱之為新華夏中心主義。新華夏中心主義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行其道，要等毛澤東思想解體才衰落。

在此意義上，天下觀在今天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它說明儒學的深層結構一直在支配著很多人的思想。特別每當民族國家競爭激烈國際法又不足於解決民族國家之間利益爭紛之時，將國際秩序立足於道德價值之上的各種議論就會出現。這裡，或許有著善良的願望，或許也存在對全球化國際新秩序的追求。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在價值多元的現代社會，對何為善存在着多元理解。為了充份尊重個體的權利和不同個體的平等，人類不能僅僅依靠道德建立合理的全球秩序。對全球現代秩序的再思考過程中，傳統當然也是一種可利用的資源。但是，當代人在利用這種思想資源時，為了它具有建設性，必須切記它在歷史上帶來的問題。這時，以百年為單位的長程歷史視野是不可缺少的。

#### 注释\*

- <sup>1</sup> 台灣政治大學講座教授及中國美術學院南山講座教授。
- <sup>2</sup> 一般認為，在孔子和孟子言論中，「天下」才被明確賦於道德內涵。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孟子云：“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離婁上》）。
- <sup>3</sup> 高明士：《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 11，19，21。
- <sup>4</sup> 甘懷真：〈從天下觀到律令制的成立：日本古代王權發展的一側面〉《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一》高明士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頁 182。

- <sup>5</sup>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西歐的衝擊與開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頁 47-48。
- <sup>6</sup> 金得愷：《韓國思想史》，頁 175-176。
- <sup>7</sup> 黃秉泰（韓）：《儒學與現代化：中韓日儒學比較研究》，頁 463。
- <sup>8</sup> 信夫清三郎：《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三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頁 122-123。
- <sup>9</sup> 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26)(臺北：1970，1984再版)，頁 384-385。
- <sup>10</sup> 張佩綸《澗于集書牘》卷六頁十。轉引自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頁 394。
- <sup>11</sup> 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頁 100。
- <sup>12</sup> 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頁 139。
- <sup>13</sup> 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頁 385-387。
- <sup>14</sup> 林明德：《袁世凱與朝鮮》，頁 384。
- <sup>15</sup> 陶德民：〈泊園徂徠學與明治時代的國家主義教育—藤澤南岳的思想〉，《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日本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
- <sup>16</sup> 信夫清三郎：《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二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頁 400-401。
- <sup>17</sup> 信夫清三郎：《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二卷，頁 446-450。
- <sup>18</sup> 信夫清三郎：《日本近代政治史》第二卷，頁 401-402。
- <sup>19</sup> 轉引自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頁 48。

## 中国官僚資本主義体制の成立

矢吹晋<sup>1</sup>

### I. 建党 90 周年と習近平体制・獄中の劉曉波

・「打倒孔家店」「孔子学院」の海外展開へ  
中国共産党は 1921 年にコミンテルンの中国支部として誕生したので、2011 年に建党 90 周年を祝った。建党記念日は 7 月 1 日と定められている。これは当時の最高指導者・陳独秀たちが、この日上海で建党宣言をしたからだとされるが、肝心の陳独秀に対する評価はいぜん「論定まる」とはいいがたい状況に見える。それだけではない。中国共産党の母体は、「賽先生」と「徳先生」に学ぶことを提唱した五四運動だが、前者は賽因斯 Science すなわち科学尊重の精神であり、後者は徳莫克拉西 Democracy の訳語で、「科学と民主」が、いわゆる新文化運動の 2 大精神であった。孔子学説こそが中国の長きにわたる封建社会で形成された精神・道徳・文化体系であり、人民を精神的に奴隷化してきた元凶だから、これを打倒すること、すなわち「打倒孔家店」のスローガンが当時の時代的風潮であった。知識人たちは、ロシア 10 月革命が送り届けてくれたボリシェビズムに鼓舞されて、革命に決起した。その後、90 年にわたる曲折を経て、中国のイデオロギーは完全に逆転したように見える。

ストックホルム大学アジア太平洋研究所所長・準教授池上雅子<sup>2</sup>によれば、中国政府は世界中の大学内に孔子学院をつくることで、海

外における中国研究教育を北京政府がコントロールする体制を整えつつあり、中国政府による孔子学院海外展開の手法は、1930 年代ファシスト・イタリア政府が自国の宣伝と外国人教化の目的を狙ってアメリカの学校に「イタリア語プログラム」を国費で大量に設けた「ムッソリーニ・モデル」に酷似している。すなわち「特定の社会的価値観やイデオロギーの浸透が覇権安定に必要であり、国内的には情報操作・世論工作、対外的にはソフトパワーが重要なもの」(池上)。「打倒孔家店」から出発した中国共産党の革命運動が、「孔子学院」の海外展開に発展して今日に至るとは、鬼胎が鬼子を産み落としたものというほかない。国際共産主義運動と中国マルクス主義の破産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とき、伝統思想に回帰するほかない事情は、理解でき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が、これほどの自家撞着に無頓着な精神構造は、普通の日本人の理解を逸脱している。海外に孔子学院が設けられた嚆矢は 2004 年 11 月韓国ソウル市に設けられたものと伝えられるが、日本にもすでに少なくとも 12 の孔子学院が存在する<sup>3</sup>。

### II. 「五つのやらない」 ——政治改革の無期延期宣言

さて「賽先生」すなわち科学技術の発展についていえば、中国共産党政治局の顔触れの大部分が理工系大学の卒業生であり、この分野での取組みが成果を挙げていることは、さ

まざまな実績から明らかだ。「第12次5カ年計画要綱」の項では、新世代情報技術産業、バイオ産業、ハイエンド産業、新エネルギー、新素材などにおける先端部門への取組みを紹介している。これらの例を一瞥するだけでも、90年間の科学技術における成功は理解できる。では、もう一つの「徳先生」はどうか。2011年3月の全人代で呉邦国委員長は「五つのやらない」<sup>4</sup>を強調した。(1)複数政党による政権交代はやらない。(2)指導思想の多元化はやらない。(3)「三権分立」と両院制はやらない。(4)連邦制はやらない。(5)私有化はやらない<sup>5</sup>。これらの5カ条については、従来政治改革の課題として話題になってきたものであり、個々のトピックについてさまざまな議論が行われてきたが、今春の全人代でこれらをまとめて「五つのやらない」を強調したのは、注目すべきだ。

それは来年に開かれる第18回党大会を控えて、政治改革の方向を基本的に否定したものと受け取れるからだ。呉邦国は政治局常務委員会において胡錦濤に次ぐナンバー2の位置にいる。胡錦濤に代わってナンバー2が第18回党大会における政治改革の無期延期を宣言したに等しいと筆者は受け止めて、一方では中国共産党の苦境の現れと理解し、他方でこの種の強圧路線の行方を危ぶむ次第である。中国がリーマン・ショック以後の世界不況のなかで、高度成長を堅持して世界中から頼りにされていること自体は慶賀すべきだが、その統治のウラは薄氷踏むがごとく、累卵の危機にあることを「五つのやらない」は告白したに等しい、と読む。

### Ⅲ. 劉曉波の「非暴力の思想」

以上のような危機感は一人の人物に象徴される。ノーベル平和賞を得た劉曉波である。劉曉波という男は、ノーベル平和賞を得たこ

とで脚光を浴びたが、それだけなら一過性で終わる。むしろ中国当局が出国を許さず、「本人か家族限定」で手渡すルールの賞金を未だに入手できない不条理によっていっそう有名になったと見てよい。人々は、授賞式への出席すら許容できない中国政治の現実を改めて思い知らされた形である。受賞の直接的契機は2008年暮、仲間を募ってメールで呼びかけた『零八憲章<sup>6</sup>』である。憲章を読んだ友人から「新しいことが何も書いていない、どこがノーベル賞級の発言なのか、教えてほしい」と問われたので、私(矢吹)はこう答えた。その通り。劉曉波はあまりにも当たり前のことを主張しているにすぎない。フランス革命など近代の欧米社会を中心に発展してきた人権尊重の価値観を中国でも、「人類の普遍的価値」として尊重しよう、と呼びかけただけである。とびきり独創的な思想や難解な哲学を語ったものではない。と答えたところ、ではなぜそれが平和賞なのか、と重ねて問われた。中国当局が「普遍的価値」に背を向け、「人権よりも国権が必要だ」など時代錯誤の強圧政策を続けているからではないか。天安門事件が発生した1989年6月4日未明、劉曉波はハンスト四人組の仲間とともに広場制圧を指揮する戒厳部隊の政治将校と交渉し学生を逃がす道を用意させ、広場撤退局面での流血を回避した。これは火中の栗を拾うきわめて勇気ある行動で、劉曉波の名はこのとき、人々の脳裏に刻み込まれ、「第一の劉曉波伝説」が生まれた。広場の制圧後、少なからぬ有名知識人や学生指導者たちが亡命したが、劉曉波は国内に留まり秦城監獄に投獄され、ここで「第2の劉曉波伝説」が生まれた。劉曉波が「広場ハンスト宣言」以来一貫して語りつづけているのは「私には敵はいない」という思想であり、授賞式ではノルウェーの女優リブ・ウルマンが代読した。

「私には敵はいない、という思想」とは、

何か、中国共産党は長いゲリラ闘争を経て「銃口から政権が生まれる」という暴力革命で政権を得た。その政治的暴力はさらなる暴力支配を生み、中国共産党の統治全体が血塗られ、今日に至る。劉曉波はこの「暴力の連鎖」を見据えて「非暴力の思想」を対置した。劉曉波の「非暴力の思想」がガンジーやキング牧師の非暴力と重なることは明らかだが、これは単なる模倣ではない。文化大革命期に中学・高校に進学する機会を奪われた紅衛兵世代が、自らの痛切な体験を通じて獲得した思想と解してよい。こうして劉曉波は現代中国の政治的暴力を根源的に否定し、中国共産党の握る政権の支配の正統性に疑問を提起し続

けている。彼の主張は、「非暴力の思想」により「社会を変え、政権を変えよう」という穏健きわまるものだ。秘密結社を呼びかけたり、政治テロを主張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にもかかわらず、彼は国家反逆罪の重刑を受けた。劉曉波裁判とは、建党 90 周年の前年に中国共産党が行った裁判だが、この裁判は建党百年あたりの時点では、堅持されようが、建党 150 年史、あるいは建党 200 年史<sup>7</sup>では、どのような姿になるか。おそらく、そのとき被告は劉曉波ではなく、国家反逆罪として一人の市民を裁いた国家自体が被告席にいるのではないか。

#### IV. 第 18 回党大会の指導部人事

表 1 第 17 期政治局 常務委員 9 名

氏名	生年	2012 年中央年齢	常務委空席ポスト	派閥	備考
習近平	1953 年 6 月	59, 1 期	留任	太子党	国家副主席⇒主席(4 中全会か)
李克強	1955 年 7 月	57, 1 期	留任	共青团	國務院常務副総理⇒総理
李長春	1944 年 2 月	68, 2 期	空席 5		2 期完了引退
賀国強	1943 年 10 月	69, 1 期	空席 6		68 歳基準超過
周永康	1942 年 12 月	70, 1 期	空席 7		68 歳基準超過
胡錦濤	1942 年 12 月	70, 2 期	空席 1		2 期完了引退
温家宝	1942 年 9 月	70, 2 期	空席 3		2 期完了引退
呉邦国	1941 年 7 月	71, 2 期	空席 2		2 期完了引退
賈慶林	1940 年 3 月	72, 2 期	空席 4		2 期完了引退
<b>17 期 政治局委員</b>		若い年齢順			
汪洋	1955 年 7 月	57 歳	昇格 1	共青团	広東省書記⇒党務か
李源潮	1950 年 11 月	62 歳	昇格 2	共青团・太子党	中央組織部長⇒党務か
薄熙来	1949 年 7 月	63 歳	昇格 3	太子党	重慶市書記⇒副総理か
王岐山	1948 年 7 月	64 歳	昇格 4	太子党	副総理・金融⇒常務副総理
劉雲山	1947 年 7 月	65 歳	昇格 5	太子党	党中央宣伝部長
張徳江	1946 年 11 月	66 歳	昇格 6	太子党	副総理・新幹線事故対応
張高麗	1946 年 11 月	66 歳	昇格 7	太子党	天津市書記, 石油派
劉延東	1945 年 11 月	67 歳	1 期	共青团・太子党	昇格微妙, 留任可能
俞正声	1945 年 4 月	67 歳	2 期	太子党	上海市書記
王樂泉	1944 年 12 月	68 歳	引退		68 歳基準超過
回良玉	1944 年 10 月	68 歳	引退		68 歳基準超過
徐才厚	1943 年 6 月	69 歳	引退		68 歳基準超過
劉淇	1942 年 11 月	70 歳	引退		68 歳基準超過
王剛	1942 年 10 月	70 歳	引退		68 歳基準超過

郭伯雄	1942年7月	70歳	引退		68歳基準超過
王兆国	1941年7月	71歳	引退		68歳基準超過

2012年秋の第18回党大会では最高指導部のトップ9名(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以下の幹部人事が決定される。中国の主要人事が5年ごとに開かれる党大会で決定されることは常識であろうが、来年に正式決定される人事の骨格は、すでに固まっている。なぜそれが分かるのか。2007年に選ばれた17回大会人事によるトップ9名は、以下のとおりである。

胡錦濤総書記(2期引退)、呉邦国全人代委員長(2期引退)、温家宝総理(2期引退)、賈慶林政協主席(2期引退)、李長春宣伝担当(2期引退)、周永康治安担当(1期引退)、賀国強紀律検書記(1期引退)、習近平(留任、1953年6月生まれ)、李克強(留任、1955年7月生まれ)。9名のうち5名は、「同じポストを2期10年務めた」ことに伴う引退規定に縛られている<sup>8</sup>。この「3選禁止」規定のために引退するのは、胡錦濤、呉邦国、温家宝、賈慶林、李長春の5名だ。周永康と賀国強の両人は、まだ1期しか務めていないが「68歳という年齢基準」のために引退する。こうして常務委員ポストに留任できるのは、当年58歳の習近平と55歳の李克強だけになる。政治局常務委員のポストは、七つが空席になる。この常務委員ポストに昇格できるのは、現在政治局にポストを持っている16名に限られる<sup>9</sup>。中国の官僚システムは強固であり、いまや「2階級特進」はありえない。ポスト文革期には実力者鄧小平が人事の大幅若返りのためにこれを行った例もあるが、そのような実力者はなく、整った官僚制(ビューロクラシー)が機能しているから、例外はありえない。中国は官僚国家なのだ。由来、科挙という世界に冠たる官僚制の歴史をもつ国だから、共産党官僚制もその伝統に深く根ざしている。現在の政治局委員は、次の16名である。王樂泉(2期引退、68歳)、王兆国(2期引退、71歳)、回良玉(2期引退、68歳)、劉淇(2期引退、70歳)、劉雲山(2期昇格か、65歳)、張徳江(2

期昇格か、66歳)、俞正声(2期昇格か、67歳)、郭伯雄(2期引退、70歳)、汪洋(1期、昇格確実、57歳)、劉延東(1期、昇格か留任か、67歳)、薄熙来(1期、昇格確実、63歳)、王岐山(1期、昇格確実、64歳)、李源潮(1期、昇格確実、62歳)、徐才厚(1期引退、69歳)、張高麗(1期、昇格か留任か、66歳)、王剛(2期引退、70歳)。ここから「2期引退組」6名および「68歳以上の高齢組」1名を除くと、次の9名が残る。すなわち劉雲山、張徳江、俞正声、汪洋、劉延東、薄熙来、王岐山、李源潮、張高麗である。このうち2名だけが常務委員になれず、残りの7名が昇格する形の椅子とりゲームになる。劉雲山、張徳江、俞正声はすでに2期務めているので、留任はありえず、昇格か引退かの二者択一だ。汪洋、劉延東、薄熙来、王岐山、李源潮、張高麗の6名は昇格か留任かの二者択一だ。この6名のうち年齢の若い汪洋、李源潮、薄熙来、王岐山は、その任務分担と合わせて考えると昇格の可能性が強い。以上のように分析を進めると、鄧小平時代に成立したルールが厳守されていることからして、常務委員ポストの大枠は、すでに確定し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となると、次の課題は、政治局委員のポストである。候補を含めて16のポストのうち、7名が引退し、7名が昇格すると、14のポストが空く。このポストを誰が埋めるか、この人事予想は、可能性が広がるので、むずかしい。まず地方代表、すなわち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慶市、広東省などの書記は、いわば政治局に指定席をもつことが多い。次いで国务院の有力部長(閣僚)や党中央各部長も当然候補に入る。さらに軍代表もこれまでの慣例に従い、政治局に二つのポストを確保するであろう。ここで、政治局入りできる者は、当然の必要条件として中央委員<sup>10</sup>の活動を少なくとも2期10年続けていることが求められる。このような有資格者のなかから選ばれるわけだが、そのような資格を持つ

者は、すでにしかるべき党務あるいは政務に就いているわけだ。以上の文脈から、われわれが着目すべき省・市・自治区レベルのトップ指導者を発見できよう。國務院の部長級（閣僚級）および省レベルの書記・省長はいずれも60歳前後の者から選ばれる決まりは固く守られている。たとえば河南省委書記を務めた徐光春<sup>11</sup>、内蒙古自治区党書記を務めた儲波<sup>12</sup>、遼寧省書記を務めた張文岳<sup>13</sup>は、いずれも65歳で引退した。65歳までに5年間務めて引退するためには、60歳前後で省長や部長に就任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うした「年齢基準」は、動かしようのない事実なので、幹部選考において、ほとんど最大の制約条件の観を呈しており、いま「60後」の部長や書記が話題を集めているのは、そのような事情によるわけだ。

最後に軍事委員会をみておこう。副主席郭伯雄<sup>14</sup>、同徐才厚<sup>15</sup>は、2010年に69～70歳になるから当然引退だ。引退するこの二人は政治局委員であり、軍代表の枠は当然軍によって埋

められる。現在8名の軍事委員会委員のうち梁光烈、陳炳徳、李継耐、廖錫龍の4名は70歳を超えるので当然引退だ。留任できるメンバーを年齢順に並べると、呉勝利<sup>16</sup>1945年生まれ、同67歳。常万全<sup>17</sup>1949年生まれ、同63歳。許其亮<sup>18</sup>1950年生まれ、同62歳。この3名の上将である。3名のうち2名が軍事委員会副主席に昇格し、政治局委員も兼ねて、文民出身の主席<sup>19</sup>を支える形になる。呉勝利は文官ならば引退年齢だが、軍事委員会副主席級ポストはヒラ委員と異なり、60歳台後半の慣行ができてい。現行軍事委員会メンバーのうち、常万全、呉勝利、許其亮の昇格をペンタゴン報告<sup>20</sup>が明記したことは、特筆すべき事実であろう。私のいうチャイメロカ「結託構造」の象徴的一例だからだ。これら3名に、2011年7月に上将昇格した6名を加えた(9名+1名)が軍事委員会を構成することになるであろう。政治局人事の前に軍事委員会メンバーが固まるのは、現在の政治状況を象徴する異例の事態ではないか。

表2 第18期軍事委員会予想

		生年	2012 年齢	軍内の職務	系列	備考
主席	胡锦涛	1942	70	文民		
副主席	習近平	1953	59	文民		
副主席	常万全上将	1949	63	蘭州軍区、瀋陽軍区から総装備部経由	蘭・瀋	蘭州軍区、瀋陽軍区から
副主席	呉勝利上将	1945	67	海軍司令員から	海	海軍一筋
委員 8ポスト				4総部3兵種= (7ポスト+1)部長		
委員1	許其亮上将	1950	62	国防部長	空・瀋	空軍、瀋陽軍区
委員2	孫建國上将	1952.2	60	総参謀部部長は いずれか	海	原潜艦長
委員3	侯樹森上将	1950	62		瀋	瀋陽から抜擢、東北軍
委員4	賈延安上将	1952.9	60	総政治部主任	江沢民	江沢民秘書、 軍事委員会弁公室主任
委員5	張又俠上将	1950.7	62	総後勤部部長又は 総装備部部長	瀋	瀋陽から抜擢 張又俠は 張宗遜の子、親子二代上将。 張宗遜が集團軍司令当時、 習仲勳は政委であった。
委員6	李長才上将	1950	62		蘭	南京を経て、 蘭州政治委員から抜擢
委員7	劉曉江上将	1949.12	63	海軍司令員	海	



委員 8	新人抜擢		第二砲兵司令員か	
------	------	--	----------	--

注, 2011年7月23日, 6名の上将人事発表. 昇格3名と上将6名を加えると, 軍事委員会定員10名のうち9つのポストが埋まる.

## V. 「チャイメリカ」体制——米中経済戦略対話 (2011年5月)

2011年5月9～10日の両日, ワシントンで「米中戦略経済対話<sup>21</sup>」が行われ, 副首相王岐山と財務長官ガイトナーが「経済合作枠組み協議」に調印した. 日本としてより注目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 この枠組み<sup>22</sup>のもとに, 新たに「戦略安全保障対話<sup>23</sup>」が設けられ, 「戦略対話の成果リスト<sup>24</sup>」7項目48カ条を発表したことであろう. オバマ政権発足半年後の2009年7月にワシントン第1回会議に始まり, 10年5月, ヒラリー・クリントン長官が200名の国務省スタッフを率いて3日間北京に滞在した北京第2回対話に続く3回目の対話の核心はなにか. 昨年の北京会議の時, 東京にはわずか3時間のみ滞在し辞任直前の鳩山首相と会談したことは, まだ記憶に新しい. その後, 東日本大震災に対して米軍は「トモダチ作戦」を展開し, 日本にとって「米軍はやはり頼りになる」と親米派が安堵した時, 米中の安全保障対話は, 新たな枠組みを設けたのである. すなわち中国からは, 中連部北米局長出身・現外交部副部长張志軍と, 解放軍副総参謀長馬曉天がS&ED中国代表団に加わって訪米し, 米統合参謀本部副議長のジェームス・カートライト海兵隊大将や太平洋軍司令部のロバート・ウィラード大将との顔合わせが実現した. この対話を受けて早くも15日には, 陳炳徳総参謀長を团长とする中国人民解放軍高級代表団がマレン米統合参謀本部議長の招きで公式訪米した. 主な随員は張海陽<sup>25</sup>, 戚建国<sup>26</sup>, 鄭勤<sup>27</sup>, 蘇支前<sup>28</sup>, 張建平<sup>29</sup>, 楊暉<sup>30</sup>, 関友飛<sup>31</sup>であった. スタインバーグ副長官とともに対話の

枠組み作りを行い, 最近辞任したホワイトハウス国家安全保障会議アジア部門の前責任者ジェフリー・ペーダー<sup>32</sup>の評価はこうだ. 「安全保障における米中対話は, 米ソ対話のレベルよりも遥かに低い. しかし, 双方がある問題について厳格な話し合い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れば, 両国の問題を解決する第一歩となるだろう. いま枠組み作りを始めたばかりの米中協議が, かつての米ソ対話(結託)のレベルに達していないのは当然だが, その方向へ向けて歩みを速めていることは決して軽視すべきではあるまい.

## VI. 国際情勢・地域問題を「二つの超大国」が管理

今回の両軍対話の再開は, 今年1月にゲイツ国防長官が中国を訪問した際に提案し, 実現した. ゲイツ国防長官は当時, 米中は今年上半期に核兵器, ミサイル防衛, ネット戦争, 宇宙空間の軍事利用などについて話し合う「新たな戦略安全対話メカニズム」を始動させると語り, 中国側代表戴秉国<sup>33</sup>が, 人民解放軍の当局者2名を戦略・経済対話に出席させると話していたことが実現する形となった. むろん, 双方の思惑には食い違いもすれ違いも見受けられる. たとえば米国側の焦点が, 「ミサイル防衛, 戦略兵器, インターネットの安全, 宇宙空間」であるのに対し, 中国側は「インターネット, 海事, 中国に対する偵察活動」を強調したようだ. 対立や摩擦は避けられないとはいえ, 3回目を迎えた「米中戦略・経済対話」の枠組みから文字通り「安全保障対話」を突き出し, 国際情勢・地域問題に関わるさまざまな摩擦の芽を「二つの超大国」が管理していく姿勢を打ち出した点は,

決して過少評価してはなるまい。

## VII. 中国外貨準備高と対米輸出市場の腐れ縁

王岐山副首相とガイトナー財務長官とが署名した「経済合作枠組み協定」は、全5カ条20項目からなる。第1条原則(1~4項)、第2条マクロ経済合作の深化(5~7項)、第3条貿易投資関係のバランスのとれた発展(8~13項)、第4条金融領域の合作深化(14~15項)、第5条地域合作と国際合作の強化(16~20項)、である。両国が国益を追求するとともに、両国の「共同利益<sup>34</sup>」と「交匯利益<sup>35</sup>」に基づいて、相手国経済の健康かつ持続的な発展が己の繁栄の不可欠の条件となっていることを相互に確認することからスタートしている。この「交匯利益」という新表現は、いうまでもなく、昨年来の「共同利益・核心利益」の二分法で生じた対立を反省した表記法と読むべきであろう。では、「己の繁栄に不可欠の条件」とはなにか。周知のように、中国の3兆ドルを超えた外貨準備高を当てにしないかぎり、米国財務省証券は追加発行できず、基軸通貨国としての米国は崩壊するのだ。逆に中国から見ると、対米輸出を中心としないかぎり、「世界の工場としての中国経済」は成り立たない。こうして米中両国経済の相互補完・相互依存関係は空前の深まりと広がりを見せている。もはや互いに相手を不可欠の条件とする「腐れ縁にも似た関係」であり、断ち切ろうにも断ち切れない構造として体制内部に深くビルトインされている。こうして、極度に入り組んだ相互依存関係を安定させることは、喫緊の課題であり、オバマ政権の対中国政策シナリオライター・スタインバーグ國務副長官が「戦略・経済対話 S&ED」の枠組み作りに2年半の時間を費やしたのは、この課題に応えるためであった。彼が、米国にとって中国は「戦略的確約保証<sup>36</sup>」の関係であり

たいと、抱負を述べたとき、國務省高官が核抑止力にかかわるキーワードを用いたことの意味は、当初日本ではほとんど理解されなかったようだ。しかし日本を超えて米財務省証券の外国保有量の2割を占める中国が、「共産主義を奉じる敵国」であったとしたら、米国は安眠できまい。米国外交は否応なしに、中国を「味方とはいえない」までも「敵ではない存在」に転化させる必要性に迫られており、57歳のスタインバーグは見事にその期待に応じて枠組みを作り上げて今夏退任した。人民元レートの切り上げにしても、中国側が抵抗する人権問題にしても、目立った進展はないが、当面の課題は「両国が協議を定例化すること、個別の懸案がより大きな相互不信につながり、爆発するのを防ぐことであるから、その意味では対話の「枠組み作り」としては、まずまず双方にとって満足できるものとみてよい。

## VIII. 「チャイメリカ」体制への歩みは広がり深まる

近年、オバマ政権が対中関係で最も力を注いできたのが元安・ドル高の問題であり、国内製品の輸出競争力を保つため、中国当局が故意に人民元の対ドル相場を不当に安く抑えていると米国は批判してきた。しかしながら、そのような手段で貯め込んだ米ドルを米国債の買い付けに当ててくれる。これは元安・ドル高の裏面であるから、この点では、米国は中国に感謝するほかない。為替レート調整がこの10年、繰り返し論じられながら、ほとんど進展がないのは、表・裏それぞれの事情を踏まえた上での応酬だから、ほとんど八百長対話に近いとさえいえよう。今回の枠組み協議では元高への政策調整のペースアップを米側は期待しつつも、中国の市場開放や知的所有権の保護など、米企業の利害により直結

した構造問題に焦点が移り始めた。人民元相場は、昨年6月以来約5%、「物価を加味すれば10%以上も上昇している」とみる新解釈を宣伝して、交換レートの是正問題を薄めたことは、米中協調の行方を示唆する変化の一つだ。他方で米政府がより重視し始めた貿易や投資の自由化は、日本の企業にも影響が波及しよう。たとえば巨大な市場規模を持つ政府調達で中国政府は、国内企業の技術向上を支援するため外国企業の参入を阻んだり、中国企業への技術移転を参入条件とするなど不当な措置をとっていると批判されているが、今回中国側は、中央・地方の両レベルで政府調達における外国企業の差別を行わない意思を示した。また、知的所有権の保護や金融サービス分野の市場開放でも、前進があった模様だ。中国政府の意思表示が、口約束に終わらず目にみえる改善につながるよう、日本も米国や欧州連合（EU）などとの連携を強め、監視や要求を続けていく必要はいうまでもない。米中対話の予定としてリストアップされた分野・項目は相当な数に上る。たとえばエネルギー合作の面では、スマートグリッド<sup>37</sup>、大規模風力発電、天然ガス、オイルシェールガス、航空燃料バイオエタノール等の面における実務合作を含めて、米中は今年に「米中エネルギー政策対話」「米中石油天然ガス工業フォーラム」「米中再生エネルギーフォーラム」などの会議を開くと明記した。2013年には米中が協力して第1回中国国際太陽エネルギーフォーラムを開く。米中は世界1、2を競うエネルギー消費国、二酸化炭素排出国だから、この動きも目を放せない。こうして「チャイナ」体制への歩みは広がり、深まる。日本はこの谷間でどう生きるか？

#### IX. 2020 ～ 30 年の中国経済展望

30年前に鄧小平が改革・開放を始めて以来、世界銀行やIMF（国際通貨基金）は、あたかも「中国市場経済の応援団」でもあるかのごとく、熱心に脱計画経済を進めようとする中国経済を応援してきたと見てよい。そして20世紀末から21世紀初めにかけて、中国経済の高度成長を称賛し、現行の成長率が今後も維持されるならば、中国経済がドイツや日本を超えるのは確実だとする見方を早くから示してきたことは、周知のとおりである。とはいえ、世界銀行やIMFはその組織の性格からして、相対的にはかなり慎重な態度で展望を示してきたように見える。これに対して、たとえば米国の証券会社ゴールドマンサックスなどは、投資家への勧誘がその仕事であり、かなり楽観的な展望を示すことが多かった。しかもこれらの楽観的展望がその後の現実の発展によって裏付けられてきたことによって、楽観論はますます勢いを増してきているのが今日の姿であるとみてよい。一例を挙げよう。英国のジャーナリスト、マーチン・ジェイクスの著書『中国が世界を支配するとき——西側世界の終焉と新世界秩序の誕生<sup>38</sup>』は、かなり挑発的なタイトルで読書界の話題をさらった本である。私はいくどか言及してきたが、この本の冒頭に掲げられているのは、「2025年の世界」「2050年の世界」における主要国のGDP予想図であり、それを試算したのは、ゴールドマンサックスである。いうまでもなくヘンリー・ポールソンは、ゴールドマンサックスのCEOを務めた後、ブッシュ政権で財務長官を務めた人物である。この例からわかるように、世界銀行やIMFの後には、米国の戦略エコノミストが控えており、その行動をみたほうがシナリオはよくわかるという話である<sup>39</sup>。数年前に提起した展望において、ゴールドマンサックスは、中国が2025年に米国に限りなく近づき、GDP2兆ドルになり、2050年には7兆ドルになり、4兆ドル台の

米国とインドを合わせた数字に近づく、と指摘した。2050年の展望は40年後のことなので棚上げするとして、2025年の展望はすでに「15年後の現実」であり、ある程度の現実的可能性をもつ予想と見て、ビジネス界が動き出していることに着目すべきであろう。この種の見通しを踏まえた上での長期的ビジネス戦略を打ち出す例が現れたので、その一端を紹介してみよ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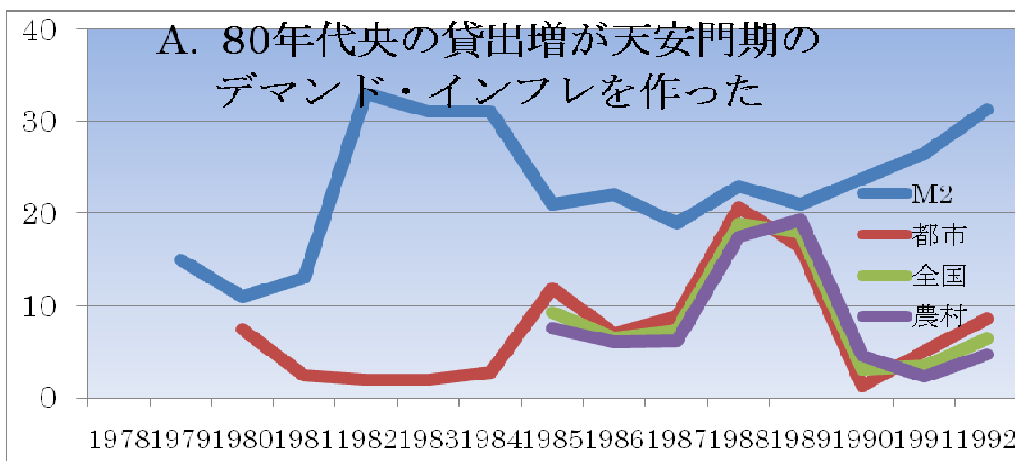
### X. 動き出した新ビジネス戦略

旧聞だが、2010年1月21日AFP電によると、「中国は早ければ2020年には米国を抜いて世界最大の経済大国となる」と予想する米コンサルティング会社プライスウォーターハウスクーパース<sup>40</sup>の市場予測を発表している。各種展望を前倒したかに見えるこのレポートによると、世界の経済大国の間に「地殻変動」が起き、2030年までに世界経済のトップ10は中国、米国、インド、日本、ブラジル、ロシア、ドイツ、メキシコ、フランス、英国の順となると予測した。すなわちPWCのマクロ経済部門を統括するジョン・ホークワース<sup>41</sup>が、米欧の経済と比較して、中国とインドが今後、世界のGDPに占める割合を急速に伸ばしていくだろうとの見通しを表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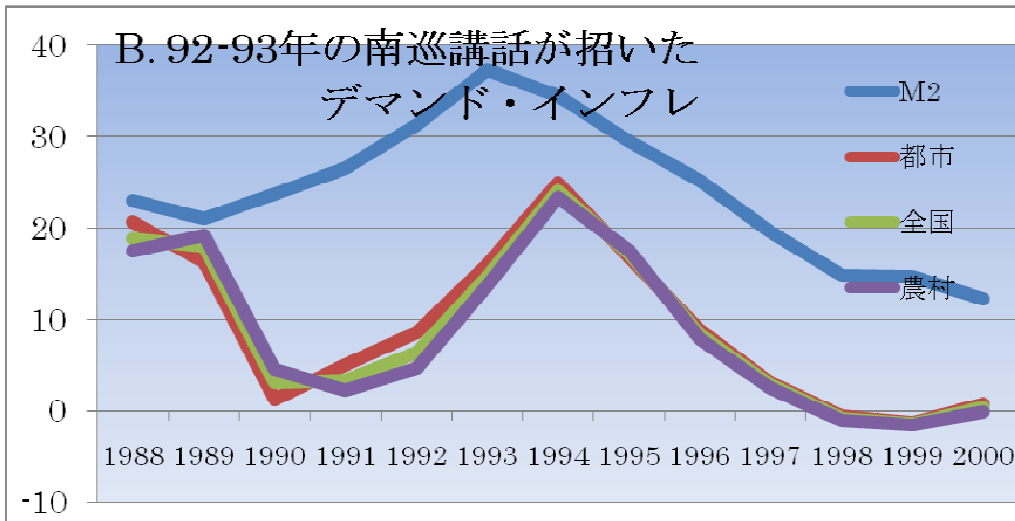
し、「中国は早ければ20年までに<sup>42</sup>世界最大の経済大国になり、30年までには<sup>43</sup>米国に差をつけるほどまでに成長する」、「インドは<sup>44</sup>、20年以後になって、成長率で中国を追い抜き、国内総生産（GDP）が急速に上昇する可能性もある」などと指摘した。これはいわば楽観論の前倒しの構図だ。同じ米コンサルティング会社プライスウォーターハウスクーパースは、半年後の6月15日、エンターテインメント産業とメディア産業に関するレポート<sup>45</sup>を発表し、この中で今後5年以内に、中国が日本を抜いて「世界第2位の広告市場になる」との見通しを示した。同レポートは、現在米国に次いで世界第2位の日本の広告業界はほぼ横ばいであるのに対し、中国の広告業界は成長を続けていくとの見方を示すとともに、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ゲーム産業の規模は、2014年までに音楽産業の4倍に成長すると指摘し、「ゲーム市場でも中国は2012年までに日本を追い抜く」と予測している。このレポートは、世界48カ国のテレビ、音楽、映画、ゲーム、ラジオ、出版、広告などの分野を対象に調査されたものだ<sup>46</sup>。

### XI. 懸念されるインフレと従属人口の増大 ・デマンド・プル型インフレからコスト・プッシュ型インフレへの転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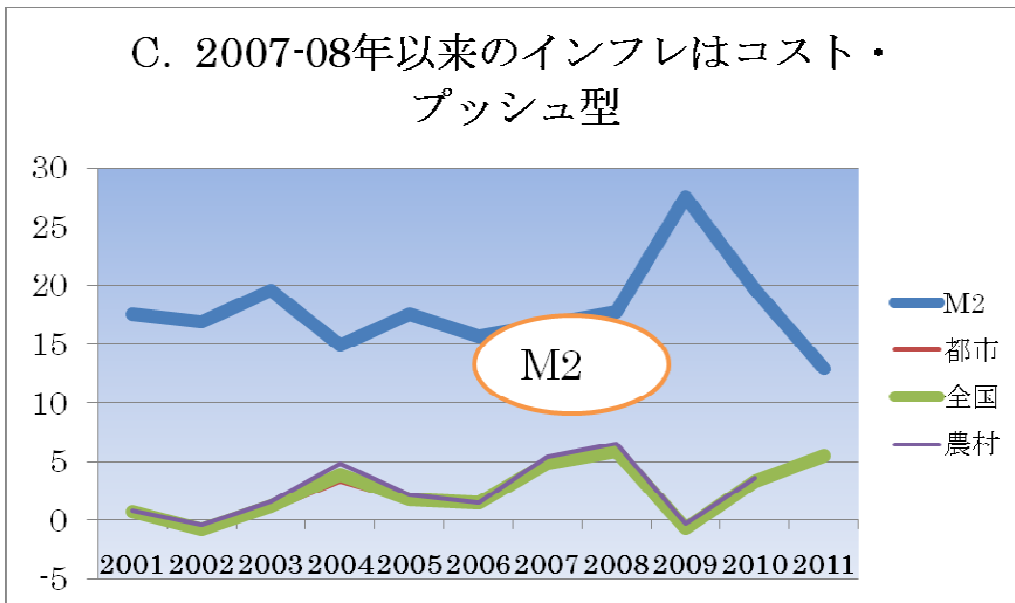
【図 A】80年代半の貸出増が招いたデマンド・プル型インフレ



[図 B] 1992～93年の南巡講話が招いたデマンド・プル型インフレ



[図 C] 2007～08年以降のコストプッシュ型インフレ



20世紀から21世紀への転換時に、中国経済はデフレに悩まされていた。ところが21世紀最初の10年の後半期はインフレが庶民の生活を直撃している。このインフレについて、2008年秋のリーマン・ショックに対応すべく中国当局が打ち出した4兆元緊急支出がインフレの原因だと見る見方が少なくない。改革・開放期の二つのインフレは、図A、図

Bの示すように、いずれも過剰な通貨供給が招いたインフレであるところから、その類推で2007年以降のインフレの原因を通貨供給に求める見方が出て来るのは、無理からぬところがある。

しかしながら、図Cから分かるように、2009年におけるM2の激増とこの年における物価の対前年伸び率マイナスは際立った対

象を見せている。この箇所から判断して、M2の増加が物価値上がりの犯人とは、到底いえない。2006年を底として2007～08年の物価は都市・農村ともに値上がり基調であり、リーマン・ショックのために、2009年は一時的に対前年マイナスを記録したものの、2010年には値上がり基調に戻していることが読み取れよう。ここから2007年以降のインフレは従来の需要超過型インフレではなく、むしろ災害や外国輸入資源など供給サイドの要因に起因するコスト・プッシュ型インフレと見るのが妥当だという話になる。

・今回のインフレは80年代、90年代のそれと異なる

中国人民銀行および国家統計局がM2のデータを定期的に出すようになったのは1991年以降であり、80年代はそのデータが得られない。そこでこの期については、『金融安定報告』各年版から銀行貸出を調べて、その「貸出増」をもって、M2の対前年伸び率の代わりに用いる。こうして「代替M2」<sup>47</sup>と物価値上がりとの関係を見ると、明白な因果関係が浮かび上がる。すなわち、1982～84年のいわゆる改革躍進に伴う通貨供給増が、3年遅れて1988～89年の狂乱物価現象をもたらした、それが人々の心理を動かし、天安門広場へ駆り立てたのであった。「官倒」すなわち官僚ブローカーが目の仇にされた。本来公定の市場に回すべき自転車などの生活用品をヤミ市場に密かに回して暴利をむさぼる役人が怨嗟的になった。当時は、丈夫で長持ちする自転車が庶民の憧れの的であり、現在のマイカー・ブームとは、まさに様変わりの市場風景だ。1991年の旧ソ連解体、これに危機感を抱いて鄧小平が改革の死守を訴えた92年以後の南巡講話が招いたデマンド・インフレは、鄧小平の呼びかけに呼応する形で、1992～93年の中国経済は、天安門事件後の逼塞状況から一挙に改革の春を迎えた。1991年後

半から増え始めたM2は93年にピークを迎えた。これを後追いつめるかのように、物価は94年にピークを迎え、やがて1997～98年のアジア通貨危機の時期につながる。先行するM2に導かれる形のインフレは、基本的な構図において同じパターンである。ここから80年代と90年代の中国のインフレはいずれも先行するM2に導かれたデマンド・インフレだと結論してよい。このパターンと、今回のパターンは、明らかに異質である。これは80年代、90年代の高度成長を経て、中国経済に供給面での隘路が生まれ、この経済構造の転型に伴う原材料、労働力などの供給摩擦が今日のインフレをもたらしていると見てよい。80年代から2010年に至る30年の高度成長が中国経済の基底を大きく変貌させつつあることは、明らかな事実であり、このような構造変化を踏まえて第12次5カ年計画が推進されることになる。

・「人口オーナス時代」の負担を一人っ子が支えきれるか

経済発展を支えるさまざまな要素のうち、最も重要な要素が人口すなわち労働力であることはいうまでもない。エコノミスト藻谷浩介の書いた『デフレの正体——経済は「人口の波」で動く』<sup>48</sup>は、タイトルそのままに、日本経済を襲っているデフレの正体は、少子高齢化が原因なのだと言いついて大きな話題を呼んだ。なるほど、バブルが弾けて以後長く続く日本経済の低迷と、躍進する中国経済の最も際立った特徴が若い労働力人口の豊かさにあることは、誰もが実感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る。藻谷浩介流の観点によれば、中国のこれからの労働力需給展望は、大きな関心の的になることはいうまでもない。中国はこれまで子供と老人が少なく、生産年齢人口の多い「人口ボーナス」状況をフルに活用してきた。それどころか、これまで「最低限7%の経済成長が必要だ」と繰り返してきたのは、毎年生

産年齢人口として労働市場に新入りする若者の雇用確保のために必要な措置として、ほとんど至上命令扱いされてきたのである。中国の人口ボーナスを象徴する出来事であった。ところが、一人っ子政策を30年続けてきた結果、人口ボーナス時代は終り、人口オーナスの時代に確実に移行しつつある。中国の人口構成において、一人っ子世代が生産年齢人口になり、これが減少する反面、高齢人口は、日本の後を急いで追いかかると急増しつつある。甘やかされて育った一人っ子が果たして、日本よりももっと急速に高齢化する親たちを扶養できるのか。

1980～2010年の30年間、太線で示した「従属人口指数」は一貫して低下した。この指数は分母に生産人口をとり、分子は「年少人口+老年人口」をとる。中国の場合、分子が小さくなり、分母が増えたことによって、「従属人口指数」は低下したわけだ。しかし、この傾向は、まさに第12次5カ年計画の目標年である2015年あたりを境に反転する。生産年齢人口が減少し、彼らが支える「年少人口+老年人口」、特に後者が急激に増加する。今後10年間は、まさにその転換点に位置する。このような人口構造の転換が経済発展にどのような影響を与えるかは、ある程度の予想がつくとはいえ、実際にはさまざまな予想を超える事態も生まれよう。とはいえ、従属人口指数の変化にもかかわらず、量としては生産年齢人口は依然他の諸国と比べてきわめて大きいので、比率だけではなく、絶対数で考慮すべきことも確かである。他方、労働力の不足現象が生まれて始めて労働節約技術が発展する側面も大きいはずだ。こうして中国にとって第12次5カ年計画期はこれまでの量的経済発展から質的経済成長、循環型の経済成長を模索する大きな転換点になるものと見られる。

## むすび——中国官僚資本主義体制の成立

2011年7月1日、中国共産党は建党90周年を祝賀したが、祝賀ムードから透けて見えるのは、以後2～3カ月、社会の治安維持のために全力をあげる方針を繰り返し、伝達している姿である。そのキーワードは、2011年2月に行なわれた胡錦濤講話<sup>49</sup>でにわかに注目された「社会管理」の4文字である。「社会管理」というキーワードは、第12次5カ年計画要綱にも書かれているが、これは中国の直面する重大な社会問題群、たとえば①流動人口、②インターネット言論の活発化、③都市・農村境界付近の社会治安問題、④犯罪者の管理、⑤NGO・NPO等社会組織の管理などに対して、「管理」を旨とする方針を指す。この事実から明らかなように、中南海はいま「下からの政治体制改革」はあらゆる手段を駆使して徹底的に封じ込めて、代わりに「上からの社会管理」に特別の努力を傾注している。市場経済システムの導入のもとで、経済活動に関するかぎり一定の自由化が進展したが、その背後で着実に進展してきたのは「管理社会」の構築にほかならない。市場経済が生み出した社会問題群を中南海がどこまで管理しきれるか。

### 1. 「官僚主義者階級」という概念

(1) トロツキーは『裏切られた革命』(1937年)で、「官僚制が生産手段を統制している」事実は認めしたが、「特定の所有形態を欠いている」との理由によって、支配「階級」を構成しているとはいえないと考えた。したがってソ連にとって必要なのは、「十月革命のような社会革命」ではなく、「官僚制の排除を目的とした政治革命である」と結論した。

(2) その後、イタリアのブルーノ・リッツィは『世界の官僚制化』(1939年)において、官僚制はみずから高い給料を支払うことによつ

て、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の剰余価値を所有するようになった以上、ソ連では「新しい階級が発生した」と論じた。ただリッツイは官僚制の技能を高く評価し、官僚と労働者階級との間のギャップが最小に至るべく労働者生活の物質的条件を高めるうえで官僚制が有効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た。

(3)リッツイに代表される「新しい階級」論をさらに徹底させたのは、ミロバン・ジラス(ユーゴスラビアの理論家、元大統領補佐)の『新しい階級』(1957年)であった。ジラスは、「社会主義国家は政党によって運営されており、政党は官僚制である」、「官僚制は国有財産を使用、処分する権限をもつがゆえに一つの階級である」、「この官僚制は、権力とイデオロギー的独断主義という二つの重要な要素に依拠している」、「これは過渡的な現象ではなく、国家制度の特殊類型の一つである」、と主張した。

(4)ジラス以後、社会主義における官僚制の問題に対して、最も大胆な主張を展開したのが毛沢東であり、1964年5月にこう断定した。「現在のソ連はブルジョア独裁、大ブルジョア独裁、ナチスのファシズム独裁、ヒトラー流の独裁である。彼らはゴロツキ集団であり、ドゴールよりもはるかに悪い」<sup>50</sup>。ソ連の現実の姿のなかに、中国の明日を垣間見た毛沢東は同年、こう敷衍した。「官僚主義者階級と労働者・貧農・下層中農とは鋭く対立した二つの階級である」、「資本主義の道を歩むこれらの指導者[走資派あるいは実権派]は労働者階級の血を吸うブルジョア分子にすでに変わってしまったか、あるいは今まさに変わりつつある」。

(5)「社会主義における官僚制論」の系譜を考察してみると、毛沢東の性急さがよく分かる。21世紀初頭における中国の現実こそが、まさに「官僚主義者階級」が生産手段を所有し、名実ともにみずからの階級を再生産でき

る条件を整え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毛沢東は条件が整う前に誤った戦闘を挑むことによって、戦闘の主体をつぶしてしまったように見える。現代中国の「労働者・貧農・下層中農」は、「血を吸うブルジョア分子」に闘いを挑むイデオロギーも組織もともに欠いている。

## 2. 中国の特権階級——ノームクラツラ制度

### (1)ノームクラツラとはなにか

ノームクラツラ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とは、リストを意味するラテン語起源のロシア語である。このことばは、旧ソ連の亡命史家ミハイル・ヴォレンスキーの書いた『ノームクラツラ——ソヴェトの特権階級』<sup>51</sup>がベスト・セラーになったのをきっかけとして現代人の常用語の一つとなった。ポーランド統一労働者党中央委員会政治局「党中央委員会、地方委員会、郡委員会のノームクラツラに属するポストの一覧表」<sup>52</sup>とその解説が日本語で読め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80年代初頭であった<sup>53</sup>。しかしこの言葉も旧ソ連の解体や東欧の民主化のなかで歴史用語化しつつある。社会主義諸国において各種の国家機関や社会機関に対して、党が指導的役割を発揮するというばあい、外側からは「党の決議や指令」をとおして働きかけ、内側からは中に働く「党員たちの活動」をとおして影響力をおよぼすという二つのチャンネルがありうる。しかし、実際にはノームクラツラ制こそがそうした働きかけに実効性をあたえる制度的保証であり、「指導的役割」の実体そのものであったことがいまでは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る。「社会主義が勝ち取ったものを守れ」とか「党の指導的役割を堅持せよ」と繰り返し呼びかけられてきたが、これは端的にいえばノームクラツラ制を守れという主張と同義なのであった。ノームクラツラ制には「党組織のポスト」に関するものと、「党外



のポスト」に関するものと二種類ある。各レベルの党委員会は、あたかもみずからの所領のごとくに「直接的に所有するノーマンクラツラ」のほかに、「報告を受けるノーマンクラツラ」<sup>54</sup>と呼ばれる補助的なリスト<sup>55</sup>をもっている。この補完的なノーマンクラツラをつうじて、各レベルの党機関は、直接の人事権をもたない多数の人間に目をくばり、必要に応じて人材をノーマンクラツラに引き上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く<sup>56</sup>。

要するに、ノーマンクラツラとは元来は幹部ポストを列挙したリストのことだが、そのポストに就任する幹部をも指し、転じて現存社会主義国の支配者集団をも意味している。旧ソ連のノーマンクラツラの中国版こそ、一つは「中共中央の管理する幹部職務名称表」<sup>57</sup>であり、もう一つが「中央への報告を要する幹部職務名称表」<sup>58</sup>である。これは従来極秘とされてきたが、近年の情報公開のなかで、その一端が公開された書物の中に現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たとえば50年代に党中央組織部で働いた安子文の功績を記した伝記<sup>59</sup>が、資料の一つである。

これによると、安子文<sup>60</sup>は1950年12月8日、毛沢東、劉少奇に報告書を書いて、ソ連共産党のノーマンクラツラ制度を学び、幹部管理制度を樹立するよう問題提起を行なっている。ついで51年4月13日、全国人事工作座談会で安子文は「幹部管理制度」を提起し、これを「幹部職務名単制」<sup>61</sup>と略称したが、その原案こそロシア流のノーマンクラツラ制にほかならなかった。53年4月1日、劉少奇は当時モスクワで第一次五カ年計画策定のために、ソ連側と交渉していた李富春<sup>62</sup>に電報を送り、七項目の問題点について文書でソ連から教示を得ようとした。4月3日、安子文は劉少奇の意を体して李富春に必要事項の具体的内容を書いた手紙を送った。これに対してソ連共産党は中央書記サターリンを

指名して李富春と会わせ<sup>63</sup>、ソ連のやり方を紹介した。この紹介に基づいて中央組織部が「幹部管理工作を強化することについての決定」を起草し、これは53年11月に正式決議として通達された。

これによると、当時の幹部制度は9種類からなっていた。

**表3 1950年代の幹部制度**

<p>1.軍隊幹部——軍事委員会の「総幹部部」(幹部問題を担当する部門)、総政治部および軍隊の各級「幹部部」、政治部が管理に責任を負う。2.文教工作幹部——党委員会の宣伝部が管理に責任を負う。3.計画、工業工作の幹部——党委員会の計画、工業部が管理に責任を負う。4.財政、貿易工作幹部——党委員会の財政、貿易工作部が管理に責任を負う。5.交通、運輸工作幹部——党委員会の交通、運輸部が管理に責任を負う。6.農業、林業、水利工作幹部——党委員会の農村工作部が管理に責任を負う。7.統一戦線工作に関わる幹部——党の統戦工作部が管理に責任を負う。8.政法(「政法」とは政治法律の略だが、実際には司法治安系統を指す)工作幹部——党委員会の政法工作部が管理に責任を負う。9.党群(党と大衆)工作幹部とその他の工作幹部——党委員会の組織部が管理に責任を負う。</p>
---

さらに、各部門について、全国各方面に関わる「重要職務を担う幹部」は中央が管理し、「その他の幹部」は中央局・分局<sup>64</sup>および各級党委員会が管理するものとした。この決定に基づいて、一九五四年までに中央組織部内に1.工業、2.財政貿易、3.交通運輸、4.政法などの「幹部管理処」が設けられ、1955年1月には中共中央は「中央の管理する幹部職務名称表」を正式に公布するに至った。そして各省、国務院各部門に対しては、1955年9月そ

それぞれの「幹部職務名称表」を作るよう指示したのであった<sup>65</sup>。もう一つの資料<sup>66</sup>によると、1955年1月、党中央は「中共中央の管理する幹部職務名称表を出すことについての決定」を下達している。1955年9月、党中央は「各省、国务院各部門がそれぞれの管理する幹部職務名称表」を迅速に制定するよう通知し督促している。こうした経緯を経て、中国流のノーメンクラトゥーラ・システムが成立した。

### (2)中国のノーメンクラトゥーラ(1990年リスト)

文化大革命期には多くの幹部が「資本主義の道を歩む実権派」として批判されたために、幹部制度はほとんどマヒした。しかし鄧小平時代になると、文化大革命以前の制度がそっくり復活した。転換点は1978年12月の11期3中全会であった。会議から1年半後の1980年5月20日、党中央組織部は、いわゆる「27号通知<sup>67</sup>」を出し、改めてノーメンクラトゥーラ体制の再建を指示した。この通知には「中組発〔1980〕27号」という書類番号が付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は中国共産党中央組織部発、1980年27号通知の意だ。この「27号通知」は鄧小平時代のノーメンクラトゥーラ制再構築の原点である。この27号通知に付された肝心のリスト、すなわち「中共中央の管理する幹部職務名称表」<sup>68</sup>そのものは、入手できない。しかし、これに若干の修正を加えたものである84年のリスト、すなわち「中共中央の管理する幹部職務名称表および中共中央に報告する幹部職務名称表(1984年7月)」は、読むことができる<sup>69</sup>。入手できるリストのうち最新のものは「中共中央の管理する幹部職務名称表および中共中央に報告する幹部職務名称表<sup>70</sup>」である。ノーメンクラトゥーラ・リストとしてはさらに、次のリストも流布されている<sup>71</sup>。矢吹は中国のノーメンクラトゥーラ制についていくどか語ってきたが<sup>72</sup>肝心の

基本資料すなわち『人事工作文件選編』<sup>73</sup>という重要資料を入手したのは、80年代央であった。

### 3. 中国ノーメンクラトゥーラの構造

中国共産党の組織は、基本的に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基層組織の3段階に分けられる。このうち、中央組織は中央政治局と中央委員会である。地方組織は省級党委員会と県級党委員会の2級からなる<sup>74</sup>。最後に企業、農村、機関学校、科学研究機関、街道、人民解放軍の中隊レベルなど「基層組織」<sup>75</sup>に基層委員会<sup>76</sup>がもうけられている。省級党委員会の書記、副書記、常務委員および紀律検査委員会書記のポストは、表向きは同級の党委員会の選挙で選ばれ、「上一級」<sup>77</sup>の備案を得るものと党規約では規定されている。上級の備案が得られない人物を下級が選ぶことはできない。省級党委員会の選挙はあらかじめ中央が采配した任命リストに基づいてを行なわれるとみたほうが妥当であろう。

この1990年リストを以下の1998年リスト<sup>78</sup>と比べると、20世紀末、21世紀初頭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の支配構造が一目瞭然となる。すなわち1.中央直属机关机构领导干部职务类(33単位)、2.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干部职务类(74単位)、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国家机关领导干部职务类(120単位)、4.中央管理的社会团体领导干部职务类(20単位)、5.中央管理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职务类(10単位)、6.中央管理的国有重点企业领导干部职务类(53単位)、7.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委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监事会主席(22単位)、8.中央管理的高等学校领导干部职务类(31単位)、9.中央管理的其它单位领导干部职务类(9単位)、計372単位に拡大し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90年リストでは「備案リスト」に収められていた大学や国有企業の名が正規のリストに昇格し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2012.1.8)

脚注\*

- <sup>1</sup> 横浜市立大学名誉教授.
- <sup>2</sup> 『中央公論』2010年4月号.
- <sup>3</sup> ただし、最近のニュースによると、孔子学院の展開は、大きな壁にぶつかったという。双務主義の原則に基づいて、中国国内に諸国の某々学院の設立を迫られ、その扱いをめぐって國務院教育部は対応に苦慮している由だ。
- <sup>4</sup> 五個不搞.
- <sup>5</sup> 原文＝中共“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 <sup>6</sup> 2008年アピールの意.
- <sup>7</sup> 現実にこの党が存在するか否かはさておき.
- <sup>8</sup>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2006年8月6日《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
- <sup>9</sup> 年齢は2012年央基準.
- <sup>10</sup> 少なくとも中央候補委員.
- <sup>11</sup> 1944年生まれ.
- <sup>12</sup> 1944年生まれ.
- <sup>13</sup> 1944年生まれ.
- <sup>14</sup> 1942年生まれ.
- <sup>15</sup> 1943年生まれ.
- <sup>16</sup> 海軍司令員.
- <sup>17</sup> 総装備部部长.
- <sup>18</sup> 空軍司令員.
- <sup>19</sup> 習近平は副主席にとどまり、胡錦涛主席は18期4中全会まで留任か.
- <sup>20</sup>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 <sup>21</sup> Strategic & Economic Dialogue=S&ED.
- <sup>22</sup> S&ED, the Strategic Track.
- <sup>23</sup> Strategic Security Dialogue=SSD.
- <sup>24</sup> Outcomes of the Strategic Track.
- <sup>25</sup> 第2砲兵部隊政治委員.
- <sup>26</sup> 参謀長補佐.
- <sup>27</sup> 広州軍区副司令員.
- <sup>28</sup> 南京軍区副司令員兼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
- <sup>29</sup> 濟南軍区副司令員兼同軍区空軍司令員.
- <sup>30</sup> 総参謀部情報部長.
- <sup>31</sup> 総参謀部外事弁公室副主任.
- <sup>32</sup> 現ブルッキングス研究所中国センター.
- <sup>33</sup> 國務委員の肩書よりも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の肩書に着目したい。外交だけではなく、安全保障面でも辦公室主任を務めている点が重要である。
- <sup>34</sup> Common Interests.
- <sup>35</sup> Overlapping Interests. 重複する利益の意.
- <sup>36</sup> Strategic Reassurance.
- <sup>37</sup> 中文= 智能電網.
- <sup>38</sup> Martin Ja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 The Penguin Press, 2009.
- <sup>39</sup> ちなみに世界銀行の現総裁ゼーリックは、2011年夏に辞任したばかりのスタインバーク國務副長官の前任者であり、2006年当時、中国を stake-holder (利益共有者) と位置づけられて話題になった人物だ。
- <sup>40</sup>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PWC.
- <sup>41</sup> John Hawksworth.
- <sup>42</sup> すなわち10年後.
- <sup>43</sup> すなわち20年後.
- <sup>44</sup> 中国に対して人口増加率が高いため.
- <sup>45</sup> *Global Entertainment and Media Outlook 2010 ~ 2014*.
- <sup>46</sup> AFP/Adrian Addison.
- <sup>47</sup> 実は銀行貸出増.
- <sup>48</sup> 角川新書, 2010年6月.
- <sup>49</sup>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人民日報』2011年2月20日.

- <sup>50</sup> 「対陳正人同志蹲点報告的批示 1965年1月29日」『文選』34 ページ。「在計委領導小組匯報時的一些插話 1964年5月11日」。矢吹編訳『毛沢東社会主義建設を語る』256 ページ所収。
- <sup>51</sup> M.S. ヴォレンスキー著『ノーメンクラトゥーラ』ミュンヘン、パリ、1980年、邦訳・中央公論社、1981年。
- <sup>52</sup> 1972年10月付指令。
- <sup>53</sup> 鈴木博信「ノーメンクラトゥーラ制覚書」『中央公論』1981年11月号。
- <sup>54</sup> Учо́ртна́я・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чётн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 <sup>55</sup> 中国語では「備案名単」と訳された。
- <sup>56</sup> なお、旧ソ連のばあい、ソビエト共産党中央委員会はおよそ4万のキーポストを権限下におき、モスクワ市党委員会と同市地区委員会にはあわせて約1.7万のポストがあったといわれる。
- <sup>57</sup> 原文＝中共中央管理的幹部職務名称表。このリストに掲載されたポストに就く要員は「中央幹部」あるいは「国家幹部」と俗称されている。筆者はこの職位を「任命ポスト」と略称する。
- <sup>58</sup> 原文＝向中央備案的幹部職務名単。以下では「備案ポスト」と略称する。
- <sup>59</sup> 『安子文伝略』陳野萍、韓勁草主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
- <sup>60</sup> 1945年中央組織部副部長、56年組織部部長就任。
- <sup>61</sup> 「名単」とは名簿の意。
- <sup>62</sup> 国家計画委員会副主任。
- <sup>63</sup> 4月20日、5月5日の両日。
- <sup>64</sup> 中央局・分局とは中国全土を六大行政区に分けて、それぞれに派遣された中央を代表する出先機関を指す。
- <sup>65</sup> 『安子文伝略』陳野萍、韓勁草主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109～112頁。
- <sup>66</sup> 『中国共産党大辞典』「黨員与幹部」の項、307頁。
- <sup>67</sup> 「中共中央の管理する幹部職務名称表」を通達する通知。「中央組織部關於重新頒發《中共中央管理的幹部職務名称表》的通知」（中組發〔1980〕27号。『人事工作文件選編』IV卷、158～164頁。
- <sup>68</sup> 1980年5月。
- <sup>69</sup> 「中共中央管理的幹部職務名称表」「向中央備案的幹部職務名単」『人事工作文件選編（幹部管理部分）』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398～405頁、405～412頁。
- <sup>70</sup> 1990年5月10日、中組發〔1990〕XX号）」および《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通知(1998年8月13日、中組發〔1998〕11号。「中央組織部關於修訂《中共中央管理的幹部職務名称表》的通知」（中組發〔1990〕2号）『人事工作文件選編』XIII卷、35～38頁および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修订《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通知(1990年5月10日 中組發〔1990〕XX号、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修订《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通知(1998年8月13日 中組發〔1998〕11号)。
- <sup>71</sup> ①「中共中央統一戰線部の管理する幹部職務名称表(1981年1月)」（「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關於中央統戰部分管幹部的請示」（中組發〔1981〕第1号）、統戰部發文〔1981〕第1号）、「中央統戰部分管幹部職務名称表」（『人事工作文件選編』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349～351ページ）、②「中国人民銀行が管理する幹部職務名称表(1984年8月)」（「中共中国人民銀行党组關於印發『中国人民銀行管理的幹部職務名称表』的通知」（84銀党字第42号）、「中国人民銀行管理的幹部職務名称表」(『人事工作文件選編』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414～416ページ)。

<sup>72</sup> たとえば『蒼蒼』19号, 1988年4月号の矢吹晋「逆耳順耳」, のち『ペキノロジー』蒼蒼社, 1991年6月, 84~85頁所収.

<sup>73</sup> 『人事工作文件選編』I~XV. このうちI~IIIは国家人事局編, IV~XVは労働人事部政策研究室編, 労働人事出版社, 1984年~1993年. および『人事工作文件選編(幹部管理部分)』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5年.

<sup>74</sup> なお, 地区級は省級機構の出先機関にすぎず, 自治州などの例外を除き, 独自の行政レベルを構成しているものではない.

<sup>75</sup> 基層とは末端の意.

<sup>76</sup> あるいは総支部委員会, 支部委員会.

<sup>77</sup> 直属上級, すなわち中央委員会を代表する中央組織部.

<sup>78</sup> 中组发[1998]11号.

## 中国農業のアフリカ進出の現状と要因

### —農業援助、貿易、直接投資—

高橋五郎<sup>1</sup>

#### 要旨

中国の対アフリカ農業直接投資は、1950年代中期以降の援助と貿易の経験を基盤に、徐々に増加する傾向にある。その要因は中国政府の援助外交の効果、その直接的成果としてのアフリカ各地で展開される経済特区、農業技術支援センターの設置、農業担い手の育成・支援など多彩である。中国企業の場合は単に、政府の対アフリカ政策の共助者としてだけでなく、自らの企業的意思に基づくアフリカ進出を展開し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援助、FOCAC、中国農業直接投資**

#### はじめに。中国のアフリカ関与研究の視点

中国とアフリカ研究者であるエラスムス大学(オランダ)のM.ダイク教授(Meine Pieter van Dijk)は永年の研究を通じて、中国のアフリカ関与の研究の視点として、次の5つを挙げている<sup>2</sup>。

- アフリカにどのくらいの中国人が住み、あるいは仕事に就いているか。
- 財とサービスがアフリカに亘っている状況(貿易)。
- 中国の対アフリカ援助の実態：供与、ソフトローン、債務救済。
- 中国の対アフリカ直接投資の役割。
- 中・ア間におけるその他の金融の流れ：通常ローンと輸出信用便益。

これらの視点はおおまかにいえば常識的な視点であるが、そのすべてを網羅的に研究することはたやすいことではない。中国もアフリカもこれらの点に関し、十分な情報公開をしていないからであり、またそれを補うかた

ちで取り組もうとする各種の実態調査にもさまざまな障害があるからである。しかし、M.ダイク教授は、そのような障害があるなかで注目すべき研究成果[1]を挙げている。

そして上述の視点は中国とアフリカに限らず、中国と南米、中国とアジアなど広範なケースに当てはまるところがある。この視点に倣うと、本稿の場合は、中国のアフリカ進出という枠組みとなるので、中国の援助と直接投資ということになる。中国のアフリカ進出という視点からの研究や分析、情報解説は、中国の世界的台頭とともに、日本、欧米、中国を問わず、最近めざましく増加する傾向にある[1][2][3][4]等。

しかし、中国の対アフリカ進出の文脈において農業分野に焦点を当てている研究は限られる[5]。本稿は、農業援助から農業直接投資に自然に転換していく過程に焦点を当てた点に特徴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る。

#### I. 援助の発展としての直接投資

中国のアフリカ農業進出について、本稿は幅広くとらえている。具体的には農業や農業関連分野の振興をねらいとする多様な援助、貿易、直接投資である。そのもとで、これを第一期と第二期と、大きく二つの時期に分ける。

第一期は1950年代から1990年代前半、第二期は1996年頃から現在までである。進出の主要な内容が、援助・貿易であった時期を第一期、直接投資が増え始める時期を第二期と区分するわけである。本稿ではその役割分析や効果測定について言及しないが、とくに貿易の発展には、中国輸出入銀行の果たした役割は大きいと言われている<sup>3</sup>。

中国の対アフリカ政策の変化という視点から1949-1977年、1978-1994年、1995-現在と3つに分ける方法<sup>4</sup>もあるが、ここではこれを参考程度にとどめる。というのは、この3つに分ける考え方は、中国経済の発展スピードを基準にしているが、対アフリカ関係における中国の姿勢は経済力を超えた視点が基礎にあり、かつ重要な要因にな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からである。

また援助に重点をおいて1956-1978年(戦略援助期)、1979-1999年(経済援助期)、2000年以降(ウイン・ウイン関係期：期別の呼称は引用者)と分ける方法もあり<sup>5</sup>、非常に有意義な区分ではあるが、本稿が取り扱う直接投資の視点を加えるとふさわしいものではないのでこれも参考にとどめたい。

本稿では、中・ア間の貿易関係の実態や廉価な中国製品のアフリカにおける氾濫状況の紹介などについては他の報告など<sup>6</sup>に譲り、中・ア関係の基礎を作り上げた援助政策、そして農業直接投資に絞った考察を行う。

中国とアフリカの貿易については、GDPに占める貿易依存度という指標を用いて、本ジャーナル上で国別の対中依存度の拡大傾向と

その大きさを分析したことがあるので参照して頂きたい[10]。

そして本稿を通じて、中国の対アフリカ援助が、その中国的方式ゆえに、その後の直接投資を誘因し発展させる内的要因になる点を明らかにしたい。このような視点はすでにD. ブロティンガム (Deborah Brautigam) によって与えられている<sup>7</sup>が、本稿では、援助を直接投資の前段階となった、と明確に位置付けたい。

## II. 第一期：中国の対アフリカ農業進出 —対アフリカ農業援助—

### 1. 「中国的対外援助白書」

1956年、アフリカで最初の国交樹立国となったエジプト[8]とアルジェリア(1958年国交樹立)から始まった中国の対アフリカ援助の推移をみると、最も契約件数が多かったのは1970年代であり、これに60年代が次ぎ、80年代から90年代にかけ徐々に減少する<sup>8</sup>。

1971年、念願の国連議席回復を実現した中国はこの70年代、そのために協力したアフリカへの報奨ともいえるような多額の援助に取り組んだようである。しかしDAC未加盟の中国援助情報の実態は断片的にしか分からず、中国とアフリカの関係を考察するためには大きな障害となっている。

2011年4月、中国政府はそれまで非公表であった対外援助を「中国的対外援助白書」として2009年までの概要を公表した。そこではさまざまな形態を含めて総額2,562.9億元、うち無償資金援助1,062億元、無利子借款765.4億元、優遇借款735.5億元の資金援助を行ったとされている。ただし国別の援助内容は公表せず、依然として援助の詳細は不明である。ましてや、農業関連援助の正確な全容の詳細となるとまったく不明である。

J.シャポニエール (Jean-Rapbael Chaponniere) も、分野ごとの実態は解明できなかったものの、この難行に挑んだ研究結果を公表している。それによれば、表1が示すように、1959年以降2005年まで、アフリカ諸国に対し総額85億ドルの援助が行われた。上述の援助白書から推測すると、この大部分は無償資金援助と無利子借款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い。彼の研究は大きな意義があるが、また同白書などに記載されている国の事例が欠落していたりするので万全ではないが、十分に参考になる資料である<sup>9</sup>。この表では期間を1959-1998年、2004-2005年と分けてあり、1999-2003年が抜けているので正確とはいえないが、おおまかな援助対象国とその金額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点で参考になる。1970-1975年に4億5,000万ドルの無利子借款で建設したとされるタンザン鉄道も、タンザニアに対する5億3,400万ドルの資金援助に含まれると思われる。

表1 中国の対アフリカ援助 (100万ドル)

	1959-1998	2004-2005
タンザニア	534	181
ザンビア	372	チュニジア 65
DRコンゴ	303	ナイジェリア 787
モーリタニア	239	アンゴラ 305
スーダン	230	1342
ソマリア	220	ボツワナ 265
コンゴ	205	南アフリカ 82
エジプト	193	276
ギニア	161	リビア 132
エチオピア	155	ジンバブエ 89
マリ	148	169
マダガスカル	144	エチオピア 77
ブルンジ	125	モーリシャス 76
カメルーン	124	赤道ギニア 75.6
モザンビーク	116	ガーナ 69
セネガル	108	コンゴ 68
アルジェリア	100	1065

出展: Ed. by Meine Pieter Van Dijk, The new presence of China in Africa,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p.67.

「中国的対外援助白書」にもとづいて、農業援助の多少具体的な事例を紹介しておきた

い。時期は不明だが、ギニアピサオに対する11か所の合計2,000ヘクタールに及ぶ水稲栽培モデル農場建設、マダガスカルに対する34種水稲雑種交配試験場設置の支援(収量2~3倍を見込む)、1960年代になるがマリに対して食料国産の道を開く甘藷農場と砂糖工場建設支援、現在も二か所の甘藷農場と二か所の砂糖工場が操業している。1980年代にはチュニジアの農業用灌漑設備建設支援を行った。

また2010年に、アフリカを含め5年以内に30か所の農業技術センター、3,000人の農業技術者の海外派遣、5,000人の農業技術研修生の受け入れを決めている。2009年までの実績として、221項目の途上国農業援助、うち農場建設35か所、農業技術試験場建設47か所、畜産振興支援11項目、漁業振興支援15項目、農業水利整備47か所、その他農業関係支援66項目や大量(数値は不明)の農業機械等の農業生産資材の援助を行ってきたという。

中国の対アフリカ援助方式をめぐっては、国際社会からときに厳しい批判の目が向けられている。現地で起きている政府による人権問題を無視または軽視し、「内政不干渉」の立場から援助を継続する中国の援助方式については日本や欧米が特に批判的である。また、中国の援助方式の大部分が全アフリカを舞台にするタイド援助であり、フルセット型援助の持つ利点を活用する思惑もみられる。それは、中国企業の現地密着を進めると同時に、本稿の主題である中国企業による直接投資を支援促す働きをするという点で、援助と投資が結びつく中国式の海外進出の形態を形成しているのである。発展するアフリカは中国企業にとっても大きな発展の機会を約束するにちがいない。

## 2. 中国の対アフリカ援助の推移

中国の対アフリカ援助、対アフリカ外交の推移を要約すると以下のようなになる。



(1955年：バンドン会議)。  
 1956年：対アフリカ援助開始（対エジプト、アルジェリア）<sup>10</sup>。  
 1964年～  
 1965年：周恩来アジア・アフリカ14か国訪問，対外経済技術援助8原則発表。（1971年：国連議席回復）。  
 1970年：タンザン鉄道着工（1975年完成）。  
 1982年：趙紫陽首相アフリカ11か国訪問。  
 1993年：無利息借款の対外援助合資協力制度樹立。  
 1995年：李鵬首相アフリカ訪問。  
 1995年：中国輸出銀行による中長期低利優遇借款制度樹立，技術援助，招聘人材研修制度樹立。  
 1996年：江沢民アフリカ6か国訪問（国家主席初めてのアフリカ訪問）。  
 1997年：李鵬首相アフリカ訪問。  
 1999年：江沢民アフリカ訪問。  
 2000年：江沢民アフリカ訪問。  
 2000年（10月10日）：「中国アフリカ協力フォーラム」（FOCAC）設立（第1回閣僚会議。北京。アフリカ44か国参加，以後3年おきの開催を決定）。  
 2002年：江沢民アフリカ訪問。  
 2002年：朱鎔基アフリカ訪問。  
 2003年（12月15日）：「中国アフリカ協力フォーラム」（第2回閣僚会議。アジスアベバ。アフリカ44か国参加。温家宝出席）。  
 2004年：胡錦濤アフリカ訪問。  
 2006年（1月）：中国「アフリカ政策文書」発表。  
 2006年（11月3日）：「中国アフリカ協力フォーラム」（第3回閣僚会議。北京。アフリカ48か国参加，42か国は元首参加。胡錦濤，温家宝出席）。  
 2006年：胡錦濤アフリカ訪問。  
 2006年：温家宝アフリカ訪問。

2007年：胡錦濤アフリカ訪問。  
 2009年：胡錦濤アフリカ訪問。  
 2009年（10月）：中国アフリカ協力フォーラムー女性フォーラム（カイロ）。  
 2009年（11月8日）：「中国アフリカ協力フォーラム」（第4回。閣僚級会議。エジプト，シャルムエルシェイク。アフリカ48か国参加。温家宝出席）。  
 2009年（12月）：中国アフリカ協力フォーラムー法律フォーラム（カイロ）。  
 2010年（8月）：中国対外援助工作会議。  
 2010年（8月）：中国アフリカ農業協力フォーラム「同北京宣言」（中国北京）。  
 2011年：中国アフリカ頭脳集団フォーラム（中国杭州）。

訪問国： 李鵬：モロッコ，ナイジェリア，ガボン，モザンビーク，タンザニア，ザンビア。  
 江沢民：モロッコ，アルジェリア，チュニジア，マリ，リビア，エジプト，ナイジェリア，エチオピア，ケニア，ジンバブエ，南アフリカ，ナンビア。  
 朱鎔基：モロッコ，アルジェリア，エジプト，ケニア，南アフリカ，ガボン。  
 温家宝：エジプト，ガーナ，DRコンゴ，ウガンダ，タンザニア，アンゴラ，南アフリカ。  
 胡錦濤：モロッコ，アルジェリア，マリ，セネガル，リベリア，ナイジェリア，エジプト，スーダン，カメルーン，ガボン，ウガンダ，ケニア，タンザニア，ザンビア，モザンビーク，南アフリカ，

ナンビア、モーリシャス、  
セーシェル<sup>11</sup>。

このように、1995年以降アフリカを最も頻繁に訪問したのは江沢民・胡錦濤の両首席であり、ともに4回を数える。次いで首相であり、朱鎔基は1回、李鵬は2回、温家宝は3回である。首相の場合、回数は異なっている。ここら読み取れることは、少なくとも、国家主席がアフリカ外交の先頭に立っているという点である。

この間、最も多くのアフリカの国々を訪問したのは胡錦濤であり、4回の訪アを通じて合計19か国に足を運んでいる。次いで江沢民であるが、その数は12か国と及ばない。二人の訪問国を比較すると、特別の違いや特徴を見出すことは難しく、むしろ二人とも共通して訪問している国を挙げるとモロッコ、アルジェリア、マリ、エジプト、ナイジェリア、ケニア、南アフリカ、ナミビアの8か国であり、中国がこれらの国々を重視していることがうかがわれる。これらは、中国がアフリカのなかで比較的早く国交樹立をした国々である。なかでも中国にとってモロッコは特別に重要な国のようで、李鵬から胡錦濤まで、この間に首相・国家主席の職にあった者全員が訪問している。次いで重要な国は南アフリカのようで、李鵬を除く全員が訪問している。

### Ⅲ. 中国アフリカ関係の転換：1996年

#### 1. 台湾問題からの転換

江沢民政権以降、中国の首脳はアフリカ訪問を重要な外交政策の基軸の一つに位置付け、双方の関係強化に従来以上の強い姿勢を見せ始める。その画期となったことが国家主席として初めてとなる1996年の江沢民のアフリカ訪問である。彼はこのアフリカ訪問に際して中国とアフリカの友好協力関係の強化とと

もに、共同して発展する国家形成を意図する5つの提案を行った。

内容はかなり抽象的・精神論的なものであるが、中国アフリカ協力フォーラムの結成など、その後の中・ア関係の急速かつ実りある関係の構築のスタート台となったという意味で重要な訪問であった。

それまで、中国にとってのアフリカは台湾問題を念頭においた援助対象地域であったが、この時期から、中国とアフリカ相互の経済的活動の基盤としての可能性を意識する対象へと変わったのである<sup>12</sup>。5つの提案は抽象的な表現を装いながら、そのような意図を明確に含んでいた。1995年だけで、中国の副首相は18か国を、首相の李鵬はモロッコを訪問し、翌年の江沢民による中国国家主席として初めてのアフリカ訪問へと繋げて行った。

#### 2. 貿易から直接投資への移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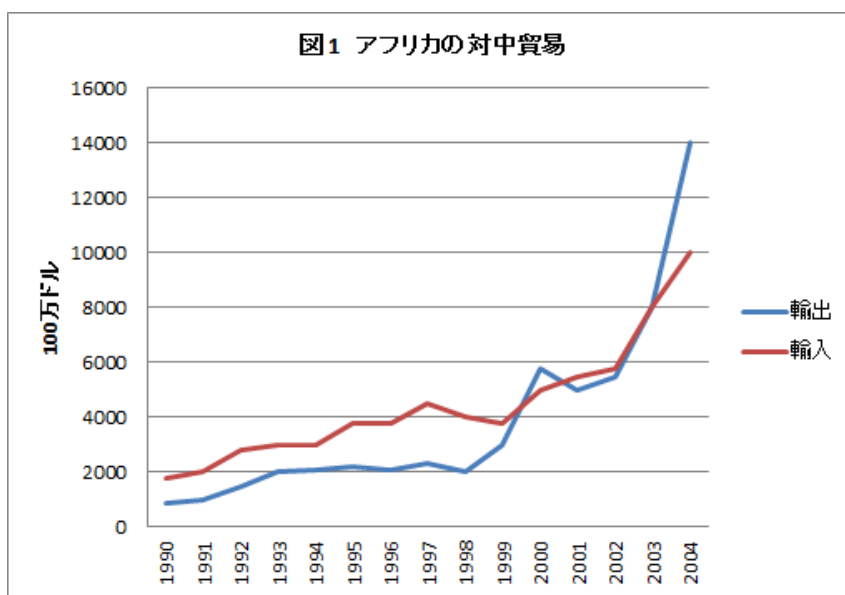
中国とアフリカとの貿易は長い歴史があるが、1980年代までその伸びは比較的緩やかであった。ところが図1が示すように、90年代になると急速に勢いを増すようになる。とくに、90年代後半になるとその動きは顕著で、90年代前半の輸出入合わせて30～50億ドルから60～70億ドル水準に高まる。そして2000年以降には100億ドルから200億ドルへの急激な伸びをみせるに至る。2001年の中国のWTO加盟以後は、さらに顕著な傾向を示すようになり、その後さらに順調な貿易関係を築き上げ、ついに2008年に、中国はEUとアメリカに代わって、アフリカ最大の貿易相手国となるのである。

その背景には、借款供与、中国のアフリカからの輸入関税の引き下げや無税化といった優遇策、1994年設立の中国輸出入銀行融資の拡大といった施策があったことは強調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加えて、中国とアフリカの関係の経済的パートナーへの変質という大き

な変化があったことも重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ここでは、それ以降の貿易の動向については説明を省き、2000年以降、中・ア関係の飛躍をもたらすFOCAC(中国・アフリカ協力フォーラム)を中心に述べて行く。周恩来8原則

の時代に形成された援助・被援助地域という関係の希薄化が明確になり、さらには貿易相手国という単純な関係をも飛び越えて、これらをバネに、概ね21世紀以降は、アフリカは中国の投資対象地域としても重要な役割を担うように変化したと思われるからである。



Ed, by Robert I. Rotberg, China into Africa,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26, p.98.

#### IV. 「中国アフリカ協力フォーラム」(FOCAC) の総括的な意味

##### 1. FOCAC とは何か

2010年時点の構成員国数は49か国で、現在台湾との外交関係を維持しているのはスワジランド、ブルキナファソ、ガンビア、サントメ・プリンシペの4か国であり、これらを除くすべてが中・ア協力フォーラムに加盟していることになる。

加盟国との間では中国主導の援助、開発、投資、貿易が推進され、台湾との外交関係の

ある残された4か国にとっては、心中穏やかならぬ施策が強化されているとい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からう。

この中国アフリカ協力フォーラムは、中国が音頭をとって始められたもので、中国のアフリカ外交の基礎をなす重要な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とみることができる。中身は政治、経済、環境、文化と多様であるが、重点はアフリカ諸国の中国陣営への傾斜を推進することにあることは明白である。

ただし、その狙いは台湾を意識したものから徐々に変化し、中国の国際的国力の増大に沿って生まれてきた欧米や日本・韓国などを

中心とする先進的な国際勢力との対峙という、新しい舞台を意識したものとなってきている点が重要である。

本稿の主題である農業分野に関してはアフリカの主産業であることから極めて重要な成果を上げ、食料の国際的不足が懸念されるなか、中国とアフリカ双方にとって、農業開発は特に関心の高い分野として位置付けられている。

以下、過去4回の中国アフリカ協力フォーラムの概要をみてみよう。

## 2. FOCAC の推移

### 第1回 FOCAC (2000年)

まだ2000年頃は、第一期の中・ア関係を引きずる状況にあった。そうした状況のもとで開かれた第一回 FOCAC は次のように行われた。

議題は、(1)21世紀に向かい、いかに国際政治経済新秩序を形成するか、(2)いかに新時代において中国・アフリカ間の経済貿易関係の協力を構築するかであった。討議の結果、

「中・ア協力フォーラム北京宣言」及び「中・ア経済社会発展協力綱領」を採択して終了したが、これらの概要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まず「中・ア協力フォーラム北京宣言」の概要は国連憲章、アフリカ統一組織憲章、平和共存5原則及び国際関係秩序の尊重にもとづき、南北間の平等と対話および協力、内政不干渉を尊重すべきであ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る。

「中・ア経済社会発展協力綱領」の精神は中・ア45か国が相互信頼にもとづき新型の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構築を図ることとされた。関係閣僚は平等・相互尊重の上に立ってさまざまな領域で経済社会の発展面での協力を進め、21世紀における中・ア協力の発展を期するとされた。

また、中・アの具体的協力関係の内容は農業分野などを中心に、無償援助形式を原則と

し、優遇借款、無利息借款などについて合意され、貿易・投資についてはその促進を図る観点から法律と商業環境の整備や海運・航空協力を進め、これをもとに相互経済パートナー関係の発展を期するとされた。

このフォーラムの開催期間中、中国は対アフリカ債務の減免を表明、実際に2002年に31か国の156項目、1億4,500万ドル相当の債務を免除したと伝えられている<sup>13</sup>。

### 第2回 FOCAC (2003年)

開催地の地名を取った「アジスアベバ行動計画」が採択、2004年～2006年の3年間、中国の対アフリカ援助が引き続き増加することが謳われた。加えて、農業技術者など1万人のアフリカ人の教育訓練、関税の無税化などの優遇、相互観光協力、中国とアフリカ双方の相互文化紹介機会の設置、民間協力の促進が合意された。

また、中・アの企業商談会が併設され、双方から500企業が参加、10億ドルの商談が成立した。貿易関係では、2005年から190品目の関税ゼロ化を約束した。

### 第3回 FOCAC (2006年)

第3回フォーラムは、その後の中・ア関係の画期をなす意味で重要な会議となった。会議には台湾との外交関係を持つ6か国(チャド、ガンビア、マラウイ、スワジランド、サントメ・プリンシペ、ブルキナファソ)が招待され、実際にも5か国の外交官が出席した。

今回の会議では「中国アフリカフォーラム北京サミット宣言」(後に、海外から Beijing Action Plan: BAP 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もの)及び「中国アフリカ協力フォーラム—北京行動計画(2007—2009)年」が採択された。



第3回フォーラムを機に中国はいわゆる「中国の対アフリカ政策文書」を発表した。これは「前言」から始まり、大きく6つの部分からなる。「前言」では21世紀に入り国際社会の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が進展し、深刻かつ複雑な問題が発生、中国は世界最大の発展途上国として平和の発展を迫り、独立自主外交政策を堅持、平和5原則を基礎に世界の平和共存に貢献するとの姿勢を示した。この姿勢の下で、中・アが安定的な相互協力を通じて、新しいとともに不断の互惠利益形成のためのプラットフォーム構築を図るという決意が表明されたのである。6つの部分の内容は第1：アフリカの地位と効果、第2：中国とアフリカの関係、第3：中国のアフリカ政策、第4：中国アフリカ全方位協力の強化、1.政治、2.経済、(1) 貿易（自由貿易協定）、(2) 投資（投資保護協定、重課税回避協定など）、(3) 金融協力、(4) 農業協力（後述）、(5) 基礎施設建設、(6) 資源協力、(7) 観光協力、(8) 債務減免、(9) 経済援助、(10) 多国間協力3. 教育・科学・文化・衛生社会、4.平和と安全保障、第5：中国アフリカ協力フォーラム及び継続的行動、第6：中国とアフリカ地区の組織的関係の構築。

貿易面では、2007年発効の440品目のアフリカからの輸入品目の関税ゼロ化が表明され、中・ア貿易の増加に拍車をかける要因となった。

農業協力として合意されたのは、土地開発、農業栽培、養殖技術、食糧安全、農業機械、農産物副産品加工など広範囲に及ぶ協力である。さらに農業技術協力の拡大、農業実用技術教育、アフリカに農業技術試験モデル園を設置することなども合意された。

また農業関係に限らないが、この会議の場で胡錦濤はアフリカの後発開発国のうち2005年末までの無利子借入金すべて（33か国168項目）について、債務免除を表明した[12]。

このフォーラムで胡錦濤はアフリカに、300人の若いボランティアを派遣することも約束したが、かっても10年間に523人の教師がアフリカの大学などで働くために派遣されたことがあった。さらに中国語を普及するために、2,800人の教師が派遣されたこともあった<sup>14</sup>。

#### 第4回 FOCAC（2009年）

第4回フォーラムはリーマン・ショックの影響冷めやらぬなか、エジプトのシャルムエルシェイクで「中国アフリカ新型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を深化させ、持続的発展を追求する」をテーマに開催された。特に中国とアフリカが国際的な政治・経済・気候変動などについての協力をを行うことが議論され、「シャルムエルシェイク宣言」（2009年11月12日）としてまとめられたことは双方にとって大きな成果であった。

同宣言の主な内容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最初に意義づけをすれば、中国があらゆる分野においてアフリカに対する戦略的関係の強化を求めている点、そして宣言の最後に一つの中国への原則的支持を取り付けていることは、もともと中国の対アフリカ戦略が政治的思惑によって始まっ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が示されている。

ー中国とアフリカは多様なレベルや方法を通じて戦略対話を増やし、共有認識を高

- め、多国間協力を深化、発展途上国共同の利益を維持発展させる。
- －ハイレベル協議を密接にし、政治的相互信頼を増進させ、中・ア双方が理解を深め、重要な諸問題に対処する。
- －相互に団結し、国際金融危機に対し共同で対処、アフリカの未来の発展目標の実現に不退転の努力を続ける。
- －相互の利益を拡大させ、中・ア間協力の水準を高める。また相互の貿易・投資を促進、協力方式の多様化、貧困減少、環境保護、人的資源育成と能力開発、情報技術などの分野での重点的協力、特に基礎的な施設建設、農業と食料の安全などに関する分野の協力を深める。
- －中・アの人文領域の協力交流を拡大・深化させる。文化、教育、科学技術、衛生、体育、観光などの領域の交流を強化、青年、女性、民間団体、マスコミ、学術機構の連携などの協力関係を増進し、民間相互の理解と友好を深める。
- －相互協力を強め、中国アフリカ協力フォーラムのさらなる建設的な発展を共同して進める。中・ア双方の求めと情勢の発展が求めるところにしたが、フォーラムの不断の改善に取り組み、その実を上げ、あるべき目標を設定し、中・ア関係の発展にこのフォーラムを十分に活用、効果を上げるための多様な取り組みを行う。
- －中国は将来においてもできる限り対アフリカ援助を継続することを承諾し、債務減免に取り組み、対アフリカ投資を拡大させ市場の開放を促し、相互協力を拡大する。
- －アフリカ諸国は中国の承諾を積極的に評価し、中国が当初から進めてきた協調と経験を生かし、金融危機がアフリカ経済に与える影響を緩和するために努力する。

－アフリカ諸国は、中国は一つとの立場を堅持し、中国の平和的統一の大業を支持する。

また、同宣言以外に、その後の中・ア協力を深化させるための具体的措置として「中・ア協力8項目の措置」がまとめられた。そのうち、農業に関連するものを中心に概要を紹介すると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まず、農業分野に関してはアフリカに農業モデル農園を20か所増設、50グループに及ぶ農業技術指導陣の派遣、1,000名の農業技術者を国家レベルで教育すること、アフリカの食料安全保障能力を高める施策に取り組むこと、などが織り込まれた。

また、100億ドルの借款供与、アフリカの中小企業金融に取り組むため原資10億ドルの中国金融機関の設立、2009年末までに償還期が来る無利子借款の償還債務免除を行うことが謳われた。さらに、アフリカ産品の中国輸入市場の開放を進め、アフリカの後発開発途上国に対しては95%の産品について免税、2010年までに、うち全品目の60%免税を実現するとした。

### 3. 中国アフリカ農業協力フォーラム「同北京宣言」（2010年8月12日）

中・ア農業協力フォーラムは、食料の世界的逼迫や今後予想される気候変動など農業環境をめぐる国際的懸念をまえに、アフリカ農業の開発と発展を急ぐ観点から、前述の「中・ア協力8項目の措置」のうち、農業分野に関する項目に着手することとされたものと理解できる。

参加国数はアフリカの18か国にとどまり、やや勢いが感じられない会議となった。このフォーラムのとりまとめ文書は「中国アフリカ農業協力フォーラム北京宣言」として公表されているが、その内容にはあまり具体性がな

く精神論的な色彩が濃い。中・ア協力について平等互恵の精神のもと、さまざまな協力が行われることが謳われてはいるが、中国が資金的支援を行うことを除き目新しさはない。

#### 4. 中国アフリカ頭脳集団フォーラム（中国杭州）

中・ア頭脳集団フォーラムは、2011年10月、アフリカ26か国が参加し中国で開催された。参加者は学者、政府高官、企業経営者など300名で、「アフリカ安全保障情勢と中・ア協力」、「アフリカ金融投資環境と中・ア協力」、「中・ア人文交流と頭脳集団の役割」をめぐって意見交換された。

これには中国外交部、商務部が主導的な役割を担ったが、中・ア協力のすそ野を拡大し、学術・教育・企業活動などにおいても中・ア協力を進め、協力のあり方に厚みをつけようとの意図もうかがわれる。

ひとことでいえば、中国はアフリカとあらゆる分野での協力関係を構築し、まさに途上国の盟主として、あるいはそれを超えた関係への脱皮を模索しているかのような印象を受ける。

### V. 中国のアフリカ直接投資の始まり

#### 1. 「走出去」政策と農業進出

中国の対アフリカ直接投資を誘導し円滑にした要因のうち、最大の要因はこれまで述べたような援助である。そして、江沢民政権時代に始まったいわゆる「走出去」政策がこれを後押しした。さらにこれに一層拍車をかけそうな動きが生まれている。それはハード面の要因であり、中国の経済発展を決定づけた経済特区のアフリカ版を構築しようとする点である。中国は自ら先導して、アフリカにおける経済特区（SEZs）の構築に乗り出した。ジンバブエ鉱山ハブ、環インド洋貿易ハブ、

タンザニア特区（物流ハブ）、ナイジェリア西アフリカゲートウェイの構築への協力などがそれである。いずれも2007-2009年に唱えられたもので、まだ完成していないが、今後、中国の直接投資基盤を厚くする期待がもたれている[13]。

また、経済成長に欠かせない石油・ガスなどのエネルギー資源を求めて、三大国有エネルギー企業を中心に、豊富な資源を求めてアフリカに深く広く入り込む結果ともいえる[2][3]。

#### 2. 農業直接投資の背景

さらには、農業直接投資の背景として、過剰な中国農民の移民先としてアフリカを位置付け、一方では長期的には、中国の逼迫する可能性のある食料の保険として、いまから準備するためだという見方もある。“中国の当事者は海外を農民の移動先としてとらえ、また長い目で見た場合、中国自身の食料安全保障の確保にそのねらいがある”<sup>15</sup>。また別の論者も同様に、“中国はもはや食料自立ができない状況にある。そこでアフリカ農業が中国人の関心の的になってきたのだ”<sup>16</sup>。

まったく的外れとはいえないが、このような見方はむしろ従的とすべきで、やはり、援助から生まれた経済動機の担い手としての動きだと見た方がよいのではないか。

アフリカに対する直接投資を行っているのは、中国だけではない。しかし、中国の直接投資には、根本的なところでは他の先進国による投資と変わらないが、子細な点では次のような特徴があるとする見方もある<sup>17</sup>。

すなわち、第一に、中国企業の国際化の歴史は浅く、中国政府の走出去政策が効果を発揮し始める2001年頃まで動きは鈍かったことである。また、最初から他の国では見られないほどの政府の支援を受けての海外投資であったことは明確な、特徴の一つである。こ

の点について、筆者も同様の見解を述べたことがある<sup>18</sup>。

第二に、アフリカに進出する中国企業は資本1単位当たりの雇用労働者の数が多いこと、すなわち労働集約的であることも特徴の一つである。

第三に、中国の投資企業の主体は国有企業もしくはその系列にある企業なので、欧米企業と異なって、短期的な収益よりも長期的な視点で投資を行う余裕がある点である。この点について、筆者は、中国企業が多様な農業関連の直接投資を行う例が多いことと関連していると思う。

第四は、政府主導で現地政府と一体となった貿易投資特区を建設するなど、中国企業が投資しやすい環境整備などの面で、政府の役割が非常に大きな支えとなっ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この点については筆者も同調する。

諸外国による対アフリカ直接投資は中国に限ったものではない。中国が投資を始める以前から旧宗主国やアメリカ、日本、韓国、中東といった国々がアフリカに熱い視線を注いできたことは無視できない。最近では流入の方が投資（流出）を上回る傾向がみられるものの、日本もまた、表2のように、毎年1,000億円を超える多額の直接投資を行ってきた国である。

表2 日本の対アフリカFDI

	(億円)
2006	1047
2007	1285
2008	1592
2009	-258
2010	-316

資料:財務省。  
マイナスは流入

世界的な投資活動も活発で、UNCTADの統計から直接投資のストック勘定の推移をみると、この30年間、表3のように推移し、2000年の1,542億ドルが2010年には5,540億ドルと10年間で4倍の増え方をしているように、その増え方は極めて顕著である。

表3 中国の対アフリカFDIストック

	(100万ドル)
1980	41 097
1981	41 008
1982	42 737
1983	42 899
1984	40 979
1985	42 898
1986	45 514
1987	49 692
1988	49 847
1989	54 840
1990	60 675
1991	65 164
1992	69 051
1993	73 380
1994	81 661
1995	89 308
1996	91 827
1997	101 865
1998	110 316
1999	154 210
2000	154 268
2001	151 186
2002	167 658
2003	203 015
2004	240 793
2005	261 753
2006	317 038
2007	395 240
2008	395 726
2009	488 824
2010	553 972

UNCTAD

次に中国による対アフリカ直接投資の動向をみると、表4のように、2000年代以降の増え方が極めて顕著である。それまでは1億ドルに満たなかったが、数字が判明している2004年からは3億ドル代へ到達し、その後の伸び方には非常に早いものがある。その結果、2010年には21億ドルとなっている。2008年に55億ドルと跳ね上がっているが、これは南アフリカに対する中国企業の政府一体となっ



た、白金や鉱山、その他の鉱物資源獲得を念頭においた先行大型投資という特殊事情があるためである<sup>19</sup>。今後、南アフリカに対する中国企業による投資はさらに増えるとみられている。

中国企業の投資増加に伴って、当然のことながら在地中系企業数も増している。その詳細は不明であるが、断片的には表4のように2006年時点で900とされている。この傾向をみれば、2010年頃の段階で1,500社程度は下らないと推測すべきではないか。

**表 4 中国対アフリカFDI**  
(100万ドル)

	FDI	企業数
1991	1.5	
1992	7.7	
1993	14.5	
1994	28	
1995	17.7	
1996		
1997		
1998		80未満
1999	42.3	
2000	85	499
2001	24.5	
2002		585
2003	75	600未満
2004	317.4	674
2005	391.7	
2006	519.9	900
2007	1574.4	
2008	5490.6	
2009	1438.9	
2010	2112.0	

2003 までは UNCTAD, 以下「中国統計年鑑」.

## VI. 第二期：中国の対アフリカ農業進出—対アフリカ農業直接投資—

### 1. 農業直接投資の嚆矢

現段階では、中国の FDI 全体に占める農業部門の割合はそれほど多いものではない。表5は2003年以降の新規 FDI と農振水産部門の FDI を示しているが、2010年の FDI 全体が6,81億ドル（非金融部門）であるが、うち農林水産部門は5億3,000万ドル、率にして1%に満たない規模である。その理由の一つは、農林水産業部門の FDI が他の産業部門に比べ立ち遅れていることにあ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しかしもう一つ別の見方をすれば、それだけではない理由がある。それは、中国が農業投資をする対象はアフリカをはじめとして低開発国が多く、農地価格がタダ同然あるいは無地代のところが多く、それだけ投資が大幅に節約できているという事実である。中国政府が関与することの多いアフリカ農業 FDI の場合、ほとんどが農地費用負担は数十年間以上非常に軽いかゼロであることが多い。

こうした事情を理解することは重要なことではあるが、それにしても農業関係の FDI が途に就いたばかりであることは否定できない。

このうち、アフリカに対する中国の農業直接投資の実態がどうなのかを知る正確なデータは現段階では存在しないので不明である。部分的、断片的にしか分からないのが実情であり、ここでも事例的に示すことしかできない。

表 5 中国の FDI の推移

		(万ドル)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新規FDI	合計	285465	549799	1226117	1763397	2650609	5590717	5652899	6881131
	農林漁業	8136	28866	10536	18504	27171	17183	34279	53398
年末ストック	合計		4477726		7502555		18397071		31721059
	農林漁業		83423		81670		146762		261208

In Afric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50.

中国の対アフリカ農業直接投資は、既述のように援助→貿易→投資というつながりのもとで、政府が資金援助、輸出入銀行等の施策を通じてサポートしながら道が開かれてきたものである。そうした一連の流れのもとで、いくつかの経済特区プロジェクトを実現させながら補強していったのである。

農業部門に関しても各国に、図2に示したような農業開発ステーションをつくり投資の基盤づくりをしていった。これには中国の地方レベルの企業（政府）の名称がつけられているように、中国の中央・地方の両政府が歩調を合わせ、戦略的に進めていった結果できたものと推測できる。2006-2009年の間に限定されるが、農業に特化したものとしてはスーダン、エチオピア、ウガンダ、タンザニア、ザンビア、モザンビーク、ジンバブエ、南アフリカ、コンゴ、カメルーン、ベナン、トーゴ、リベリアに「農業技術展示センター」が作られてい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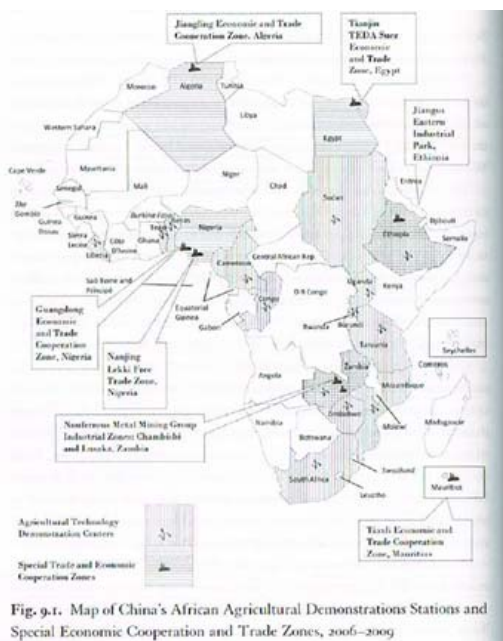


図2 アフリカの中国農業技術展示センターなど  
Deborah Brautingam, THE DRAGON'S GIFT-The real Story  
Of China

## 2. 中国にとっての対アフリカ農業 FDI のメリット

では、中国にとってアフリカに農業進出をするメリットは何か？先に引用したように、それを中国の農民の移住先として、そしていまのうちから食料安全保障の先手を打っておくために、という見方に求めることも可能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それは国家的都合を重視したもので、政府だけでなく実際の投資責任を負う企業にとっては経済的なメリットが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このような観点から中国の対アフリカ進出をみると、以下のようなことが指摘できると思われる。

- 供給不足が大きく、投資回収率が 20% 前後にも及ぶほど投資効率は高いと思われること[5].
- 穀物、青果物など多くの品目の栽培ができる自然条件を備えていること[5].
- 中国とアフリカには農業協力に関しても 50 年以上の歴史があり、進出を受け入れる土壌があること[3].
- アフリカには 100 万人の中国人が定住し、中国食材需要に応える供給体制の整備<sup>20</sup>
- コメのハイブリッド品種改良などの試験栽培を、シオラレオネなど新開地のアフリカで実施できること<sup>21</sup>.
- 中国よりも生産費が高く、中国式農業技術と安い中国賃金の農民を連れて行けば、それだけ増益になるとみられること.
- 中国では土壌・水質汚染や極度の農薬利用などにより農業生産性上昇が頭打ちになっていること[18].
- 中国では農業龍頭企業が育成され、経営能力を備えた企業農業の底辺が拡大していること<sup>22</sup>.

## 3. 農業直接投資の概要と優位性

ここでは、中国にとっての対アフリカ農業 FDI のメリットのうち、食料（穀物）需給問題と同生産費問題を取り上げ検討する。

まず、アフリカの穀物需給をめぐっては表 6 により説明したい。2007 年のアフリカ全体の穀物自給率は 69.3% と推計できる。1990 年からの十数年間、年によって変動はあるが増えもせず減りもせずの状態である。同表にみられるような年ごとの不安定な変動は、農業土地基盤や施設整備が不十分である一面を物語る。

穀物のうち、コメ、小麦、トウモロコシについて取り上げると、自給率が最も低いのが小麦であり 40% 程度にすぎない。土壌と気候との関連が大きい、小麦栽培技術の問題もあるとみられる。コメ（インディカ米）は多くのアフリカ人にとって重要な食料であるが、自給率は 70% 程度で推移している。最も大きな問題は灌漑施設の未整備（水田灌漑率は

30% に満たない）、多収穫品種と栽培技術のミスマッチなどが起きているためと思われる。

トウモロコシは最も日常的な食料であるが、その自給率は年によって大きな変動に見舞われている。しかも、やや低下する動きすらみられるゆゆしき事態が起きている。1990 年の 94.5% が 2007 年には 75.8% と大きく低下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国内需要を満たすことができないため穀物輸入量が増加する傾向にあり、1990 年に 2918 万トンであった輸入量は、2007 年になると 1.9 倍の 5651 万トンに急増している。とくにトウモロコシの輸入量の増加率は際立っている。

以上の考察から、基本食料が不足するアフリカにおいては、海外のより優れた農業技術を備えた企業が直接農業を行う理由があることが一般論として成り立つことが明らかである。

表 6 アフリカの穀物需給の推移

		生産量	構成比	輸入量	在庫取崩	輸出量	国内供給量	自給率
		(1000t)	(%)	(1000t)	(1000t)	(1000t)	(1000t)	(%)
2007	穀物計	130 802	100.0	56 508	4 849	3 294	188 864	69,3
	小麦	18 610	14,2	31 727	939	825	50 451	36,9
	コメ	13 940	10,7	8 127	921	1 372	21 616	64,5
	トウモロコシ	47 350	36,2	13 420	2 576	854	62 493	75,8
2006	穀物計	141 916	100,0	54 253	-8 646	2 925	184 599	76,9
	小麦	25 169	17,7	29 554	-4 376	546	49 801	50,5
	コメ	14 690	10,4	8 330	-883	1 164	20 973	70,0
	トウモロコシ	49 360	34,8	12 948	-171	1 077	61 060	80,8
2001	穀物計	110 791	100,0	46 591	2 080	2 967	156 495	70,8
	小麦	18 091	16,3	25 270	1 082	1 032	43 411	41,7
	コメ	11 109	10,0	7 056	6	710	17 461	63,6
	トウモロコシ	41 373	37,3	10 718	1 855	989	52 957	78,1
1995	穀物計	92 889	100,0	35 887	10 599	3 667	135 708	68,4
	小麦	13 111	14,1	22 133	1 762	624	36 383	36,0
	コメ	9 954	10,7	3 953	-188	174	13 545	73,5
	トウモロコシ	34 934	37,6	7 067	6 455	2 213	46 243	75,5
1990	穀物計	89 171	100,0	29 180	4 767	3 901	119 216	74,8
	小麦	13 689	15,4	18 982	542	486	32 727	41,8
	コメ	8 469	9,5	3 192	443	99	12 006	70,5
	トウモロコシ	37 676	42,3	4 716	546	3 124	39 813	94,6

資料：FAOSTATから作成。

注：自給率=(生産量/国内供給量)\*100

つぎに統計のあるアフリカ諸国のトウモロコシ、コメ、小麦を取り上げ、中国の場合と比較してみよう。

表7(2009年)がそれである。単年の比較なので十分ではないが、おおむねの相対価格の比較はできる。まずトウモロコシであるが、中国は243ドル(トン当たり、以下同じ)なので、これを下回る国はカメルーン(129ドル)、マリ(176ドル)、モーリシャス(191ドル)、南アフリカの4か国にすぎない。コメは中国の284ドルに比べ低い国はエジプト(211ドル)、ギニア(179ドル)の2か国にとどまる。さいごに小麦についてであるが、中国の271ドルに対して、これを下回る国はマダガスカル(147ドル)、南アフリカ(191ドル)の2か国にすぎない。

以上のように概観しただけであるが、この3つの穀物の相対価格をみる限り、中国の生産費はアフリカの多くの国を下回る。中国の気候、品種、栽培方法、土地基盤などがこれらの穀物栽培にとって優位があるためともいえるが、栽培技術にも優位性があるためと考えられる。また農業労働賃金の違いも考慮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が、アフリカ諸国の労働賃金はILOも把握できないので、体系的な比較ができない事情がある。

このように、アフリカに比べて中国の穀物生産者価格の低さに中国農業技術の優位性があるとすれば、このことは、中国農業がアフリカに直接投資を行う経済的な契機が存在することになる。

### VII. 中国企業の自主的農業進出

このような経済的な優位性が乏しいところに、政府の施策だけでは、企業自身によるアフリカ進出が長続きすることも拡大することもあり得ないと思われる。

現在、中国農業企業がアフリカに直接投資を行っている様子は表8によって、その一部が示されている。この表は中国農業企業がアフリカに直接投資のかたちを取って進出したほんの一部と考えられ、その実態は公表されていない。しかし、おおまかな実情を知ることにはできる。

まずこの表で掲載した投資実績対象国からみていくと、ザンビア、南アフリカ、アンゴラ、ペナン、コンゴ、エジプト、エチオピア、ガボン、ガーナ、ケニア、マダガスカル、モーリシャス、モザンビーク、ニジェール、ナイジェリア、アルジェリア、シオラレオネ、スーダン、タンザニア、ウガンダ、ジンバブエ、合計21か国となっている。これらの国々の顔ぶれをみると、中国とアフリカ交流の長い歴史を彷彿とさせ、また農業関連に視点を

表7 各国生産者価格の比較(2009)  
(トン:米ドル)

	トウモロコシ	コメ	小麦
Algeria	319	517	620
Burkina Faso	260	644	
Burundi	337	841	
Cameroon	<b>129</b>	310	
Cape Verde	450		
Congo	507	313	
Cote d'Ivoire	331	587	
Egypt	<b>208</b>	<b>211</b>	322
Eritrea	574		510
Ethiopia	389	1 028	587
Gambia	253	<b>223</b>	
Ghana	385	507	
Guinea	<b>150</b>	<b>179</b>	
Guinea-Bissau	1 324	963	
Kenya	309	750	380
Madagascar	<b>220</b>	315	<b>147</b>
Malawi	365	1 294	525
Mali	<b>176</b>	316	
Mauritius	<b>191</b>		
Morocco	272	295	299
Mozambique	298	322	
Namibia	282		278
Niger	<b>226</b>	<b>260</b>	324
Nigeria	401	427	501
Rwanda	434	1 095	555
South Africa	<b>156</b>		<b>191</b>
Sudan	428	1 270	549
Togo	350	342	
Tunisia			319
<b>China</b>	<b>243</b>	<b>284</b>	<b>271</b>

資料: FAOSTAT

当てると、いずれも中国との密接な関係があり納得できるところである。

現地で登記された期日は古いもので2005年、新しいもので2011年となっている。中国のアフリカ農業への直接投資が始まったのは上述のように、主に21世紀に入ってからなので、この表に掲載されていない2004年以前を加えると、さらにその数はすえるはずである。

この表に掲載した企業の主な事業内容は、農産物生産、家畜飼養、同加工、販売、農業副産物生産と販売、林業や漁業が主なものである。全体的には、第一次産業のうちほとんどの業種を含む内容である。ただし、これらが企業にとってはこれらが専業でない場合もあり、多角経営企業も多数存在する。

表8 中国の対アフリカ農林業分野投資企業の状況

投資国名	投資中国企業名	企業所在地	アフリカ企業名	事業内容	現地登記年
ザンビア	中国化学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赞比亚有限公司	农产品加工	2010
ザンビア	中非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央企业	中垦友谊有限公司	农产品生产和销售	2011
ザンビア	中非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央企业	中垦产业有限公司	农牧产品生产和销售	2011
ザンビア	华永海外(北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央企业	华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	2006
ザンビア	大厂回族自治县农林综合养殖场	北京市	华丰畜业(赞比亚)股份有限公司	畜禽养殖、饲料加工、农业开发	2008
ザンビア	抚顺中农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河北省	麦得隆中农(赞比亚)有限公司	农产品生产	2005
ザンビア	抚顺中农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辽宁省	德宝坤争水有限公司	纯净水的生产	
ザンビア	常州常润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辽宁省	李润投资(赞比亚)有限公司	农产品加工	2008
ザンビア	华盛江泉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	江泉国际公司	农产品种植、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	2008
ザンビア	青岛纺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穆隆古希煤油股份有限公司	煤油加工生产	2006
ザンビア	开封市中农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开封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家禽养殖及农作物种植	2006
ザンビア	开封市华中万头养殖有限公司	河南省	兴华农业投资公司	家禽养殖、服务、农作物、林木种植	2008
ザンビア	开封市外西防护林绿化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	大梁农业投资公司	家禽养殖、农作物、林木种植	2008
ザンビア	开封市中农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	高远投资有限公司	农林产品加工	2011
ザンビア	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河南省	凯迪生物赞比亚有限公司	农林业、绿色生物资源产品开发、研究、种植	2010
南アフリカ	安徽省祁门县祁门镇动物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	沈氏投资公司	农产品种植及动物养殖	2009
南アフリカ	山东滨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安徽省	双鲜(南非)贸易有限公司	蔬菜、果品的生产、加工和配送	2006
南アフリカ	淄博市博山区唐人餐饮有限公司	山东省	御膳厨餐饮有限公司	食品加工	2008
南アフリカ	华信凤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格兰西农业公司	种植、园林及畜禽养殖	2011
アンゴラ	东港市太平渔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大平安农牧有限公司	渔业捕捞、水产品加工、面粉	2011
アンゴラ	泰安立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辽宁省	安哥拉山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农业开发、蔬菜生产与销售	2007
アンゴラ	佛山市南海信合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省	FMSA 国际商贸公司	家禽养殖	2011
ベナン	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	广东省	粤垦国际(贝宁)有限公司	食用菌的生产	2007
コンゴ	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刚果正威技术有限公司	农、林业开发等	2006
アラブ連合	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埃及中纺无纺纤维有限公司	农、林业	2010
アラブ連合	宏盈(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央企业	兴达饮料公司	果汁饮料、茶饮料、碳酸饮料、果冻、小食品等的生产	2010
エチオピア	河北黑猫粮油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甘特利黑猫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食品加工、销售	2007
エチオピア	沈阳工瑞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北华农场	农产品加工(种植绿色蔬菜、榨油)	2007
エチオピア	湖南达丰源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	湖南达丰源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埃塞赞比亚公司	农产品种植(不含种子)及养殖业的开发、农产品的加工	2011
エチオピア	成都米比亚耳福海有限公司		青春园林	农产品瓜果栽培	2009
ガボン	温州林林集团总公司	四川省	加盛森林发展公司	森林开发、原木加工	2008
ガボン	山东隆盛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省	国际木材运输和贸易公司	森林采伐、木材加工	2009
ガボン	广州世安科工贸有限公司	山东省	AKOK农场发展有限公司	农作物种植、畜牧养殖、食品加工	2007
ガボン	广州市奥田木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省	林?木业有限公司	开展林木采伐、森林种植、木材加工	2011
ガボン	深圳市博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	华耀木业有限公司	木材生产、加工	2008
ガーナ	大连海陆丰远洋渔业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	加的海陆丰渔业投资公司	开展水产捕捞和养殖业	2005
ガーナ	蚌埠县斯凯尔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大连市	加的新东方高科技农业研发中心	高科技农业生产、种植技术研究、蔬菜及农作物种植、加工	2009
ケニア	临颖外贸外贸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	肯尼亚顺发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产品的生产、加工	2005
ケニア	长沙龙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省	卧龙国际有限公司	农、林、牧、渔业的生产	2011
リベリア	大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湖南省	中利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捕鱼、水产品加工	2011
マダガスカル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大连市	中成马达加斯加西岸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蔗糖种植、蔗糖和酒精生产	2008
モーリシャス	武汉新能置业有限公司	中央企业	千里马投资有限公司	葡萄酒种植、葡萄酒生产、观光农业等	2009
モザンビーク	福州宏远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	宏与美渔业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海洋渔业捕捞、水产品冷藏、加工	2009
モザンビーク	河南昊德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	莫桑比克河南昊德工业园有限责任公司	种植等	2009
モザンビーク	湖北省联丰海外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	莫桑比克联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土地租赁经营、农副产品、加工、农产品开发、农业承包	2010
ニジェール	浙江省武义茶业有限公司	湖北省	尼日尔-浙江九龙山茶叶加工贸易有限公司	茶叶加工贸易	2008
ナイジェリア	中地海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	农业技术开发、种植业、粮食加工、养殖业、畜牧业、大中型农场等	2008
ナイジェリア	中地海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	绿色农业发展尼日利亚有限公司	农业技术开发、种植业、粮食加工、养殖业、畜牧业、大中型农场等	2007
ナイジェリア	天津瑞隆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市	向日葵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饮料、葡萄酒、纯净水等食品饮料的生产	2005
シエラレオネ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天津市	中成马格巴斯糖业有限公司	甘蔗种植、蔗糖和酒精生产	2005
スーダン	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中央企业	苏能有限公司	农业生产	2010
スーダン	江苏中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	非洲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农业土地开发、农作物及经济作物种植、畜牧业养殖、农产品加工	2010
スーダン	福建尤德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省	苏中联合发展总公司	农产品种植和农副产品深加工、畜牧养殖业	2008
スーダン	扬州市丰惠商贸有限公司	福建省	苏丹惠丰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蔬菜、粮食种植	2011
タンザニア	中非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	坦桑尼亚中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种植	2010
タンザニア	中非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央企业	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坦桑尼亚有限公司	种植、	2010
タンザニア	石家庄恒富瑞进出口有限公司	中央企业	发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农副产品加工、	2010
タンザニア	湖南中盈国际经济合作有限公司	河北省	坦桑尼亚神龙开发有限公司	粮食、瓜果蔬菜、花卉苗木、农作物种植、水产养殖、畜牧	2011
タンザニア	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湖南省	凯迪坦桑尼亚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生物质能源及相关产品开发、生物质能源种植、种植基地建设等	2011
ウガンダ	河北沃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	沃和(乌干达)农场有限公司	农作物种植、林业种植、畜牧业养殖等农副产品生产、农副产品	2011
ジンバブエ	北京奥瑞津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省	奥瑞玛在威矿业公司	农产品开发等相关业务	2009
ジンバブエ	辽宁金鼎铁矿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	津源投资有限公司	农业开发等	2009
ジンバブエ	安徽农垦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辽宁省	(津中) 皖津农业(私人)有限公司	土地开发、农产品生产、畜产品、水产品生产、种子研究、繁育	2011
ジンバブエ	高密市锦?棉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锦?棉业巴布韦棉花(私人)有限公司	棉花种植、收购、加工、榨油	2011

資料:中国商務部。

企業組織形態は独資が多いが、合弁企業も存在する。合弁企業の場合、アフリカ企業が土地を時価計算して自己資本勘定に繰り入れ、それを出資として持分計算して提供するかたちもある。土地は多くの場合国有あるいは地域共同体所有の国が多いので現地政府が提供する場合が多く、99年借地といった期間の長いものもある。地代は、無償のことが多い。ある報告はアフリカにおける中国など、外国の手による農地取引が横行している実態を述べている[20]。

この表から言えることはおおむね以上で、企業の沿革、財務状況、事業規模などは不明である。この点は、今後の研究課題としたい。

最後に、これら企業は中国政府の後押しや協力がなければ容易にアフリカに進出できるものではない点を強調しておきたい。しかし、そうした他律的な要因だけが働いているのかといえはけっしてそうではなく、企業の経営目的である利益追求を重視した結果でもある点は無視できない。アフリカの投資回収率は高いという期待を多くの企業が持っているのはその現れでもある。

今後の見通しとしては、さらにこうした中国農業企業のアフリカ進出、とくに直接投資は増加するものとみられる。

### おわりに

中・ア関係の歴史は60年近く、典型的な「南南援助」関係、経済発展を遂げる過程における中国がリードする貿易関係、そして中国による資源開発・工場設置、農業経営等の直接投資関係へと発展を遂げてきている。

とくに農業は援助関係の中核的役割を担い、そして現在は農業直接投資が増える関係へと変化している。農業直接投資の規模はまだ小さいが、これはアフリカ農業開発がまだ過渡期にあることの裏返しであり、今後、その発

展が見込まれることから大きくなる可能性を秘めている。

本稿では、現在の中国の対アフリカ農業直接投資の実態を細かに述べ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が、今後、公開資料の集積等を通じてより詳細な実態を踏まえた考察を行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う。(2012年3月)

### 脚注\*

<sup>1</sup> 愛知大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所長。

<sup>2</sup> Meine Pieter Van Dijk [1], p.13.

<sup>3</sup> Deborah Brautingam [6], pp.111-115.

<sup>4</sup> Li Anshan [7], p.22.

<sup>5</sup> 中国とアフリカの国交樹立を年次別に整理した文献として、次を参照。李恩民 [8].

<sup>6</sup> セルジュ・ミッシェル, ミッシェル・ブーレ [9], pp.167-182.

<sup>7</sup> Deborah Brautingam [6] p.63.

<sup>8</sup> Jean-Rapbael Chaponniere [11], p.57. 原典は Brautingam(1998).

<sup>9</sup> Chaponniere [11], p.67.

<sup>10</sup> Chaponniere [11], p.57.

<sup>11</sup> Deborah [6], p.84.

<sup>12</sup> Deborah [6], p.83.

<sup>13</sup> Li Anshan [7], p.33.

<sup>14</sup> Deborah [6], p.123.

<sup>15</sup> Deborah [6], p.234.

<sup>16</sup> Anders Bastholm and Peter Kragelund [14], p.132.

<sup>17</sup> Meine Pieter Van Dijk [1], pp.90-91.

<sup>18</sup> 高橋五郎 [15], pp.8-10.

<sup>19</sup> 中国と南アフリカとの貿易・投資関係を述べたものとしては次が注目される。木村公一朗 [16].

<sup>20</sup> 高橋五郎 [17], pp.61-62.

<sup>21</sup> Deborah [6], pp.245-256.

<sup>22</sup> 高橋五郎 [19], pp.117-145.

\*参考文献

- [1] Meine Pieter Van Dijk, Ed. by Meine Pieter Van Dijk, *The New Presence of China in Africa*,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 [2] 須藤繁「中国の対アフリカ外交と企業進出」『中国経営管理研究』第6号, 2007.5.
- [3] 熊登礼, 李世婧, 董相男「我国対非洲農業投資的対策研究」『農業経済』2011,01.
- [4] 竹原美佳「中国国有企業がアフリカ進出に熱心な事情」『石油・天然ガスレビュー』2006.11, Vol.40, No.6.
- [5] 俞毅「論我国非洲跨国農業投資的戦略構建」『農業経済問題』2009,第11期.
- [6]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7] Li Anshan, *China's New Policy toward Africa*, Ed. by Robert I. Rotberg, *China into AFRICA-Trade, Aid, and Influenc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 [8] 李恩民「アフリカにおける中国外交援助の展開」『アジア・アフリカ研究』第51巻第2号, 2011.4.
- [9] セルジュ・ミッシェル, ミッシェル・ブーレ, 中平信也訳『アフリカを食い荒らす中国』河出書房新社, 2009.
- [10] 高橋五郎「進出先に対する中国経済の影響—輸出する物価引下げ効果—」『ICCS 現代中国学ジャーナル』(ISSN:1882-6571) 第2巻, 第1号, 3月30日(2010).
- [11] Jean-Rapbael Chaponniere, *Chinese aid to Africa, origins, forms and issues*, Ed. by Meine Pieter.
- [12] 施銀芳「中国の対外援助の現状」『専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月報』NO.544, 2008.10.
- [13] Martyn J. Davie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China's Developmental Model Comes to Africa*, Ed. by Robert.
- [14] Anders Bastholm and Peter Kragelund, *State-Driven Chinese investments in Zambia: Combining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profits*, Ed. by Meine.
- [15] 高橋五郎「中国企業海外進出の背景と中国経済」, 高橋五郎編『中国経済の海外進出』日本評論社, 2008.
- [16] 木村公一朗「中国企業の南アフリカ進出—家電産業の事例—」牧野久美子, 佐藤千鶴子編『ポスト移行期南アフリカの社会変容』調査研究報告書, ジェトロ・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2011年.
- [17] 高橋五郎『新型世界食料危機の時代—中国と日本の戦略』論創社, 2011.10.
- [18] 高橋五郎『農民も土も水も悲惨な中国農業』朝日新聞出版, 2009.2.
- [19] 高橋五郎『中国経済の構造転換と農業—食料と環境の将来』日本経済評論社, 2008.3.
- [20] アフリカ日本協議会「アフリカでも進行する国際的な農地取引誰にとってのチャンスなのか International land deals in Africa Land grab or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http://www.ajf.gr.jp/lang\\_ja/africa-now/no86/top6.html](http://www.ajf.gr.jp/lang_ja/africa-now/no86/top6.html) (2012年3月12日アクセス)

## 華為技術(ファーウェイ)と聯想集團(レノボ)の対日進出 —中国企業多国籍化の二つのプロセス再論—

中川涼司<sup>1</sup>

### 要旨

中国の対外直接投資は近年急増を見せ、2010年には単年度フローでは日本を凌駕するに至った。しかし、中国の対日直接投資は国・地域別投資額でみて第21位(2010年単年度)と比較的少なく、対日投資は遅れていた。その要因としては、日本が直接投資をあまり受け容れていないことや、中国との地理的近接性や製造コストから考えて輸出が選択される、というだけでなく、企業の対日進出の戦略にも問題があった。華為技術(ファーウェイ)と聯想集團(レノボ)は中国を代表するITメーカーであり、中国を代表する製造業多国籍企業である。両者はビジネス・モデルおよび多国籍企業化のプロセスにおいて対照的な位置に居ながら、それぞれの特性を活かしつつ、対日進出を成功させており、これらが近年の中国の対日直接投資の拡大につながっ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中国、対外直接投資、華為技術(ファーウェイ)、聯想集團(レノボ)、対日進出

### I. はじめに

中国企業の対外進出が進んでいる。中国においても日本においてもこの中国企業の多国籍企業化の研究が進められており(藍慶新・夏占友主編[7]、天野倫文・大木博巳[1]、丸川知雄・中川涼司編[2]、高橋五郎編[5]など)それらの成果は小さくない。ただし、現実の進行があまりに急速であることから、現状の把握と多国籍企業化の目的等の分析に労力が割かれており、多国籍企業化のプロセスやスタイル等について概念的に把握することはまだ初歩的な段階にあるといつてよい。

中川涼司[4]は中国を代表する多国籍企業となった華為技術(ファーウェイ)と聯想集團(レノボ)を取り上げ、同じ中国企業でも多

国籍企業化のプロセスやスタイルに大きな違いがあ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それによれば、聯想集團はマーケティング・オリエンティッドな企業で、多国籍企業化の過程もM&Aを中心とし、それまでの蓄積を基に「時間を買う」やり方で一気に進めている。それに対し、華為技術はテクノロジー・オリエンティッドで、グリーフィールド投資を中心とし、また、電気通信キャリアのブランドで製品供給を行うなど、目立たず、時間をかけて漸次的に展開をしている。また、聯想集團については先進国に大きな市場を持つIBM PC事業部門買収後、改めて新興国市場への進出を強化したのに対して、華為技術は途上国市場から攻め上がり、欧州進出をし、最終段階としてアメリカと日本への進出を行ってい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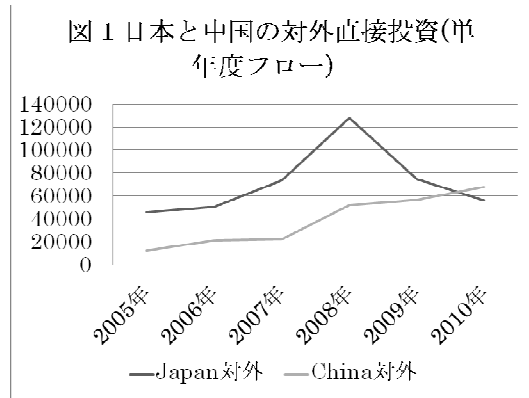
それから3年がたった。中国企業の多国籍企業化はさらに加速し、2011年度の単年度対外直接投資はついに日本を凌駕するに至った。先進国の中では比較的進出が遅れていた対日進出でも注目される事例が相次ぐようになっている。联想集団と華為技術は対日進出を進めた企業の代表的事例ともなっている。

そのような背景のもとで、本稿の以下の点を課題とする。

まず、中国の対外直接投資額(単年度)が急激に拡大し、ついに日本を追い越したことを確認する。ついで、中国の対外直接投資の地域別分布を考察し、対日投資が遅れていることをデータとして確認し、さらに、中国企業の対日FDIが遅れた要因を分析する。そしてこれらを背景として、中国を代表するIT多国籍企業である華為技術(ファーウェイ)と联想集団(レノボ)の対日進出の形態と有効性の検証を行う。

## II. 中国対外直接投資の急増と対日投資の遅れ

国連貿易開発会議(UNCTAD)が2011年7月26日に発表した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 (『世界投資報告2011』)によると、中国の2010年の対外直接投資額(FDI)は米国、ドイツ、フランス、香港に次いで世界第5位になり、前年から1つ順位を上げた。金額的にも単年度フローでみて、2005年段階では123億ドルと、日本の457億ドルとは距離があったものが、2010年には680億ドル(中国商務部等『2010年度中国対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では688億ドル)と日本の563億ドルを凌駕するに至っている。



(出所)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 より筆者作成。

表1 2010年中国対外直接投資フロー国・地域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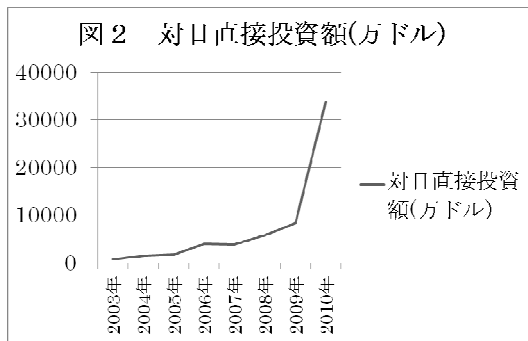
順位	国/地域	投資額(億ドル)
1	香港	385.05
2	英領バージン諸島	61.20
3	ケイマン諸島	34.96
4	ルクセンブルク	32.07
5	オーストラリア	17.02
6	スイス	13.67
7	アメリカ	13.08
8	カナダ	11.42
9	シンガポール	11.19
10	ミャンマー	8.76
11	タイ	7.00
12	ロシア連邦	5.68
13	イラン	5.11
14	ブラジル	4.87
15	カンボジア	4.67
16	トルクメニスタン	4.51
17	ドイツ	4.12
18	南アフリカ	4.11
19	ベルギー	3.70
20	アラブ首長国連邦	3.49
21	日本	3.38
	合計	635.68

(出所) 中国商務部等『2010年度中国対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11年, 9,36-41,82-87頁より筆者作成。

投資先は投資額の半分以上を占める香港や7分の1程度を占めるタックスヘイブン(租税回避地)を除くとルクセンブルク、オーストラリア、スイス、アメリカ、カナダ、シンガポール、

ミャンマー、タイ、ロシア、イラン、ブラジル、カンボジア、トルクメニスタン、ドイツ、南アフリカ、ベルギー、UAE、と続き（中国商務省等[10]による）、日本は上位20位には入っていない（表1）。

とはいえ、2010年以降、投資額は急拡大しており、今後の動きとしては現在よりは上位になる可能性もある（図2）。



（出所）中国商務部等『2010年度中国対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2011年、42頁より筆者作成。

### 1. 中国企業の対日直接投資遅れの要因

#### (1) 一般的背景

では、中国企業の対日直接投資は何故遅れているのだろうか。まず、一般的背景として日本の直接投資受入額の小ささが挙げられる。2005~2010年の単年度フロー合計でみて日本の対内直接投資は対外直接投資の12.6%にすぎない（UNCTAD[6]）。また、中国と日本の地理的な近さおよび日本の貿易障壁の小ささ、中国における諸コストの低さからいって、中国で生産し、日本に輸出すればよい、ということも対日直接投資を少なくしている要因と言えよう。

#### (2) 中国企業の戦略の問題

しかし、それらの一般的な背景だけで説明できない側面もある。それは中国企業の対日進出戦略の問題である。すなわち、日本企業を上回る「企業特殊優位」（S.ハイマー）が乏

しく、かつ、ブランド力の無さにも拘わらず自社ブランド展開をしかけようとしたといった点である。その典型は海爾集団（ハイアール）である。海爾集団は自社ブランドではローエンドでしか展開できず、それが結局ローエンドのブランド・イメージの定着につながり、限定されたローエンド市場へロックインされてしまうという悪循環を描いた（三洋電機の家電部門買収に成功し、今後「三洋」ブランドでの展開も図られるため、これらの悪循環から脱する可能性もある）。

### III. 聯想集団（レノボ）と華為技術（ファーウェイ）の中国におけるポジションと多国籍化の現段階

海爾集団（ハイアール）の対日進出については社会的注目がされており、丸川知雄・中川涼司編[2]その他で、詳細な研究も行われている。海爾集団が中国企業の対日進出の典型であるとはいえない。同じ電気機械メーカーである聯想集団（レノボ）と華為技術（ファーウェイ）の両社は両社の間で見て対極的な形態をとりつつ、日本進出の地歩を固めつつある。

まず、両社が中国を代表する製造業多国籍企業であることを確認しよう。中国企業联合会・中国企業家協会が選定した2010年の「中国企業500強」において華為技術は第11位、聯想控股（聯想集団を傘下に収める持株会社）は第21位である。海爾集団は第17位と両社の中間である。

しかし海外売上、FDI残高、海外資産においては、華為技術と聯想集団が国策を担う資源関係企業と並んで上位に入っているのに対して、海爾集団の順位ははるかに低い。

では、この両者はどのような企業で、過去にどのように多国籍企業化を行い、そして現在、

どのように対日進出をしているのだろうか。 その特徴や有効性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か。

表2 2010年中国企業500強・製造業500強における華為技術と聯想控股

順位	企業名	売上高	同左	利潤	同左	資産	持分	従業員数
		(億元)	増加率	(億元)	増加率	(元)	(億元)	(万人)
11	華為技術 (ファーウェイ)	1,493	21.6	182	314.36	1,397	433	7.5
17	海爾集団 (ハイアール)	1,249	5.01	29	63.77	966	166	6.0
21	聯想控股	1,064	-7.68	12	151.44	873	89	2.2

(注) 聯想控股有限公司は聯想集団を傘下に収める持ち株会社。

(出所) 中国企業聯合会・中国企業家協会選

定 <http://www.ccc-cceda.org.cn/c500/chinese/ep500.php?id=1> より筆者作成

表3 華為技術・聯想控股・海爾集団の海外進出ランキング順位(2010年)

	海外売上順位 (位)	対外直接投資 残高順位 (位)	海外資産順位 (位)
華為技術 (ファーウェイ)	7	47	11
聯想控股	8	26	15
海爾集団 (ハイアール)	43	51位以下	51位以下

(出所) 中国商務部等『2010年度中国対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58-63頁より筆者作成。

#### IV. 華為技術(ファーウェイ)のビジネス・モデルと多国籍企業化,対日進出

##### 1. 華為技術(ファーウェイ)のビジネス・モデル

華為技術(深圳華為技術有限公司)は1987年に元人民解放軍の軍人であった任正非によって創業された私営企業である。設立当初は小型の交換機,火災警報器,などの開発・生産,工事などを営んでいたが,利益を上げていたのは香港からのHAX交換機の代理販売であった。任正非は「市場でもって技術に換える」政策が追求されていた時期においてその政策の限界を認識し,自主的な技術開発を基礎に

おいた経営戦略への転換を決意した。華為技術が初めて開発した局用の交換機は半デジタル半機械式のJK1000機であった。その半年後には全デジタル式の交換機の開発にとりかかり,1992~93年にかけて大量の開発人員を採用し,1993年に2000門の大型交換機C&C08機の完成にこぎつけた。続いて万門級の交換機の開発にも成功した。しかし,当時,都市部の電話局の交換機は上海ベルやアルカテルなどの多国籍企業の支配下にあった。そこで,華為技術は農村市場から都市市場に向かう戦略を立てた。上海ベルなどの多国籍企業はさほど大きな市場ではない農村部にはあまり注力せず,人員もほとんど配置していなかったため,そこに交換機そのものだけでなく電話局幹部

や技術者の個人的な要望に対するものまで過剰サービスともいえるほどのサービスを提供することで、農村部から市場を獲得していった。農村部の市場の確保からさらには都市部の市場へと進出していったのである。

これらを可能にしたのが、人民解放軍出身の任正非による軍隊式の人事労務管理および「マットレス文化」（深夜残業をこなすために職場にマットレスを持ちこんでいる）とも呼ばれるモーレツ主義であった。

## 2. 華為技術の国際化の3段階

華為技術の国際化戦略は三段階に分けられる。第1段階は旧ソ連、東欧、アフリカ等へ新興市場への輸出と保守管理拠点設置の段階で、多国籍企業化の発展段階からみれば準備段階にあたる。第2段階は初期段階で、ヨーロッパ市場への進出・保守管理拠点設置と世界各国での研究開発体制の構築を行う段階である。第3段階は本格化段階であり、日本とアメリカへの進出を行う段階である<sup>2</sup>。中国国内でも展開された周辺から中心へという戦略は国際化戦略においても繰り返されたのである。中川涼司[4]執筆の時点で、華為技術の日本における顧客はイー・モバイルのみであり、まさにその端緒段階であった。しかし、その後、以下に示すように日本での事業はその後大きく展開している。

華為技術はこのように国際化をすすめ国際的な通信機器メーカーに成長した。2009年の世界での売上高は前年比19%増の1491億元（約218億ドル）でソニー・エリクソンに次ぐ通信機器メーカー世界第2位であった。

## 3. 華為技術(ファーウェイ)の日本進出

(1)イー・モバイルへのシステム供給を中心とする初期段階

2005年11月に華為技術日本株式会社（ファーウェイ・ジャパン）が設立された（東京都

千代田区大手町）。2002年にすでに事務所の開設はされていたが、国際化の第3段階をにらんで日本進出の拠点とすることを狙いとして現地法人とされたものである。地域本部とのつながりでは東アジア地域本部所轄となる。2007年時点ですでに70名以上のスタッフをそろえており、その大半は技術スタッフであった<sup>3</sup>。当該時点では新興無線通信キャリアであるイー・モバイル社に基地局のシステムを提供し、日本法人はその保守管理を行っているにとどまっており、製品は中国から供給され、研究開発は本社から世界の各地の拠点に分担される。NTTなどのメジャーなキャリアは歴史的にも技術的にも日本企業の優位性が強いいため、企業向けや新興キャリアが顧客ターゲットとされていた。

### (2)端末機器事業の展開

華為技術は伝統的に基地局など用の通信システムを中心とし、端末機器はあまり重視してこなかった。しかし、2010年からその方針を変え、全社的に端末機器の強化を行うようになった（呉穎[8]）。それは、アップルのiPhoneやiPadなどまさに端末がネットワーク全体のあり方を左右する時代になったことに対応したものであり、同社の「端、管、雲」（端末、ライン、クラウド・コンピューティング）戦略の一環である（連曉東、日本ファーウェイも端末機器の販売強化に着手した。しかし、その際に採られた戦略は自らのポジションを踏まえた現実的なものであり、日本メーカーや韓国メーカーとの正面衝突を避けつつも成長する分野への進出が目指された。そこで選択されたのが、むしろiPadなどとのセット販売がされことも多い、データ通信端末（「ポケットWiFi（ワイファイ）」のタブレット）や、デジタルフォトフレーム、などである。ソフトバンクのPocket WiFi「C01HW」、EMOBILE（イー・モバイル）Pocket WiFi D25HWは一見すると

ソフトバンク製、イー・モバイル製に見えるが、どちらも華為技術製である。HW という型番とロゴに注意しなければそれとはわからない形である。

華為技術は、ヨーロッパでも携帯端末を電気通信キャリアのブランドで販売するなどをして、自社ブランド力の弱さをカバーする戦略をとっているが、そのやり方は日本でも踏襲された。これは自社ブランド名の浸透ということにはマイナスで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が、実質的な便利さと品質で売り込む上では有効な戦略であった。このようにして、NTT Docomo、KDDI、ソフトバンクはすべて華為技術の端末供給先になった。2010年の華為技術の日本での売上約4億ドルの70%は端末機器によっている（呉頴[9]）。2012年2月にSoftbankが売り出したSoftbank 4Gは中国政府が推進するTD-LTE技術を応用したものであり、端末機器の製造は華為技術等が担っている。今後、同社の必勝パターンである、「周辺から中心へ」攻め上がるパターンで目立たないが着実に進出を進め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

## V. 聯想集団（レノボ）のビジネス・モデルと多国籍企業化、対日進出

### 1. 聯想集団のビジネス・モデル

聯想集団（レノボ）は1984年に中国科学院計算技術研究所が20万元を出資の下に、同所の11名の所員で設立された。人事権、財務権、経営権のすべては会社側に渡された。試験、修理、教育訓練などの業務によって70万元の資金を作り、1985年に漢字カードへの進出を決めた。これが成功し、売上高は急成長した。1988年、30万元を投じ、香港のコンピュータ小売商との合併で香港聯想電腦公司を設立（1994年に香港株式市場上場）、外国ブランド製品の流通を担当するとともにインテル286のマザーボード生産、システムインテグレーションを手が

け、国際的な技術的・市場的な連関を強化した。また同時に米国ASTの中国単独代理商の地位を獲得、パソコン完成品販売はASTマシンの代理販売から開始された。これらの成功によって、聯想集団は国外にはアメリカ、シンガポール、ドイツ等に国内では十数カ所に子会社を設立、また、北京、香港、深圳の3つに生産基地を、シリコンバレー、香港、深圳、北京の4つに研究センターを設立するに至った。

1990年には自社ブランドにて286マシンから完成品市場に参入した。1992～93年は外国メーカーの本格参入により、中国メーカーが苦境に立った時期であるが、聯想集団も例外ではなかった。この危機を、聯想集団は販売網を整備すること等によって乗り切った。

1993年香港聯想が広東省恵陽に科学技術パークを設立、生産拠点とした。これらを背景に聯想集団はキャッチアップ力を高め中国最初の486マシン（1991年）、ペンティアムマシン（1993年）を売り出し、ペンティアムProマシン（1995年）についてはアメリカと1日違いですぐさま市場に売り出した。1996年、聯想集団はパソコン国内市場第1位を獲得（以降1位を継続）、業界のみならず政治的にも大きく注目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1998年は電子工業部（現・信息产业部）が毎年公表している電子百強にて国内のカラーテレビトップメーカーである長虹もしいので、中国内で電子メーカー最大の売上176億459万元（約2600億円）を誇るに至った。

聯想集団の成功の要因はどこにあったのか？それは第1により迅速かつよりの確に世界標準に則る戦略を取ったこと、第2に技術優位でなくマーケティング優位を志向したことに、第3にそれらを支えた柔軟な組織戦略を取ったことである。具体的には世界との「同時化」と中国人ユーザ向けの改良を中心とした製品開発、シナジー（相乗効果）を意識した製品ライン、リベート制や専売店制などを整え

た流通チャネル,全国統一価格,巧みな広告宣伝・セールス等である。

## 2. 2000年の組織転換と国際化戦略

聯想集団は2000年に転機を迎えた。PCがますますコモディティ化するなかでは、PC単体販売を中心とするビジネス・モデルでは成長が望めなくなってきたからである。2000年の発展戦略は①PCにおける競争優位のさらなる強化,②サーバー,ネットワーク機器,ソフトウェア開発,システムインテグレーションを総合したネットワーク構築力の強化,③勃興するインターネット企業への対抗としてポータルサイトの運営 (FM365) 等インターネット事業への進出である。2000年に大きな企業組織編制変えが行われ,新たな聯想集団と神州数碼の2大集団等を聯想持株会社(聯想控股有限公司,Legend Holdings)が統括する形となった。2001年楊元慶が新・聯想集団の総裁・CEOとなり,多角化・国際化戦略を策定,2002年 携帯端末にも進出した。2003年,聯想集団の商標をLegendからLenovo (レノボ) に変更した(持株会社レベルではLegendのまま)。しかし,新規事業への進出は携帯端末への進出を除いてはことごとく失敗した国際化もPCについては東南アジア等に売上の3%を程度もつに過ぎず,多角化と国際化の二大戦略は失敗したのである。

## 3. IBM PC事業部買収とその後の事業展開

2004年12月8日,聯想集団の創始者の一人で,聯想持株会社総裁,聯想集団董事局主席の柳伝志はIBMのPC部門買収について公にした。これは,聯想集団が6.5億米ドルの現金,聯想集団の6億ドル相当の株式(これによって,IBMは聯想集団の18.9%の株式を持つことになる)の12.5億ドルおよび6億ドルの負債負担で,IBMのPC部門を買収す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った。これによって,世界PC市場第9位(といっ

ても大半は中国市場)の聯想集団が,デルとHPに次ぐ,地位を得ることになった。2003年の事業成績を基に計算すれば,販売は1190万台,販売総額は120億米ドルとなり,これは聯想集団のPC事業を約4倍にすることを意味した。買収後もThinkPadの商標(「IBM」の商標については18ヶ月)の使用が可能で,世界本社はニューヨークに置かれることとなった(のちラレーイに移転した)。2005年3月にはTexas Pacific Group,General Atlantic Group and Newbridge Capital Groupなど米投資ファンドから3億5,000万ドルの戦略的投資を受けることが決まり,5月1日に両社は買収の手続き完了が発表された。新・聯想集団では,聯想集団の楊元慶氏が董事局主席に,IBMでパソコン事業を統括していたスティーブ・ウォード(Steve Ward)がCEO兼董事局副主席に就任した。聯想集団の創業者の一人である柳伝志は非常勤董事(取締役)に退いた。新・聯想集団は日本の大和(の一部)と米ノースカロライナ州のラレーイの2つの研究所も引き継いだ。ラレーイは統括機関となり,大和がノートパソコンの,北京がデスクトップパソコンの開発を担う体制となった。従業員は21400人でうち1700人の研究者・技術者であった。

販売チャネルとしては,全世界的には,企業向けであるリレーションシップ・モデル部門と個人向けのトランザクション・モデル部門に分けられ,(中国を除いて)前者には主にThinkブランドが,後者には主にLenovoブランドが投入されることとなった。

しかし,その後,組織の統合の困難,従来のThink顧客の流出,北米におけるLenovoブランドの苦戦などの中で損失が嵩み,2006年3月には1000人の,2007年には1400人の解雇が実施された。CEOは組織統合のために留任したウォードに替わり,2005年に元デル副社長のアメリオ(W.J. Amelio)がスカウトされ,収益性の改善に向けた努力が重ねられた。ま

た、中国市場の再重点化や新興市場開拓も進められた。このような努力の結果、2007/2008年度において税引前利益が対前年比 262.5%増の 4.64 億ドルとなり、収益性改善はある程度達成できた。しかし、PC 市場の頭打ちと低価格化、利幅縮小とスマートフォンや iPad 等の携帯型端末への市場移行が発生しており、その対応が必要であった。アメリカは収益性志向が強すぎ、成長性志向が弱かったため解任され、2009年2月5日創業以来のリーダーであった柳伝志が董事局主席に復帰、また、柳のもとで聯想集団の成長に寄与してきた楊元慶が CEO に復帰した。楊元慶は中国市場とくに農村市場の開拓、新興市場の開拓等によって PC 事業の拡大を図るとともに、スマートフォン等への新規事業への取り組みを強化した。

#### 4. 聯想集団（レノボ）の日本市場戦略

聯想集団の IBM PC 事業部買収に伴い、2005年5月に日本法人として東京都港区六本木の日本 IBM に隣接して本社を構える「レノボ・ジャパン」が設立された。資本金は3億円、従業員数は640名で大半は IBM PC 事業部からの移籍であるが、その他間接部門から移籍や、他社からの入社もある。設立時には代表取締役社長に元日本 IBM 理事の向井宏之が就任し、9月に代表取締役はデルジャパンホーム&ビジネスセールス事業本部統括事業本部長と宮崎カスタマーセンター・マネージング・ディレクターを兼務していた天野総太郎に交代した。これは全社的に元デル重役をスカウトしていたことと符合する。日本 IBM はすでにノートパソコン生産拠点であった藤沢工場は閉鎖しており、生産拠点としては引き継がなかった。神奈川県大和市の研究所のうち、ThinkPad の研究・開発部門を持つ部門については引き継ぎ、全世界のノートパソコンの開発拠点となった（2010年12月には横浜市みなとみらい地区のみなとみらいセンタービルへ

移転したものの、横浜事業所大和研究所として大和の名称を残した）。レノボ・ジャパンは、新聯想集団においても営業拠点にとどまらない重要な役割を担うこととなった。

しかし日本市場戦略には課題も存在していた。ThinkPad/Center はすでに日本のほとんどの家電量販店の店頭からは消え去っており、また、個人向けとして開発された Aptiva もすでにない。日本 IBM のチャンネルを使って聯想集団の個人向け販売を行うことはきわめて困難であった。天野社長の主導下で個人向けのトランザクション部門の強化が図られたが、トランザクション部門で成果が上がらなかつたばかりか、企業向けのリレーション部門でも大きく後退した。

聯想集団による IBM PC 事業部買収後の日本の PC 市場は NEC と富士通が 20% 台で首位を争い、その後をデル、東芝、HP、ソニーが続き、世界市場の第 3 位を争う聯想集団とエイサーが第 7 位争いをする状態であった。日本 IBM の PC 事業はほぼ法人営業に特化し、個人向けはヘビーユーザ等を対象にしていたにすぎず、その状態から、日本では知名度や信頼度が依然それほど高くはないレノボブランドで、巻き返しをす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かった。

2008年10月1日天野社長は退任し、後任には、デルでアジア太平洋地区でのリレーションシップ部門を担当ののち、聯想集団に移籍し、アジア太平洋地区等のマーケティングを担当していたロードリック・ラピンが当たることとなった。

そこで、採られた戦略は（マーチャンダイジングの強化やタブレット型端末への進出などもあるが）IBM PC 事業部門買収の日本における「再現」であった。それは NEC との PC 事業合弁である。両社による事業統合の発表は 2011年1月27日であった。NEC は国内 PC 事業では首位を続けているが、国外市場はパッカードベルなどの失敗もあり、ほぼ国内専

業状態となっていた。全世界出荷台数で見れば、NECは联想集団の10分の1程度にすぎない。逆に联想集団は上記のとおり世界第4位のメーカーでありながら日本市場では第7位当たりで低迷していた。両社は互いの弱点を補強しあう形で合弁を行うこととなったのである。2011年7月4日に合弁会社のLenovo NEC Holdings B.Vが発足した(出資比率は联想51%、NEC49%)、傘下にレノボ・ジャパンとNECパーソナルプロダクツが入り、ここにNECレノボ・ジャパングループが形成された。NECブランドの維持は求めたが、出資比率からもわかるように経営の主導権にはこだわらなかつた。NECにとってみれば、PCは売上高3兆5800億円(2010年3月期)のうちの2500億円程度を占めるに過ぎず、収益性の低い事業を次々と切り離してきたNECから見れば、PC事業も切り離し対象であっても不思議ではない。とはいえ、かつて88,98シリーズで一世を風靡し、統合時点でも国内首位を保っていたNECのPC事業が中国企業に主導権を譲る形での合弁に移行したのはエポックメイキングな事柄であった。この合弁成立により、2011年の第4四半期において、NECレノボ・ジャパングループのシェアは2位以下を引き離し、24.1%に達した(IDCが2012年2月16日に発表した速報値による)。

M&Aによって一挙的にシェアを獲得する戦略はここにおいても成功を見た。

#### IV. まとめ

中国の対外直接投資は近年急増を見せ、2010年には単年度フローでは日本を凌駕するに至った。しかし、中国の対日直接投資は国・地域別投資額でみて第21位(2010年単年度)と比較的少なく、対日投資は遅れていた。その要因としては、日本が直接投資をあまり受け容れていないことや、中国との地理的近接

性や製造コストから考えて輸出が選択される、というだけでなく、企業の対日進出の戦略にも問題があった。联想集団(レノボ)と華為技術(ファーウェイ)は中国を代表するITメーカーであり、中国を代表する製造業多国籍企業である。両者はビジネス・モデルおよび多国籍企業化のプロセスにおいて対照的な位置に居ながら、それぞれの特性を活かしつつ、対日進出を成功させており、これらが近年の中国の対日直接投資の拡大につながっている。

表4 联想集団(レノボ)と華為技術(ファーウェイ)のビジネススタイルと海外進出形態

	联想集団	華為技術
志向性	マーケティング志向	テクノロジー志向
市場戦略	ボリュームゾーン	周辺から中心へ
人事労務	競争主義	軍隊式
海外進出	M&A 中心	グリーンフィールド投資中心 (ただし対米は M&A 中心)
	中心から周辺への回帰	周辺から中心へ
		途上国では政府と一体
	ブランド獲得戦略	先進国では隠れ身戦略

(出所)筆者作成。

#### 脚注\*

- <sup>1</sup> 立命館大学国際関係学部教授。電子メール：  
rnt20014@ir.ritsumei.ac.jp
- <sup>2</sup> 詳しくは中川涼司[4]。
- <sup>3</sup> 2007年2月14日に華為技術日本社において実施した聞き取りによる。

#### \*参考文献

- [1] 天野論文・大木博巳『中国企業の国際化戦略—「走出去」政策と主要7社の新興市場開拓』ジェトロ、2007年
- [2] 丸川知雄・中川涼司編『中国発・多国籍企業』同友館、2008年



- [3] 中川涼司『中国のIT産業—経済成長方式  
転換の中での役割—』ミネルヴァ書  
房,2007年
- [4] 中川涼司「華為技術（ファーウェイ）と聯  
想集団(レノボ)—多国籍化における2つ  
のプロセス」（丸川知雄・中川涼司 [2]  
所収）
- [5] 高橋五郎編『海外進出する中国経済（叢書  
現代中国学の構築に向けて）』日本評論  
社,2008年
- [6]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  
2011
- [7] 藍庆新・夏占友主编《中国企业“走出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
- [8] 连晓东《华为终端胜算几何》《中国电子报》  
2011年5月24日
- [9] 吴颖《华为重新生长》《IT经理世界》第  
05期总第311期,2011年3月5日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0年度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1年

## 靠海吃海的忧患与解困

### —山东荣成市人和镇院乔村调查—

张士闪<sup>1</sup>

#### 摘要

2010年4月17至21日,因为承担中国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志》子课题《渔民开洋谢洋节》,我率领山东大学,山东艺术学院民俗学专业师生一行10人,来到山东省荣成市人和镇院乔村,在对谷雨节期间渔民祭海仪式进行重点调查的同时,也对整体意义上的村落生活予以关注,并特别注意全球化时代来临后该渔村的变迁状况。2010年8月,我承担山东省旅游局《山东省民俗文化乡村旅游规划(2011-2020)》项目,率领规划组骨干成员在2010年12月,2011年4月和6月又三次前往该村,在进行规划的同时又做了补充调查。本文即主要依据上述三次的调查资料撰写而成。

#### I. 环山面海的渔村

“乔”,音“kuǎng”,山东半岛东部地区方言中特有的地名用字,使用范围以烟台,威海,青岛为主。“乔”是指一种特殊的地貌,即两山之间的较大山谷或相对平坦之地。

院乔村位于胶东半岛最东端的西南角,三面环山(铁槎山),一面靠海(东海),属于冬暖夏凉的海洋性气候区。(图1,图2)据村民讲,本村于明朝天启五年(1625)建村,属于主姓村,王姓占全村人口90%以上。该村占地3750亩,户口登记村民3500多人,代以渔业为生。同时,村内还有来自安徽,河南,东北等地的打工者3000多人,使村里常住人口数超过7000人。院乔村村民自述有“不欺生”的传统,对“院乔村养活穷人”的话题津津乐道。

目前,院乔村集体经济基础雄厚,村民生活富足安康。山东院乔实业集团公司为院乔村集体所有,实行的是村企合一的管理方式,下辖国际货运,水产品精深加工,名优海品养殖,船舶修造,生物制品,特种养殖等20多个子公

司,资产总额4.9亿元。村民自有渔船仅大船便有28艘,价值7亿元。以2010年为例,村集体实现经济总收入33214.2万元,上交利税3432万元,出口创汇898.4万美元。



图1: 院乔村区位关系图



图2: 环山面海的院乔村(邹本东摄)

院乔村以渔业生产为主，男女分工明确，男人出外作业，妇女当家，这使得同性之间的交往比较密切。该村妇女因为长期在缺乏男人的情形下持家，于是互助群体较多，如妇女之家，老年人协会，秧歌队等。此外，本村还成立了创业者协会，特困救助爱心会等经济组织。

但近海资源的日渐匮乏，是院乔村渔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图3）依靠现代技术的渔业远洋捕捞，加工与运输成为该村经济产业的支柱，而这又引发国内外渔业日趋激烈的竞争，和国际摩擦的难以避免。村民对生活品质要求是不断高涨的，村委，企业和村民的危机意识和发展意识随之强烈，加快产业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业已成为全体村民的共识。以2011年退休的老书记王巍岩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提出要发展民俗旅游业，但全村并未形成一致。



图3：4月的早市上，只有小鱼小虾

## II. 民俗传统：历史记忆与对未来的想象

在院乔村渔民的讲述中，以前这一带近海到处都是鱼，在岸边随便撒网就可以捕到很多鱼，鱼吃不了就晒干了卖给别人当土地肥料。现在随着海洋污染的加重以及渔船马力的增大，海洋资源急剧减少，靠海吃海越来越难，再过二三十年就更不敢想象。村落中至今保留着很多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往往吸引着为数甚多的村民参与其中。尤其是谷雨节祭海仪式，吸引着几乎所有家庭参与进来。村民在谷雨节时

纷纷来到龙王庙行祭，既有传统信仰因素，也是对往昔时光的记忆和回味，又是对莫测未来的一种“解困”的期许。从一开始，这类仪式就被设定为与整个村落社区生活有关，面向所有村民开放，因而指向公共性的利益与情感，具有某种公共表演和文化创造性质。下面，我们将关注院乔村最重要的几种民俗传统，相信这是我们理解该村文化体系的捷径。

### 1. 龙王庙：村落的神圣中心

庙宇，对于村落而言，既是公共聚会的场所，又是举行某些重要仪式的合适场所。龙王庙是院乔村最神圣的祭祀之地，高耸于村南的山坡之上，面朝大海，看上去很是气派。（图4）据村民说，龙王庙由来已久，原是一个破旧的小庙，每到谷雨节，前来祭拜者拥挤不堪，场面甚为混乱。村民纷纷向村委提议重修龙王庙，并自愿出钱出力，最终于2009年修整一新。



图4：院乔村龙王庙

龙王庙共有三个大殿，三个神殿前各有一尊香炉，供香客烧香。进门左右两旁分别是海神娘娘殿和财神殿，其中财神殿的四壁上分别绘有武财神赵公明，利市财神姚少司，富财神沈万三，义财神关羽的画像，边桌上放有教化众人的教义诗词，任香客拿取。正对庙门有一尊2米多高的香炉，香炉后立有牌坊，题名“龙王庙”。牌坊后是一条十几米高的石梯，显得威严而神圣，拾阶而上，便到了正殿——龙王宝殿。龙王殿高于海神娘娘殿和财神殿，殿内立

有一尊高大的东海龙王像，凝视着前方辽阔的海平面。龙王右手边是风伯，雨师的塑像，左手边则是雷公，电母的塑像。各神像上方都悬挂着金黄的丝缎流苏，上绣有腾龙图案。

龙王宝殿的左边，是重修龙王庙后所立的功德碑，刻有捐资人姓名。右边立有一块屏风，上面绘有八仙过海图。屏风前砌有一座高台，作为文艺表演的舞台，上悬横幅“渔民开洋节，谢洋节文艺汇演”。

龙王庙长年香火鼎盛，村民每每来此上香祭拜，特别是家中有人出海作业的家户，更是特别虔诚地要常来祭拜龙王以求平安，财旺。一年之中香火最旺的时候当属谷雨节，此时全村老少几乎都到龙王庙里来上香祭拜，场面壮观，热闹非凡。据村民说，谷雨节这天的鞭炮声比过春节时还要热闹些。

## 2. 正月十三的“起信”

在院奝村，正月十三是每年第一个大汛，海水流速开始加快，为保佑这一年的海上作业都能平安顺利，喜获丰收，渔民要在龙王庙举行每年一度的祭海活动，称作“起信”。届时，附近没有龙王庙的村民也来这里祭拜。

“起信”祭拜讲究抢早，越早越好，渔民多在正月十二晚间就开始陆陆续续到龙王庙祭拜，但大规模的祭拜活动是从正月十三的凌晨开始的，以凌晨2点左右人最多，大规模的人流一直持续到凌晨6点多。此后，这一整天都会有村民零零散散地来祭拜，尤其是女人，因为女人是不能在晚间参加祭拜活动的。

“起信”祭拜活动进行时，村民一般会带着一整个猪头，5个大枣饽饽以及香，纸，鞭炮，酒等，到龙王庙上香拜祭。以神的地位高低而定祭拜顺序，依次是龙王爷，海神娘娘，财神，土地神，祭拜仪式大致相同，无非是烧香，磕头，敬酒，摆供，然后出来烧纸，燃放鞭炮。于是，一晚上鞭炮声不绝于耳，清晨起看遍地都是红色。此外，渔船第一次出海之前也要来给龙王爷上香，并要在船上燃放鞭炮，

祈求出海能够发财，平安归来。

## 3. 谷雨节祭海：庙祭，船祭与海祭

院奝村人有“鱼鸟不失信”，“谷雨百鱼上岸”之说。谷雨节后，休息了一冬的渔民开始整网出海，为了祈求平安，预祝丰收，出海前要举行隆重而盛大的仪式以向海神献祭，由此形成了隆重的祭祀海龙王的仪式活动。仪式从蒸饽饽的忙忙碌碌开始，以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狂欢而宣告结束，所以渔民中间又有“一年中属谷雨节最隆重，春节也赶不上”的说法。

传统上，谷雨节祭海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以渔船为单位，每条渔船都要准备一头整猪，去毛带皮，用腔血抹红，将一朵大红花戴在猪头上，向海龙王献祭；二是渔民家自为祭，一般是只买一个猪头，买不起猪头的也可用蒸制的猪形饽饽代替。除了在龙王庙祭拜外，还要到渔船上祭拜，将祭品摆在沙滩或码头上，烧香，烧纸，磕头，放鞭炮，祭拜完毕后将大枣饽饽抛施到大海中去。现在，以渔船为单位的整猪祭祀和家自为祭这两种形式依然保留，只是在村里集资将龙王庙翻修以后，祭海活动就都基本上在龙王庙内进行，渔船祭祀和海边祭祀的仪式趋于消失。

一般是在谷雨节前两三天，各家就开始准备祭祀用的猪头，大枣饽饽，其过程与过年前的“忙年”相似，而在隆重程度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谷雨节的前一天上午开始，就陆续有村民携带整猪或猪头，大枣饽饽，纸，香，鞭炮等来到龙王庙，在庙门口放一挂鞭炮。（图5）进入龙王庙后，有的会先去祭拜左右偏殿的海神娘娘和财神爷，通常在门前烧柱香就行，也有的人省略这一环节直接去主殿祭拜龙王爷；进入龙王爷殿内，先将供品摆上，大枣饽饽五个一组，很讲究地三个摆下面，两个摆在上面，然后烧香磕头，祈祷龙王保佑新的一年平安发财。谷雨节祭海的高潮是由村委会干部和村企业负责人，船老大共同前来祭拜的时候，几头

通体血红，头顶红花的整猪由几个壮劳力抬到龙王殿前，旁边摆了数十个八斤八两重的大枣饽饽，他们轮流向龙王爷献上九炷碗口粗的巨型香，并向香炉前的“玉液盃”倾洒数瓶白酒以供龙王爷享用，然后默默祷告。随后本村村民的祭拜，也有一部分外来的人。祭拜者恭恭敬敬地给龙王磕头，边磕头边随口念叨“鱼虾满仓……风调雨顺……龙王保佑，多打鱼，不管大船小船都发财……”之类。在这一过程中，前来围观的村民将仪式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的红光。



图 5：村民装点猪头准备祭献龙王庙

随着村民们陆续上香，龙王殿前由院夼村妇女协会组织的石岛大鼓表演队和村老年协会自发组织的锣鼓队开始表演，锣鼓喧天，此起彼伏。此外，在龙王殿西侧专门搭建的舞台上，表演太极拳，扇子舞等各种文娱活动。据说，该村早些年的时候还有耍狮子，踩高跷，舞龙，扭秧歌等传统表演形式。

祭祀仪式完毕，中午，晚上是渔民齐聚一堂，庆祝狂欢的时刻，所有渔船暂停作业，船长大摆筵席宴请船员，大家一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划拳猜令……狂欢之中，平时产生的误解和摩擦都会烟消云散，相互间的情谊得到增强。

#### 4. 花饽饽系列

院夼村面食风俗独特，如生日寿桃，清明节的面燕，七月七的烙花<sup>2</sup>，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花饽饽。过去谷雨节祭海买不起猪头的，要用面蒸制猪头以代替。给父母过生日时，儿女需要蒸 20 斤重的大寿桃。在葬礼后做“五七”仪式的时候，要做名为“四山”，“四海”的面食供品，“四山”指龙，虎，鹤，鹿，“四海”指对虾，鲛鲛，螃蟹，海螺。花饽饽还是该村年节期间供家堂，祭祀龙王和走亲戚串门的必备礼品。（图 6）



图 6：花饽饽是祭祀海龙王的必备供品

花饽饽的制作程序是：先取一些干面粉，用水和“引子”使其发酵，接着揉面，取八斤八两的湿面做成一个大饽饽。剩下不够八斤八两重的，就用秤平均分成若干份，做成小饽饽。但小饽饽不能用于祭祀。花饽饽要“笑”才好，饽饽一定要“开口”，意思是吉利。一锅只能蒸一个，一个就需要 50 分钟。通常一共要蒸 10 个，5 个一包，敬神祭祖一般就用 5 个或 10 个。所用枣子的多少决定村民口中饽饽的“大”，“小”：再大的饽饽，如果点缀的是两颗枣，也叫“小饽饽”；再小的饽饽，如果点缀的是三颗枣，也叫“大饽饽”。蒸制敬神和走亲戚用的大饽饽时，需要亲邻间的互助帮工，此时是村中妇女频繁交际的时段。

婆婆在大年三十那天会有意地问儿媳：“蒸大饽饽了吗？”媳妇一定要回答：“蒸了，蒸了，蒸了很多！”即使没蒸也要说蒸了，谐音

“挣了”，寓意挣钱发财。大年初二，初三姻亲走动时，要给岳父母家送花饽饽，外面用花色或红色的包袱包裹，放在用柳条编成的或方或圆的笊帚筐里盛着，用扁担挑上。这时的大饽饽有莲子花的，有点心饽饽，每个差不多都要用一斤面。

### 5. 剪纸：小龙，元宝，老财神

院乔村剪纸的造型主要有“小龙”，“元宝”，“老财神”等，主旨是对财富的追求，对吉祥的渴盼。这些剪纸通常在过二月二期间剪制张贴，象征着人对自然的喜爱，敬畏和欲加控制的复杂心理。“老财神”一般会贴在内门上，小龙则贴在大门两侧的底部，比较讲究的人家还会在门窗，炕上，贵重家具上张贴。

“小龙”是最基本的剪纸模型，新手学剪纸大多从小龙开始。“小龙”造型没有指爪，按照村民的说法就是“小龙就是蛇”，但龙身有鳞状物，整体肥短，不太像蛇更像鱼。特别是龙嘴，实际就是鱼嘴，这样更显可爱。“小龙”的造型底下常以船型元宝装饰，小龙在元宝上翻腾，令人想起鲤鱼跳龙门。龙角过于长大，仅略短于龙身，这应该也是鱼虾等海洋生物的特征。“小龙”剪纸的造型以简洁小巧为优，多贴到两侧门或窗台两下角，两个头都朝上，村民称为“龙抬头”。

“老财神”就是青蛙，当地方言俗称“老别把子”。（图7）二月二百虫出洞，青蛙能吃虫去害，因此寓意驱虫。蛙的剪纸造型丰肥，夸张更似螃蟹，有时干脆就在青蛙的四肢上直接加上螃蟹的蟹爪。青蛙图形内都是大大小小的方孔钱，毫不遮掩对财富的向往。

一连串的元宝和小龙，青蛙等造型多是连缀结合在一起，相映成趣，目前没见到单独的元宝剪纸。



图7：“神”（青蛙）是院乔村剪纸的常见造型

### III. 风起于青萍之末：全球化时代的村落社会

龙王庙的兴建，花饽饽与剪纸的时兴，正月十三“起信”与谷雨节“祭海”的传承不衰……显然代表了院乔村渔民生活的特殊之处，与内陆村落形成鲜明对比，是这个依山傍海的小康渔村的文化特色所在。我们应以此为基点，从文化整体的层面理解院乔村社会生活。院乔村的社会生活，主要包括“山与海”，“神与人”，“船与家”，“官与民”，“政与企”，“内与外”等层面。其中，“山与海”是指院乔村的地理地貌特征，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依山傍海的地理位置潜移默化地塑造，影响着村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神与人”是指院乔村的信仰活动，地处人文圣地山东浓郁的儒学文化氛围之中，与铁槎山上的佛道古迹，以龙王庙为代表的民间信仰，共同构成了院乔村多元共生的信仰生态。“船与家”对应着院乔村的渔业生产。“政与企”，“官与民”对应着院乔村的社会组织文化，村企合一，人员交叉，角色重叠，相互支撑，一个面向市场，一个面向行政。

如果说，上述种种因素代表了院乔村传统的村落社区结构，那么以革命性，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为特征的全球化浪潮，则是自外而内地逐渐渗透到这一渔村的日常生活及其发展逻辑之中，并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可以说，由全球化带来的村落生活变迁并自今日始，却从来没有像近30年间的变化如

此剧烈而彻底。在院奂村，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包括：

**1. 革命性的巨大影响。**院奂村村民向来以勤俭著称，20世纪50年代以前，他们曾依靠打渔所获在周边地区购买了许多土地，雇工耕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当地政府规定院奂村须以打渔为业，强制将这些土地无偿交还邻村，显示出民族国家无与伦比的权威力量。

**2. 现代性的强力渗透。**近2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夏天进入院奂村作短期居留，对该村原有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生态形成影响，如铁槎山生态，海域生态，社区管理，邻里关系，环境卫生等。如今的院奂村，绝大多数家庭有电视机，电话等现代传媒工具，以小轿车代步，一半以上家庭安装了互联网，现代信息可谓无孔不入地进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作为一个典型的海边渔村，传统的院奂村节日习俗具有浓郁的渔业特色，与传统农耕型村落的节日体系大有不同，如许多与农事活动紧密相连的节日在该村不过是徒有虚表，而与渔业活动紧密结合的节日却被大力突出，最为突出的即正月十三“起信”与谷雨节祭海的隆重举办。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随着渔民社会交往圈的扩大，电视，网络等现代工具的普及与流行，当代渔民生活越来越趋于城市化，院奂村原有的文化个性逐渐减弱。

**3. 全球化浪潮下的被动选择。**面向海洋开展国际业务的经历，与村民原有的道德规范相叠合，使得院奂村人对承诺看得很重。其中，1980年代与日本客户打交道时，对方宁愿赔一大笔钱也恪守合同前来履约一事，给院奂村村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已成为该村比较稳固的历史记忆，经常向外来客人提及。事实上，院奂村在所从事的各项商业贸易活动中，口碑甚佳，向来没有纠纷。时至今日，尽管以老书记王巍岩为代表的部分村领导，以国家政府的“腾笼换鸟”为旗号，在该村大力宣传渔业旅游的种种好处，试图以恢复跑篷，海钓等传统渔业活动以实现村落经济结构的转型，但收效甚

微。这说明，已经初步富裕起来的院奂村，面对全球化贸易浪潮的逼近，还没有最后做出社区发展的战略性选择。

我注意到，年轻一代村民对于村落传统的渔业生产方式已经相当隔膜，对于村落历史也比较淡漠，这其实意味着村落个性与民俗旅游资源的双重丧失。如果说历史记忆是一种资源，那么民俗传统是以历史记忆为资源而形成的一种知识，民俗知识的传承离不开身体知觉的形成和情感的注入。如何依托村落个性，在全球化势头中做出符合村落社区生活的发展模式，仍然是院奂村人必须做出的选择。

#### 注释\*

<sup>1</sup> 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

<sup>2</sup> 在清明节蒸的“面燕儿”，实际并不只是燕子，而是面蒸的各种小动物，蒸出后用线串着挂在屋里，认为可以保佑小孩不得病。七月七要“烙糖烧”或“烙花”，是用引子面蒸制的面食，用模子刻出各种瓜果动物的形状，再用线串起来，深受小孩子的喜爱。

## 汉服运动：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亚文化

周星<sup>1</sup>

### 摘要

本文聚焦于近年来在中国各大中城市里兴起的“汉服运动”，并把“汉服运动”置于当前中国社会互联网日益普及的这时代背景之下予以分析，指出热衷于“汉服运动”的都市青年群体乃是一种亚文化群体。

**关键词：**汉服运动、汉服、互联网、亚文化群体

近 10 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的重大变迁之一，即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亚文化社群日益活跃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当中，以为数众多的亚文化社群为背景，新的社会动态和文化潮流层出不穷，进而促使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和碎片化。笔者近年一直在追踪研究的“汉服运动”，正是此类亚文化群体及其活动和影响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透过对“汉服运动”的起源及发展进程的梳理，探索其理论依据和实践活动的特点与影响，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去深入理解现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某些非常重要的焦点所在。本文把“汉服运动”界定为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亚文化社群之一，进而试图探究“汉服运动”和互联网的关系<sup>2</sup>。

### 1. 中国的互联网时代

中国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在对外部世界开放时总会有各种考量，既想和外部世界沟通，又谨小慎微地想避免“失控”。虽然至今这个基本姿态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但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仅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信息交换

关系，而且中国社会内部的基本结构，均发生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改变。海外研究者在论及中国互联网问题时，较多聚焦于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和限制，并倾向于把它作为中国政府管制媒体、限制言论自由，亦即作为人权问题的一环来指责，故多持批评立场[1]，殊不知互联网在中国的崛起，已经并且将越来越成为促进变革的全新的动力机制<sup>3</sup>。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之一即是信息化。1990 年代，中国几乎和西方发达国家不相前后地及时提出了发展信息技术科学、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信息化对策。改革开放的中国，赶上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信息技术革命的快车。1994 年，中国正式接通国际互联网；短短十年，到 2004 年中国的网络人口便已达到 9400 万，2005 年更是进一步超过 1 亿人，约占总人口的 7.9%。2007 年，《国际互联网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这使中国社会不可逆转地迈进到了互联网时代。不过，由于中国社会的非均衡特质，网络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尚存在很大差异，大约有 80%集中于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的网络普及率更高。



以上海为例,1985年,上海市民所能接触的媒体主要有报纸(60%)收音机(94%)和电视(24%,其中黑白电视占86%);到1997年,市民依赖的媒体则改变成为:彩色电视(98%)、报纸(77%)、收音机(76%)。在1997年,打算购买电脑的上海市民家庭约为34%,但当时仅有1%的人利用互联网;根据2002年的调查,仅仅过了3年,2000年上海市民利用互联网的比例便迅猛地上升到29%,2002年这个比例则高达52%<sup>[2]</sup>。现在,这个比例更是高达80%以上。与此同时,上海市民中利用互联网的人群也出现了均质化趋向,不再局限于知识分子、学生和白领阶层,而是向全社会所有阶层渗透,不论性别、职业、学历、年龄、地域和民族,全社会都以各种形式日益卷入互联网之中。越来越多的市民以互联网为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人们不仅从互联网获得有关新闻、邮件通讯和资源检索等服务,也可以积极地介入互联网的各种论坛发表言论和表达主张。因此,当今中国互联网的成長与繁荣,在相当意义上可以说是“庶民”的胜利,它意味着“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北京、广州和深圳等其他中国城市。这不仅意味着传统媒体的逐渐衰落和“互联网文化”的形成,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步入越来越彻底的互联网时代。截至2011年10月,中国的微博用户已经超过3亿人(多为新浪微博用户),网民人数则达到4亿8千万,来自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管理局的这个数据说明,中国的互联网用户的规模已达“世界第一”。

目前,中国已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互联网在中国已经渗透到越来越多的行业,诸如传统媒体、电子商务、社交交流、影视娱乐、网络游戏等等,甚至互联网本身也正在日益膨胀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对于本文而言,互联网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和国际社会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中国主动参与和被动卷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侧面。互联网在官方话语体系之外,提供了相

对自由、独立和具有无数可能性的言论及信息共享的空间,以此为依托,中国网民人数的迅猛增加和成长,这意味着不特定多数的“公众”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公共话语体系中,通过互联网而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发言权和影响力,就此而论,互联网已经和将持续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格局<sup>4</sup>。

## II. 互联网和汉服运动

本文所谓的“汉服运动”,主要是指近年来,以都市汉族男女青年为主体,以互联网为媒介和舞台,以“汉服”为主轴和符号,旨在建构汉人的民族服饰和复兴汉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文化运动。这里所谓的“汉服”,主要是指汉族曾经拥有、但已经消亡了的民族服饰,尤其是历史上汉人的服装。“汉服”这一概念在古代并不常用,它主要是现在参与“汉服运动”的人们,对于他们相信或想像的汉人民族服饰的称谓;应该说在“汉服”这一概念里,内涵着服饰文化的正统性和纯粹性的寓意。并非汉人曾经和正在穿着的所有服装都是“汉服”,“汉服”的特定含义是指起源于汉族、由古代汉人发明并传承,具有汉文化本质特点的服饰文化。由于汉人在中国历史上拥有主体性的地位和影响,所以,“汉服”被“同胞”们认为比起“唐装”、“新唐装”、“旗袍”和“中山装”等,它更有资格成为“中式”服装的代表。

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前后,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汉服”曾被作为政治与社会动员的符号之一,其逻辑是改朝换代需要伴随着“易服”革命。不过,“剪辮”迅速取得了成功,“放足”在历经较长时期的努力之后也终于得以实现,唯独“汉服”却仅仅昙花一现,最后不了了之。新生的中华民国受历代王朝服制和“易服”之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制定的民国“服制”中,以“长袍马褂”为主的“中式”服装和“西装”得以并置,却没有对“汉服”有任何关照。究其原因,无非是“汉服”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

并不存在。

21 世纪初“汉服运动”的兴起，曾使很多人都感到有些突然、意外。除了作为对“唐装”、“旗袍”之类“满装”的逆反，“汉服运动”实际上也体验到辛亥革命前后曾经有过的类似尴尬，例如，被误读为“戏装”和死者的“礼服”，或被误解为日本人、韩国人等。无怪乎有的“汉服运动”活动家认为，“汉服运动”所要达成的目标正是一次文化领域的辛亥革命。“汉服运动”并不讳言他们致力于恢复的是“古装”，因此，“复古”的指责对他们而言并不构成深刻的批评。问题是为什么辛亥革命时期曾经的“汉服”动向不成气候，而在完全没有“易服”之社会政治需求的如今，“汉服运动”却如火如荼？答案就在互联网。

新时期的“汉服运动”，从一开始就借助于互联网、依托于互联网、成长于互联网[3]。有关“汉服”的讨论、争辩和倡议，主要是以互联网上的网站、论坛或网页、博客、微博等为舞台而展开的，它不断扩大、延展而永不停歇、永不关闭、永不消失。对于热衷于“汉服运动”的都市青年男女来说，没有互联网是不可想像的。在中国互联网上无数大大小小的“虚拟”社区中，“汉服运动”已经拥有了相应的份额。

自称“汉友”、“汉服网友”或“同袍”的网民们，在“汉民族网”、“汉网论坛”、“汉服网”、“兴汉网”、“新汉网”、“天汉网”、“百度汉网吧”、“百度华夏吧”、“汉未央”、“汉文化论坛”、“汉韵唐魂论坛”、“九章摄影”、“华夏先锋”、“中华民族服饰论坛”、“清韵论坛”、“华夏复兴网”、“华夏汉网”、“长安汉服网”、“苹果汉服社区”、“如梦霓裳论坛”、“汉服春晚”、“北京汉服协会”、“中原汉服”、“福州汉服网”、“温州汉服”、“英伦汉风”等为数众多的网络社区里，参与和汉服问题有关的讨论或争辩。“同袍”们在网络汉服社区里召集活动，相互交流信息，同时也把他们自己参与各种汉服活动时的照片和心得贴出来予以展览，甚或炫示。互联网上迅速地积累了有关汉服和“汉服运动”的大量

信息和知识，已经成为青年网民学习汉服知识和有关“汉服运动”之理论和实践的图书馆、资料库与课堂。

2011 年中秋节，“汉服北京”组织在北京朝阳公园举行了中秋祭月祈福活动。他们首先是在互联网上自己的“汉服吧”（汉服北京）发布通知，呼吁“同袍”们和本“组织”的成员们积极参加；然后，他们在网络社区内部串联互动，把各项活动分组落实并尽可能具体化，包括确定活动纪律和注意事项，确定各项目的负责人以及活动内容。到中秋节这天，“同袍”们便三五成群地来到朝阳公园分若干小组展开活动，例如，学做月饼的“帝都食货志”小组，制作宫灯（用于祭月仪式）、小桔灯等的“汉有游女”小组，组织射箭体验的“控弦司”小组，学做汉服（纸样制作、童衣教学）的“衣冠小组”，负责摄影、录像工作的“映世阁”小组等；傍晚时分，小组活动结束后，大家聚集在湖边，举行庄重的祭月礼拜活动。最后，他们再回到自己的网络社区，贴图、灌水、发表感想、总结经验、交流心得，并开始策划下一次新的活动。汉服“同袍”们从互联网上获取了很多智慧资源，例如，当天举行祭月仪式时所诵读的“祭文”，据说就是网友从互联网上下载得来的。如果，这样的汉服活动得到了平面媒体和电视媒体，尤其是官方的关注与报道，参与的“同袍”们则会视之为活动的成效，亦即提高了汉服的知名度，扩大了“汉服运动”的影响，这自然也是要在自己的网络社区里庆祝一番的。

近些年来，“汉服运动”以互联网为平台，制造或促成了很多公共事件和重大新闻，例如，在网络上提倡和传播所谓“中国式学位服”、倡议 2008 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采用汉服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礼仪服装等等。互联网为“汉服运动”提供了绝好的活动空间，“汉服运动”也为中国互联网制造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闻。互联网可以说是 21 世纪初“汉服”得以重新“再发现”，得以不断地被“表象”和“再生

产”出来的最为重要的机制。互联网为“汉服运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虚拟社区基础和密切互动的重要途径，它还促成了全国不同城市的汉服爱好者/“同袍”们的互相串联、相互模仿，从而促使“汉服运动”迅速地具备了全国性的规模。因此，我们不妨说“汉服运动”是互联网之子，它是在互联网产生之后，由部分汉族青年在互联网内外发起和推动的[4]。

### III. 作为“亚文化”群体的“同袍”们

积极参与“汉服运动”的都市青年男女，已经在中国社会里形成了明显的“亚文化”群体。这是由一些在中国社会迅猛发展和剧烈变迁的过程中，较为具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汉族城市青年自发形成的社群。“汉服运动”的参与者，均拥有较为明晰的汉民族认同感和较为强烈的汉民族意识，并且都主张用“汉服”来作为其最为重要的族群认同的符号。

如上文所述，互联网为中国公众提供了巨大的广泛交流和个人主张的自由空间，虽然它在一定意义上是“虚拟”的，但同时也是“真实”存在的，并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以互联网为基地，中国社会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新的亚文化社群，这也是中国社会生活民主化趋向的一个重要方面。网民们在互联网上创造和发明了许多独特的表达和表现的途径，并通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无数多的亚文化社群。可以说，汉服“同袍”们的社群，正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类。在中国互联网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和互联网的普及相同步，中国出现了明显的“网络民族主义”思潮。表现在互联网里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情绪非常复杂，既有国家民族主义，又有族裔民族主义，很难一概而论。在这些民族主义思潮中，既有中国公众/网民对于全球化进程的反应性姿态，也有伴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出现的“文化自觉”意识，当然也有在特定国际关系事件中的应景式对应。网络民族主义有强烈

的情绪性，这是因为网络空间并非适于冷静思考的空间，匿名性通常总会导致言论的进一步偏激化。例如，在涉及日本的有关问题时，此种情绪化情形尤为明显[5]。在形态复杂多样的网络民族主义中，“汉服运动”被有的批评者认为是一种“种族性民族主义”[6]，其表层是以复兴“汉服”和中华传统文化为目标，深层却是汉族文化本位和汉族中心主义，其中较为极端的主张甚至具有种族优越感的色彩。

不过，根据笔者2011年夏天在上海、无锡、北京、西安和郑州等地的实地调查，走出互联网上的虚拟社区，在各种形态的城市公共空间（公园、广场、步行街）展开实践的“汉服运动”却颇为温和、稳健，更像是年青人的郊游聚会或行为艺术等，这和他们中一部分人的网络言说激烈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仅凭网络虚拟世界较为激烈的言论来判断“汉服运动”，就有可能产生误解。参与“汉服运动”的青年“同袍”们，固然是依托网络虚拟社区建构其认同的，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活跃的实践，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作为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亚文化群体，汉服“同袍”们通常共享着颇为类似的价值趋向。他们大都喜欢传统文化，喜欢中国历史，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对于古诗词、传统乐器、民族音乐、女红、武术、书法、茶艺、国学和中国古代服饰等，拥有独到的审美偏好，例如，中国古典文学里“才子佳人”式的审美理想。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互联网上“哈日”、“哈韩”及偏好欧美价值的亚文化群体，可以说有非常显著的不同。汉服“同袍”们在互联网的虚拟社区内相互交流，并形成了彼此互相认可的“同袍”意识。“同袍”一词，来自《诗经·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显然，这一用语强化了汉服运动实践者们彼此之间的情感认同[7]。“同袍”们除了在自己熟悉的网络论坛或网站里如鱼得水之外，还能够在其他城市的“汉服”社团中找到知音，而互联网则为“汉服运动”超越各城市之地域性，扩张为全国性规模，

甚至在海外中华文化圈也产生影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活跃于不同城市的“同袍”，相互鼓舞，互通信息，进而使“汉服运动”作为“亚文化”日益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力。

通常在每座城市里，都有一个或多个汉服社团存在，它们彼此之间有时候是合作的关系（例如，彼此借用服装等道具、彼此借鉴并相互通报活动的信息等），有时候则是相互竞争的关系（例如，相互比较介意对方的影响力、彼此之间或存在理念上的差异等）。目前，尚不存在同一座城市里统一各个汉服社团为一体的任何迹象。造成这种多社团并立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由于认知和理念不同而产生的分裂（“汉服运动”内部，有不同的理论流派）、由不同领袖发起而形成、或受其他因素制约（例如，大学里的学生汉服社团，自然会和社会上的汉服社团有所区分）等等。大多数汉服社团的形成都是自发的，成员人数一般从十多人到一百多人不等，成员的加入和退出都是自愿的，彼此的联系也较为松散。汉服社团通常会有1位或几位召集人，他们在多数情形下，便是该社团的负责人或意见领袖；同时，也会有若干位积极分子，他们是热衷于参加活动并分担会务的核心骨干人员；然后，便是一般的会员。在社团的外围则有他们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多为他们的男女朋友、家属或熟人，例如，在“汉服北京”的户外活动中，除了他们自己各有编号的会员之外，每次也都会有一些“外挂”的人士参与其中，他们大都是由会员介绍，对汉服活动感到好奇，随后也有可能参加的一些人士。在很多汉服社团里，均是女孩子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涉及汉服“秀”的展演时，她们便是无可争辩的主角。但社团内部的理论家，却往往是较多男性。

截至目前为止，除了大学内部的学生汉服社团之外，社会上绝大多数汉服社团都没有经过正式的社团登记手续，但它们也并不面临被取缔的危险。汉服社团在举办户外活动时，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阻力，这是因为他们举办的活

动多在传统节日之时，通常会被视为是有益和健康的。也有一些汉服社团有明确的章程或试图努力正规化，希望完成社团登记等合法化的手续，但这个趋向并不明显。



图1 互联网：促进交流与理解，新时代有新方式<sup>5</sup>



图2 “汉服北京”组织的2011北京七夕之夜活动时的纪念照（北京奥林匹克公园）



图3 笔者于2011年中秋节在北京市朝阳区公园调查汉服活动。



图4 2011年8月4日，笔者在无锡向当地的汉服社团“同袍”们进行访谈

#### 注释\*

- <sup>1</sup> 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
- <sup>2</sup> 本研究系笔者主持的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课题“有关中华世界之唐装、汉服、汉服运动的人类学研究”（2011-2013）的研究成果之一。
- <sup>3</sup> 若把互联网作为一个行业，则在中国互联网的本土市场较难有国外公司成功，而中国互联网公司也因“中国特色”较难进入世界互联网。中

国独特的政策环境和文化背景等要素的存在构成了一些屏障。

- <sup>4</sup> 有关互联网在中国的意义，可参考刘新“中国的现象”（The Phenomenon of China），爱知大学21世纪COE(21世纪重点科研基地工程)2003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激荡的世界与中国—面向现代中国学的构筑》，爱知大学，2004年3月。
- <sup>5</sup> 此漫画引自“我国网络舆论呈现八大特点：浏览者多参与者少”一文，<http://www.sina.com.cn>，2011年9月2日，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 \*参考文献

- [1] 野村弘美「中国における情報化政策の展開—グローバル化の進展と中国の『情報化』—」、石井健一、唐燕霞編著『グローバル化における中国のメディアと産業—情報社会の形成と企業改革—』，第188-215頁，明石書店，2008年10月10日。
- [2] 張国良「上海市民と情報化—情報メディアの普及とその効果に関する実証分析—」、石井健一、唐燕霞編著『グローバル化における中国のメディアと産業—情報社会の形成と企業改革—』，第216-237頁，明石書店，2008年10月10日。
- [3] 周星「新チャイナ服、漢服と漢服運動—二一世紀初頭、中国の『民俗衣装』に関する新しい動き—」、韓敏編『革命の実践と表象：現代中国への人類学的アプローチ』，第437-474頁，風響社，2009年3月。
- [4] 王军：“网络空间下的‘汉服运动’：族裔认同及其限度”，《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0年第1期。
- [5] 陈静静：“以涉日情绪为例简析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 [6] 张跖：“‘汉服运动’：互联网时代的种族性民族主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28卷第4期。
- [7] 周星：“汉服之‘美’的建构实践与再生产”，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玉溪师范学院编：《2011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6-54页，中国云南/玉溪，2011年11月10日-14日。

## Korean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Trend and Future Perspective

Jongkeun Park<sup>1</sup>

### Abstract

Korean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as a paradigm of traditional power industry has been recently shifting. Movements toward low carbon and clean energy society are one of the challenges and require long-term gradual restructuring of Korean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In this paper, the national energy master plan published in 2008 containing such changes is introduced and a variety of measures to balance economic growth and clean environment are discussed. Korean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which take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nergy plan is also briefly presented. A recent rolling blackout in Korea revealed the weakness of current power system and solutions for the problem are analyzed. In the long term, smart grid is the ultimate destination that Korean electric power system is pursuing and the overall vision for Korean smart grid is presented.

**Keywords:** Korean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Rolling Blackout, Smart Grid

### I. Introduction

Korea is one of major energy importers in the world, ranking fifth in oil, third in coal and eighth in gas. Oversea energy dependency of Korea reaches 97% and its annual energy consumption is consistently growing. The Korean government has continuously put an effort to decrease severely high overseas energy dependency, but the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mainly by specific sectors and oil prices during 90s and early 2000s have not been high enough to arouse the importance of long-term strategies for national energy plan [1].

In the middle of 2000s, the world has seen a spike in oil prices, regulations for carbon emissions have been reinforced in many countries and resource nationalism has become prevalent across the world. Many advanced countries

started putting energy policies on the top priority and recognizing energy as a commodity requiring long-term national strategies.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nergy policy [2] and many countries have announced their plans to reform power industries [3] such as Electricity Market Reform White Paper published in 2011 in Britain [4]. The Korean government also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ies for energy and built an energy master plan to achieve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energy environment [5]. The Korean government also proposed a long-term smart grid vision and expects its power system to be efficient, reliable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6].

This paper consists of three sections. In the first section, the national energy master plan is introduced.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Korean electric power system and a recent rolling blackout are presented in the second section. In

the last section, an overall vision for Korean smart grid is given.

**II. Korean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1. Energy Master Plan**

The Korean government made the first long-term national energy master plan in 2008. In this plan, a movement toward low energy consumption and high energy efficiency is taken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eps. Among many measures to implement the movement, realization of energy prices, enhancement of signal function in energy prices and diversification of customer tariff are worthy to notice for their effectiveness.

Secondly, the plan is aiming at optimal energy supply mix from both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Considering price volatility and carbon emission of fossil fuel, a drastic reduction in energy from fossil fuel is required and a great increase in renewable energy is needed. The Korean government is targeting to increase the share of renewable energy from 2.4% to 11% by 2030 and decrease the share of fossil fuel from 83% to 61% while lifting the level of self exploitation of fossil fuel from 4.2% to 40%.

Thirdly, the plan proposes a new growth engine based on green technology and clean energy. It is called green growth in Korea and has a role of balancing between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lean environment. Renewable, nuclear,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high efficiency coal-fired power plant, LED lighting, building energy management, etc. are proposed as green technologies and will be intensively fostered as the future growth engine. The Korean government is expecting those technologies to meet and lead

the global standard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mong green technologies, renewable

Table 1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by 2030

Renewable Resources	2010	2015	2020	2030
Solar Heat	0.5%	0.5%	2.0%	5.7%
Photovoltaic	1.8%	2.7%	3.2%	4.1%
Wind	2.9%	9.2%	11.6%	12.6%
Bio	13.0%	18.8%	24.0%	31.4%
Hydro Power	12.8%	9.1%	6.6%	4.4%
Geothermal	0.6%	2.4%	3.1%	3.8%
Ocean	0.9%	3.3%	5.2%	4.7%
Refuse	67.4%	53.8%	44.3%	33.4%
Total	100%	100%	100%	100%

energy takes a big role. The Korean government has been supporting renewable power producers with feed in tariff (FIT) since 2002, but its supporting mechanism is changing to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RPS) with an expectation of leading to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rough competition. However, as generation companies are taking the burden of obligation, realization of electricity tariff should be preceded.

Of renewable energy, wind energy is expected to develop at a great amount as shown in Table 1. The Korean government anticipates generating 7301MW of electricity from wind power generation plants by 2030. Most of new wind farms will be installed offshore and experiences in offshore engineering of Korean heavy industries are expected to help develop offshore wind farms.

**2. Korean Electric Power System**



Examining the change of final energy consumption by source over the decades in Korea, the importance of power industry is found to be constantly increasing. Economic growth and change of life pattern have continuously contributed to the change and a shift of heating energy source from fossil fuel to electricity due to high oil prices in 2000s has also made a contribution in past years. For the reasons, annual average demand growth rate is quite high comparing to countries with mature economies as shown in figur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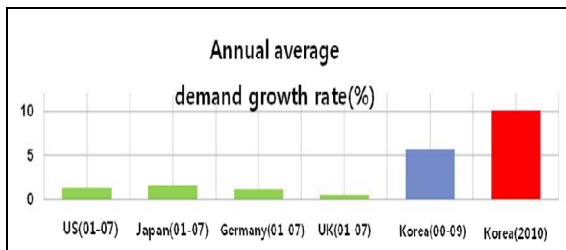


Figure 1 Annual average demand growth rate

While smart grid technologies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high energy efficiency through bette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overall demand appears to increase in the near future and appropriate government policies to induce investments in power plants are vital for efficient and secure power system. Figure 2 shows generation output in 2010 by sour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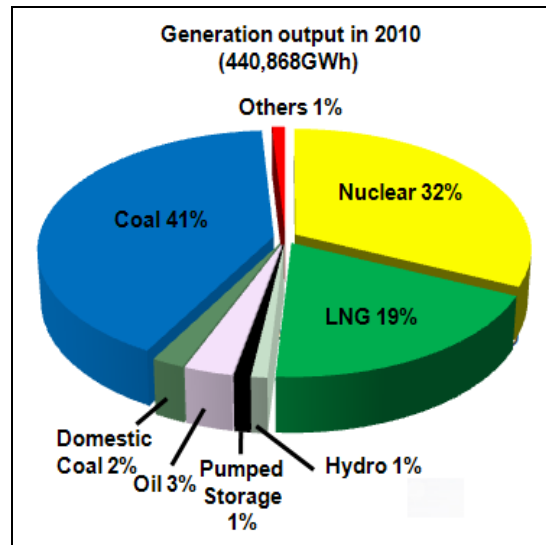


Figure 2 Generation Output in 2010

Coal and nuclear power plants provide base load power and accounted for 73% of total generation output in 2010. Annual load factor records above 70% in Korea, which is comparatively high, and relatively low electricity tariff of midnight power for industries largely contributed to it.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the Korean government has a plan to increase the share of nuclear power up to 59% by 2030 while decreasing the share of fossil fuel plants. The backbone of Korean electric power system consists of 154kV, 345kV and 765kV as shown in figur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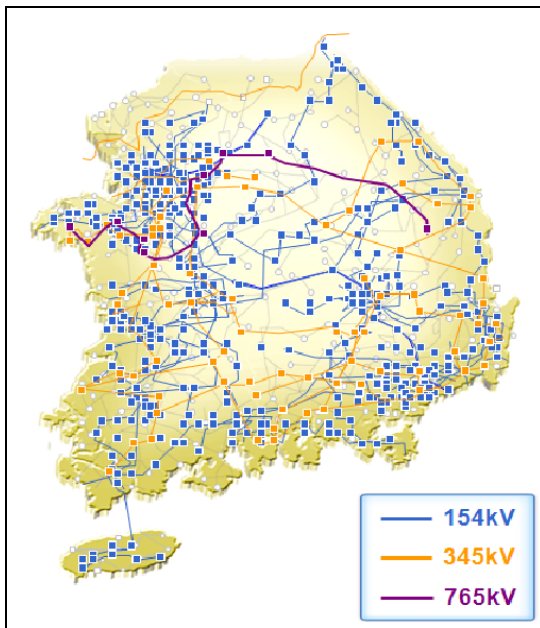


Figure 3 Korea Transmission System

A large portion of total demand takes place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above map and power transfer occurs from south to north and from east to west. The rate of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loss is around 4% which belongs to one of the lowest level in the world.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recorded 77,361MW in 2010 while peak load reached 71,308 MW.

### III. 9.15 Rolling Blackout in Korea

A rolling blackout refers to intentional halts of power supply for non-overlapping periods of time over geographical regions. A system operator normally uses a rolling blackout as a last measure to prevent the entire power system from a blackout by keeping localized regions out of service. Rolling blackouts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Japan amid power shortage in the aftermath of Tohoku earthquake and tsunami and Texas in the US also recently experienced rolling

blackouts due to a cold snap in 2011.

Unlike aforementioned cases, a rolling blackout can happen without notice. On 15th September in 2011 in Korea, total 4.0 million kW load was shed without pre-notification and about 7.5 million households were affected by the rolling blackout and geo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is shown in figure 4. Since Korean electric power system has kept low outage duration (15~20 minutes) for a long time, the rolling blackout gave a considerable impact to the nation.

At the moment of crisis, frequency dropped down to 59.25Hz and operational reserve recorded 0.24 million kW at its minimum while appropriate reserve level is considered to be 4 million kW in Korea. The peak load was forecasted to be 64.0 million kW on the day, but it actually recorded 67.2 million kW even after load shedding. Although the rolling blackout was caused mainly by a big forecasting error due to unexpected hot weather, the primary reason lies on the fast growing demand without a sufficient increase in supply. Adequate reserve margin is set to be minimum 15% in the 5th basic plan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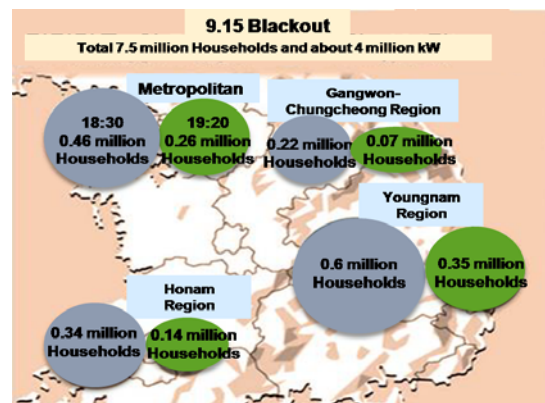


Figure 4 Impact of 9.15 Blackout

long-term electricity supply and demand in 2010, but the actual reserve margin was 6.6% in 2011 and is expected to be 7.3% in 2012.

For the short term, demand management is considered to be an inevitable measure and an improvement of short-term load forecasting technique,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an increase in reserve level are considered as well. There are also voices that re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electricity tariff is required. Electricity tariff has practically maintained its level since 2001 without a big hike while the prices of fossil fuel have almost doubled. It has caused a shift of heating energy source from fossil fuel to electricity and largely contributed to the high annual average demand growth rate in 2000s. Since the current electricity tariff doesn't properly reflect the profile of load, it is important to design adequate electricity tariff so that end-users can respond to the signal of changes in load. Introduction of time of use (TOU) rate and critical peak pricing (CPP) are regarded as options of drawing such demand responses.

In the long term, constructions of power plants are necessary. For the low carbon and clean energy society, government policies to induce investment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IV. Smart Grid and Future Perspective**

Solutions for smart grid had been handled on the name of Power IT until 2008 in Korea, but the overall vision for smart grid was set in 2009, which was a step behind US and Europe. The national road map for smart grid consists of 5 major areas; Power Grid, Electricity Service, Transportation, Renewable, Consumer. They cover a wide variety of fields from engineering to business and the platform is represented in figure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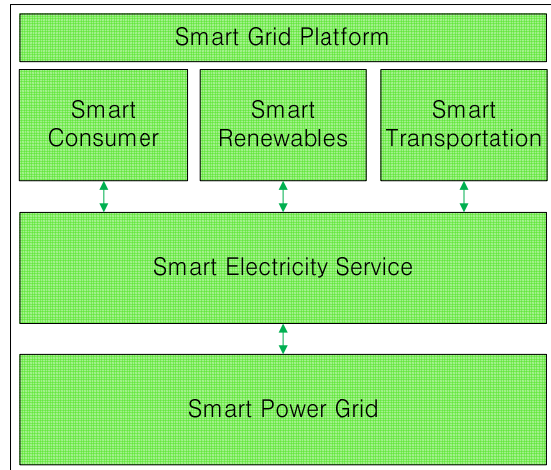


Figure 5 Smart Grid Platform

Smart grid deployment schedu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by 2030 as shown in figure 6. First phase is from 2010 to 2012 and the goal is building the infrastructure for smart grid environment. For the purpose, a test-bed was installed in Jeju island. Korea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 (KEPCO) and several companies have been participating in the test-bed to test and simulate their technologies and to creat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Korean government supports.

In 2013, Jeju test-bed is completed and extensive smart grid projects are initiated 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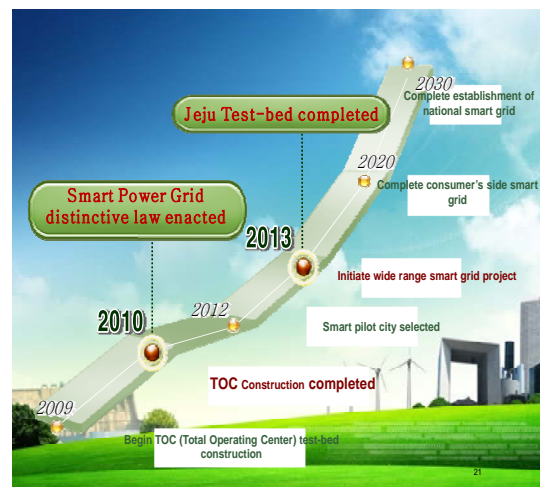


Figure 6 Smart Grid Deployment Plan

selected smart pilot cities. In this second phase, developed technologies and tested systems are applied to power grid at city level until 2020.

At the third phase, which is from 2021 to 2030, establishment of nationwide smart grid is completed. All the related technologies are integrated into smart grid in this step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from demand and supply arises. In other words, bilateral electricity trading scheme is implemented and no distinct classification between suppliers and consumers exists as energy storage system and renewable become common. In this stage, energy efficiency and social welfare is maximized. Moreover, accumulated technologies and experiences are expected to open new oversea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o achieve the smart grid plan, critic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implemented and they are listed below.

- Development of Korean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ransmission Network Monitoring and Operation System
- IT Based Control System for Bulk Power Transmission
- Development of Prototype for Advanced Substation Autom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Digital Control Technology
- Development of Power Equipment Monitoring System using Active Telemetrics
-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System
- Development of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 Ubiquitous Technology
- Power Semiconductor for Dispersed Generation and Industrial Inverter Application
- Development of Integration EMS for the

microgrid and application technology to real site

### V. Conclusion

Korean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is encountering challenges to transform into clean, sustainable and low carbon environment while keeping the system reliable and efficient.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the national energy master plan proposes various measures including a great expansion of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ion by supporting and promoting renewable industry. 9.15 blackout emphasizes the security of power system and implies that demand side participation becomes more important. Korean smart grid vision enables full participation of both supply and demand through bilateral electricity trading scheme and suggests various solutions for highly efficient and reliable power system.

### Footnote\*

<sup>1</sup>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E-mail:* parkjk@snu.ac.kr

### \*References

- [1] Bae KeunHoo. "The Study on the Strengthening Competitive Power in the Oil Industry in Korea: on the subject for policy". The Journal of Korea Research Society and Customs, Vol. 3(2) : 197~219
- [2]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Annual Energy

- Outlook 2011, [Online]. Available : [http://www.eia.gov/forecasts/aeo/pdf/0383\(2011\).pdf](http://www.eia.gov/forecasts/aeo/pdf/0383(2011).pdf)
- [3] Hiroshi Asano, Jong Keun Park, Yuanzhan Sun, Felix F. Wu, Ryuichi Yokoyama. "New Issues on Electric Power Markets and System Operations in Asian Countries". IEEJ trans. PE, vol. 127(11) : 1106~1113, 2007
- [4] UK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Electricity Market Reform White Paper 2011, [Online]. Available : [http://www.decc.gov.uk/en/content/cms/legislation/white\\_papers/emr\\_wp\\_2011/emr\\_wp\\_2011.aspx](http://www.decc.gov.uk/en/content/cms/legislation/white_papers/emr_wp_2011/emr_wp_2011.aspx)
- [5] The Third National Energy Committee. The First Long-term National Energy Plan 2008, [Online]. Available : [http://www.eia.gov/forecasts/aeo/pdf/0383\(2011\).pdf](http://www.eia.gov/forecasts/aeo/pdf/0383(2011).pdf)
- [6] Korea Ministry of Knowledge Economy. Smart Grid National Roadmap 2008, [Online]. Available : <http://www.smartgrid.or.kr/book/KoreasSmartGridRoadmap.PDF>

## 大震災が提起する電力システム問題

### —反省点、対応の動向及びこれからの論点整理など—

栗原史郎<sup>1</sup>

#### 要旨

本稿は 3.11 の大震災を踏まえ、我が国の電力システムに関して、その反省点、これまでの対応の動向およびこれからの論点について箇条書きの形式で概括する。さらに原発の再稼働のあり方や太陽光発電の買い取り価格の設定に関する筆者なりの見解を提示する。

キーワード：大震災、電力システム、原発再稼働、太陽光発電買い取り制度

#### I. リスクとコストの評価に反省点

##### 1. 津波のリスクを過小評価

まず第一の反省点として、我が国は世界で有数の地震国でありながら、津波のリスクを過小評価していたことが挙げられる。今回のマグニチュード 9.0 という地震は想定外であったのだ。我が国では、すべての大規模火力発電所と原発が臨海部に立地されている。蒸気タービンで発電機を回転させて電力を得る方式の大規模発電所は大量の冷却水の採り入れと温排水の廃棄が必要とされるが、我が国の場合はそうしたことが可能な大型河川がない。そのため、大規模発電所はすべて臨海地域に立地されている。内陸と比べると津波リスクが大きい臨海地域に立地が集中している構造となっている。したがって非常用ディーゼル発電機は津波を警戒してできるだけ高台に設置すべきであったが、そうした事前の配慮にかけていた。少なくとも九世紀に起きた過去最大の貞観地震を想定した津波対策を講じておくべきであった。事後の反省とは言え、大いに悔やまれてならない。

##### 2. 安全神話の横行

次に第二の反省点として、国民の大多数が原発安全神話の横行を許してしまった点が挙げられる。原発には崩壊熱のコントロールが困難という本質的リスクがある。このため、最後の防護壁とされる格納容器が破損した場合には放射性物質の外部への漏えいを抑制する手立てが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にもかかわらず、格納容器はいかなる場合にも絶対に壊れることはない、という安全神話が政府公式見解として国会においてもまことしやかに語られていた。原発のもつ本質的リスクに目をつぶってしまっていたのである。科学的に考えると絶対安全という状態はありえないにもかかわらず、大多数がそういう神話を疑わなかった点は今となっては大いに悔やまれる。

##### 3. 経済性神話の横行

第三の反省点として、原発コストの見積もりの甘さが挙げられる。3.11 以降、技術開発や立地対策に投じられた財政資金、さらには数十兆円にも及ぶ賠償金額を加算すると、原発は火力より必ずしも安く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

という疑問が提起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のようなコストは従来からの発電コストの比較では考慮されてこなかった。原発のトータル・コストを過小評価した経済性神話の横行を許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は深く反省すべきである。

## II. 対応の動向

東京電力管内では計画停電が実施され、また放射能汚染が土壌、作物、魚など広範囲に及び、国民感情のレベルで1973年のオイルショックを上回るインパクトを受けた。省エネ型ライフスタイル、創エネ型住宅、エネルギー・セキュリティの確保などへの関心が高まった。脱原発を望む声は多いが、政策当局は現在審議中で最終方針は未確定。

### 1. 分散電源の導入に弾み

- (1) [企業] 自家発電を増強し、自ら電力の安定供給を図る動き。
- (2) [家庭] 太陽光発電パネル、コージェネ、燃料電池、蓄電池などを設置する動き。
- (3) [政策動向] メガソーラー発電からの全量買い取り制度の導入を決定。  
スマートグリッド構想の実証を加速。

### 2. 制度改革の議論が開始

内閣府や経済産業省において各種検討部会が設けられ、以下のような議論が行われている。

- (1) 発送電分離と小売りの完全自由化
- (2) 電気料金制度(総括原価方式)の見直し
- (3) 自給率の向上や電源のベストミックスなど政策の基本フレームの見直し

## III. これからの論点整理

### 1. 火力発電の稼働アップ

原発54基の約8割が停止中で、火力発電の稼働率が上昇しCO<sub>2</sub>排出が増加。京都議定書の遵守や今後の温暖化対策が課題。

### 2. 新エネ買い取り制度設計

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の買い取り量が増すにつれ電気料金の上昇が見込まれる。このような形で国民負担がどこまで社会的に受け入れられるかが課題。

### 3. 原発再開

今春4月末には原発がすべて停止する事態が予想されるが、ストレステストの評価と再開を巡る地元自治体の首長の意向が課題。

### 4. スマートグリッド

将来の電力システムにリアルタイム・プライシングやスマートグリッドをどう組み込むかが課題。

## IV. 原発再稼働をどう考えるか ～発送電の全国一体運用を

現時点(2012年2月16日現在)で稼働中の原発は3基となっており、今後は原発再稼働を巡る議論が高まることが予想されます。ここでは従来からの原発対新エネという対立の構図ではなく、送電網の全国規模での運用という視点から考察してみよう。

「電気予報の論理」を沖縄電力を除く9電力会社および電源開発と日本原子力発電、公営、その他の卸電気事業者に適用してみましよう。原発と沖縄電力を除く9電力と卸電力の水力と地熱、火力、風力、太陽光を合計すると1億8404万キロワットとなります。一方、10電力を合成した場合の過去における最大電力は2001年7月24日の1億8270万キロワットです。その時の沖縄電力の需要はデータがないために不明ですが、2001年6月28日

にその年の最大電力 148 万キロワットが出ています。仮にその分を差し引くと、9 電力の過去最大の電力需要は 1 億 8122 万キロワットと推定されます。水道管のパイプの太さがキロワットにあたるといわれますが、電力会社は需要の変化におうじて供給側が発電能力に相当するパイプの直径を変えていくような設備運用を行っています。一昨年の 2010 年は東京でも秋分の日直前まで最高気温が 30 度をこえる真夏日が続き計 71 日間という新記録をつくりましたが、10 電力合計の最大電力は 8 月 23 日の 1 億 7775 万キロワットにとどまりました。沖縄を除く日本全国の電気予報は、下図のようにピーク時供給力は 1 億 8404 万キロワット、予想最大電力は過去最大で 1 億 8122 万キロワットあるいは近年では最低の 2009 年で 1 億 5900 万キロワットとなります（この値から同年 8 月 3 日の沖縄の年間最大電力 154 万キロワットを引くと 1 億 5746 万キロワットになります）。電気予報で使われる棒グラフでは、使用率は 99%あるいは 86%となります。

既に我が国では昭和 34 年から電力会社間の送電線による連系が開始され、昭和 54 年には北海道から九州までの電力ネットワークはすべてつながっています。その後もさらなる連系の強化が進んでいます。したがって会社間の一体的設備運用を行えば、なんとか電気は足りるという仮説が成立すると思われま。送電線の強化や 50 ヘルツと 60 ヘルツ間の周波数変換所の増設など補強しなければならぬ点もあるでしょうが、10 電力体制を超えたオールジャパン体制を構築すれば実現できるはずだ、と私は考えます。送電設備の資産は 10 社計で約 6 兆円であり、総固定資産の約 36 兆円の 6 分の 1 ですから、補強してもそれほど多額の費用はかからないでしょう。

これまでは 9 電力体制というかたちで各社がそれぞれの供給区域内の需要に対応して十

分な供給力を持ちうるように発電設備を増強してきました。供給予備力も十分にありま。我が国の 10 電力会社全体の総電力需要は、2009 年度の 1 年間で 8585 億キロワット時であり、1 年間=8760 時間でわると平均需要は 9800 万キロワットになります。ところで 2009 年度の年最大需要は 2009 年 8 月 7 日の 1 億 5900 万キロワットです。ちなみに、これまでの最大値は 2001 年 7 月 24 日の 1 億 8270 万キロワットです。したがって 2009 年度でみると、平均需要は最大需要の約 60%となります。発電設備の面ではかなり余裕があります。それにくわえて最大電力も 2001 年をピークにその後は減り続けています。このようなわけで全国の発電所をあわせて一体とする設備運用をすれば過剰な供給余力が生まれます。したがって 54 基、4885 万キロワットの原発は止めても全国の需要をまかなえるという理屈です。現時点で稼働している 3 基が停止したら経済活動に甚大な影響が出て大パニックになるという言説もありますが、本当に電力の安定供給に支障が出るのかは検証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昨年の夏は 15%の節電で東京電力管内では約 1000 万キロワットもの節電が可能となったと報ぜられていますから、これを全国展開すれば 3000 万キロワット程度の節電が可能となるでしょう。この場合の使用率は、83%あるいは 70%とかなり余裕がありま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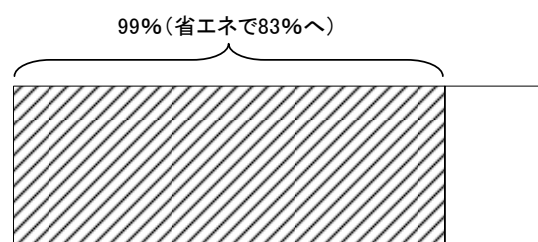
このオールジャパン体制を実現すれば、全国各地でいっせいに同時刻にピーク需要が出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から、電気の余っている会社から不足している会社に対して全国的に融通す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ります。北海道では 12 月から 2 月の冬場に、東北と北陸ではまれに冬場に、その他ではほとんど 7~9 月の夏場にピークが出ています。日時をみるとまれに同日の場合がありますが、多少は時刻がずれているという各社ごとの「負荷パター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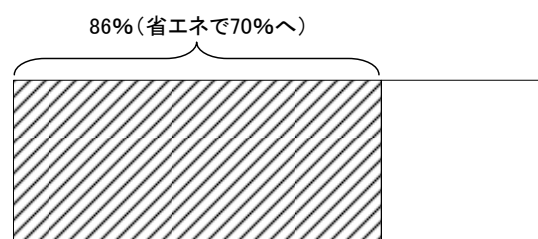
のちがいがあります。このため自社の供給力では電気が足りなくなり一社のみでは安定供給の実現が不可能な時でも、他社からの融通をとりつけば供給力の確保が可能になります。原発を「不要」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これが、まさに「ネットワーク連系効果」だといえます。これを活用しようというのがこのアイデアです。現在停止中の原発の再稼働を認めず、また現在運転中のものはこれから定期検査に入る時点で停止とすれば、約40年前のまだ原発が運転を開始していない水力と火力だけの時代に戻ることができます。実は戦時中の日本でこの体制がとられたことがあります。日本発送電株式会社は、1939年(昭和14年)から1951年(昭和26年)まで日本の電力事業を司った特殊法人で、国家総力戦体制を構築しようとする当時の日本政府の電力国家管理政策に基づき、東京電燈・日本電力など全国の電力会社の現物出資や合併によって設立された半官半民のトラスト(企業合同)です。戦時中のような国家主導の体制ではなくとも、各社協調によって国難を打破すべく一体的運用の実現に挑戦すべき時です。強力な政治的リーダーシップが求められますが、リスクの大きい原発を再開せずに電気を確保することに対しては国民的支持が得られるはずで、原発のかわりに火力の稼働を増やすことによるCO2の増加は避けられませんが、節電を継続し供給体制を全国一本化すれば、怖い原発の再稼働を回避することは可能です。ヨーロッパでは、脱原発を表明したドイツやイタリアなどは他国から電気を輸入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す。それは、国際間の送電線連係ができあがっているからです。EUは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を増加させる戦略として、採算性が高く、発電容量の大きい風力発電の増加に注力してきた結果、2009年で7658万キロワットの風力発電があります。風力発電の出力パターンは地域によって異なりますか

ら、広域送電網でつなげば出力変動が互いに打ち消されて平準化し系統運用が安定化します。このような理由でEUは国境を越えた広域送電網の建設に重点を置いてきました。我が国の国内においても、各社ごとの部分最適の体制から会社間の連系線強化による全国的な全体最適の体制へと変革し国難に立ち向かうべきと思います。このようなエネルギー・インフラは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の大量導入にも役立ちます。

各社毎に発電設備容量とピーク需要を比べて原発再開なしの影響を判断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たとえば東京電力管内では2010年7月23日に年間最大のピーク需要5999万キロワットを記録しました。その日の14時台の東京の平均気温は34.9度でした。現在の東京電



過去最大のピーク需要を想定したケース



2009年の最大電力を想定したケース

図 日本全国の電気予報

力の発電設備は水力が 899 万キロワット、火力が 3829 万キロワットであるから両者をあわせても 4718 万キロワットにすぎません。さらに現在運転中の原子炉 4 基（柏崎刈羽原発の 1,5,6,7 号機）の合計 491 万キロワットを加えると 5209 万キロワットになります。東京電力の発表によれば内訳は公表されていませんが、4900 万キロワット（2011 年 6 月 29 日現在）が供給力の限界となっています。もしピーク需要がこの限界を超えそうになれば、原則として実施しないこととしている計画停電を行わざるを得なくなります。ちなみに東京

電力管内の過去最高のピーク需要は 2001 年 7 月 24 日の 6430 万キロワットです。

中部電力の場合は 2008 年に 2821 万キロワットの最大ピーク需要が出ていますが、現在の水力、火力の合計で 2919 万キロワットの発電設備がありますから、原発（発電設備出力の約 11%を占める）を動かさなくても供給予備率は低下しますが、なんとか対処できるでしょう。ピーク需要が出た時の供給余力が原発の分より多ければ、原発なしでも対応可能となるからです。九州電力の場合は原発のウエイトは 26%と高いため、水力と火力の合計

（単位は万キロワット）

電力会社	過去の最大電力 〈年月日〉	原発を除く 発電設備	需給	過去の最大電力 の 15%減	需給	最大 連系量	過去の最大 電力との比 率（%）
北海道	579 (11.1.12)	535	△44	492	43	60	10
東北	1557 (10.8.5)	1328	△229	1324	4	180	12
東京	6430 (01.7.24)	4718	△1712	5466	△748	620	9.6
中部	2821 (08.8.5)	2913	92	2398	515	400	14
北陸	573 (10.8.5)	622	49	487	135	160	28
関西	3306 (01.8.2)	2455	△851	2810	△355	820	25
中国	1229 (07.8.17)	1071	△158	1044	27	668	54
四国	599 (08.8.4)	464	△135	509	△45	230	43
九州	1771 (08.8.1)	1477	△294	1506	△29	30	1.7
9 電力計 卸電力 総計	18865	15583 2821 18404	△3282	16036	△453		

表 最大電力と発電設備

1476 万キロワットでは今年の想定ピーク需要 1669 万キロワット（過去最大は 2008 年の 1771 万キロワット）をまかなえません。東京電力は原発が 27%、関西電力は 28%です。このように原発が発電設備出力に占める割合が高い電力会社ほど、原発ゼロの影響が相対的に大きくなります。現有の水力と火力だけでは間に合わなくなり、節電を一層強化するか、他社からの融通を増やすか、あるいは太陽光発電や風力などの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の導入を図るか、または火力を増強、あるいは自家発電からの余剰の購入を実施す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上表は、このような各社ごとの影響を検討した結果です。1 列目の数字は各社ごとの過去の最大電力を示しています。カッコ内はその時の年月日です。北海道だけが冬ピークで、あとはすべて夏ピークです。各社でいっせいに過去の最大電力がでると想定し、単純にその数値を合計すると 1 億 8865 万キロワットとなります。2 列目は原発を除く各社の発電設備で、卸電力を加えると 1 億 8404 万キロワットです。原発 2 基のみを有する日本原子力発電は除外してあります。3 列目は 2 列目から 1 列目を引いた数字で、過去最大の需要が今発生したと想定した場合の供給余力を示しています。中部と北陸を除く各社は供給が足りません。その過不足の合計は 9 電力計で 3282 万キロワットの不足となり、卸電力の原発を除く供給力 2821 万キロワットをあてても、461 万キロワットだけ不足します。卸電力の供給力が 9 電力にどう配分されているかは公表されていませんから詳細は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また 4 列目は 15%の節電がされた場合の最大電力を示しています。2 列目から 4 列目を引いて供給余力を求めたのが 5 列目になります。北海道、東北、中国は節電の効果で供給余力が出てきますが、東京、関西、四国、九州は依然として供給不足です。しかし過不

足の合計は 453 万キロワットと大幅に減少し、卸電力の供給力でカバーできます。

ところで隣接する会社間の連系量を考えてみましょう。現実に運用できる容量は熱の発生や周波数・電圧の変動のために制約を受けるために、設計上の送電容量を下回ります。3 行目の場合は、東北、東京と九州を除けば自社の供給力不足をほぼ連系によって補うことができます。また 5 行目の場合では、連系で不足を補えないのは東京のみとなります。これまでは各社とも会社ごとに需給バランスをとる自社完結主義の経営をとってきましたから、連系量の実績は必要最小限に抑えられてきたようです。連系量を最大にするには経営方針の転換が必要となります。欧州各国の連系状況を見てみると、相互依存関係が強そうです。仏教用語で「融通」といえば、別々のものがとけあって一体となることを意味するようですが、欧州の送電線はまさに一体となっているような印象をあてえます。しかしドイツが隣接国から融通してもらえる量は 802 万キロワットで、自国の最大電力 6997 万キロワットの約 11%です。ちなみにイタリアは 12%、スウェーデンは 25%、スペインは 6%、イギリスは 3%となります。我が国の場合はどうでしょうか。上表の一番右の行は隣接会社から融通を受けられる最大連系量を自社における過去の最大電力で割ったものですが、九州を除く各社は約 10~50%と最低でもドイツやイタリア並みで、9 社のうち 6 社はそれ以上です。つまり、やろうとすれば我が国の内部で欧州並みの連系は十分にできる物理的能力はすで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を意味しています。こうして国際比較をしてみると、我が国の会社間連系の能力は欧州並みか以上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連系を最大に活用し自社の発電設備を最小化するような経営方針がとられていないために、実際の連系実績は極めて低調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がいえるのではない

でしょうか。技術の問題ではなく、経営の問題です。

以上述べてきたことをまとめると、結論は次のようになります。

会社間連系の現行設備能力を最大限に活用した電力融通のオール日本体制を早急に確立し、原発以外の現行発電設備を優先的に投入する。このような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を実施し、それでも電力不足が起きる可能性の高い地域が残る場合には、その地域の電力会社だけに限定して原発の再開を必要最小限の基数のみ認める。と同時に、全原発を停止しても融通によって電力供給ができるような連系線の強化工事をオール日本の視点から直ちに実行する。

#### V. 太陽光発電の買い取り価格をどう設定するか

私の住んでいる川崎市で自宅の屋根に太陽光発電パネルを設置したケースの収支を試算してみましょう。近くの家電量販店のチラシによれば、値引きを考慮すれば工事費込みでキロワットあたり約 50 万円で購入できそうです。国からの補助金が 48,000 円、神奈川県から 15,000 円、さらに川崎市から 25,000 円と合計 88,000 円です。これを差し引いて初期投資額はキロワットあたり 412,000 円となります。3 キロワットを設置すれば、1,236,000 円

です。

上図は一般家庭での 1 日の電気の使われ方と太陽光発電でつくる電気のパターンを示したものです。朝と晩に電気を多く使うことがわかります。昼間はあまり電気を使いませんから、太陽光で発電した電気は余りが出て、それをキロワット時あたり 42 円で東京電力に売電します。1 年間で太陽光が発電する量は 3,000 キロワット時と推定されます。そのなかで自家消費分（山形の下の部分）を 1,500 キロワット時とすれば、売電分（山形の上の部分）は残りの 1,500 キロワット時です。1 年間では売電収入が 63,000 円、太陽光発電でまかなった自家消費分については、もし設置しなければキロワット時あたり 23 円を東京電力に支払ったことになる分 34,500 円の節約となり、あわせて 97,500 円の収入です。11 年目以降は売電価格が 23 円に下がりますから、売電収入は 34,500 円で、自己消費分の節約と合わせて 69,000 円の収入です。したがって修理代などがかからなければ 14 年間の収入は 1,251,000 円となり初期投資が回収できます。20 年間では 429,000 円の得になります。パネルについては、25 年間の保証をするメーカーもありますから、少なくとも 20 年間はずつでしょう。しかし家電量販店によれば、11 年目以降にパワーコンディショナー（直流交流変換器）の交換が必要になり、30~40 万円かか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そこで平均の 35 万円



図 6 太陽光発電の買い取りの仕組み

出典：シャープ株式会社([http://www.sharp.co.jp/sunvista/know/what\\_is/intro/](http://www.sharp.co.jp/sunvista/know/what_is/intro/))

を差し引くとやっと 19 年目の終わり頃に投資回収ができ、20 年間の得は 79,000 円に低下してしまいます。初期投資額の年利回りは 20 年複利で 0.3% にしかありません。

買い取り期間を 10 年から 20 年に延長すれば、収入が売電の収入増 285,000 円だけ増えますから、364,000 円の利益が得ます。年利回りは 1.3% にあがります。現在の新発 10 年物の国債利回りが 1.2% ですから、ほぼ同率になります。さらに全量買い取りにすれば、売電収入は 20 年で 2,520,000 円となり、11 年目の交換代 35 万円を引いても 2,170,000 円の利益が出ます。初期投資は 10 年で回収出来ます。年利回りは 5.2% です。この場合には、電力会社に支払う金額は太陽光発電パネルを設置する前後で変化ありません。発電したものは全量販売してしまいますから、自家消費分は従来と同様に電力会社から買うことになります。設置したパネルがどれだけ利益を生むかだけが問題です。

国が電気料金の認可にあたって電力会社に対して適用する公正な事業報酬率と同じ数値を、家庭の利回りにもあてはめる、という考え方もあるでしょう。現行の事業報酬率は 2.8% です。家庭の利回りが複利でちょうど 2.8% となるような買い取り価格を計算してみましょう。余剰分の買い取りの場合では、買い取り期間が 10 年で 97 円（現行ではこの値は 42 円に設定されています）、20 年で 60 円となります。また全量買い取りの場合では、買い取り期間が 10 年で 60 円、20 年で 42 円となります。

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の大量普及には技術革新だけでなく社会制度の革新がカギとなります。ドイツの事例は、このことの重要性を語っています。ドイツにおける太陽光発電の設備容量は 2005 年に日本を抜いて世界一となりました。我が国は 1973 年の第 1 次石油ショック後に、ナショナル・プロジェクトとして

太陽光発電などの新エネルギー技術の研究開発（サンシャイン計画）を進めてきたこともあり、技術革新の面では長い間フロント・ランナーの位置を守ってきました。市場シェアの点でもシャープが第 1 位でしたが、国の補助金制度が一時的でしたが 2005 年度で終了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さらに日本政府は 2003 年から 2009 年まで電力会社に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の導入を 1.35% だけ義務付ける RPS 法（義務量割当制度）を採用していたことなどで、2007 年にはドイツの Q セルズに抜かれてしまいます。フィード・イン・タリフ制度が導入されたのは民主党政権が発足する直前の 2009 年からと政策の面でも出遅れてしまったことが大きく影響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この差はドイツの巧みな制度設計に原因があります。1991 年に施行された「電力供給法」では太陽エネルギーと風力の買い取り価格は小売価格の 90% 以上と定められ、1 キロワット時あたり約 17 ペニヒでした。買い取り期間は 20 年です。1990～2000 年の間に、風力は 102 倍の 611 万キロワットに急伸びしましたが、発電コストの高い太陽光は 50 倍の 10 万キロワットと小さい規模のままでした。ところが 2000 年の「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法」では、風力の買い取り価格が約 9 ペニヒ（稼働より 5 年間）、約 6 ペニヒ（6 年目以降）に下がり、逆に太陽光は 51 ペニヒと大幅に引き上げられました。その結果、2000～2004 年の間に、風力は 2.7 倍の 1663 万キロワットに、太陽光は 10.2 倍の 102 万キロワットと、太陽光の急伸が際立ちました。太陽光は 2009 年には 968 万キロワットで、日本の 3.7 倍の規模になりました。

一方我が国では、太陽光発電パネル購入時に設備代金の一部を国が補助し、電力会社による電気の買い取りと共に普及拡大を図る政策がとられました。しかし、これら両者の効果を合わせても、設置者は耐用年数の間に投

資額が回収できないという状況でした。環境にやさしい太陽光発電パネルをつけても、結局のところ「自己負担」が強いられました。電力会社から従来通り電気を「買う」方が得でした。自ら発電して電力会社に売るという電気を「つくる」選択をすれば、売れば売るほど赤字が増えるという状態でした。電気を顧客にたくさん売れば売るほど電力会社の利益が増えるのとは逆の仕組みになっていました。これではダメです。マイナスの「自己負担」ではなくプラスの「利益」が出るような制度設計を用意すべきだったと思います。電気を賢く、つくり、たくわえ、送り、配り、節約するためには、賢い制度を用意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 脚注\*

<sup>1</sup> 一橋大学商学研究科。

#### \*参考文献

- [1] 栗原史郎『環境市民革命』省エネルギーセンター, 1998年
- [2] 大澤正治・栗原史郎「ネットワーク型経済の核心と将来展望—ネットワークの新しい概念を求めて—」『愛知大学経済論集』 第187号, 2011年, pp.1-46
- [3] 栗原史郎「電力会社間で融通し供給を」応援メッセージ 3・11大震災 『河北新報』 2012年1月22日付, 第5面(声の交差点)
- [4] 電気事業連合会「電力統計情報」(<http://www5.fepc.or.jp/tokei/>)

## 中国の経験と日本の経験

### —福島第一原子力発電所事故発生 of 解明と 原子力政策の将来を念頭において—

大澤正治<sup>1</sup>

#### 要旨

日本と中国の原子力発電開発にの歴史を辿り、原子力発電技術の定着性、政策、経済体制の観点から比較を行った。

この比較を行うことにより、福島第一原子力発電所以降のわが国のエネルギー政策見直しの基礎となるべきエネルギーの技術と安全に関する考察を試みた。

**キーワード：**両弾一星，福島第一原子力発電所事故，原子力発電密度，日本のエネルギー政策見直し，コンカレントエンジニアリング

#### I. 日本ウサギと中国カメの原子力発電所開発の違い

わが国においては、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震災に伴う福島第一原子力発電所事故をきっかけとして、わが国における原子力発電の位置づけをめぐる議論が噴出している。筆者は2011年7月研究ノート『福島第1 (F1) 事故以降わが国原子力発電に関する緊要な論点』を愛知大学経済論集第186号に発表し、わが国原子力発電開発の歩みを紐解き、原子力技術の定着性に関する疑問を明らかにした。

この時期に、愛知大学経済学部教授李春利は、『中国の原子力政策と原発開発—時期区分を中心として—（『愛知大学国際問題研究所紀要』第139号，2011年12月）』を発表した。この報告の主要な論点は、2011年度ICCS ワークショップにおいて紹介があったが、中国の原子力開発の経緯を知り、今後を展望する上で大変に貴重な論文である。

今回は、この李春利論文をふまえ、原子力発電開発に関する日本の経験と中国の経験を比較しながら、改めてわが国原子力発電問題の核心に近づいてみることにした。

原子力発電に関する日本と中国の違いは、日本は、現在、世界第三位の原子力発電設備保有国であるのに対して、中国はその約5分の1の設備が稼働しているのにすぎないという現状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と、中国は今後、わが国を上回る設備保有国となる計画があることである。この計画については、李論文が詳しい。まさに、開発が進んだ日本と今後、開発を進める中国である。

このような現状の違いとともに、重要な違いは、中国は核兵器不拡散条約 (NPT) において明らかにされた核兵器保有国五国の一つであるのに対して、日本は非保有国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この違いのために、一見、開発が遅れたような印象を与える中国における原子力発電開

発あるいは核技術に対する評価を見誤る恐れがある。

李論文を理解しながら作成した年表「日本、中国の原子力発電開発の推移」をふまえ、両国の原子力発電開発への歩みが意味するところを整理することとする。

世界の原子力発電開発の歴史は 20 世紀の半ばに始まる。しかしながら、原子力発電のための核技術は平和利用の代表格である原子力発電以前に軍事利用からスタートし、世界にその効力が轟きわたった。むしろ、軍事利用に覆いかぶせるように平和利用の原子力発電の開発が始まり、進んだ。その開発には核の軍事利用（例えば、1954 年のビキニ環礁水爆実験における第五福竜丸被害発生など）に手を染めた米国が核の平和利用についても最も積極的であり、やがて、国際原子力機関の設立等世界諸国を囲い込み、原子力発電普及の範囲を世界に広げるなどは米国の貢献に負うところが大きであった。その後、やがて 1960 年代、1970 年代と引き続き原子力開発の世界的ブームが起こることになった。原子力発電開発は 1950 年以降、急速に進み始めたことを考えると商業化への時間が大変に短いことに注目したい。なぜ短期間に商業化が実現したのか、答えは軍事利用の技術経験が活かされたからと考えられる。

日本も中国も世界的な原子力発電開発が始まる時期に遅れることなく原子力発電への取り組みに着手している。しかしながら、スタートは日本、中国、同時であったが、その後の 40 年、50 年に大きな違いが生じることになった。

20 世紀の後半、日本では原子力発電建設のラッシュであったのに対して、中国ではようやく 1991 年に商業用原子力発電所が泰山で臨界に達している。

この 20 世紀の後半、商業用に原子力発電所を活用したいと願いながら、中国は何をしてきたかが重要なところである。

日本が米国の傘下に入り、原子力発電開発の歩みを始めたのに対して、中国はソ連支援の下で原子力発電に対する取り組みを始めている。この岐路は当時の国際政治から当然のことであり、両国が違った道を選択することはありえなかったと思われる。日本は天然ウランを用いる英国炉の道を歩むことも可能であったが、米国の支援の下、濃縮ウランによる原子力発電開発の道を進むこととなった。

一方、中国が 20 世紀の後半、原子力発電開発の準備に明け暮れたのは、支援をえた旧ソ連の技術の性ではなく、むしろ、中ソの国交断絶により、中国がソ連に決別し、改めて世界に原子力発電技術を求める独自の道を歩まなければならず、おそらく、この道以外に道はなかったから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

その独自の道は、平和利用ではなく、軍事利用につながる道であり、その道を選択した背景については国際政治情勢であり、孤立し、不安定な時期を経由した中国の歴史を理解する必要がある。同時に、今となっては、このような準備ができた中国とこのような準備をスキップした日本の違いも理解すべきである。この間、中国は軍事利用から核技術にアプローチし、核燃料サイクルの技術蓄積を行っていたことに注目する必要がある。

改めて、日本の原子力発電所建設の歴史を振り返ると、経済性優先の名目の下、米国軽水炉をフルターンキー契約で、いわば既成品を導入し、それからなぞるように原子炉技術を修得し、核燃料サイクルについては商業ベースの電気事業とは一線を画して開発を進めようとした事実を検証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核技術の体系的理解にはかなり難しい状況下のままで、高度成長のわが国を支える電力供給



力に原子力発電所を貼りつけてきたと言いたい。

これまでのことを結論的にまとめると、20世紀後半の時間をどう使ったかという違いを考えると、原子力発電技術に直接、触れる機会は中国の方が多かったと言える。

このことは、原子力発電技術に関する両国の国際展開の歴史の違いにも通じることとして理解できる。中国は国内での商業炉臨界以前に、アルジェリア、パキスタンに対する技術供与を行い、国外を舞台にして技術実証の経験を積んでいたことになる。日本はアジア諸国の原子力開発への協力を視野に入れ始めたのは21世紀に入ってからである。

原子力発電所を介した国際関係の構築は外交上、極めて重要な意味をもっていることは北朝鮮、イラン、リビアなど核疑惑の国々が世界各国の視線を集めながら、瀬戸際外交を展開し、いまだに軍事利用を实践することなく確実に原子力発電技術を修得していると解釈できることからわかる。中国は自国内の商業炉の開発と同時に、原子力発電と外交の強いリンクを感じていたと思われる。

今、さらに、アジアの中で、ベトナム、トルコ、カザフスタン、インドネシア、さらにタイ、フィリピンなど原子力発電への関心が高まってきており、アジア諸国に対する原子力発電開発の指導力が問われている。日本と中国が歩んできた異なった原子力発電開発のそれぞれの足跡を今後、原子力発電を導入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アジア各国に活かすために日中両国がお互いの歴史を承知していることが重要となってくる。

以上、両国における20世紀後半の時間の使い方の違いについてみてきたが、この違いは、両国の外交上、置かれた世界的な位置に基づき必然的なこととも理解できるが、この間、国内でどのように原子力発電開発に取り組ん

できたのかについてもそれぞれの国の違いを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日本は、1956年に原子力委員会が設立されたが、開発を急ぐ正力松太郎委員長と基礎開発からのアプローチを重視する湯川秀樹委員が対立し、1957年には湯川委員は原子力委員会を辞任した。以降、日本の原子力発電開発のながれは、商業化された米国軽水炉を受け入れる促進体制が整備され、学术界との間に隙間が生じた。

昨今、日本では原子力関係の研究体制について「原子力村」という言葉で皮肉っているが、その源は1957年にあり、その歴史は長いと思われる。

一方、中国においては超ハイテク技術として「両弾一星」（原爆、水爆、人工衛星）を位置づけ、政治と技術の一体化のもと、国家を上げた強力な開発指導体制が整備された。

その中国では、原子力発電開発の原則は、「安全、実用、経済性、自力更生」と確認されていた。1956年に設立された日本の原子力基本法第二条には、学術会議の三原則（公開・民主・自主）声明を受け、「原子力の研究開発及び利用は、平和の目的に限り、安全の確保を旨として、民主的な運営の下に、自主的にこれを行うものとし、その成果を公開し、進んで国際協力に資するものとする」と基本方針が定められている。

中国が提示した原則は、その後の開発へ向けたスローペースとは裏腹に、より実践へ向けた方向づけがなされており、将来を暗示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のに対し、日本は学术界が提示した原則と開発の実際の動きが整合していないことが奇妙に感じられるとともに、両国の歴史をある意味で正確に物語っているように思える。

日本、中国の原子力発電開発の推移

年	世界の動き		中国の原子力発電開発の動き	日本の原子力発電開発の動き	年
	一般情勢	原子力関連			
1945 (昭 20)		・広島、長崎に原子力爆弾投下			1945 (昭 20)
1949 (昭 24)	・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 (昭 24)
1950 (昭 25)	・朝鮮戦争起こる				1950 (昭 25)
1951 (昭 26)		・米アイゼンハワー大統領国連総会演説「Atoms for Peace」 ・世界ではじめての原子力発電(100kW)の実験		・九電力体制スタート	1951 (昭 26)
1954 (昭 29)		・米国、ビキニ環礁水爆実験 ・米国核燃料物質民間移管		・原子力利用準備調査会発足	1954 (昭 29)
1955 (昭 30)			・中ソ原子力協定締結、1958 年ソ連支援で 7MW 重水炉研究炉臨界、1959 年中ソ対立によりソ連側から破棄	・日米原子力研究協定締結	1955 (昭 30)
1956 (昭 31)	・日本国連加盟			・原子力委員会設立 ・原子力三法の施行 ・日本原子力研究所実験炉(154kW)開発始まる。臨界は1957年	1956 (昭 31)
1957 (昭 32)		・国際原子力機関 (IAEA) 設立			1957 (昭 32)
1962 (昭 37)			・周恩来首相のもと、「兩彈一星」開発指導体制確立		1962 (昭 37)
1963 (昭 38)			・甘肅省蘭州ウランガス拡散濃縮工場稼働		1963 (昭 38)
1964 (昭 39)			・中国、初の核実験		1964 (昭 39)
1965 (昭 40)				・日本原子力発電所東海発電所 GCR (160 kW) 臨界	1965 (昭 40)
1965~66 年		・世界的な第一次原子力発電所開発ブーム			1965~66 年
1966 (昭 41)	・中国文化大革命起こる		・使用済核燃料再処理工場稼働		1966 (昭 41)
1965~67 年				・日本原子力発電所敦賀 1 号、重電福島第 1、2 号、関電美浜 1、2 号着工	1965~67 年
1967 (昭 41)				・動力炉・核燃料事業団設立	1967 (昭 41)
1970 (昭 45)		・核不拡散条約発効			1970 (昭 45)
1970~74 年		・世界的な第二次原子力発電所開発ブーム			1970~74 年
1971 (昭 46)	・中華人民共和国国連加盟				1971 (昭 46)
1972 (昭 47)			・周恩来首相が平和利用の原子炉開発を指示、1982 年エネルギー長期戦略、原子力発電計画を発表		1972 (昭 47)
1973 (昭 48)	・第 4 次中東戦争起こる				1973 (昭 48)
1974 (昭 49)				・電源三法公布	1974 (昭 49)
1977 (昭 52)				・動燃事業団 FBR 実験炉「常陽」臨界	1977 (昭 52)
1979 (昭 54)				・動燃事業団新型転換炉原型炉「ふげん」臨界	1979 (昭 54)
1984 (昭 59)			・中国、IAEA 加盟		1984 (昭 59)
1985 (昭 60)			・中国の自主設計秦山原子力発電所 (PWR) 着工、1991 年臨界	・原燃サイクル施設の立地に関する基本協定 (青森県、六ヶ所村、日本原燃サービス、日本原燃産業)	1985 (昭 60)
1986 (昭 61)		・チェルノブイリ原子力発電所事故			1986 (昭 61)
1987 (昭 62)		・米ソ、中距離核兵器廃棄条約調印			1987 (昭 62)
1989 (平 1)	・天安門事変	・放射性廃棄物深地層処分地ゴビ砂漠の調査開始			1989 (平 1)
1990 (平 2)	・ドイツ統一				1990 (平 2)
1991 (平 3)	・ソ連崩壊				1991 (平 3)
1992 (平 4)				・日本での商業用ウラン濃縮工場操業	1992 (平 4)

・中国については、李春利『中国の原子力政策と原発開発』愛知大学国際問題研究所紀要第 139 号より

## II. 狭い国日本と広い国中国の原子力発電開発の違い

発電システムの中でも原子力発電については、安全性の評価をめぐり、リスク拡散の地理的範囲の広さと時間的範囲の広さが特徴である。この特徴から、国土面積に対する原子力発電の容量、即ち原子力発電密度によってその国の原子力発電リスク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

世界的にみれば、現在、国土面積（1km<sup>2</sup>）あたりの原子力発電密度は韓国が最も大きく、次が日本である。原子力発電密度が大きいこ

とは、放射線に伴うリスク被害がもたらす影響が大きく、安全性の問題が深刻であることを意味する。

李報告による現在の中国の原子力発電開発計画では約1億kWの規模の原子力発電所を中国がかかえるビジョンを示しているが、原子力発電密度は約10kWであり、現在の米国程度であり、まだ現在の韓国、日本に比べて一桁、小さい。もしも、中国が現在の日本の原子力発電密度まで原子力発電設備を建設すると想定すれば、12億2千万kWの原子力発電所を建設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世界の原子力発電設備容量  
(わが国は核兵器をもたない、最も原子力発電容量をもつ国である)

		<原子力発電設備容量>	<国土面積>	<km <sup>2</sup> あたり 原子力設備容量>
◎	米 国	10630 万 kW	9629 千 km <sup>2</sup>	11 kW
◎	フランス	6602 万 kW	552 千 km <sup>2</sup>	120 kW
	日 本	4794 万 kW	378 千 km <sup>2</sup>	127 kW
◎	ロシア	2319 万 kW	170984 千 km <sup>2</sup>	1.4 kW
	ドイツ	2146 万 kW	3574 千 km <sup>2</sup>	60 kW
	韓 国	1772 万 kW	100 千 km <sup>2</sup>	177 kW
	ウクライナ	1382 万 kW	604 千 km <sup>2</sup>	23 kW
	カナダ	1343 万 kW	9985 千 km <sup>2</sup>	1.3 kW
◎	英 国	1195 万 kW	243 千 km <sup>2</sup>	49 kW
	スウェーデン	938 万 kW	441 千 km <sup>2</sup>	21 kW
◎	中 国	912 万 kW	9597 千 km <sup>2</sup>	1.0 kW

(注)◎:核不拡散条約に定める核兵器国  
原子力発電設備容量 2009年1月1日現在  
資料:愛知大学経済論集第186号, p.297

最適な原子力発電密度は安全対策の技術向上によって大きくなると考えられ、各国の技術力によって許容される原子力発電密度及び規模は異なるが、世界各国が共有する目安があるとしたら、中国はまだまだ開発の余地があると言える。一方、日本は韓国とともに、

目安を超える超過原子力発電国と言え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られる。

この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化石燃焼を利用する発電方式で考えると CO2 排出量取引としてその超過に関する新たな市場を舞台とする取引が可能となるが、原子力発電容量の超

過分については、超過分により起こりうるリスク被害即ちリスクコスト負担の大きさを考えると市場取引は不適切と考えざるをえない。

広い国の中国と狭い国の日本では、その開発のテンポの違いがあっても、原子力発電規模に関して、あるいは規模に基づく世界市場における占有に関して、動かすことのできない絶対的な違いがあることを認識せざるをえない。

もっとも、原子力発電の世界市場における占有とは、その国内に建設する発電容量のみを尺度とするのではないと考えても、前章で述べたように他国への進出はすでに中国の方が積極的であったことも念頭に置いておく必要がある。

さらに、もう一点、中国の広さと日本の狭さから原子力発電開発の違いを認識させられることがある。日本は、戦後の私営九電力体制における総括原価にまもられた供給安定性命題のもと、原子力発電を発電の一種と位置づけ、とくに、経済性については電力供給のベース供給力として火力発電との比較を意識しながら市場競争原理を基礎として原子力発電を発展させてきた。日本には、このように商業ベース原子力発電の主体を「民間」に委ねる一方、核燃料サイクル及び核燃料サイクルがらみの原子力発電の技術開発には国家研究開発予算を投入し、「官」で推進してきた歴史が残っている。「民間」と「官」は九電力体制という日本の電気事業体制をバックに、いわば、対立の構図であったと言える。

一方、中国は、原子力発電というよりも核技術として、「両弾一星」の言葉が示すように、国威をまもるためのプロジェクトと位置づけられ、国家をあげて、官学連携体制で原子力発電へ取り組んできた。国家プロジェクトとして、実際の実施体制は、中国核工業総公司(CNNC)と中国広東核電集団公司(CGNPC)の二社の国営企業が牽引車役を担った。この

二社は、地域割の原則や研究開発はCNNCが担うなどの原則があるものの、その原則にかかわらず、競争原理が機能している。

一般的に、自由経済国ではなかった中国は市場整備に対して独自のスタンスを保っていた。石油、通信などの場合と同様、原子力発電についても複数国営企業体制をとりながら、競争が起こっていた。このような競争が自由経済の国々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できた鍵ではなかったのかと推察する。

狭い国日本では、福島第一原子力発電所事故以来、原子力発電の国営化も議論されているが、中国が原子力発電開発において残した国営の効果とは随分、違う国営に焦点をあてているように思える。少なくとも、PWR 国営会社と BWR 国営会社の構想は議論されていない。中国は広い国であるから、国営会社を二社設立しただけではなく、中国は国土の広さをどのように考えたか日本は改めて考え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る。

ところで、現在、前述した原子力発電開発計画に示されたように中国においては原子力発電開発ブームである。そして、李報告によると、原子力発電所立地誘致をめぐって地域間に競争すら起こっている。日本が原子力発電所建設に際してどのような地域対策を実施し、開発スピードを加速させたか中国にとっては関心の高いところとのことであるが、中国は広い国であることを改めて認識し、原子力発電密度の低い国々の経験を学ぶべき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る。

### III. 産学官連携日本と学官産連携中国の原子力発電開発の違い

2012年2月27日愛知大学車道校舎で開催された次世代自動車開発をめぐる日中比較をテーマとする公開講演会で中国次世代自動車開発のキーパーソンである清華大学自動車工

学専攻教授張劍波氏は日中両国における産学経験から、日本の技術開発は産主導の産官学連携型、中国の技術開発は学主導による学官産連携型であり、日本の技術開発検討会は産または官が主催し、その座長に大学の研究者が座らされていることが印象に残っていると述べた。

原子力開発においても、これまでに述べてきた「両弾一星」と位置づけた中国と原子力委員会委員を湯川秀樹が辞した日本のシーンを垣間見るだけで、張氏の指摘は的をえていると思わざるをえない。

また、張氏は中国の「失敗から学ぶ」技術開発に対して日本は常に完成度の高さを求める技術開発を進めていると指摘している。

2011年3月11日の福島第一原子力発電所事故以降、この経験を世界各国と共有したいとする言葉の現実性よりも事故のない原子力発電を一層、求める姿勢の方に実感するのも張氏の指摘が裏づけ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る。

大学が技術開発に係わる重要性については改めて張氏と論議し、整理することとして、産業が前面にでる技術開発がもたらす危険性についてここで警告しておきたい。張氏の指摘によれば、中国は産業の育成が課題であるが、日本は産業の力が強すぎるがかえって課題となっている。産業の力が強すぎるというよりも産と官ないし学とのバランスがとれていない課題というべきかも知れない。

日本では、原子力発電開発に関しても官と電気事業が対立的であったことは既に指摘したところであるが、このような構図で日本の原子力政策が策定されていたので、電気事業が商業炉として軽水炉を導入する部分についてはその現実を後追いするだけの原子力政策であったといえる。

そして、米国からフルターンキーで導入した技術を下請としての位置から丁稚奉公のよ

うに技術を身につけながら、日本の原子力産業は育ってきた。米国原子炉メーカーから日本の原子力産業がどのようにして技術移転がされたかが重要なところであるが、日本の電気事業者は経済性を念頭におきながら、各要素技術を集約し、最適な解を求めるコンカレントエンジニアリングとして原子力発電所を建設した。相次ぐ原子力発電所建設は、独創性に基づくプロダクトイノベーション型ではなく、既存の技術を前提とするプロセスイノベーション型で日本の原子力産業を育成することになった。

このような日本の原子力発電開発の経験から、日本の原子力産業としての基礎的技術力を十分に検証しないままに、電気事業という産業が原子力産業の体系化、あるいは囲い込みをはかることになったと見ることができる。競争、国際性など外部の刺激を受けないように、電気事業者は特定の原子力産業を育て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のような状況下では、即ち、官とは隔離された電気事業の保護のもと育ってきた原子力産業に関する競争政策が重要となってくるが、競争政策をも電気事業者は囲い込んでしま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られる。電気事業者によるコンカレントエンジニアリングは原子力発電の各技術を選択することになるが、その選択において原子力産業の競争が機能していたか、技術力の養成にプラスになったのか、コンカレントエンジニアリングで切り捨てられた技術に失敗を救う機能が残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か、このような技術の選択が必需性の高いエネルギー供給を通じて国民にもたらしたものが何か福島第一原子力発電所の事故を契機に改めて検討し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と思われる。

現在、福島第一発電所事故をきっかけとして日本ではエネルギー政策を白紙に戻して検討が行われている。スマートグリッドという新たな技術の導入も重要な検討課題となって

いる。しかしながら、その技術がコンカレントエンジニアリングによって選択され、特定の技術企業以外の技術メニューを少なくしてしまうこと、あるいはプロダクトイノベーションが否定されるのであれば、省エネルギー政策におけるトップランナー方式と同様、また、技術企業を囲い込むことになり、原子力発電開発の歴史と同じ道を相変わらず歩んで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警告したい。

いきなり商業炉導入を求めたときのように、経済性のために自らの首を絞めることにならないか、ほんとうに技術を熟知しているか、中国流に福島第一原子力発電所の失敗からの学びとして同じ道を歩まないように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

#### 脚注\*

<sup>1</sup> 愛知大学経済学部教授。

#### \*参考文献

- [1] 李春利「中国の原子力政策と原発開発 — 時期区分を中心として —」『愛知大学国際問題研究所紀要』第139号、2011年12月
- [2] 大澤正治「福島第一（F1）事故以降のわが国原子力発電に関する緊要な論点」『愛知大学経済論集』第186号、2011年7月
- [3] 平成21年版原子力白書
- [4] 原子力ポケットブック 2009年版

##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 —基于文化属性的思考—

陈红娟<sup>1</sup>

#### 摘要

文化的历史性和民族性以及传统文化自身内在的作用力和强大影响力要求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在历时性研究方面抽象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的时代性和文化进步性要求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在共时性研究方面融合世界文化之精华进行综合创新；文化的社会性和文化自身结构的独立性要求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在当下实现依附性和独立性的统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化只有通过历时、共时和现时三个维度的合理建构才能不断完善自身的有机结构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提供精神向导和支撑。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现代化、维度、文化属性

21世纪的历史进程让所有文化都共同面临着一个命题：如何避免自身传统与历史的断裂性变迁，如何在一个全球化世界里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经济运行规则日趋统一，共同道德规范、共同价值标准的建构日趋紧迫，似乎要求所有的文化都以割断自身文化的“精神链条”为代价，去迎合现代化的逻辑。依据现代化的特征与需求，着眼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涵、现实处境和普世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文化实现现代化的方略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盛行于当代自由主义西化派、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家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分别以“全盘西化”、“中体西用”和“综合创新”为基本文化主张。无论是传统文化本位论亦或是西方文化本位论，都无法超越“中西之争”、“古今之辨”的传统思维模式。中国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民族“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和“会通以求超

胜”的智慧精神之中，在文化建设中兼重时代性与民族性，鲜明地体现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中国文化的新品格。然，文化现代化问题涉及到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等诸多复杂因素，具有多维性、不平衡性和复杂性，综合中西文化之长颇为混沌，笔者在此基础上呼应全球社会文化分化与整合的现实逻辑提出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三个维度以明晰中国文化发展路向。

#### I. 历时维度：抽象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从文化的历史性和民族性来看，文化现代化的发展构建离不开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文化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就历史性而言，费孝通先生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文化的历史性进行过论述[1]（P393）：一群社会人互相学习利用那些人文世界的设施包括物质的和

精神的，或说包括他的硬件和软件进行生活。生物人逃不掉生死大观，但属于社会人的生活用具和行为方式即文化的零部件却可以不跟着个别生物人的生死而存亡。文化的社会性利用社会继替的差序格局，即生物人生命的参差不齐，使它可以超脱生物体生死的定律，而有其自己存亡兴废的历史规律。这就是人文世界即文化的历史性。从这一论述中可以看出，一种文化的存在总是有其历史性因素的沉积，不管它是否能占据主导地位，是否能经得起社会现实的冲刷，它总是在对先辈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传承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且，许多文化研究也表明，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建构。克拉孔（Clyde Kluckhohn）曾指出[2]（P429），一个社会要想从他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离开传统文化的基础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必然需要历史血液灌输，需要与历史相承接，特别是占据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儒家伦理中所包含的“理性之转化”和“道德的动力”[3]等蕴含着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此外，传统文化中可以借鉴的并非只有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优秀的文化思想都可以借鉴和运用，如法家、农家、阴阳家、道家等，当前中国社会所倡导的理念在传统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如和谐。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推动文化现代化转型，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屹立于民族之林，凸显本土色彩的必然举措。

文化还具有民族性。人类群体为适应其生存环境，从一开始就各自发展出一套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等。这些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经过历史沉淀，逐步积累形成文化的民族性特质。文化的民族性能够反映特定民族文化类型的基本特质，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结构，并能够反映

民族的特点和民族精神。它具有超时代、超阶级的内容和精神，与民族存亡共始终。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有其民族性，任何文化形态的建构都离不开自己的民族文化。最近几年来若干地区的文化动态更使我们真切地认识到[2]

（P429）：今天世界上最讲求的精神力量既不来自某种共同的阶级意识，也不出于某一特殊的政治理想，惟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因此，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应该以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发展为重要内容，注重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传统文化自身内在的作用力和强大影响力决定其必然成为文化现代化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学各个领域。……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控制作用”[2]（P242）。“传统”是由“传”和“统”两个字构成的。纵向曰“传”，是指时间上的历时性、延续性，是指那些过去有的，现在仍然在起作用的东西，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活的东西。横向曰“统”，指空间上具有权威性的东西，是空间意义上时时刻刻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传统文化是传统的重要方面，它是那些隐藏在历史背后超物质形式的，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任凭外来文化和社会现实冲击、洗刷、沉落、烤炼而不改其宗的文化。传统文化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是历史与现实同化而又异化的产物，具有过去性和现代性的双重含义。一方面，它包涵历史上每个时代的文化事项，是历史文化的总体综合，它具有深厚历史的沉淀；另一方面，它影响现实社会成员的社会心理，对社会成员的价值选择、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着强大控制、影响和作用力。传统文化具有延续的规范力量，让人们形成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和潜意识，并转化为有形的行为模式。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即其价值系统，内容带有根本性，是人们生活的原则和心灵向上的依附。余英时就曾写道[2]（P9）：传统的价值系统虽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



“搏之不得”，但确实存在，而且直接规范着人的思想和行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系统中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它有具有超强的稳定结构和吸纳异质文化的强大机制，不断吸收其他文化形态又不断自我调整。它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拿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来说，在“五四”时期遭到淋漓尽致的批判，但“新儒家”和“国学”的兴起足以说明它依然受着众多国人的“青睐”。可见，传统文化已“侵入”我们的血肉、骨髓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推动文化现代化转型，必须坚持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一维度，防止其在与异质文化的强烈碰撞中引起历史传承性的断裂。

在继承过程中需要注意：一、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全盘继承，而是继承其中优秀的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单一直线的系统，而是一个非常复杂包罗万象的系统，其中必有许多积极进步的内容，也有很多消极落后的因素，既有丰富的现代社会发展的东西，也沉淀了大量与社会发展格格不入，封建残余的东西。一方面，要批判并抛弃那些传统文化中极端残酷落后愚昧的内容，如古代的人殉制度、炮烙制度、凌迟制度、以及一夫多妻制、妇女裹小脚等。另一方面，要具体分析，历史地辩证地廓清传统文化中“良”“莠”，特别是思想和观念层中那些模糊和难以界定的部分。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具体继承而是“抽象继承”。“抽象继承法”是学界人士对冯友兰先生相关思想概括出的[4]。这一思想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断区分为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就具体意义而言，大都与封建思想有关，反映的是封建社会具体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殊相”，因此应当抛弃；就抽象意义而言，大都与封建思想无关，反映的是人类文化建设的“共相”，具有超时空性，因此应当继承。譬如忠孝，荣辱、礼义廉耻以及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小康社会，实

事求是等，这些思想观念经过现代的创新性转化，已经成为我们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思想资源。了解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内在逻辑，继承传统，缔造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使命之一。总之，应全面准确地理解和理性地看待传统文化，切忌简单笼统的继承。

## II. 共时性研究：融合世界优秀文化之精华

从文化的时代性和对文化进步性的要求来看，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其对世界优秀文化精华的融合。

这是文化时代性的必然要求。文化具有时代性。文化与自然物一样是一种动态性存在，是静与动的统一，是变与不变统一，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动而在保存自身基本文化基因的基础上不断重构自身。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前，文化的时代性集中地表现为各个民族文化的社会制约性和历史性，即每一历史时期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的政治和精神的基础。社会形态的演变及其区别决定了文化的时代特征。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政治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变迁，每一个时代文化事象因时间的不同和空间的差别而发生质或量、内容或结构的变化。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物质和精神的欲望，有不同价值标准，有不同的哲学、自然科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等，因此也有了奴隶制文化、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之别，这种差别都是由社会制度的演变决定的。当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以后，出现了另一种文化的时代特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和科技的发展，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壁垒逐步被打破，出现了越出一个国家和民族范围的时代概念，如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等等，它对原来各自独立发展的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全球化进程

的演进，各民族相互作用的加强和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出现，赋予了文化时代性以新的内涵。文化的时代性不仅仅决定于社会形态，也与世界文化的背景有着莫大的关联。文化的时代性说明：每一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文化内容和特征，每一种文化的建构既不能脱离时代性的规定，也不能与世界文化的大时代相违背。世界文化成为文化建构的重要因素之一，现代文化的发展是在世界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自身的逐步演进。文化现代化的发展也是一样，不可能脱离世界而独自发展，只有与世界接轨才能与时代相衔接，才不致固步自封，不致作茧自缚。

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文化进步性的必然要求。文化的进步性不同于文化的时代性。文化的时代性表明这种文化产生的必然性和何以如此的原因，而文化的进步性表明这种文化站在时代的前列，代表的是社会进步潮流，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例如在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潮、帝国主义时代的反帝国主义思潮以及它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等。文化的进步性不仅仅体现在先进文化上，任何一种指导社会现实的文化形态都应该具有进步性，这样才能保证其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不是滞后作用。而且，从文化进步性的取向性来分析，世界文化虽然纷繁复杂，但其中确实含有需要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的东西特别是现代化文化和后现代文化中那些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并起到过先进的引导作用的因素。我国的现代化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间有一个十分巨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是在西方工业文化已经高度发达，并由现代化向后现代化过渡时才开始实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这种“迟发展效应”和历史错位使原本以历时形态依次更替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中国社会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这种现状就使我国现代化注定要受到各种外来变量影响与干扰，也迫使我们为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而焦虑。在这种外来变量因素成

为必然的情况下，与其坐以待毙等待着在文化领域内再次“被动的解放”，不如在有内在逻辑性的自主建构，积极进取主动融合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使文化效果的力度和向度在悄然之间达到一种理性状态，为我国现代化过程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现实引导力。因此，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文化现代化应放宽视野，积极吸纳世界文化中“向上”和“进步”的文化基因。

当然这种将文化进步性与世界文化相联系并不等于是对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变向认同而是对起源于封建社会的前现代文化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正当性的一种正视，对进步性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一种认可，其实也是对全球化背景下牵制或减少中国现代化建设外源性文化因素负面影响的一种需要。在融合过程中有几点需要注意：一、要融合世界文化中的精华而并不是全部。世界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就西方文化而言，其对个人独立自主精神的强调、对科学理性的推崇、对民主法治的追求、对人的价值的重视等文化中的合理内核，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值得吸收和借鉴的。但西方文化中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糟粕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宗旨相违背，不足于取，应予以抛弃。二、防止民族性的缺失，建立有效的融合机制。与世界性相对应的是本土性，过多地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过激地吸收和容纳容易导致自我民族性的缺失，以致偏离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初衷。融合世界文化，并不等于民族文化的弱化，相反合理而有效的融合机制和自我调节更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强化，也有益于本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熔铸。三、融合并不等于简单的拼凑和堆积，而是在于综合性创新。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的80年代首次明确的提出了文化的“综合创新论”，主张“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硬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

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分析和审慎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 [5](P326)。融合世界文化之精华亦也同样要综合创新，在保持自己本民族文化特色基础上，借鉴外来先进文化，通过创新而形成的一种既体现民族，又体现时代性的中国文化。

### III. 现时性研究：实现依附性和独立性的统一

从文化的社会性来看，文化对社会具有依附性，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现实基础。从文化结构来看，文化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文化的建构有其自身严密的结构体系。因此，文化现代化发展应实现依附性和独立性的统一。

文化的社会性要求文化现代化转型必须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要求。文化具有社会性。当一个生物人离开母体后，就开始在社会中依靠前人创造的人文世界（具体的文化内容）获得生活。现存的人文世界是人从生物人变成社会人的场合。这个人文世界应该说和人之初并存的，而且是历代社会人的集体创作，社会人一点一滴地在生活中积累经验，而从互相学习中成为群体共有的生活依靠、公共的资产。人文世界拆开来看，每一个成分都是社会中的个人凭其天生的资质创造出来，日积月累，一代代人在自然打交道中形成。这些创新一旦为群众所接受，就进入人文世界的内涵，不再属于任何个体。这就是我们应当深入理解的文化社会性[1]（P392）。也就是说从文化生成角度来看，文化生成于现实社会，是现实社会人与人接触过程中集体智慧和本质力量的升华，文化的构建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现实和社

会基础。马克思就指出：“‘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6]（P7）。在马克思看来，文化包含着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全部总和，它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社会力量、社会财富和社会关系所达到的程度。从文化的终极目标看，文化就是要规范、处理、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好人们因思想、信念、行为、利益的冲突产生的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达至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标志和准绳。文化不是与人的社会关系相脱离的东西，而是与之处于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之中” [7]（P694）。文化都因为有社会关系这一核心价值 and 内涵而成其为文化，成为有公认或有公信力的文化，并形成独特的规则和规范的文化或伦理道德文化，任何远离此核心的文化只能呈昙花一现之势。而且从文化的时代性也可以看出，每一种文化状态都有其时代规定性，而这种时代规定性正是孕育于当时的社会形态之中。因此，文化最终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其终极指向也必须回归社会这一现实。

文化结构的独立性要求文化自身建构严密的系统。当然，文化现代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依附并不代表其自身建构的缺失，相反正是通过文化自身体系的建构才能达到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观照。因此，要正视文化自身体系的建构。从文化的生成和终极目标来看，文化是具有社会性，但就文化自身而言，它又具有系统的特点，具有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文化既不是铁板一块，不可解析，也不是互不关联的成分的混合物，而是一个具有结构和整体功能由许多复杂元素组成的系统，它是一种层次性、协调性和整体性的整合，它本身可进行分层、肢解和理性的诠释。文化系统的新陈代谢，固然要靠文化要素的增减损益，但根本的改造的途径在于旧系统结构的消解和新系统的重构。一个文化系统的落后过时

固然与构成其组成部分要素的流失和弱化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结构的内在消解和弱化,其结构的不合理性和错乱性的存在。马克思主义认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是对文化相对独立性的肯定。文化可以在客观的物质条件所限制的范围内给予经济基础以重大影响,因为在此范围内,构成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仍可选择,而文化则以各种方式对人们的选择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引导某些选择而排除另一些选择。从文化系统的源构来看,它来源于社会结构有机系统的作用。社会作为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系统,具有高度的自我组织能力、自我调节能力,而这种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自我组织系统能力,从根本上说源于社会有机系统的自觉性、意识性。文化就是社会有机系统进行自我意识的特定形式。文化并不是各个社会成员的个人意识的简单加和,而是一种系统化、规范化的社会意识。由于它对每个社会成员的活动都有规范作用和导向作用,从而也就作为社会有机系统的总体性的自我意识而能够对整个系统进行调节、控制,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也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

在文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首先,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明确其服务对象和终极指向。当前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些性质和特点,不同程度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关系、社会体制、社会行为、社会生活之中,同时也要求这些理念以各种方式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出来,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完善文化自身的结构体系。总的来说,文化主要由三种要素构成即文化产品、活动方式和文化观念。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产品”是文化系统的表层,它是文化系统的“果实”,是文化系统中的可见性因素。文化活动方式是文化系统的中层,

人们掌握一种文化的过程主要是学习和继承特定的活动方式。以文化符号的形式表现出的文化观念是文化系统的核心要素。要建构契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体系就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各个方面调节,完善文化体系。第三,实现文化自身体系的独立性与文化对社会的依附性之间的统一。其实二者是统一的,文化自身建构虽然自成体系但其终极指向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依附性也有益于自身系统进一步的完善。当然,文化现代化发展并不只是理论上的论证和口头上的简单宣扬,而要借助于文化产品,制度规范,社会成员的活动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塑造等各种“外力”来渗透到社会成员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其成为一种潜意识,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社会成员“日用而不知”的价值取向。也正是通过文化与社会之间“内在凝聚力”与“外在助推力”的结合,文化理念才能呈伞状辐射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层层相扣,处处相依,构成一个严密的体系。

历时性和共时性维度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自我定位的不可或缺的坐标,现时性维度的定位则是其落脚点,也是坐标的原点。历时性研究强调的是文化的续承性与创新性,共时性研究强调的是文化的融合性和借鉴性,现时性研究则更强调的是文化自身的指向性和体系性。历时性维度研究侧重于文化的古与今,解决的是文化的继承与传递问题;共时性维度研究侧重于文化的中与西,解决的是文化的学习与借鉴问题;现时性维度研究侧重于文化的虚与实,解决的是文化的导向与现实契合问题。这样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才能在时间、空间与实践三个维度上完善自身有机的结构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向导和理论支撑。

#### 注释\*

<sup>1</sup> 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 年版.
- [2] 余英时: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 [3] 金耀基: 《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 韦伯学说的重探》, 刊于乔健编《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汇编》,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暨社会研究所 1995 年出版.
- [3] 《辞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年版.
- [4] 吴传启先生在《从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看他的哲学观点》(载《哲学研究》1958 年第 2 期) 中将冯友兰的相关思想概括为“抽象继承法”, 并得到学界的肯定和支持.
- [5] 张岱年、程宜山: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7] 肖前: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下册)[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 从牟宗三的“政道”“治道”观到当代中国政治治理的方向

汤忠钢<sup>1</sup>

### 摘要

现代新儒家在政治理论上的重要概念是政道与治道。政道与治道的概念最初由张君勱提出，牟宗三后来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论证，因而成为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视野上，我们认为，作为“治国以法”还是“以德”抑或“德法并举”，这并不仅仅是现代新儒家自说自话的业已过时的学理问题，而是确实关乎当下中国国家的政治文明建构和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给予关注和讨论无疑是有价值和必要的。

### I. 政道与治道的概念诠释

我们知道，牟宗三提出儒家第三期发展的使命集中在三个中心点上，即所谓道统，学统，政统的“三统”。牟宗三认为，面对当前时代的要求，中国必须开出学统和政统，而开出学统政统必须以道统为出发点。道统是中国文化生命的延续，现代新儒家坚持此道统就是以心性论为核心的儒家的思想和精神。而政统则需要落到政体和政道之上。

所谓政道，相对于治道而言。牟宗三说，政道与治道的概念从孙中山的政权，治权的划分而来。孙中山将政治分为政权和治权，政权指政权的归属和更替，治权则是政权的行使和运用，这就是“权能分离”。牟宗三借用这个概念，分疏政权归属的“政道”和政治过程的“治道”。

对儒家传统而言，“道”既是最高的实在和一切价值的根源，同时也是其在万化万物中的实现。所谓政道，治道，也即是道在政治领域的实现形态，这就是他所说的“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治道是相应治权而言”的

意义。牟宗三说，政道者，政体之原理也，如“天下为公”，治道者，政府职能之运用也，如“三部六省”。牟宗三还说：

政道者，简单言之，即是关于政权的道理。无论封建贵族政治，或君主专制政治，政权皆在帝王，“而帝王之取得政权而为帝为王，其始是由德与力，其后之继续则为世袭<sup>2</sup>。

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化精神在政治上以圣君贤相为终极，政道无法得到体现，因而在政治方面就只有治道，而无政道。传统政治的君主制，政权在皇帝，治权在士，然而对于君无政治法律的内在形态之回应，则皇帝既代表政权，亦是治权之核心。中国文化生命由以寄托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只向治道用心，而始终不敢向政道处用心。

中国在以前于治道，已进至最高的自觉境界，而政道则始终无办法。因此，遂有人说，中国在以往只有治道而无政道，亦如只有吏治，而无政治。吏治相应治道而言，政治相应政道而言<sup>3</sup>。

牟宗三以政道治道的概念分析中国政治，认为中国古代数千年政治的发展，在政道上虽有先贤之垂训，却苦无办法落实操

作。政权上仍是君主专制，因此政权上并不民主。中国历史上虽然未能实现政权的民主，但在治权上为士大夫所掌握，因此从治权看，中国已有很发达的民主。这就是“完善的是治道，悬空的是一个政道”，或者说是“只有治道而无政道”。但是，民主的本质和关键在于政权，政权的民主的实现，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大问题。治道与政道相隔，得不到来自后者资源的支持，虽至高至善，但只完善了君权，不能外接于现代民主宪政，这就成为中国政治学中的严重问题，也成为儒家外王理想之难关。

牟宗三承认，中国古代以“大道之行”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为儒家的最高理想，但是大同从未实现于历史之中，它只能在治权方面体现，

而政权方面仍属于一家之世袭，或寄托在具体之个人上，则还不能算是“大道之行”。以今语言之，即还不能算是真正之民主。只有治权之民主，而无政权之民主，则治权之民主亦无客观之保证，而不得其必然性。而真正之民主则寄托于政权之民主。若论治权之民主，治权方面之“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则三代以后，皆事实上已时有之，而原则上亦普遍肯定之。故吾谓中国有治权之民主也<sup>4</sup>。

牟宗三认为，尧舜的大同理想只是一个空泛的理想，实际上政治是天下为家，政权的取得与更替，始终以“积德与天命”为观念基础，因而政道是中国政治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无论是禅让还是革命，政权的定常均不能保持。以往儒家只是停留在道德礼乐，但是终无解决问题的办法。

牟宗三对政权的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认为政权是民族的特征和属性。“政权者笼罩一民族集团而总主全集团内公共事物之纲维力也”<sup>5</sup>。依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的观念，政权是民族集团之共同体的属性，为民族集团所有，是民族集团的“形式的实有”或“静

态的实有”。这个“形式的实有”，即必然是“定常的实有”，只要民族继续生存，政权即定常不断。政权的这个属性为民族集团所“共同地有之或总持地有之”，就是“政道”。“此道即政权与治权分开之民主政治也。依是，无论封建贵族政治，或君主专制政治，皆无政道可言”，而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体现人民对于政权的所有，因此只有民主政治才有政道可言<sup>6</sup>。

在牟宗三的概念中，治权是处理公共事物的运用权。牟宗三主张政权与治权分离，同时，治权应当由选举产生：“假使政权与政道成立，则政权与治权必离。政权与治权分离，政权为集团所共同地有或总持地有，则行使或握有治权之政府首长必经由政权机关依法(宪法，代表政道者)而选举之。如是，治权方能得其真实客观化”<sup>7</sup>。

牟宗三认为，政权是治权之源，治权隶属于政权。过去，政权隶属于个人，而治权随着政权，虽然开放，但仍然受到政权的制约。治权应当由选举产生，才能“得其真实之客观化”，成为由选举制度制约的“可变者”。在牟宗三看来，政权的“恒常性”和治权的“可变性”是相互联系着的，这就解决了“体”的恒常不变和“用”的常新常变的问题：“如是，社会上有定常不变者以自持其体，有随时可变者以新其用，而革命，篡窃，割裂之狂流，遂可得而止。此即以至仁大义立千年之人极，而孔子所想之大同亦必经由此一关而逐步实现焉”<sup>8</sup>。

政权与治权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

行施治权必依一定制度而设各部门之机关，又必在其措施或处理公共事物上而设一定制度。凡此制度皆随治权走。此为隶属，委蛇，或第二义之制度，而维持政权(维持其本性与实现其为集团所共同地有或总持地有)与产生治权之制度(即宪法，政道)，则为主干，根源，或第一义之制度<sup>9</sup>。

牟宗三又说，

讲政治以第一义之制度为主，此则属于政道者。而第二义之制度则属于治权或治道，因而亦属吏治者，不属于政治者<sup>10</sup>。政权的第一义是骨干，根源，是最高的原则和原则性制度，是逆之而成，因此不易把握；治权的第二义制度是隶属，委蛇，应事制宜，是法案性制度，是顺之而生，因此容易把握。所谓外王，应当“根据内圣方面之道德礼乐之本，再撑开逆之以建立第一义之制度，下贯第二义之制度，之‘事功之道’也<sup>11</sup>。

牟宗三讲政道，或者从政权的归属来说，或者从政治的基本制度来说，因此所谓政道，是道德礼乐或道德理性为本所开出之基本制度，或第一义之制度：

政道是一架子，即维持政权与产生治权之宪法轨道，故是一“理性之体”，而治道则是一种运用，故是一“智慧之明”。有政道之治道是治道之客观形态，无政道之治道是治道之主观形态，即圣君贤相之形态<sup>12</sup>。

中国历史上的外王是内圣的直接延长，也就是主观形态的治道。而现代的政治则要求使治道转为客观化，外王和事功才能得到实现。

牟宗三的政治治道观，是充满了矛盾的。一方面他承认中国传统政治没有政权的民主，认为政道的核心在于人民对于政权的所有权，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这种所有是一种抽象的“总持地有”，而作为一般政治民主的基本程序的选举制度，在牟宗三这里被置于“行使或握有治权之政府首长”的产生方式。换句话说，牟宗三在很大程度上：将政权的归属抽象化和悬空化，反映出他站在心性论立场上对于现代政治的复杂心态，或者可以这样看，牟宗三在这里为新儒家的心性本体或道德理性留下了空间。

## II. 儒，道，法三家治道之比较

牟宗三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治道以士大夫为中心，可以分为儒家的治道，法家的治道和道家的治道。儒家的治道是传统治道的核心，牟宗三从德治，人格气象和对君权的限制三个方面来论述。他认为，儒家的治道就是“亲亲尊尊与尚贤”，此三目为体。转而为“正德利用厚生”，则较偏于用，仍以正德为本。“亲亲尊尊与尚贤皆正德中事。正德利用厚生即是王道”，正德利用厚生既是道德，又是人民生活幸福。内圣必须函外王，“外王就须正德以开幸福”<sup>13</sup>。但是：

从王道方面讲，正德必函厚生。正因为德是指道德的真实心，仁义心，故一夫不获其所，不遂其生，便不是仁义心所能忍。从个人道德实践的立场上说，律己要严；从政治王道的立场上说，对人要宽，要恕。正德求诸己，利用厚生归诸人，而亦必教之以德性的觉醒。此正所以尊人尊生业。尊生不是尊其生物的生，而是尊其德性人格的生，尊其有成为德性人格的可能的生。若只是注意其生物的生，则是犬马视之，非所以尊人也。故厚生必须尊人为本。此是儒家言德治之大端<sup>14</sup>。

值得注意的是牟宗三对于尊“德性”之人的看法，他根本排斥所谓“生物”的人，不惜“以犬马视之”，而德性之人和生物之人的标准又掌握在谁的手里，谁来确定呢？尊德性之可能的极权倾向在牟宗三这里也出现了。

儒家的治道，是德治，是道德的精神境界。牟宗三说：

儒家德化的治道，其最高最后之境界即是“各正性命”。故程子说孔子之志是“天地气象”。在天地气象，各正性命的境界中，视每一个人为一圆满具足之个体人格，此即人间天国境界。其所以有此境界，原是根于其德治之开始，即视人人自



身皆为一目的,由其德性的觉醒即可向上愤发,完成自己.故其极致即是各正性命.故此德化的治道,自始至终,即是落于具体的个人人格上”<sup>15</sup>.

在这里,牟宗三强调的是儒家“成圣成贤”的超拔可能的自觉,而对于这种人格要求限制和抹煞个人基本权利的可能趋向,没有任何批评.

德治虽然有至高的境界,但是由于政道的问题没有解决,治道也就不足:

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之形态下,皇帝在权与位上是一个超越无限体.因为治权与政权不分,合于一身,而其政权之取得又是由打天下而来的,而儒者于此始终未想出一个办法使政权为公有.是即相应政权无政道.即使让政权寄托在一家世袭上,亦必须有一客观有效之法律轨道以限制之,使政权与治权离.如是方能根绝打天下之路,而维持政权之定常永恒性于不坠<sup>16</sup>.

作为儒家思想的自觉继承者,现代新儒家力图将儒家思想同专制政治区别开来,强调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对君权的制约.所谓儒家的治道,很重要地表现在这里.牟宗三说,在传统中国,儒家对于限君的办法是道德,

在无政道以客观化皇帝之情形下,儒者惟思自治道方面拿“德性”以客观化之.但是此种客观化是道德形态,不是政治法律的形态.儒者自觉地根据儒家的德治首先要德化皇帝与宰相.皇帝在权与位上是超越无限体,儒者即顺其为无限体而由德性以纯化之,以实之<sup>17</sup>.

这是一个天地气象,它是一个德化的人格,是绝对与无限,“此种绝对与无限必函大洒脱,大自在,大推开,物各付物,而各得其所,各正性命,这完全是属于‘慎独’的绝对与无限”<sup>18</sup>.德化的治道使君主由德性的觉醒而忘掉其权位的无限,进至法天成德的

无限.牟宗三说,道德的绝对观念就是儒家对君权的限制和对极权独裁的否定.

牟宗三尽力将他的道德的绝对同全能主义的绝对区别开来,牟宗三认为,这个绝对是道德的,而“道德宗教上的绝对都是由慎独而成的德的绝对,不是由抓紧把持而成的‘综体’(Totality)之绝对.无限是德的圆满自足,而不是由综体而成的一个‘无限类’”<sup>19</sup>.全能主义的“综体”是绝对抹煞个性,摧残人性,将个体都纳入到一个整体机械中,而道德与宗教的绝对不是“综体”,“这种绝对总是散开而体之于个人,故皆是属于慎独的事”<sup>20</sup>.牟宗三只是强调信仰是个人的,以此来对抗对儒学意识形态专制的批评.但是,牟宗三所说的“慎独的意义,仅仅是它的实现形式.虽然实现形式的个人性,可能成为多元文化的契机,但是,牟宗三考虑政治问题的根本前提仍然是绝对的心性本体或“道德理性”,这样的道德的和宗教的绝对,施之于社会政治领域,正是政治上的全能主义观念基础.

道家的治道是“道化的治道”,

道家所言的“道”即是由冲破外在的形式与人为的对待这两点而显示.在这转关上,道家具有浪漫的否定的精神.因此它成为反人文,非人文,或超人文的.到就是一个浑圆的绝对,自足的自然.故曰“道法自然”<sup>21</sup>.

道家的性不是儒家的仁义礼智的德性的性,而只是自然之性,儒家是理想主义,道家则是自然主义,理想主义是本德性以发大用,参赞化育,自然主义反人为,反人文.相比较而言,儒家的“无为无不为”是否定根于私意计较,私心自用,家言邪说的欲望的“为”,对于本于德性天理的“为”是“不可遮拨”,“‘无为’是遮拨私意私智之为,‘无不为’是本德性天理以兴发大用”,道家的“无为”亦是遮拨私意私智,“无不为”则只是“自然”之变化和“自然”的自适自化.

道家之道用于治道上，也以限制君权为主，“也是叫人君归于自己之自适白化而让开一步，让物物各适其性，各化其化，各然其然，各可其可。这也是散开而落在各个体上，忘掉你权位的无限，进而成为道化人格的圆满自足之绝对与无限。而此圆满自足之绝对与无限也是归于‘独’，故能推开让开，而让物物各落在其自身。”牟宗三认为，道家的治道也是天地气象，天国境界，但是，道家的治道只有天地的“自然”的意义，同时，它本身不能独立，与儒家的德化的治道根源于伦常性情，由伦常性情中转出而具有彻上彻下的独立自足不同，但它可以为儒家吸收。牟宗三说，儒家和道家的治道都是至高的境界，“德化道化之治道方可说是神治天国境界，因为它能推开让开而落实在各个体自身上。物各付物，归于现成。神治宇宙万物亦不过如此。故无论德化道化，皆须法天”<sup>22</sup>。这种“神治天国”的境界是超政治的，具有教化的意义，因此，“在道化与德化中，人民在以前说为‘天民’，而不是国民，亦不是公民。国民，公民，与权利义务同，都是政治意义中的概念，”“政治的意义与教化的意义并不冲突对立，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要转出政治的意义，必抹杀或否定教化一层的意义”<sup>23</sup>。

在治道上，徐复观的观点可以与牟宗三相互印证。徐复观认为，中国政治在历史上存在一个基本矛盾，在政治理念上是以民为主体，在政治现实上又是以君为主体，这就使所谓“二重主体性”。儒家道家的治道同样体现在对君权的限制上，但是限制君权的方式是“认为人君之成其为人君，不在其才智之增加，而在将其才智转化为一种德量，才智在德量中作自我的否定，好恶也在德量中作自我的否定，使其才智与好恶不致与政治权力相结合，以构成强大的支配欲。并因此凸显出天下的才智与好恶，以天下的才智来满足天下的好恶，这即是‘以天下治天下’：

而人君自己，乃客观化于天下的好恶之中，更无自己本身的才智与好恶，人君自身，遂处于一种‘无为’的状态，亦即是非主体底状态。人君无为，人臣乃能有为。这才是真正的治道”<sup>24</sup>。徐复观的落足点是在“无为而治”上，认为这一点儒家与道家是一致的。

牟宗三认为，法家的治道直接涵有政治的意义，但是法家的治道又是一种所谓“物化的治道”。法家主张“为政以法”，强调政治运用的客观性而不向主观方面的个人人格方面用心，强调事功，“‘为政以法’的治道，确是直接符合政治的意义，因为政治运行的范围就是共同事物的领域，政治的本质就是客观性的，依法而行的东西。所以‘为政以法’的治道是表现‘客观精神’，不表现‘独化’的天地精神，是已达到政治意义的境界，而不是超政治的境界”<sup>25</sup>。

但是，法家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如果法家只求自己限制住事功，即无害而有益。法家前期李悝商鞅即是如此，而后期的法家如韩非在治道上成为“物化的治道”，顺抬高君权和君主专制的政体走，同时以道家之道为体：

反贤，反德，反民智，反性善，进而反孝弟，反仁义礼智。如是人性只成一个黑暗的，无光无热的，干枯的理智，由此进而言君术，遂把道家的道吸收进来以为“体”。如是，心只成一个虚极静极而一无德性内容的玻璃镜子，以之运术而行法。

这个“物化的治道”是专制的和极权的：

法本有普遍性与客观性，以及整齐划一性。然前期之法家之法只限于共同事物领域之内，并未越其畔以笼罩划一切。今韩非顺此普遍性与客观性之法而笼罩划一切。因为君的无限之术府涵盖一切，而其工具又只是法。

如是整齐划一之法由术府中压下来而昏暗了一切亦即物化了一切。如是，人

民就只成了“物民”，乌狗，黔首<sup>26</sup>。

牟宗三批判说，韩非之教是极端愚民，独裁和专制之教。

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是道德政治，这也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立场，然而，现代新儒家也认为，简单的道德政治是不够的。从牟宗三的论说看，所谓政道治道，不过是关于中国政治的君主专制事实与士大夫政治理想的关系的另一种说法。牟宗三的说法是，儒家和道家的德化的和道化的治道是超政治的，而法家的政道虽然函有政治的意义，但是又是纯然物化的，背离了治道的意义。徐复观的理论与牟宗三略有不同，但是也同样以对君权的限制作为治道的主要内容，并且都以此作为民主的一种存在方式。因此，所谓“治权民主”的说法，倒不是为传统的君主专制政治而是为中国文化精神的辩护。但这个“治道”已经由一个政治概念转化成为了一个文化上的概念了。

### III. 治国之道：“德治”抑或“法治”

将牟宗三政治哲学的“治国之道”比较于西方政治哲学，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在由于在人性理解前提上所表现出的分歧，其治国之道“治道”也很不相同。与牟宗三提倡的“性善”前提下的“德治”不同，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方面相信人性是善的，这既可以从看成是从基督宗教预设人趋向完善的内在根据出发的，也可以看成是基于近代西方人文主义者如卢梭等人所宣扬的“自然权力论”和“天赋人权观”所孕育出的一种理想主义表达。另一方面，在西方的自由主义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它同时更正视人的罪恶性和堕落性，也就是对于“人性恶”的方面有极深刻的了解和足够警惕。因此这种自由主义对人类的未来既是抱持着希望的，同时这希望主要地不是流于无限乐观和自信，相反，它是一种充满了

“戒慎恐惧”的希望。

学者何信全也曾经评论，西方的法制传统以“人性恶”为逻辑起点建立了先进的法治模式；而中国的法制传统以“性善论”为逻辑起点建立了人治的模式。说：

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对政治生活中的人性，抱持悲观态度，因此导出法治观念，要透过法制的安排，来限制政治人（political man）为恶。然而儒家对政治生活中的人性，则抱持乐观态度。此种乐观态度，表现在由性善论推导出德治。德治一方面相信一般人民可以“导之以德”，犹如“草上之风必偃”；另一方面亦相信政治人物会“为政以德”，“子帅以正”。在这种政治生活中天理必胜人欲底乐观预期之下，使得法治观念毫无落脚之处。……对人性过于乐观，使儒家政治哲学难以转出人治的格局，这不能不说是性善论一项负面效应<sup>27</sup>。

笔者以为，何信全先生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推进现今中国的法治进程，必须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克服“性善论”的弊端，摒弃传统德治文化的糟粕，中西结合，是中国法治的必经之路。至少以下几方面，我们必须予以足够重视：

首先，树立依靠理性，科学的法律制度制约权力的观念。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而权力是恶的平方，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防恶的目的，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在于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西方的这种价值理念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经基督教“原罪说”的深化，至洛克，孟德斯鸠，卢梭集大成。对人性的不信任，依靠理性，科学的制度约束权力贯穿了法治的始终<sup>28</sup>。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对权力依靠道德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但是，人性在现实中受客观环境的限制

及自身各种自然欲望和心理素质的限制，使人性的向善之力较之趋恶之力要脆弱的多。所以，中国的法治必须借鉴西方的法治经验，树立依靠法律制度约束权力的观念。以理性，正义，科学为依归的法律制度是推进法治进程的有效工具，因为制度的趋善要比个人的趋善要坚强的多。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权力为恶的可能性才降至最小。在法律制度健全的前提下，才能切实推进法治进程。

其次，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合理界定指导法律的道德范围。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是达到一定道德目的的手段。因而法律必须服从道德。不道德的法律可能就不配称作法律，西方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强调它是“自然正义”，是如自然科学定律一样的纯粹理性。所以指导西方法律的道德是理性，正义，公平，体现于法律之中则在于重视个体之间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与西方相比，受“性善论”影响，传统中国认为“善”是一种价值体系，符合善的便是道德的。所以，中国的道德与西方的道德有本质的不同。

中国的道德至上，一开始就是宗法至上，是重亲疏贵贱尊卑长幼之分而否定平等，自由，权利的道德。它首先是人的情感，本性而非客观，以此为基础的法律自然缺少理性。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流弊，必须把握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不能脱离道德，指导法律的道德只能界定在公平，正义，理性而非其他。法是从国家立场出发对人们行为的评价，包含着立法者关于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必须纠正人性善造成的不重视个人正当利益，轻视个人尊严，价值和权利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认识到法与道德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重视法治建设的前提是加大经济基础的投入，这样才会推进社会的法治建设。

再次，克服人格的附属，不独立，不自由之弊，建立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下的人

格制度。西方的法律秩序，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虽然有变革，但基本上可以视为商业性，市场性法律秩序。这种法律秩序注重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人生来都应有基本的权利，任何人只要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则处于可与任何人订立契约，独立处理自己的权利义务，互相有偿给付利益的平等地位。这种法律秩序是西方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在中国则不然，在封建社会，长期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自闭体系，根本无法形成正常的商品生产交换关系。经济条件本身不具备，“性善论”等统治思想长期对民众的麻木，造成中国法治的积弱积贫局面，因此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身份或人格从未在中国真正确立。因为这种身份或人格不存在，所以现今的法治才要靠外力来改变。借鉴西方法文化，重心在于强化个人权利意识，培养民法所要求的人格独立。个人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观念确立，必然促进社会法治的长足进步。同时也要注意发展市场经济，法律意识及价值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法律意识的根本转变。

法治与德治这两种治国方略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许不可以无条件地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确实，如果社会并不存在或不应当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道德发展方向，德治就被取消了前提或失去了正当性。如果人性是无可救药地糟糕，教育者言行不一，被教育者阳奉阴违，德治就成了自欺欺人，浪费社会资源的闹剧。我们认为，在任何社会的公共领域中都存在着被普遍承认的公共道德，这种公共道德就可以成为民主社会中德治的内容。另外，人性似乎也不像有些论者所想象的那样天生邪恶，人具有一定的自制力，为人类大多数人的幸福和利益实现而行为，乃是道德之为道德的真实意义而为文明人类所

共识，也成为注定要影响每个社会人的基本“文化基因”。而且人的道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和舆论的社会环境，取决于健康德法制环境的建立与有序运行。而德治可以营造一定的社会环境以制约人的道德趋向，培养人的自制能力，使其遵纪守法并提高法律的品质。在这些条件下，德治和法治可以是并行的，并可以得到相互支持的效果。

我们今天谈德治，是不能因此降低对于法治的重视的，不能因此忽视推进法治，甚至滑向牟宗三所主张的先验道德，圣人道德“治化天下”的人治之路。现代的，真正健康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就是要走出新老儒家们预设的“人性善”怪圈，就是要立足社会人类学所理解的现实人性论，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法律制度，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制约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因此法治以及为推进法治而建立的各种制度不能因提倡优良政治伦理和优良政府而削弱其效能与权威。谈德治，不能脱离法治，以德治来取消法治，或者把德治看作是法外之治。德治不能突破法治的原则和规范。这样一些原则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人权等，应当受到维护。这是我们反观牟宗三的新儒家政治哲学的“治道”观应该得出的基本结论。

#### 注释\*

<sup>1</sup> 华侨大学。

<sup>2</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1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3</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1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4</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10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5</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19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6</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21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7</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22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8</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22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9</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22-23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10</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23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11</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23-24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12</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24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13</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28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14</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28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15</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29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16</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28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17</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30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18</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31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19</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31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20</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33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21</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30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22</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34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sup>23</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37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 <sup>24</sup> 牟宗三：《儒家思想与自由民主人权》，225页，台湾学生书局，1988.
- <sup>25</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40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 <sup>26</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41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
- <sup>27</sup> 何信全：《儒学与现代民主——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125-1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sup>28</sup> 如亚里士多德早已经明确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并对法治的内容及其作用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他指出，“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在这里，亚氏已经指出了法治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守法的绝对性。



## 反省的现代性：从《坂上之云》看现代中国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席伟健<sup>1</sup>

### 摘要

《坂上之云》原为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所撰以 1904 年日俄战争为题材的小说，2009 年 11 月底，该小说作为“大河剧”被搬上电视荧屏。通过这样一部艺术作品，观众可以透析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相关政治价值变迁。作为亚洲最具有经济实力的现代法治国家，日本在其现代转型过程中曾经有过许多值得当代中国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明治维新所创造的近代日本社会的悲剧命运——在技术、制度上迅速实现转型的日本，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战争的灾难带到亚太广大地域；不过，在战争的废墟上，日本又得以迅速崛起。在上述历史现象中，除了外界因素的影响外，对于其本国既有政治传统的进一步发掘，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理论上的探索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坂上之云、现代中国学、反省的现代性

### I. 所谓“司马史观”与日本近代的相关思想问题

《坂上之云》原为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所著，以 1904 年日俄战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故事的主线为来自四国松山的三个青年——分别加入日本帝国海军和骑兵队伍的秋山好古，秋山真之兄弟以及新时代文艺的倡导者正冈子规——在明治时代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通过这三个不同个性的历史人物，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明治时期洋溢在日本整个国度上下的那种朝气蓬勃，奋发图强的“乐天主义”国民精神。2009 年 11 月底，该小说作为与经典的 NHK“大河剧”具有相似性质的特别剧集被搬上日本的电视荧屏。通过这样一部艺术作品，观众可以了解到 100 年前的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相关社会文化价值的变迁。总的说来，这部将于 2011 年底放送完毕的电视剧集所要传递给

观众的信息与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曾经鼓吹过的观点类似，即从本国的传统政治中实现一种朝向现代政治的扬弃，或者说干脆按照西方列强的发展路径，为本国量身打造一种适合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政治价值观，让衰朽的传统农业国迅速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根据历史的事实来看，日本很快做到了这一点，而中国却积贫积弱，一再错过历史的机遇。

在当今中国近代史的叙事话语中，公元 1895 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由这一历史事件起，从满清统治集团内的开明士大夫到中国底层知识分子及普通士绅，对于大清王朝居然被后来居上的日本击败并被迫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这一残酷事实，纷纷产生“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感，并进而认识到，北洋水师失败的缘由已不仅仅局限在所谓的器物层面了，社会舆论乃至统治层内部

批判的矛头开始指向清王朝的统治体制。在“中体西用”的喧嚣中，国内众多知识与政治精英所追求的目标触及更深层的所谓“国体层面”，于是“制宪法，开议会”等主张登上历史舞台。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戊戌变法昙花一现，迅速被清廷保守派镇压。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更成问题的则是，对于这一连串的历史屈辱，论者或是简单地归咎于慈禧太后等保守派的顽固不化，或是就签订了《马关条约》的李鸿章的私人节操问题大做文章。相形之下，对于日本成功实现近代化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深层原因，却鲜有真正透彻的反思。

作为亚洲最早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现代转型的国家，日本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曾经有过许多值得中国借鉴的教训——在技术乃至政治，社会制度上迅速实现现代转型的日本，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一种“普世战争”的形式将灾难带到亚太广大地域，最终也让自己的现代化进程遭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尽管如此，作为研究现代中国学的学者，我们还是不能过于放大日本传统政治及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而必须积极研究同样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何以较中国更加适应现代转型这一宏观的社会问题。

学术无法脱离现实。在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上，普通人未必能与专家学者一样做思维的深度探险，在公共领域内对普通人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艺工作者。因此，从艺术作品的角度去理解，反思中日两国在现代转型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总体上更有说服力。

回到《坂上之云》这部小说，其作者司马辽太郎作为一个作品发行超过两亿册的作家，他在日本读者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出了其他国家人的想象。日本学者中村政则认为，现在日本有些人对于司马辽太郎开始有了卡里斯玛式的所谓“司马神格化”崇拜举动，甚至有人（立花隆氏）认为“司马辽太郎超过了司马迁”——当然，这种夸张的褒奖之词显然违背了司马

辽太郎先生给自己起这个笔名的本意<sup>2</sup>。同时，很多日本学者对于中国人很少有人研究这个作家的思想，也都感到非常奇怪。

概括地说，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这部小说里所要表达的精神就是一种自尊自强的现代国民精神，而他对这个问题的思索，来自于他亲身的经历和对日本文化的思考。出生于1923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算是德富苏峰所寄予殷切期望的“大正青年”——的司马辽太郎曾经作为装甲兵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场战争对于他的创作人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终其一生，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就是：“日本民族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民族变得不明智了呢？”“日本是什么样的人？”总之，这些问题与孕育出了歌德和贝多芬，由一部民主宪法维护的魏玛德国何以蜕变成了纳粹国家一样难以琢磨。因此，他认为“昭和初期是日本近代的异胎”<sup>3</sup>。司马辽太郎在他的小说中没有告诉读者日本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因为他毕竟不是专门做理论研究的学者，但是，由于他的作品广受欢迎，他对日本二十世纪历史的总结——“光明之明治”，“幽暗之昭和”却深入人心，所以不可避免地与军国主义混杂在一起。他的这种史观，被简称为“司马史观”，尽管同时遭到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攻击，在日本社会还是受到广泛的欢迎。

众所周知，旧式的武士集团转变为引导日本进入近代的主导力量，因此，依照丸山真男教授的观点，这个统治集团在引导日本建设近代国家的时候，有选择地根据日本的统治需求来选择学习什么而不学习什么。日本学者莲见和男曾经评价说：日本四面环海，总是借助外来的力量进行改革，从内部未曾发生完全成熟的革命<sup>4</sup>。这个评价触及到了关键——固然，日本的国门是由佩里于1853年打开的，但是在明治维新后，由于认识到两国体制与国情的巨大不同，在学习西方近代化的过程中，在政治、法律和军事上，日本迅速转向德意志帝国，于



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在对宪政的本意并未厘清的情况下号称开始宪政建设。因此，日本的近代化恰恰在最重要的心智和思维习惯方面，没有实现竹内好先生所说的“回心”与“抵抗”，只注重学习表层的西方技术，文化和行政管理的制度，对于深层的思想大传统，完全没有实行深入的了解与把握。它在用虚构的意识形态——即要求重建亚洲新秩序，建立黄种人的“大东亚共荣圈”——来为侵略战争提供合法性证明时，早已在灵魂上成为西方那种偏执狂式的理性主义政治的俘虏。从这个层面讲，体现在《坂上之云》中的那种拥抱帝国主义模式的激进民族主义喧嚣，是20世纪现代性政治的危险产物，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用司马辽太郎先生的话来说，使“光明之明治”变成了“幽暗之昭和”。

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中，用一种类似于史诗般的恢宏气魄和大历史的视角，作了一个文明发展史的有趣对比：日俄战争之于日本，恰如1812年的卫国战争之于俄罗斯，而遵循相同的逻辑，俄罗斯在卫国战争胜利之后，击溃了拿破仑帝国，并以泛斯拉夫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为它后来的克里米亚战争正名——而克里米亚战争，正是俄罗斯帝国旧统治秩序崩溃的起点。日本的20世纪战争史也遵循了相同的发展路径，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发展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意识形态，并在这杆旗帜下对亚洲广大地区发动征服战争，同样地，这样的战争，也给日本帝国的旧统治秩序敲响了丧钟。因此，对于日俄战争的胜利，他引用德富芦花说过的“胜利的悲哀”来形容。一方面，日俄战争的胜利对于日本来说，物质上没有得到来自俄罗斯的赔款，而且日本因为这场战争，几乎打光了家底。另一方面，胜利让日本的军部势力迅速膨胀，损坏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根基，为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埋下了祸根。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辽太郎对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性质，与其文学前辈德富苏峰一样一再强调其是自卫性质的战

争，这种说法对于其他国家的读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缺乏说服力的。其原因在于，俄罗斯的1812年卫国战争当中，确实是拿破仑的侵略大军直接攻破莫斯科，摧毁沙皇的统治，在这个前提下，俄罗斯人民才奋起自卫。而反观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我们至多只能认为它们是日本为了保护，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发动的具有争霸性质，抢夺朝鲜和中国东北作为殖民地的战争。在这一点上，如果将这两场战争的性质看得与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一样的话，只能说这其中掺杂了司马辽太郎本人太多的民族情感因素。由于缺乏对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性质的准确把握，司马辽太郎与其德富苏峰一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军国主义的套套逻辑（tautology）。

在一些研究司马辽太郎先生文学作品的中国学者当中，他们利用左翼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对司马史观有诸多误解，普遍认为司马史观有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嫌疑，甚至在日本本土，2009年底当《坂上之云》剧集上映的时候，仍有愤怒的观众致信NHK电视台，询问播放这样的给军国主义唱赞歌的电视剧的原因。关于司马史观，笔者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是根据目前所查阅过的资料来看，司马辽太郎并不是一个眷恋军国主义的文人。他对战争的厌恶，完全是真诚地出于自己的内心，加上他青年时代也饱受战争的苦痛，因此没有证据表明他是一个军国主义者。那么，为什么在谈论到日俄战争这个历史问题的时候，《坂上之云》字里行间却表现出了一种莫名的激动呢？司马史观当中的这种文学断裂，如果联系到另外一个日本作家，即竹内好先生在对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不同态度，或许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个问题。竹内好先生是日本研究鲁迅文学的权威人物，也是一个非常热爱中国文化的人，对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他始终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但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后，他不禁为这场在他看来是人种之间的战争大幕拉开而感到激动。竹内好与司马辽太郎

两人身上同样出现的这种文学思想的断裂，在于他们对于现代性本身的把握不足有关。相比之下，中国的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由于受到章太炎的影响，他对现代性的把握更加谨慎，深刻。

## II. 留日期间的鲁迅对于现代性精神内核的把握

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写过的一篇叫做《破恶声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对当时世界上流行的两大思潮进行了批判，一是激进的民族主义，一是激进的世界主义。对于激进的民族主义，鲁迅归纳了其三种主张：破迷信，崇侵略，尽义务。由于《破恶声论》是一篇没有完全写成的文章，鲁迅在文章中主要批判了前两个主张。尤其是关于表现为“崇侵略”的主张的民族主义，鲁迅很不客气地用“兽性之爱国”这样的用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这种激进的意识形态，其外在表现为“势力盛强，威足以凌天下”，其内表现为“孤尊自国，蔑视异方”，且“执进化留良之言”的文化优越感，自以为占据着文明“进步”的制高点，实质却在于“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鲁迅不满于19世纪西方殖民/帝国主义表现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上的野蛮征服和主从逻辑，认为它是19世纪的西欧文明和亚洲旧传统的问题之所在<sup>5</sup>。

关于鲁迅早期思想的研究，在资料的发掘，考证和阐发方面做得极为出色的学者，莫过于伊藤虎丸先生。在他的名著《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中，他从探讨亚洲不同于西方的近代（现代）性，或者说是从探讨亚洲不同于西方的近代（现代）的独特性的角度探讨了鲁迅的独特价值，认为鲁迅的价值就在于他形成了一种“真正的个人主义”，即“个”的思想。这一思想主要是通过鲁迅在日本留学而与西方近代相遇，特别是与尼采的个人主义相遇而形成的，并构成了后来鲁迅思想

和文学的原型的“原鲁迅”<sup>6</sup>。

《破恶声论》里所指的“恶声”，恰恰是指中国在面对欧风美雨时所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主义”话语。不论是洋务派，科学救国派，启蒙派，革命派，还是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甚至包括无政府主义等等，看起来很热闹，弄到最后还是一个吵吵嚷嚷的“无声的中国”。恶声扰攘的中国，却是一个“寂寞之境”<sup>7</sup>。无论那个派别的学说主张，在当时的青年鲁迅看来，都根本没有触及现代化的本质，即人之现代化。鲁迅的思想直觉觉察到，与其说人类冲突起源于国家和政府，不如说隐伏于人类的原始本能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改造我们自身，使每一个人成为“人各有己”，“朕归于我”之人，比反对国家和政府，搞暴力革命和夺权更为根本。没有实现这种转变的国家，在现代转型过程中，蓬勃昂扬的国民精神不可避免地要混入“兽性爱国”的杂质。被这种偏激的文明观教育出来的国民，往往“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嫌也”<sup>8</sup>。相形之下，中国的志士仁人，民族主义者一样逃离不了“兽性爱国”的局限——如果说“兽性爱国者”是自我崇拜的话，而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则最崇拜西方的强大国家，同时还瞧不起与中国一样落难的文明古国，诸如印度。鲁迅把这种现象叫做“侮胜民”。这种心态，鲁迅在若干年后的《阿Q正传》里，曾经有过入木三分的刻画。不过，当时世界的舆论环境是容不下鲁迅特立独行的思考的，流行的观点将帝国主义说成是“民族之力充沛于内不得不溢于外”<sup>9</sup>的表现，甚至连孙文都将其视为“民族主义发达的最后阶段”<sup>10</sup>。

鲁迅在处理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问题时，出人意料地把“立人”的主体化构造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这就是他发现了“自省”（“内省”“反省”）的意义，通过它，不仅找到了进入与社会，国家乃至国际等相互关系领域的入口和通道，而且把自足的“立人”构造发展为一种开放的，关涉社会，国家关系的“相互主

体性”(inter-subjectivity)格局<sup>11</sup>。鲁迅所强调的“自省”并非儒家式的“内省”“自修”，而是在相互关系中的主体的精神“再自觉”；其触角不仅指向自我，而且指向社会，国家，指向一切相互关系。也正因如此，它才可以克服单向主体化方案的弊端，通过执着相互性而给人以消灭主从关系的希望。

正因为如此，青年鲁迅当年就提出，吾辈青年之要务，在于“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也就是说，让每个中国人经过教育，实现“良心上的自由”，对事情的判断依靠自己健全的常识和理性来进行，而不依附于任何外在的权势。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和“立人”的思想都受到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但是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民运动核心在于建构现代国民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是以个人对于群体，国家，民族的义务的国民公德为本位的，也就是他所说的“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sup>12</sup>。而没有个人之自由的自由，一方面会压抑了坚守独立的个体的创造性，降低社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则可能造成一种披着“民主”外衣的新形式的专制与极权，因而只能是一种伪自由。这种思想根源上的区别，正如伊藤虎丸所把握到的，鲁迅在尼采等大哲的学说中把握到了一种完全与东方文化传统不同的异质性思想内核，即真正的“个”的思想。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鲁迅提出实现现代转型的根本要求就是“立人”，即塑造越来越多的具备独立人格，有公共责任精神，有文化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大写的人”出来，要求唤醒每个中国人的“心声”，唤醒他们的良知——不是作为启蒙者，而是作为共鸣者——以打破清末中国所呈现的“寂寞为政”的局面。可以说，鲁迅在早年的这个主张，与他以后的文学战斗生涯相比较，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什么是“寂寞为政”呢？概括地说，这里的“寂寞”，就是晚清思想家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所指出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社会舆论环境。在统治

者层面，一方面是官员越来越脱离实际，为政绩一心逢迎，以上司的是非为是非，对下则脱离民众，不愿倾听底层的声音，甚至压制利益表达；另一方面是官员群体中政治修辞传统的丧失，官方意识形态对于解决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不再有效，对于这个情况，官员也鲜有抱实用主义的态度加以改革的。社会出了问题，不是欺骗就是弹压，导致政府与基层信息沟通不畅，出现所谓“寂寞为政”的局面。

至于在草根民众的方面，就是普遍丧失了公共责任心和德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于社会事务永远是“各扫门前雪”。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指责民众，将之归因于所谓的“国民劣根性”。但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典章文物，礼仪诗教，一度让周边国家的万民为之醉心，四夷来朝的景象在历史上也曾经一再出现。那么，我们这个国家既然曾拥有如此辉煌的历史，其国民何以会有“劣根性”？问题的根本，首先恐怕还得归于统治者。也就是说，统治者的行为模式对于被统治者，永远是“风行草上，必偃”。然而，这需要坚实的社会制度条件：首先，执法部门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否则会做不到秉公执法，群众也不会服膺，社会正义就会一再受到伤害；其次，媒体要有一定独立的地位和权力，对政府行为有一定的监督权力，不会受到权力的肆意干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加强公民教育是任何一个现代法治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能，公民没有公共精神，政府难辞其咎。一言以蔽之，一个现代化强国，靠一群自私冷漠的臣民，甚或叫嚣“强权即公理”的“霸者之民”，都是建设不了的。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法律条件或许已经得到充分的重视，但是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法治所仰赖的道德条件，则需要我们重新加以审视。

回到《坂上之云》，这样的小说在今天的日本社会之所以还能受到欢迎，与日本当前的社会心理不无关系。从日本目前所面临的诸种困境来看，终战后美国带给日本的“胜利的悲哀”——即美国为日本量身定做的美式宪政体系，

并不是那么完美的，实际上，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的政治哲学从来没有许诺要开启一个美丽新时代的开端，它只是要求达到一个最低目标即可，即便未来意味着所谓“末人”时代的到来，也不再允许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全球雄心的国家。甚至连好莱坞的导演对于日本传统的湮没也于心不忍，利用汤姆·克鲁斯的《最后的侍》来传播这样一个理念：即在这个消费社会的大环境下，作为“最不坏的制度”的自由民主体制所带来物质的虚荣与思想的矮化却足以湮灭一个传统社会的美德与力量。因此，日本在败战后所失去的，不仅仅是军部法西斯主义的制度，也包含有其独特的文化伦理传统，我想大多数日本读者在《坂上之云》中感到富有共鸣的，也正是明治时期日本人身上所具有的乐观向上，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这个精神的重振，对于日本走出当前的困境来说是必需的。

1959年，法国后现代政治思想的宗师，著名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到达日本后，对日本人的历史与伦理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古代武士据以生活的尚武精神有些类似于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中主人的箴言：战胜或者死亡<sup>13</sup>。在那里，科耶夫洞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充盈着“主人道德”的德性。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拉认为，虽然武士最充分地体现了冠于其名的伦理准则，但它决不仅限于武士阶级。明治维新后，这种传统的统治阶级的伦理流布到整个社会，形成了强大而危险的为共同体体现身的臣民德性——当然，它决不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现代城邦的“公民美德”，而仍是一种利用传统伦理的话语来掩饰的20世纪极权主义与政治虚无主义的集中表现。

### III. 社会学的启蒙：与文学作品保持知识学的距离

在这里，“社会学的启蒙”这个表达法可能涉嫌不够严肃地照抄了德国社会学家尼可拉

斯·卢曼所喜欢的用语。在这里笔者用这个术语所要表达的意思远没有卢曼本意那么深刻：笔者的意思是，对于作家，在进行涉及重大历史问题创作的时候，必须要有自我反省，自我检视的意识，要意识到自己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要远远大于论述同样问题的专业学术著作，要与自己所论述的对象保持知识学上的距离。如果没有这个反省的态度，那么文学的虚幻与历史掺杂在一起，必然会导致谬种流传。而对于广大读者，也要逐渐开始有意识地增进对社会科学基本研究方法的了解，在阅读这样的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增强自身的鉴别和批判能力，否则就会失去反省的诉求。需要坦白的是，中国现在很多作家，影视制片人在处理抗日战争这个历史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也同样存在不够严肃，欠缺自我反思，批判能力的现象，对于历史本身不够尊重，导致民众关于抗日战争产生了错误的观念。这样一种对于艺术作品进行有意识地批判鉴赏的能力，其重要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凸显出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司马辽太郎先生一再强调其作品忠于史实，却仍然发生了这样令人感到遗憾的事的根本原因。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研究现代中国学的学者，在考察现代中国发展现状的时候，也应该摘除所谓“东方主义”的有色眼镜，与研究对象保持知识学上的距离——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辽太郎先生在发表过的《文明与文化》这一演讲中，在论及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时，也同样令人遗憾地表达了一种错误的观点。这个错误与他在《坂上之云》中所犯的错误，根源是一致的。

德国社会学家舍勒提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把握，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现代现象是一场“总体转变”，包括社会制度（国家形态，法律制度，经济体制）和精神气质（体验结构）的结构转变。舍勒提出，现代性是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现代的精神气质体现了一种现代型的价值秩序的成形，改变了生活中

的具体的价值评价<sup>14</sup>。从《坂上之云》所描绘的“光明之明治”时代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在那个转型时期体现在普通日本国民身上的精神气质的转变，确实是非常鲜明的。然而，至于“光明之明治”在经历了大正时代的短暂繁荣后，为何会走向“幽暗之昭和”，也是司马辽太郎先生一直苦苦求索的历史难题。日本的败战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较，都可以说是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整个民族国家所遭受到的重大挫折，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历史事件都揭示了同一个道理：现代转型不仅仅意味着技术与政治，社会制度上的转型，更重要的是社会成员在精神气质和文化上的转型，简单的工业化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现代化的“半途而废”，在这个基础上，当代社会理论学界的学者普遍认为，对于现代化，我们早已应该持一种反省的所谓“二阶观察”的态度。也就是说，所谓的“反省”，不仅仅应该体现在社会运行机制上，也要体现在社会成员的教育上——前者属于如何利用社会来制衡国家的问题，而后者则属于如何改进当下的公民教育，营造良好社会文化氛围的问题。

鲁迅是中国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他是一个反启蒙主义的启蒙者，一个反世界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一个反民族主义却捍卫民族文化的人物，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物”。这些悖论式的表达不是标新立异的修辞，它们显示的是鲁迅的基本态度：自由平等，扶弱抑强和久远的传统是人之为人的基础和前提，为了捍卫其价值，就必须拒绝将这些价值纳入现代权力关系的图谱之中。他所谓“人国”（《文化偏至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的那种彻底抛弃传统的大同世界，也不是民族主义者设想的建立在民族异质性与领土管辖权相互重叠之上的国度。“人国”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状态和产物<sup>15</sup>。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的方法具有其典范意义。鲁迅在27，28岁的时候，就把创造一个“有声的中国”——也即“人国”的诞生——看成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他对中国

革命的理解，他对文学的理解，他对人之为人的理解，都需要回到这个出发点上去认识。“寂寞为政，天地闭也！”没有心声，世界也就消失了。在一定意义上，这正是一个中国心灵对于“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独特追问<sup>16</sup>。我们现在接着鲁迅的发问去考虑现代中国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就是要将启蒙时代那种对于人类理性无限乐观的启蒙——这也是明治初期“乐天精神”的内核——置于一个二阶观察的境地，即我们对于启蒙本身的认识也要启蒙，要利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启蒙。也就是说，我们在争论 Intersubjectivity 到底是翻译为“主体间性”还是“相互主体性”的时候，有关哈贝马斯与卢曼那场世纪论战，看看是否需要我们再退一步地遵循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去还原，反省：主体这个概念到底该如何运用？如果哈贝马斯所期望的共识无法达成，那么我们如何面对当前这个咄咄逼人的风险社会？

相比之下，为什么鲁迅关于现代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要比司马辽太郎更值得认真对待，笔者给出的理由是，鲁迅因其独特的生活经历，文化直觉与知识背景，不自觉地与情绪化地观察社会的思想倾向保持了知识学上的距离，他相对而言比较准确地把握了现代性的精神内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笔者认为他对启蒙主义的谨慎态度，堪与17世纪意大利先哲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相提并论。

在鲁迅看来，改造社会的希望宁可寄托在身怀“白心”的底层民众身上，也不能指望以哗众取宠的文字来“启蒙”民众的所谓新型知识人身上，因为他们会不加选择地把现代性的精髓和毒液都灌输到民众的脑子里。相同的观点，尼采也曾清楚地表达过：“无学问的下层阶级现在是我们的唯一希望。有学问，有教养的阶级，以及只理解这个阶级并且自己就属于这个阶级成员的教士们，必须一扫而光。那些仍然知道什么是真正需要的人也将意识到对他们来说什么是真正的智能。无学问阶级被现代教育的细菌感染败坏才是最大的危险”<sup>17</sup>。讲句题

外话，如果将这个主张与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联系起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理念上的惊人一致，即相信常识，相信一般民众的良心自由。这个联系，恰恰是个体理念与制度设计理念的有机联系。

涉及艺术作品与公民教育的问题，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曾经表示过，我们遵循一种“种族中心主义”，要不断地扩大“我们”（WE）的范围，扩大共识，同时一定要坚持，一个值得欲求的社会形态必然是要远离残酷的。他认为文学作品必须要有这样的作用，否则就是不合格的。所以，如果司马辽太郎先生在片面强调日俄战争那虚幻的防卫性质的同时，能够体会到中国东北土地上遭受战争痛苦的人民的感受，那么他可能会像托尔斯泰那样对战争本身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不至于产生前面所述那样的文学断裂。一言以蔽之，那个文学断裂来自社会科学知识的欠缺。

前文提到的鼓吹人类历史归宿为所谓的“普遍均质的现代国家”的科耶夫把日本当做后历史社会的“人类”典范——即一个在“无理由的否定”形式中再一次发现否定性的社会。对于这个不太容易理解的评价，笔者从现代哲学的存在主义向度看这种古老的武士伦理：这种无理由的否定，也曾经存在于中国的历史叙事中，尤其是先秦时代，这甚至可以被看作为一个民族的“绝对精神”乃至灵魂的嬗变。虽然这种精神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上的奢侈品，但是反省的态度要求我们必须尊重它，发掘它，利用现代的科学考察工具让它焕发新生，而不是继续在消费社会的大潮中随波逐流。

回到《坂上之云》这部电视剧集，笔者在观看它的时候，就可以隐晦地感觉到其中所蕴含的危险倾向。关于作者，我们只能说这个危险倾向来自于他的无心之失，我绝不认为作者有意利用文学作品传播军国主义思想。因此，对于涉及到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探讨，必须尽可能地利用现有的社会科学研究工具与方法进

行辨析，对话，任何道德化，审美化的认识，必将会引导人们重新走进历史的误区。

#### 注释\*

- <sup>1</sup> 天津行政学院
- <sup>2</sup> 中村政则「司馬史観をどう見るか—歴史と小説」，米欧回覧ニュース第12号，平成10年8月30日。
- <sup>3</sup> 中村政则「司馬史観をどう見るか—歴史と小説」，米欧回覧ニュース第12号，平成10年8月30日。
- <sup>4</sup> [日]莲见和男：《对天皇制的神学批判——基督的王权与世俗的王权》，引自[日]土肥昭夫等著《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天皇制和基督教》；杨熙楠，铃木正三主编；查常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350~351页。
- <sup>5</sup> 高远东：《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找支援》，《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7期。
- <sup>6</sup> 王晓初：《“原鲁迅”：在承传与超越中的跨文化对话》，《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五期。
- <sup>7</sup> 汪晖：《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鲁迅的〈破恶声论〉》，《开放时代》2010年10月，101页。
- <sup>8</sup>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32-33页。
- <sup>9</sup> 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20页。
- <sup>10</sup> 崔书琴：《孙中山先生与共产主义》，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年版，第77页，转引自陈志让：《军绅政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 <sup>11</sup> 高远东：《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找支援》，《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7月。
- <sup>12</sup>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223页。

- <sup>13</sup> [加拿大]莎蒂亚·B.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学的根源》，赵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86页。
- <sup>14</sup>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16页。
- <sup>15</sup>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56页。
- <sup>16</sup> 汪晖：《声之善恶：什么是启蒙？——重读鲁迅的〈破恶声论〉》，《开放时代》2010年10月，111页。
- <sup>17</sup> 参见《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笔记选》，上海三联版1993年版，田立年译，118页，转引自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书屋》，2000年10月。

## 中国テレビドラマというプリズム

### — 『裸婚時代』 から見る転型期社会における婚姻をめぐる諸問題 —

楊 韜<sup>1</sup>

#### 要旨

経済の著しい発展とともに、現代中国では新しい社会問題が次々と浮上している。そのなかでも、「裸婚」という社会現象は注目されている。これは、単に中国人の価値観が変化しただけでなく、経済の急成長による貧富の格差の拡大や、都市部における不動産バブルによる住宅購入難などの問題とも直結しているからだ。本稿は、テレビドラマ『裸婚時代』を対象とし、登場人物の婚姻観及び彼らの間に起きた衝突現象を分析し、転型期社会における婚姻をめぐる諸問題を考察する試み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中国テレビドラマ、80 後、裸婚、住宅問題、婚姻

#### はじめに

本稿は、中国テレビドラマ<sup>2</sup>というプリズムを通して現代中国の社会問題、とりわけ「転型期」と呼ばれる現在における婚姻をめぐる諸問題を捉え、ドラマに反映される中国人の婚姻に対する意識、直面する問題点などを考察するものである。

経済の著しい発展とともに、現代中国では新しい社会問題が次々と浮上している。そのなかでも、「裸婚（経済能力を考えず、愛情のみに基づいた結婚）」、「閃婚（電撃婚）」、「瘦婚（スリムな結婚）」など、婚姻に関する社会現象は注目されつつある。これらの社会問題は、単に中国人の価値観が変化しただけでなく、経済の急成長による貧富の格差の拡大や、都市部における不動産バブルによる住宅購入難などの問題とも直結しているからだ。このような婚姻をめぐる社会問題を、今年放送された連続テレビドラマ『裸婚時代』を通して

検討し、それにとまなう社会性を考察するのが、本稿の目的である。

本稿の構成としては、まず中国テレビドラマに関する先行研究を整理し、ここでの狙いを明白にする。次に、テレビドラマ『裸婚時代』の概要を紹介し、テレビドラマの「現実性」について説明を加える。そして、登場人物の相関図に基づき、主要キャラクターの婚姻観を分析する。最後に、いくつかのシーンを取り上げ、登場人物の間に起きた衝突現象を分析し、転型期社会における婚姻をめぐる諸問題（とりわけ住宅問題や医療サービス問題）を捉え、その背景、及び現代中国社会全体との関わり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 I. 中国テレビドラマに関する先行研究と本稿の狙い

中国で作られているテレビドラマのジャンルについて、Zhong Xueping はその近著のなかで、「帝王劇」、「反腐敗劇」、「青春劇」、「家



庭婚姻劇」などを取り上げ、それぞれの特徴を論じている。中国でのテレビ視聴行為については、Lull (1991) のような先駆的な研究がある。一方、日本でもそれほど多くはないものの、中国の社会構造や1980年代以降の社会変遷についてテレビドラマを通して分析する研究はある。たとえば、石井 (2005)、文 (2005a, 2005b)、周 (2008, 2009) などが挙げられる。また、南 (2010) はテレビドラマの分析を通して近年の中国における「新歴史観」の浮上とその背景について考察している。

これらの先行研究が示したように、テレビドラマを通して中国社会を考察するというアプローチは、筆者にとっても大変参考になる。しかし、これらの先行研究のほとんどは、1960年代、1970年代に生まれた中国人を主人公としたドラマを対象にしており、1980年代以降に生まれた世代を主人公とするドラマを扱っているのは Zhong (2010) だけである。周知のように、改革開放以降に生まれた世代は、それまでの世代とは、生活環境、価値観など多くの側面において大いに異なっている。今日においては、「80後」という新語が徐々に定着している。「80後」とは、1980年代生まれの世代を指す。すなわち、中国の改革開放後に生まれ育った世代で、その人口は約2億人に上る。彼らはよく「わがままで忍耐力が無く、無責任、退廃的」と言われている。一方、「80後」の世代は旺盛な消費意欲をもち、現在の中国消費市場の中核となりつつある。親世代からの不評を背負いながらも、彼らは改革開放が30年以上推進されてきた現代中国に生きている。彼らはどのようなライフスタイルをもっているのか。また、彼らはどのような社会的問題に直面しているのか。改革開放後30年を経た中国社会では、「80後」世代をめぐってどのような独特な社会現象が起きているのか。本稿は、「80後」世代をテーマとしたテレビドラマ『裸婚時代』を通し

て、これらの問題について初歩的探る試みである。以下、まず『裸婚時代』の概要について述べておく。

## II. 『裸婚時代』（全30話）の概要

### ●製作について

制作：北京光彩世紀文化芸術有限公司

原著：唐欣恬『裸婚—80後的新結婚時代』

監督：滕華弢

出演：文章（劉易陽役）、姚笛（童佳倩役）、張凱麗（田淑雲役）、丁嘉麗（吳紅霞役）、劉天佐（李冬役）、万茜（陳嬌嬌役）、艾如（孫曉嬌役）ほか

放送：江蘇衛星テレビ初放送（2011年6月11日～6月26日）、インターネット動画サイト「楽视网」にて同時放送

### ●あらすじ

『裸婚時代』は、王易陽と童佳倩というカップルの結婚と離婚を描いたストーリーである。王と童はともに会社員であり、収入は多くないものの都会での独身生活を満喫していた。二人は8年間の恋愛を経て、親の反対にもかかわらず、愛情だけを頼りに結婚した。その後、両親との同居、出産、苦しい家計のやりくり、仕事上のトラブルなど、様々な現実的問題に直面し、最終的には離婚を選ぶという物語である。

## III. テレビドラマの「現在性」と「現実性」

ドラマ『裸婚時代』の具体的分析に入る前に、テレビドラマの「現在性 (nowness)」及び「現実性 (realness)」について述べておきたい。

『裸婚時代』は放送開始から最終話まで、同時期に放送されたテレビドラマのなかで、最も高い視聴率を維持していた。また、テレ

ビと同時に放送されたインターネット動画サイト「楽视网」でのアクセス数（一日単位）は1500万を超えている<sup>3</sup>。そして、大手インターネット掲示板である「百度贴吧」での反響も大きい。放送終了後半年が経った2011年12月現在でもなお、ドラマ『裸婚時代』の掲示板である「裸婚時代吧」では、12892名の「裸迷（『裸婚時代』ファン）」による311946件の書き込みが見られる<sup>4</sup>。

視聴者による書き込みのなかで、「如果我是刘易阳（もし私が劉易陽なら）」、「如果有一个现实版的刘易阳，你会做现实版的童佳倩吗？

（もし現実に劉易陽のような人が現れたら、あなたは童佳倩のようになれるか）」のような意見は多数みられる。ここからわかるように、ドラマを実際の生活とリンクして思考する人は多い。このような書き込みもまた、このドラマのファンたちによるある種の想像的創作である。メディア研究者のジョン・フィスクの言葉を借りれば、ドラマの「脚本生産」である。すなわち、「視聴者は作家の役割を引き受け、将来放送されるであろう脚本に反して、自分の「脚本」を書いている。（中略）視聴者によるこのような「脚本執筆」は、現在起っている出来事というテレビジョンの感覚が、視聴者と同じ時間尺度で進行するからこそ可能になるのである」<sup>5</sup>彼らはドラマの中の主人公たちと一緒に生きている（という「現在性」）ともいえよう。なぜ、これほど多くの人々がこのドラマに関心を持ち、ドラマに対する自分の意見や感想を寄せるのだろうか。その原因はやはり、このドラマそのものに潜む「現実性」にあると思われる。テレビドラマの「現実性」について、伊藤守は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すなわち、テレビドラマがドラマであるかぎり、それは「非日常的」な世界（ひとつの「虚構」の世界）であるが、視聴者にとってこのテレビの世界がもしかすると「自分のまわりにも起こ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リ

アルな世界として感受されていることである<sup>6</sup>。とりわけ、「非リアルではあるけれどもリアルな、また逆にリアルではあるけれどもどこかしら非リアルな、絶えず反転していく錯綜した関係の中でテレビドラマが視聴され消費されている」<sup>7</sup>点は注意が必要だろう。

したがって、テレビドラマという「虚構」のものには社会現象のすべてがリアルに反映されているとはいえないが、日常生活から構築され、日常生活と緊密な関連があるとはいえよう。とくに、『裸婚時代』のような高視聴率を得たテレビドラマは、広い階層の人々の視聴によって、多くの中国人の意識に影響を与え、時代の変化を推進するというよう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

#### IV. 『裸婚時代』の人物分析

以下は、『裸婚時代』のテキスト分析を行い、とりわけ登場人物の相互関係、及び彼らの異なる婚姻観念によって生じた衝突について焦点を当てる。具体的には、まず登場人物の性別、年齢、職業、性格、価値観などを詳しく分析することによって、彼らの相互関係図を描く。次に、登場人物をカテゴリ化し、若者、中年、お年寄りの異なる年齢層のキャラクターのそれぞれに、どのような共通点、相違点が見られるのかを明らかにする。

劉易陽【男】：広告会社に勤めるサラリーマン  
童佳倩【女】：車のディーラーに勤めるサラリーマン

陳嬌嬌【女】：童佳倩の「表姉（いとこ）」、黃有為の「情人（愛人）」

孫曉嬌【女】：劉易陽の部下、「富二代（1980年代生まれで、成功した民営企業経営者の子女）」

童建業【男】：童佳倩の父親、「機関幹部」

田淑雲【女】：童佳倩の母親、「機関幹部」（副

- 処長), 定年退職直前  
 劉明【男】: 劉易陽の父親, 工場労働者, 早期退職  
 吳紅霞【女】: 劉易陽の母親, 工場労働者, 早期退職  
 奶奶【女】: 劉易陽の祖母  
 李冬【男】: 劉易陽の同僚, のちに孫曉嬌と結婚  
 王彼得【男】: 劉易陽の同僚  
 杜毅【男】: 田淑雲の同僚の息子, 童佳倩の友人  
 黃有為【男】: 陳嬌嬌の交際相手 (既婚者)  
 特蕾西【女】: 童佳倩の上司 (婚歴不明)  
 魏国寧【男】: 童佳倩の同僚, 特蕾西の「情人 (愛人)」  
 崔彬【男】: 博士, 陳嬌嬌の交際相手 (のちに結婚)  
 劉錦心【女】: 劉易陽と童佳倩の娘

ここでは、ドラマの台詞から主要登場人物の婚姻観を覗いてみよう。まずは、「裸婚」というテーマを表す台詞から見てみよう。第6話では、劉易陽と童佳倩の二人は、ようやく結婚に至ったところ、劉は童にプロポーズをするように迫られた。劉は次のように応じた。

「虽说我没车, 没钱, 没房, 没钻戒, 但是我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 等你老了, 我依然背着你, 我给你当拐杖。等你没牙了, 我就嚼碎了再喂给你吃。我一定等你死了以后我再死, 要不把你一个人留在这世上, 没人照顾, 我做鬼也不放心。(僕には車がない, お金もない, マンションもない, ダイヤモンドの指輪もない。でも, 君と一緒に最後までいる気持ちがある。君がお年寄りになったら, 僕は君を背負っていくし, 君の杖になる。君の歯が無くなったら, 僕は食べ物を細かく嚙んで食べさせる。君が死ぬまで僕は死なない。君一人でこの世に残すのは不安だから。)」このように,

劉易陽は童佳倩を生涯の伴侶として守りたい気持ちを込めてプロポーズした。彼が強調しているのは, すなわち「車, お金, マンション, ダイヤモンドの指輪」など現在の中国では結婚に欠かせないものを一切持たなくても, 愛する心さえあれば相手を幸せ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裸婚」の信念である。しかし第22話では二人は離婚することとなり, 最後の別れの際に互いの気持ちを言葉にしてぶつかり合う。その際に, 劉易陽は結婚が失敗した理由として, 「细节打败爱情。(現実の生活のディテールが, 愛情に勝った。)」と述べている。すなわち, 結婚当初は愛情さえ持っていれば生活が順調に行くと考えたが, 結婚後の様々な現実的問題によって, 家庭を維持していくことが出来なくなり, 失敗したという気持ちの表れである。

一方, 同じ若者でも劉と童と異なり, 「裸婚」の可能性を最初から疑問視する人もいる。このドラマのなかの陳嬌嬌はこのような若者である。童佳倩のいとこであり, よい相談相手でもある陳嬌嬌は, 愛情を信じず, 相手の経済力を恋愛や結婚の第一条件として考えている。第2話では, 彼女は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有钱就有感情啊! (お金があれば愛情が生まれる!)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可以让女人感觉到幸福, 一个是奥迪, 第二个就是迪奥。(この世界には, 女を幸せにしてくれるものは二つしかない。一つはディオール, もう一つはアウディだ。)」ここで言及した「奥迪 (アウディ) は現在中国において最も人気の高級自動車ブランドであり, 一方「迪奥 (ディオール) は知名度が高いファッションブランドとして, 中国の女性に大人気である。この両者はともにヨーロッパ発祥の高級品であり, その所有者はお金持ちとして認識されている。すなわち陳嬌嬌は, このような高級品を与えてくれる人を付き合う相手として考えているのである。彼女は, 童佳倩が劉易陽の

ような経済力のない男性と結婚することに理解を示さない。

これらの若者に対して、中高年の登場人物たちはどのような恋愛・結婚観を持っているだろう。このドラマのなかでは、主人公たちの両親、そして劉易陽の祖母などの役もある。彼らは総じて中国の伝統的観念の持ち主であるが、必ずしもみな一致し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たとえば、童佳倩の父親の童建業は、娘の恋愛と結婚についてかなり寛容な態度をとっている。第1話では、童建業は田淑雲に「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靴のサイズが合うかどうかは、足しか知らない。)」と言って、娘の恋愛と結婚に干渉しないような意見を述べている。また、童建業は劉易陽の人柄に惹かれ、経済力がなくても娘との結婚に賛成している。しかし、母親の田淑雲はどうしても収入が少なく、しかもマンションを所有していない劉易陽を気に入らず、結婚に強く反対した。ところが、のちに童佳倩と劉易陽は離婚し、実家に戻ることになると、田淑雲は二人の復縁に積極的に働いた。第23話では、田淑雲は「什么都得是原配的好。(何と言ってもやはり最初にめとった妻がいい。)」と、一生懸命童佳倩と劉易陽とその娘の家族3人の共同空間を提供しようとした。田淑雲は、娘の気持ちを考えるよりも自分のメンツを優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田淑雲としては、女性は一生に一人の夫とのみ伴うのが理想的であると考え、離婚した場合でも復縁してほしいと願うのである。しかも、田淑雲は娘の離婚を同僚に知られたくないため、嘘をつく。離婚した童佳倩にも「一度離婚した女性の価値は下がる」というように説いた。

一方、劉易陽の家族は「重男軽女(男尊女卑)」という観念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これは、曾孫の出産後、劉易陽の両親及び祖母の言動からはよりはっきりと読み取れる。

## V. 『裸婚時代』からみる転型期社会における諸問題

以上、主に『裸婚時代』の登場人物について分析及び整理してきたが、ここからはいくつかのシーンを取り上げ、登場人物の間に起きた衝突を分析し、転型期社会における婚姻をめぐる諸問題の背景と原因、及び現代中国社会全体との関わりについて検討したい。

### 1. 結婚をめぐる住宅所有問題

第3話では、劉易陽一家と童佳倩一家の両家がはじめてレストランで顔を合わせ、子供たちの結婚について話し合うシーンがあった。しかし、やはり結婚後の二人の住まいのことをめぐって意見が対立し、結局何も解決できないまま気まずい思いでけんか別れとなってしまった。この時の様子を見てみよう。

●田淑雲：至于今后这个酒席呀什么，婚礼什么的，这都是枝节，都是一个形式上的事。今天我跟她爸呢，这个中心的意思呢，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的问题弄清楚。咱们到底咱们家是有房子还是没有。有，在哪儿。（これからの披露宴などは主要なことではなく、形式上のことだ。今日は、もっと肝心な新居の件をはっきりしたい。あるのか、ないのか。あるなら、どこにあるのか。）

・・・

●呉紅霞：说起房子，我们家奶奶啊有个平房，本打算就是拆迁的时候那房款下来再给他买新房。（この件については、うちの祖母が古い平屋を持っているが、そこがじきに立ち退きに合うから、将来的にはその補償金で新しいマンションを買うつもりだ。）

・・・

●田淑雲：我也听出来了，你们家就是这么一句话，没房。要是实在没有的话呢，我倒是有个招儿。就是，他们就住在我那儿。（なんとなくわかった。そちらには、新居が用意できないわけだ。どうしても無理なら、二人はうちに住ませるしかない。）

...

●奶奶：我们刘家没有这个倒插门的规矩。（うちは入り婿をしない。）

...

●劉易陽：其实我们俩儿呢，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跟佳倩都还在上班，白天都在公司，就晚上回来找个地方睡个觉。在哪儿睡不是睡，所以我们俩呢是决定在外面租房子。等她真要快生的时候呢，再回到我们家。有我妈，我爸，奶奶，都能照顾不是。（実は、私たちはこう考えている。二人とも仕事をしているんだから、昼間は会社にいるし、夜は寝る場所さえあれば十分だ。だから、外で部屋を借りて暮らす。出産が近づいたらうちの実家に帰ってくればいい。両親や祖母に面倒を見てもらえる。）

...

●田淑雲：租房子，不合适吧。那租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外で部屋を借りて暮らすのはよくないだろう。いつまでそのつもりだ。）

...

●吳紅霞：阳阳，不说好的吗，在家里住。（陽陽，約束しただろう，うちで暮らすって。）

...

●劉明：孩子们怎么高兴就好。（子供たちが好きなようにすればいい。）

...

●童建業：我看咱们先把那个能定的定下来，其他的问题咱们慢慢再解决。（今日

決められることを先に決めて、ほかの問題はこれからゆっくり考えよう。）

...

●田淑雲：正因为这么大的事儿，咱们才不能急啊。（大事なのは新居だから、これを先に決めないと。）

...

このシーンからわかるように、結婚後の住まいをめぐる、三種類の主張があった。

まず当の二人はどちらの実家にも住まず、自分たちで部屋を借りて生活するつもりである。そして、花嫁の方の母親は、相手の実家には狭く古いマンションしかないことを理由に、結婚後には自分のところに住ませたいと主張する。一方、花婿の方の母親や祖母は、結婚後にはやはり男性の実家に住むのが伝統的慣習であり、自分の息子や将来生まれてくる孫と一緒に暮らしたいと主張する。

しかし、ここでは童佳倩の母親の田淑雲が強気で反対するわけは、やはり劉易陽の親が「婚房（結婚用の新居）」を用意できなかったからである。劉易陽の両親が将来新しいマンションを買ってあげると言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ような約束は「霧里看花，水中撈月（霧の中で花を見るように、水の中で月をすくい上げるように、物事がはっきり見えないこと）」だとキッパリと反論した。これは、いかに現在の中国社会では、結婚時にマンション所有することに拘り（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心理状態）があるかの現れであろう。このような現象を表現する「新語」も注目されている。すなわち「嫁房女」のことである。

今日の中国では、結婚の条件の一つとして、住居（新築マンション）を挙げる女性が多い。「嫁房女」の「房」は、部屋（マンション）を意味する。このような女性は、結婚相手ではなく、その相手が用意してくれたマンションに嫁入りしていることから、「嫁房女」と

呼ばれている。かつての日本社会でも、「家付きカー付き婆抜き（若い女性が結婚相手の条件として使っていた言葉で、家と車を所有し、姑となる母親はすでにいない男性を意味する）」という俗語が流行ったことも想起されるだろう。国が違うが、両者に潜んでいる意味は近いと思われる。「嫁房女」のほかにも、「啃老族」といったような様々な新語も現れている。『裸婚時代』の第1話では、童佳倩が口にした「啃老族」は、成人しても仕事もせずに親に養われる若者を意味する。日本語の「ニート」に当たるが、意味の範囲はさらに広いと思われる。たとえば、中国の場合では、仕事はしているが、住宅価格（賃貸価格も）の高騰に追いつかず、どうしても自力で住居を買えない（借りられない）人が多い。その人たちは、実家に住み続けざるを得ない。実家が狭い場合は、やはり結婚も難しくなる。このような住宅難問題を表す流行語として、「蝸居」も挙げられる。「蝸居」とは、文字通りカタツムリの家で、狭苦しい小さい家を意味する。「蝸居」での暮らしは大変だが、そうしてようやく夢のマイホームを手に入れても、今度は、収入のほとんどをローンの返済に取られるという住宅ローン地獄が待っている。いわゆる「房奴（住宅奴隷）」となってしまうわけである。

## 2. 医療保険問題

新婚をめぐる住宅問題は、『裸婚時代』にみられるもっとも顕著な社会問題である。このほかにも、様々な社会現象がドラマに反映されている。ここでは、もう一つの話題である医療保険問題について、ドラマではどのように表現されているのかを見てみよう。

第7話では、劉易陽の奶奶（祖母）は高血圧を再発し、医者から精密検査をするように勧められた。姑の呉紅霞は、奶奶の医療保険が普通住民社会医療保険であるため、外来で

検査を受ける場合はほとんど自腹となるが、入院すれば保険が効くため、奶奶を入院させることにした。

また、第9話では、童佳倩は病院で定期検査を受けた。混雑した病院でいくつもの窓口で列に並んでようやく検査を終えたが、医者からベッド数がたりないため出産の「建档（予約）」が出来ないと告げられた。童佳倩はほかの病院へ打診するが、すべて満員で断念するしかなかった。結局、李冬から私立病院を紹介されて、ようやく出産用の病室を予約して確保した。しかし、そこはいわゆる「貴族医院」であり、高額の出費に悩まされるのである。

『裸婚時代』に見られる「看病難、看病貴（診療を受けるのが難しく、たとえ受けられても医療費が高い）」という社会現象はすでに以前からよく指摘されていることである。都市化による都市部への人口の集中や所得格差の拡大などの背景もあるが、やはり中国における医療保険制度によって引き起こされている側面もあると考えられる。公的医療保険制度の改革は進められているが、国民が受けられる医療サービスをさらに改善するには依然多くの課題があるだろう。

## VI. 結び

2004年に、テレビドラマ『中国式離婚』（Chinese Style Divorce）は多くの人々に注目され、大きな話題を呼んだ。『中国式離婚』と比較して、7年後の『裸婚時代』は別の意味で注目されているように思う。『中国式離婚』はある中年夫婦の離婚をテーマとしており、夫と妻の価値観の相異、及び家庭内暴力などの話題が扱われている。そこには、中国伝統文化や慣習の現代社会への影響、そして現代社会における多元的価値観が現れている。一方、本稿で取り上げた『裸婚時代』は、伝

統文化の影響及び世代間での価値観の多様化についても当然描いているが、結婚をめぐる住宅問題など今日の中国社会におけるもっとも新しくかつ現実的な側面が中心的に描かれている。また、劉易陽と童佳倩という「80後」世代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る家庭が対象となっていることは、『裸婚時代』の大きな特徴であろう。

「裸婚」という新語が流行り始めたのは、その原著であるインターネット小説『裸婚—80後的新結婚時代』が注目された2008年以降である。この言葉の流行に便乗しているようにも見られるが、「宁可坐在奔驰车里哭，也不要坐在自行车后笑（自転車の後ろに乗って笑うよりもベンツのなかで泣く方がましだ）」という言い方が2011年に入ってから広がりつつある。「裸婚」の是非をめぐる議論はしばらく続くだろう。

そして最後に、本稿では取り上げられなかった複数の社会現象も、このドラマで生き生きと描かれていることを付け加えておこう。たとえば、「地下赛车（違法レース?）」はその一つである。公営ギャンブルが認められていない中国では、一部の高所得者の間で流行っているようだ。このような現象、及びその社会的背景について今後考えていきたい。

## 脚注

- 1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際言語文化研究科助教。
- 2 中国のテレビドラマの現状について簡単に説明しておく。「人民網日本語版」, 2011年8月2日付け。  
<http://j.people.com.cn/94475/7457444.htm>  
2011年12月9日最終確認)によると、以下の通りである。中国の2010年のテレビドラマ生産量は436本、14700話である。一日あたり

約40話が製作され、一本は約34話構成という計算になる。中国のドラマ投資総額は51億元、1話あたりの平均製作コストは約35万元である。テレビドラマの販売収入総額は62億元、1話あたりの平均収入は42万元になる。テレビドラマの広告収入は300-350億元と、テレビ広告収入総額の過半数を占めている。一方、中国国内の放送チャンネル数は1764、年間ドラマ放送量は500万話以上と、放送量全体の28.4%を占め、世界一のテレビドラマ放送国となっている。また、インターネット放送の急成長に伴い、中国ドラマ市場は、テレビチャンネルのみの時代からマルチメディアの時代に移行している。

- 3 『広州日報』, 2011年6月27日付け。
- 4 <http://tieba.baidu.com/f?kw=%C2%E3%BB%E9%CA%B1%B4%FA&fr=ala0#>  
2011年12月9日アクセス。
- 5 フィスク(1996), 146頁。
- 6 伊藤(1999), 87頁。
- 7 同上。

## 参考文献

- <日本語>
- 石井康一「「一年又一年」について—連続テレビドラマを通してみる中国の現在」『言語と文化』9(2005):205-215
- 伊藤守・藤田真文編『テレビジョン・ポリフォニー—番組・視聴者分析の試み』(世界思想社, 1999)
- 岩男壽美子『テレビドラマのメッセージ—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勁草書房, 2000)
- 周倩「現代中国における社会階層構造の変遷—1990年代以降の国産テレビドラマに対するテキスト分析を通じて—」『中国研究月報』62.12(2008):17-34

- 周倩「今日の中国社会における＜中産階層ドラマ＞の受容—カルチュラル・スタディーズのオーディエンス研究を手がかりに」『マ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74 (2009) : 95-113
- フィスク・ジョン『テレビジョンカルチャー』伊藤守ほか訳 (梓出版社, 1996)
- 藤田真文『ギフト, 再配達—テレビ・テキスト分析入門』(せりか書房, 2006)
- 「特集 最新中国テレビドラマ事情」『人民中国』2010年1月号
- 文俊「中国都市社会における夫婦関係に対する社会的共同意識—テレビドラマ『中国式離婚』およびそれをめぐる諸言説を通じて—」『名古屋大学社会学論集』26 (2005a) : 39-60
- 文俊「現代中国都市社会における女性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危機—テレビドラマ『中国式離婚』の言説戦略の分析を通して—」『中国研究月報』59.10 (2005b) : 18-28
- 南真理「中国テレビドラマ『走向共和』の新歴史観—その製作, 受容をめぐって—」『野草』86 (2010) 81-100
- ラル・ジェームズ『テレビが中国を変えた』田畑光永訳 (岩波書店, 1994)

<中国語>

- 高峰主編『中国電視劇名劇鑑賞辞典』(武漢出版社, 2010)

<英語>

- Lull, James. *China Turned On: Televis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1.
- Zhong, xueping. *Mainstream Culture Refocused: Television Drama, Socie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Reform-Era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



寄稿

## シンポジウム「日本現代化の過程、経験および教訓」の総括

劉岳兵<sup>1</sup>

2011年4月2日、南開大学日本研究院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にも指定されている南開大学世界近現代史研究センターは、「日本現代化の過程、経験および教訓」と題するシンポジウムを合同で開催した。シンポジウムには、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語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首都師範大学、山西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南開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天津師範大学、天津外国語大学の研究者たちや、世界知識出版社、『世界の歴史』、『国外社会科学』、『読書』、『日本学刊』、『南開学報』などに携わる出版業界・学術雑誌の責任者たち、そして『日本現代化の過程研究』叢書の作者あわせて60名以上が参加した。

シンポジウムでは、2010年12月に出版した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の『日本現代化の過程研究』叢書全10巻に対する講評を皮切りに、最近日本で起こった大地震および放射能漏れ事故といった最新の状況もあわせて、日本現代化の過程、経験および教訓について活発な討論が行われた。

叢書の主編者である楊棟梁教授は基調報告のなかで、「現代化」という概念についての新たな見解と、それを叢書のなかに反映させるための努力について詳細に説明した。楊教授の説明によれば、わたしたちの理解している現代というのは、わたしたちが生活しているこの時代のことであり、「当代」という言葉と基本的に同じ概念である。その上、現代化(Modernization)は、その起源、カテゴリ

一、内容、性質などほとんど全ての面で「近代化」の意味するところと多くが「重なり合い」、そしてその「延長線」上にある。しかし、一方では「資本主義化」の思惟パターンにとらわれてはいない。

「現代化」とは、ン類が近代以来の封建的生産様式と伝統思想を捨て、より高度な物質文明、精神文明そして社会制度(制度文明)を追求する過程である。この過程は、資本主義的な工業文明、政治文明そして社会制度を絶えず改善し続けるだけでなく、同時に非資本主義的な本質、すなわち人類社会をより高度な発展の次元へと導く新たな要素をも育み、創り出している。したがって、現代化とは「近代化」の延長でもあり、近代化を越えるものでもある。この意味において近代化、すなわち伝統的な意味における資本主義化は、現代化の主な内包を構成するが、すべてを代表することはできず、より広範な視野をもつ現代化のなかに収まらざるを得ないのだと言える。

このような理論的視座から出発して、楊教授は以下のように強調する。

人類は資本主義の出現を起点とする現代化の過程において、イギリス、フランス、オランダを代表とするオリジナルモデル、ドイツ、ロシア、日本を代表とする継承モデル、インドなどの多くの植民地国家にみられる依存モデル、ソ連および中国の超越モデルを形成した。またオリジナルモデルからすれば、残りの三種はすべて「追い越したタイプ」のカテゴリーに入る。加えて、この4つのモデルの現代化の過程においては、非資本主義的な本質、

すなわち人類社会をより高度な発展の次元へと導く新たな要素を生み出す可能性が残されていると。

更に楊教授は、世界各国の現代化のモデルのなかで、疑いもなく日本こそが最も価値のある研究対象であるという。これは、日本が近代アジアにおいて唯一「近代化」を実現した国家であり、また目下のところ現代化が最も進んだ国家のうちの一つでもあるからである。更に、近代以降の現代化のなかで中国は日本に大きく後れをとっており、日本の経験は学ぶべきものである。

日本は近代において中国に最大の損害をもたらした国家であり、中国はこの「立ち退くことのない隣人」と永く付き合っ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のためには、日本の民族的特性と社会のメカニズムをよく理解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彼を知り己を知り」、「古きをたずねて新しきを知る」。そうすることによって、現代化を進めるなかで対日関係を適切に処理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日本は「後発型の追い越しタイプ」の代表であると同時に「追い越し後の苦境」に陥った事例でもある。現代化の道の上で加速を続ける中国にとっては、日本の「追い越し期」と「ポスト追い越し期」の経験と教訓から長所と短所を学ぶことは等しく重要である。

こうした楊教授の観点は、叢書の序文「日本現代化研究の視角と課題」のなかで詳細に述べられている。日本研究の先学である天津社会科学院の呂万和氏も楊教授の観点到賛同を表明しており、歴史研究は閉塞した状況を打破し、概念上の束縛から自由になってこそ、縦横無尽に思考をめぐらせ、何らかの突破が得られると強調している。

世界知識出版社は、「叢書は国際的な学界が初めて明治以来の日本の現代化の歴史を系統的に取り扱った研究叢書であり、包括的且

つ系統的、学術性に優れ、中国学术界の最新の研究成果を示している」としている。

南開大学教務長の朱光磊教授は、南開大学の日本研究の伝統を回顧し、日本研究は南開大学国際問題研究における看板テーマとなっていると指摘した。そのうえで、楊教授らが10年の歳月をかけて完成させた『日本現代化の過程研究』叢書は、同研究院の全教員の力を結集したものであり、呉廷璆氏が編集した『日本史』百万字の後を継ぐメルクマールの意義をもった重要な成果であるとしてい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の李薇教授は、叢書は中国の日本研究界において前例のないプロジェクトであり、一つのメイン・テーマ、二つの方向性、三度の制度改革、四大分析視座、五大研究領域という全体的な構想の下、各巻がそれぞれはっきりとした特色を備えていると述べる。同時に李教授は、叢書は豊富な研究成果を示しているだけでなく、今後の叢書編集、特に日本研究叢書の編集という面で貴重な学術的経験とマクロな視野をもたらしてくれたと評している。また、同研究所副所長の高洪教授は、全10巻からなるこの素晴らしい大型叢書は、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研究の新たな名著となったうえ、中国、日本、更には世界各国の日本研究者に斬新な視点を提供するものであると認める。

北京大学歴史学部の宋成有教授は、日本近現代史研究の専門家として、叢書の出版が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近現代史研究全体を推進するだろうと語る。更に、天津外国語大学の修剛学長、天津師範大学歴史学院の侯建新院長、南開大学歴史学院の陳志強院長らも皆、叢書の出版は学术界にとって重要な出来事であり、一つの記念碑的成果をあげたものであると見なしている。

中華日本哲学会会長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の卞崇道教授は、「十年をかけて一振りの剣を磨き、十の著作が新たに生まれる。

蛩雪の苦は十年にわたり、英名は代々伝えられる。」と即興の詩を詠んだ。

日本の法政大学国際日本学研究所の王敏教授は、世界における日本研究の最新動向を詳細に紹介し、特に米国ハーバード大学の傅高義教授が祖国である中国の恒久の発展と進歩のために日本研究に従事したという目的意識について重点的に説明した。彼女によれば、『日本現代化の過程研究』叢書は、中国学界の最高水準にあるだけでなく、国際的な水準に達しており、世界における様々な日本研究に対する中国からの見事な応答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王敏教授は更に、叢書は具体的な形式で、世界中が注目する問題に答えていると指摘する。それは例えば「非西洋的な価値体系の視座とは如何なるイメージなのか、如何にしてそれを体系化、理論化す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に対して有益な検討を行っており、学術的な語りを通じて世界を思考させている」点であるという。

シンポジウムのもう一つの内容は、関連する分野の権威ある専門家たちによる、叢書の各巻に対する講評である。

呂万和氏は、米慶余教授の著書『日本近現代外交史』について、戦前戦後の日本外交について通史的史に論じていると共に、形式が整い論点も簡明であり、また重要な出来事や文書、更にはいくつかの重要な史料についても、その典拠や書誌情報を明記するなどその専門性がよく表れていると認める。また、取り扱った史料も豊富であり、特に当事者の回顧録、伝記および日本国内の文献を用いて歴史の真相に迫った点が、その説得力を高めているとしている。なかでも、戦前を扱った部分には特に高い評価をしており、戦前（1868-1945）の日本の対外関係における根本的姿勢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ると指摘する。当時の日本の対外関係の方針をまとめれば、強兵第一として戦略の必要とするところに応じ、

西洋某強国との同盟を実現し、近隣に向け不断の拡張を行い、口実をつくって侵略戦争を発動し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そしてその結果、アジア各国から恨まれ、日本自身も辛酸を嘗め尽くし、ついには完全に失敗し、滅亡を迎えていくことになる。朝鮮侵略、台湾侵略、琉球併呑、日清戦争、日露戦争、日英同盟、日露協商を取り扱った各章は、特に優れており、著者の長年の研究成果がよく表れているとも評され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の高洪副所長は、王振鎖・徐万勝教授の著書『日本近現代政治史』について、革新的な意義をもち、それまでの学術的空白を埋めるものであると高く評価する。高副所長は、「中国では日本政治に関する専門的歴史研究は未だに出版されておらず、特に波乱に満ちて先行きの見えなかった日本近現代政治史を系統的に整理し、幕末維新から21世紀初頭までの政治的発展の背景、原因、軌跡、結果について、専門的研究者や日本に関心のある一般読者を問わず示したことは、疑いもなく学術的価値のあることであり、その功績は明らかである」とも述べる。

中国政法大学の金仁淑教授は、楊棟梁教授著書『日本近現代経済史』について、日本経済史学界における重要な研究成果であり、実証的な考察と経済学的分析を結合させた研究方法を採用して、全面的、系統的に明治維新以降の日本現代化の歴史とその特質、更にはその功罪を論じているとしている。当該の著作の出版によって、日本経済の二度の成功（明治維新によって資本主義の道を歩み、第二次大戦後にアメリカに次ぐ先進国となった）、そして二度の失敗（敗戦と1990年代以降の長期にわたる不況）について、国内外の研究に全く新しい構想と理論的基礎を提供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また同書は、中国経済の現代化のなかで、政府と市場、自由と制限、効率と平

等、発展とバランスといった諸関係により良く対処していくための重要な理論と実際の指導的意義を提供してい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の崔世広教授は、趙徳宇教授の『日本近現代文化史』について、日本近現代の文化史研究の視点から日本の現代化を論じている点が最大の特長であり、日本近現代分化しの研究を通じて、近現代における日本文化の発展の性質を見出し、日本文化の現代化および日本現代化の過程の特徴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ると評する。同書は、系統的で詳細な研究によって、日本近現代文化の発展過程には、他文化の取り込みという姿勢に基づいた実用性、伝統文化の安定性、多元文化の並存性が常に見られると論じている。こうした結論は、客観的に日本文化と西洋文化を理解し、日本の伝統と現代との関係を理解し、日本および日本文化の現代化の特徴を明らかにするという点で、啓発的な意義を持っている。

北京外国語大学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の周維宏教授は、李卓教授の『日本近現代社会史』について、独自の日本（近現代）社会史の構築に成功していると述べる。具体的には、第一章で社会構造について、つまり社会学的な社会移動の問題を論じており、第二章では家庭社会学、第三章では女性社会学、第四章では労働社会学、第五章では人口社会学の内容を取り扱っている。この五章構成は、総体的な社会史研究の構成として適切なものであり、その豊富な内容は国内随一のものである。

武漢大学芸術学院の王傑泓教授は、2010年第8号の『中国図書評論』に、彭修銀教授の著書『日本近現代絵画史』についての長編の論評を発表した。「現代化における“東洋”モデルと日中の結合——彭修銀氏の新著『日本近現代絵画史』」と題する論評は、「同書は国民芸術と外来芸術の融合を中心テーマ“後発追い越し型”の国家が、如何にして自

我の超越と持続的発展を可能とするかについて論じており、今の中国にとって啓発的であるだけでなく、予見性さえも持っている」と指摘している。

劉岳兵副教授の『日本近現代思想史』については、早くも2010年8月14日に卞崇道氏が北京外国語大学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で同書をめぐる討論会を主宰した（討論会の報告は、2010年12月に出版された日本の学術雑誌『或問』第19号に掲載されている）、また同氏は「日本近現代思想史を系統的に論じた力作——劉岳兵の『日本近現代思想史』」と題する文章を書き同書を紹介し（『高校理論戦線』2010年第12号）、その開拓的な学術的価値と現実的な意義を賞賛した。

宋成有教授は臧佩紅副教授の著書『日本近現代教育史』について、特に教育と日本の国家発展との関係、日本における教育の位置づけといった日本の近現代の教育において繰り返しあらわれる問題を検討し、更には日本近現代教育発展の歴史全体について各段階ごとの分析、教育の特徴の整理、日本における教育の成否・損得の客観的評価を行った点を賞賛している。そのうえで、こうした点が著者の研究がもっている潜勢力であるとしている。

北京大学外国語学部の于榮勝教授は王健宜教授、呉艶・劉偉副教授の著した『日本近現代文学史』について、日本近現代の主要な流派、思潮、作家、作品、そして文学の変遷について広範に論及すると共に、文学の流派や思潮と社会・文化の変化との関係を全面的に描き出し各時期の文学特徴を捉えていると評している。また、読者が日本近現代文学流派の形成とその影響力、作家たちの創作背景を理解するうえで、大きな手助けとなるだろうと述べている。

首都師範大学歴史学院の史桂芳教授は宋志勇教授、田慶立副研究員の共著『日本近現代対華関係史』は卓越した専門書であると評す

る。同書は日本の対華政策、日中関係を主題に、確かな資料と独自の視点で近代以降の日本の対華政策が制定された背景、実施の過程、そして日本現代化におけるその作用を分析していると指摘する。同書は、戦略的な角度から日本の戦前戦後の対華政策に的確な判断と定義を行っており、歴代内閣の対華政策の相違点やそれが日中関係に与えた影響を分析し、錯綜する現象のなかから歴史の事実接近している。著者が先人の研究成果を十分に利用すると共に、長期にわたって形成されてきた誤読や偏向を正したことは、近代以降の日本の対華政策を客観的に判断し、今後の日中関係を理性的に見る上で非常に参考になるものである。

シンポジウムでは、出版界及び学術雑誌の編集者らが、如何にして質の高い学術書を出版するかといったことや、読者たちが日本現代化のどのような点に関心をもっているのかといったことについて、各自の意見を述べた。経験豊富な編集者たちの意見は、研究の視野を広げるうえで非常に啓発的なものであった。また王敏教授は本叢書出版後の計画について、英訳本と和訳本を出し、英語圏と日本語圏の読者が手に取りやすいようにすべきだと提案し、時期をみて、西欧或いは日本の学者に論評してもらうべきであるとした。

列席した専門家たちは、日本の現代化に関する今後の研究理論と方法、科学技術の革新と環境保護などについての的確な意見を提起した。卞崇道氏は、この十巻の叢書は日本の現代化の各側面をそれぞれ重視しており、専門別にそれぞれ歴史的研究が行われているが、今後の横断的な研究や総合的な理論研究のための基礎をも打ちたてていると指摘する。また同時に、日本現代化の研究における空間論的視点、すなわち東アジアから全世界へと繋がるような視点の重要性を強調しており、方法論的にも革新的であるとしている。更には

「日本現代化研究の学術史」の整理と研究を通して日本現代化研究の学術体系を築くべきだとも提案している。

楊棟梁教授は、各参加者の素晴らしい発言と支持に謝意を表し、このシンポジウムを通じて如何にしてこの分野の研究を今後進めていくかの見通しを得たと述べ、これも各著者および参加者にとっての大きな収穫であったとした。楊教授は、日本の現代化の道は曲折を経ており、「後発追い越し型」の経験と教訓とが並存しているという。歴史発展の「横軸と縦軸」に沿って、日本現代化の特質を把握・解析することは、単に「公正」であろうとすることだけではなく、「己を律する」ことにもつながる。日本現代化研究には更に多くの課題が待ち受けているが、今回のシンポジウムはこの研究領域で活躍している多くの著名な専門家を集めており、『日本現代化の過程研究』叢書の出版を契機として、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現代化研究は新たな境地に入ることだろう。

(翻訳：小嶋祐輔)

<sup>1</sup> 南開大学日本研究院。

## 劉曉波へのノーベル平和賞授与は間違いだったのか？

— 給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有错误吗？ —

ジョン・ハミルトン<sup>1</sup>

### 要旨

2010年10月8日、ノルウェー・ノーベル委員会は「中国における基本的人権のために長年、非暴力的な闘いをしてきた」劉曉波氏にノーベル平和賞を授与する決定をした。劉曉波氏は「08憲章」の起草者の一人であり、現在は中国で服役中である。ノーベル平和賞の最近の受賞者には、ダライ・ラマ14世(1989)、ミハイル・ゴルバチョフ(1990)、アウンサンスーチー(1991)、リゴベルタ・メンチュウ(1992)、ネルソン・マンデラ(1993)、金大中(2000)、ムハマド・ユヌス(2006)、アル・ゴア(2007)、そしてバラク・オバマ(2009)などがある。劉曉波へのノーベル平和賞授与は間違いだったのか？

キーワード：野党，自由，恐怖

私の話は、出発点、過去のノーベル平和賞受賞者、劉曉波、08憲章と彼の受賞したノーベル平和賞の3つの部分から成り立っている。最後の部分では中国政府の今回の受賞に対する意見を支持し、次に国際社会の意見を説明する。

### I. 私の出発点

#### 1. パリ時代

私は若い頃香港上海銀行のロンドン・パリ・香港支店で働いていた。香港に住む前に滞在していたパリの生活は大好きだった。フランス語を勉強し、フランス人の友達ができ

た。パリの生活を楽しんだもう一人の人物が鄧小平である。ここに彼の伝記、*Deng Xiaoping by Uli Franz*がある。私は鄧小平が大好きだ。背は低かったけれど彼は偉大な人だった。彼

は15・6歳のときパリに行き、ルノーの自動車工場に働いていた。同じ頃に周恩来がパリで中国共産党の新聞の編集者をしていて、鄧小平は夜には周恩来を手伝ってガリ版を切って印刷した。彼もパリの生活を楽しんだ、たとえば、煙草、クロワッサン、ブリッジ。後に香港返還についてイギリスと話し合ったとき、鄧小平の交渉の仕方はブリッジのやり方に似ていた。私もブリッジをやるのでそれが分かる。

ここにもう一つの本、*The White Boned Demon: A Biography of Madame Mao Zedong by Ross Terrill*がある。これは上海の女優時代から文化大革命までの江青の伝記である。彼女はもう少しで中国政府を乗っ取って、女帝になるところだったが、周恩来と鄧小平がそれを防いだ。私は周恩来も尊敬している。

#### 2. 香港時代

パリの後は香港で働いた。香港は興味深い所だったが、イギリス人の中国人に対する植民地主義的な態度が嫌いだった。それは1973年の香港のバブルの時期だった。そのバブルは銀行家が作ったものだった。最近同じことを銀行家は日本とイギリスでやった。その後で多くの銀行がつぶれた。私がお金を預けている 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 もつぶれた。妻はイギリスで周章狼狽した。アメリカと日本では銀行は沢山のお金を大学から上手に取りあげた。1973年の香港ではお金をあまり持たない人のお金が取られた。だから私は香港上海銀行を辞職した。

### 3. 愛知大学

次の仕事が愛知大学である。私が愛知大学に来た時、東亜同文書院のことは何も知らなかった。私は卒業研究のための「大旅行」という考えを気に入っている。

私の研究テーマは蜜蜂である。ここに養蜂についての本が2冊ある。「中国蜜粉源植物及其利用」と徐万林著「中国蜜粉源植物」である。最初の本の中には省ごとにいつ、どの蜜源植物が咲くのかを示した地図がある。もうひとつの本には色々な花のきれいな写真が載せてある。私が中国に行く前に、愛知大学の小山先生が、「夜行列車で旅をする方がホテルより安いし、中国の人と話もできる」とアドバイスしてくれた。愛知大学の研究費のおかげで養蜂家にインタビューするために楽しく中国のあちこちを旅行した。黒竜江から雲南まで、浙江省・湖北省・山東省・四川省・・・いろいろなところに行った。汽車の中でブリッジをやり、お酒を飲み、中国語をしゃべりながら旅をした。実を言うと、ウィスキーの助けを借りないと中国語はうまく話せない。

東亜同文書院と愛知大学の目的はいずれも日中友好である。私はこの目的が本当だったと信じている。豊橋の旧本館の中の記念セン

ターに、孫文と東亜同文書院大学の卒業生で孫文の秘書をしていた山田純三郎の写真がある。他にも孫文の書と写真が展示されている。来年は辛亥革命百周年なのでこれらの展示品は大事である。

しかしそれだけではなく、多くの愛知大学の関係者は日中友好のために頑張った。もう一冊言及したい本がある。この「中日大辞典」はよく知られている。今泉先生はこれを作るため他の人たちと40年間頑張った。名前を挙げるべきもう一人の人は十五年戦争について書いた法学部の江口先生である。中国の南開大学でも中日友好のため、例えば Pang Song Feng さんが頑張った。

## II. 過去のノーベル平和賞受賞者

### 1. ノーベル平和賞

当初からノーベル平和賞は議論的によくなかった。アルフレッド・ノーベルの父親は地雷と魚雷の工場を所有していた。ノーベルは父の後を継ぎ、爆薬を発明し製造して財を成した。中でもダイナマイトは有名である。彼が1896年に亡くなった時その遺産はノーベル賞のために寄付された。彼の遺言書の中に、ノーベル平和賞はオスロの委員会を決めるようにと書いてあった。

### 2. 過去のノーベル平和賞受賞者

次にこれまでの受賞者を何人か名前を挙げよう。

まず、佐藤栄作である。私が彼の名を言うと私の日本人の友人は笑った。彼は「非核3原則」一核兵器は持たず、作らず、持ち込ませずで平和賞を受賞した。しかし、最初から「持ち込ませず」というのは絵空事だと多くの日本人は思っていた。

ロンドンの Chatham House でダライ・ラマ14世の話聞いた。彼はチベット語で話し、

それが英語に通訳された。最近彼は日本に来たが、英語で話していた。日本人の英語はそれほど強くないから安心して英語で話せますと、彼は冗談めかして言っていた。今回はチベットについては触れない。しかし、将来チベットは20億人のインドと20億人の中国の間のとても重要な緩衝地帯になると思う。

ミハイル・ゴルバチョフは南ロシアのスタヴロポリ温泉の出身だった。彼はソ連共産党の書記長に、ついでソ連の大統領になった。1989年5月天安門事件のさなかに彼は北京を訪問した。同じ年に東欧革命が起こり翌年彼はノーベル平和賞を受賞した。91年ペレストロイカとグラスノスチの結果政治的混乱が生じ、共産党のメンバーによりクーデターが起こったが失敗に終わった。その後でソ連は崩壊し冷戦は終焉した。スターリンの帝国は平和的に姿を消した。ロシア人はソ連を終わらせたゴルバチョフを尊敬していない。ハミルトンの意見ではゴルバチョフは素晴らしい人だった。

ここにアウンサンスーチーの本、*Freedom from Fear*「自由」がある。彼女は1985-6年京都市に住んでいた。京都大学東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の客員研究員だった。1989年ラングーン在住の母親が病気になり彼女はビルマに帰国した。間もなく彼女は国民民主連盟の指導者になった。1990年国民民主連盟は選挙で大勝したが、彼女の自宅軟禁は解かれていない。1991年彼女はノーベル平和賞を受賞した。中国政府がビルマの軍事政権を支持し続けていることは議論的となっている。

これはリゴベルタ・メンチュウの著書、*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である。これはグアテマラのインディオの人たちの生活について述べた美しい本である。しかし同時にスペイン語を話している人たちのインディオに対する差別と搾取も取り上げている。1992年はコロンブスの「アメリカ」到着500年記念の

年だった。コロンブスの「アメリカ発見」とその後の先住民に対する扱いに抗議して、小さなグループがニカラグアからワシントンまで歩いた。その中に二人の日本人、山伏さんとドミニコ会のシスターがいました。シスターさんは私の友達である。メキシコで彼らは亡命のリゴベルタ・メンチュウに会った。

ここにネルソン・マンデラが刑務所でそのほとんどを書いた自伝、*Long Walk to Freedom*がある。彼は27年間ケープタウンの近くのロベン島の刑務所に収容されていた。釈放後彼は大統領になった。

金大中は北朝鮮との宥和を目指し、それに対してノーベル平和賞を受賞した。しかしその努力は成功しなかった。先月北朝鮮はヨンピョン島を攻撃した。

ムハマド・ユヌスは、彼のマイクロクレジットの考えと彼が創設したバングラデシュのグラミン銀行が女性の地位向上に貢献したことに対してノーベル平和賞を受賞した。

そしてバラク・オバマのノーベル平和賞を多くの人は「早すぎる」と評価した。

### III. 劉曉波, 08 憲章と彼の受賞したノーベル平和賞

#### 1. 劉曉波のノーベル平和賞に対する中国側の反応

中国は大きな国である。人口が14億人あり、強い政府が必要である。誰であっても中国を統治するのは簡単ではない。

1999年香港が返還された。1984年の返還交渉の時香港の人たちは心配していた。しかし香港は心配されていたように中国本土のようにはならなかった。その代わり、最近30年間の間に中国全体が香港のようになった。

自由は、いわばポケットにどれ位のお金が入っているか次第である。あなたにお金があればある程、転職、子供の教育、家の引っ越



しなどについてあなたはより自由に選ぶことができる。この30年間で中国の生活水準は高くなった。従って自由の度合いは増している。

北京オリンピック、上海の地下鉄、上海万博は、海外に向けた中国のサインである。中国の経済発展のおかげで、最近日本とイギリス、アメリカは高い生活水準を享受している。百円ショップのことだけを言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中国が「世界の工場」になっている現在の世界の経済の仕組みは、1971年の名古屋での国際卓球大会から始った。アメリカと中国も参加した。中京大学の教員にそのときの日本の代表選手がいる。水曜日に時々中京大学の教職員用レストランでその人に会うことがある。この大会でいわゆる「ピンポン外交」が始まった。翌1972年、ニクソンの電撃的な訪中があり、新しい経済制度が始まった。

08憲章を書くのはそれほど難しいことではない。アメリカの憲法、世界人権宣言と中国の歴史の教科書さえあれば、頭のいい憲法学者なら誰でも書けるものである。18世紀の終わりに書かれたアメリカの憲法の言葉は素晴らしくて感動的だが、14億人の人口がある21世紀の初めの中国にそのままの形でふさわしいかどうかは簡単にはいえないことである。

## 2. 国際社会の意見

繰り返しになるが、中国には強い政府が必要である。現在の政府は十分強いと言えるだろうか。強くなるためには政治改革が必要だ。つまり、政府を批判し、政府に取って変わる力のある野党が必要なのである。

私はイギリス人で、イギリス保守党の党員である。イギリスでは1997年に保守党は疲れて墮落していた。労働党が順番を待っていた。そして政権を取った。私はそれは残念なことだと思った。でも選挙の結果は受け入れた。

2010年5月労働党は疲れて墮落していた。保守党が待っていた。政権が交代した。デービッド・キャメロン42歳が閣僚の経験もなく首相になった。二大政党制は悪くない。

アメリカではジョージ・W・ブッシュが8年間大統領だった。変化が必要で、オバマとヒラリー・クリントンが待っていた。野党の制度は便利である。ブッシュがさらに大統領をやっていたら、国民はバリエードを作っていたらう。

日本では、私は詳しくないが、自民党は分裂して一部は野党になった。去年ほとんどの日本人は「さようなら麻生さん」と言った。民主党の番が来て次の政府になった。

国際社会は、中国が強くて安定した政府を持つには、「野党」のアイデアに慣れ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っている。「野党」のアイデアは08憲章に書いてある。そういうわけで、ノーベル平和賞委員会は劉曉波にノーベル平和賞を授与した。

その劉曉波へのノーベル平和賞授与は間違っていたのだろうか。現在の、そして将来の中国の人たちがその答えを一步一步探さ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だろうと私は思う。

## 脚注\*

<sup>1</sup> 愛知大学法学部教授。

## \*参考文献

- [1] Uli Franz. *Deng Xiaoping*. Harcourt. 1988..
- [2] Ross Terrill. *The White Boned Demon: A Biography of Madame Mao Zedong*. William Heinemann. 1984.
- [3] Aung San Suu Kyi. *Freedom from Fear*. Penguin. 1996

- [5] Rigoberta Menchu. *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 Verso Books. 1987
- [6] Nelson Mandela. *Long Walk to Freedom*. Back Bay Books. 1995

後記 (2011年12月15日)

私がこの発表を行ってから1年が経った。2010年のクリスマスの前に原稿を提出したが、出版されないまま一年が過ぎ、今2011年のクリスマスが目前に迫っている。私の原稿はすぐに出版されるべきだったと思っている。しかし出版が延びたことで書いてから1年後に改めて読み直す機会が与えられた。議論を両側から公平に考えることは道理にかなっていると思う。

東亜同文書院の価値ある後身である愛知大学が、名古屋市の笹島に新しくキャンパスを開き、新たに発展していくのにあわせて、この原稿ができるだけ速やかに出版されること信じている。



# 孔子学院——中国模式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sup>1</sup>

戴 蓉<sup>2</sup>

## 摘要

作为中国代表性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孔子学院既有与国际知名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如英国文化委员会、法语联盟、歌德学院等相同的属性，又有其独特的中国模式。孔子学院与其它国际知名语言文化推广机构一样，都把推广本国语言和传播本国文化作为根本宗旨，语言推广和文化传播紧密结合，属于非营利性组织，“官方性”或“半官方性”明显。孔子学院的中国特色则表现为巨大的国家投入，多方办学的模式和利益分配的可能性。

**关键词：**孔子学院、语言文化推广、中国模式

孔子学院的建立，是与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果，中国国际地位和中国形象得到大力提升分不开的。孔子学院的建设和推广，是中国文化外交的重大举措。作为中国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孔子学院既有与国际知名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如英国文化委员会、法语联盟、歌德学院等相同的属性，又有其独特的中国模式。

## I. 孔子学院与其它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共性

### 1. 把推广本国语言和传播本国文化作为根本宗旨

明确的使命和宗旨为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运行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在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章程中，各国都将本国语言和文化的传播确定为主要使命和根本宗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宗旨是推广海外英语教学，增进外国对英国文化的了解；法语联盟的宗旨是传播法语，弘扬法国文化；歌德学院的宗旨是促进国外的德语教学，介绍德国文化，增进与各国的文化交流。根据《孔子学院章程》，“孔子学院致力于适应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

增进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sup>3</sup>。孔子学院把推广汉语，推动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各国与中国友好往来确立为自己的宗旨。

## 2. 语言推广和文化传播的紧密结合

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推广对文化传播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而文化的传播则是语言推广的终极目标，是语言生存和传播的基础。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负面结果就是世界文化的单一化趋势，强国在进行经济扩张的同时扩张了本国的语言文化，而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个性被削弱，世界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和全球化的挑战，使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在推广本国语言的同时，都力图传播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从而使得本国的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英国文化委员会通过推动英语在全世界的普及，力图增进其他国家对本国的理解，加强英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提高英国的国际形象

和国际地位。英国通过具体的指标来衡量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具体贡献和成果，例如以英国文化委员会为中介与国外高校建立联系的英国高校的数量来衡量文化委员会在开拓年轻人国际视野方面贡献的大小<sup>4</sup>。歌德学院是德国的文化中介机构之一，是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重要执行者。歌德学院的主要工作有语言工作、文化活动、咨询服务三种。语言工作主要是学员和教师的培训、语言考试、为学员和教师举行的活动；文化活动是指在国外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仅2004年，歌德学院在国外举办活动8400次，参加人次达63万；咨询服务主要通过提供德文资料，邀请访问学者，资助各种语言翻译德语书籍、文化杂志发行等途径来实现<sup>5</sup>。法国更是将文化作为最主要的语言推广特征，法语代表着一种“地位”、一种“修养”、一种“生活的品位”<sup>6</sup>。而孔子学院作为中国语言文化的推广机构，在全球范围内为所在国提供零距离汉语教学服务，形成了最权威、最系统的海外汉语学习基地。孔子学院同时也是各地的“中国文化中心”。各地孔子学院相继开设中国文化课程和图书信息，举办与中国有关的论坛和学术活动、学术讲座及汉语演讲比赛和作文竞赛，让各国的学习者和中国文化爱好者亲身体验了底蕴深厚、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sup>7</sup>。例如日本的北陆大学孔子学院就开设了“中国电影鉴赏”、“中国养生”、“中国古诗”、“中国传统乐器”等课程。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推出了受当地市民欢迎的“孔子学院开放日”和“汉语沙龙”活动，邀请中国民俗方面的专家前往斯德哥尔摩开讲座，并和当地的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举办过题为“中国的发展及其在全球的角色”的高级论坛。法国孔子学院除了汉语培训班，还应学员的要求开出了书法班、绘画班、厨艺班、太极拳班等。

### 3. 非营利性

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有几个重要的判断标准：是否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是否向社

会提供服务或公益性产品；利润是否分配给出资人或组织成员<sup>8</sup>。在通常情况下，各国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都属于非营利机构，这些机构的性质、宗旨、资金来源和利益分配等方面都确定或隐含了它们作为非营利组织的特性。大多数语言文化推广机构都在宗旨中强调了其非营利性。关于资金或收入来源，营利性组织主要是来自顾客在购买其产品或享受其服务时所付的货款，而非营利组织则是靠组织成员的会费。

英国文化委员会每年接受政府大量的财政资金支持，法语联盟各分支机构将企业和基金会赞助作为其重要资金来源，歌德学院的国外分院的经费主要来自外交部的财政拨款，此外还有公司捐助等渠道。这些语言文化推广机构都以推广语言、推动文化交流为目的，提供语言教学资源和文化产品，具有明显的公益性，收益则是用于组织的扩大和发展，而不是分配给组织成员的。这些都符合非营利组织的一般特性。按照孔子学院章程，孔子学院是以推广汉语，推动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各国与中国友好往来为宗旨的非营利教育机构，非营利的性质在机构性质的性质中已经确定。从资金来源来看，孔子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投入，今后企业、基金的捐助及自身所提供的服务性收入也将成为其收入来源。孔子学院的目的在于通过为当地汉语教学提供充足的教学资源，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积极推动和支持海外汉语教学，向世界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增进世界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了解，满足的是国际社会对汉语学习和发展语言文化多样性的需求。孔子学院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具有很强的公益性。目前阶段绝大多数的孔子学院都是以总部牵头，国内外大学共同合作的模式，此类孔子学院的收益，都用于该孔子学院的运营，并不分配给总部或国内外大学的单位或个人。今后的孔子学院即便会出现把一小部分收益分配给孔子学院合作方或者特许经营方的可能，也是占比很小且经过严格限制的（这一点我们在孔子学院

的特色中将会谈到).孔子学院的收益原则上用于孔子学院的扩大和发展,属于非营利机构.

#### 4. “官方性”或“半官方性”明显

纵观各国语言推广机构的发展历程和与政府的关系,可以明显地看出,语言文化的成功运作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实质上是政府文化外交战略的具体表现和重要平台.各国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在资金上依赖政府,政府还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机构的组织管理.随着语言文化推广作用的凸显,许多国家政府对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介入程度日益增加,语言文化推广机构也就具有越来越强的“官方性”或“半官方性”.

英国文化委员会在成立时虽是以慈善机构注册的社会团体,但随着机构本身的不断发展以及英语和英国文化外交地位的上升,政府对其投入和控制不断加大,该机构已经逐步演变成英国的“官方”机构.而法语联盟,借用法国前总统、巴黎法语联盟前名誉主席希拉克的话来说:“法语联盟一直是法语国家的前方哨所”<sup>9</sup>.歌德学院在法律上虽然定位为民间组织,但学院本身发展历程与德国国家命运密不可分,工作内容、领域完全服务于整个国家外交战略的需要.歌德学院1979年在罗马尼亚建立分院,是因为罗马尼亚与苏联交恶的缘故,阿富汗战争之后则在阿富汗设立分院,而伊朗分院时开时关都是根据国家战略要求不断调整的结果<sup>10</sup>.歌德学院实质上是一家带有浓重官方色彩,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文化机构,而不是单纯的德语语言文化学院.国际语言文化推广机构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尤其是国外分支机构的启动资金几乎完全来自政府拨款,海外工作人员多由政府派出,由政府支付薪金而不是从语言文化机构中领取.英国文化委员会每年都可以得到“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拨款,以“海外发展署”为代表的英国其他政府机构也会给予大量的资金支持.法国政府对法语联盟的资

金支持主要表现为教育部、外交部等政府部门的财政补贴.政府的直接投资主要用作分支机构创始之初的启动资金以及支付海外派遣人员的工资.歌德学院海外分院的经费主要来自外交部的财政拨款.德国外交部通过控制歌德学院的资金来控制歌德学院执行政策的忠实程度.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组织管理也与政府部门密切相关.政府部门对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参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最高负责人通常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高官.例如伊丽莎白女王是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庇护人,查尔斯亲王是副庇护人;历届法国总统都是法语联盟的名誉主席;歌德学院的最高管理层“代表委员会”的现任主席尤塔·林巴赫曾历任德国司法部长及德国最高宪法法院院长.第二,各国语言文化推广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任命需要向政府汇报,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行政机构中都有政府的派驻代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理事会成员中有两个成员的任命需由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提名;法国内政部长、国民教育部长和外交部长都有权派代表视察各法语联盟建立的机构,并听取有关这些机构运作的汇报;歌德学院“代表委员会”主席的选举必须得到外交部的认可.第三,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分支机构通常同本国使(领)馆的文化处协调后才展开工作.例如英国文化委员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通过在北京的英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处,以及在上海、广州和重庆的英国总领事文化教育处来开展工作<sup>11</sup>.法语联盟同法国使馆有着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项目合同”的方式确定文化教育项目需要资金、活动内容和日程安排等具体事项.歌德学院协同使馆实施海外文化交流,在领馆文化教育处的协调下工作.

孔子学院从成立到运行无不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进行的.政府的财政拨款是孔子学院重要的资金来源,中外合作设立的海外孔子学院启动资金几乎完全来自中国政府的财政拨款,用于初创阶段的开办费,中方派出管理人员和专

职教师的工资、住房、国际旅费、医疗保险等费用，提供教材、图书、音像制品等教学资料的费用，以及海外孔子学院组织的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专项活动的资助经费。从长远的发展趋势来看，孔子学院在日常运作的过程中有可能得到企业、基金的捐助，但是孔子学院毕竟是代表国家的机构，政府直接和间接的财政支持仍将是孔子学院维持和扩大自身发展的重要来源。从政府对孔子学院的组织建设管理来看，孔子学院最高管理机构——孔子学院总部的理事会主席由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担任。孔子学院总部设理事会，理事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理事由中国政府任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各国政府对其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介入程度越来越深，但政府只是把握其战略方向，并不直接干涉语言文化机构的具体活动，语言文化推广机构仍在非营利组织的框架下，相对独立地运行。

## II. 孔子学院的中国特色

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国情<sup>12</sup>，国情的差异决定了语言文化推广机构成立背景、组织文化以及运行模式上的差别。作为中国的代表性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孔子学院既有一般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共性，又有其中国特色。

### 1. 巨大的国家投入

孔子学院是国家汉办<sup>13</sup>推出的《汉语桥工程》中的九大项目之一，目前海外孔子学院的建立形式主要是采取国家汉办委托国内院校与国外合作建设的模式，孔子学院是以国家汉办为依托的，而国家汉办是教育部、财政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文化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等 12 个国家部委组成的，国内承办院校是教育部的下属单位，也是政府管理的，因此可以说孔子学院的建设和运营本质上更接近于一种政府行

为，迄今为止民间团体或组织的参与不多，这与以慈善机构或民间团体注册的西方国家语言文化推广机构有着较大的不同。无论从经费来源还是从管理人员的配备上，政府在孔子学院的运行中都处于支配地位。此外，在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教育产权制度中，国家是教育产权的最后所有者。由于中国的国情和政府在社会经济中强有力的地位，政府可以动员丰富的社会与行政资源，如教育资源、政策资源、外交资源等为孔子学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根据《关于 2010 年孔子学院总部工作计划的汇报》<sup>14</sup>的数据显示，2009 年国家汉办向 109 个国家都派出有汉语教师，向 40 多个国家派出了志愿者 1600 多人，至 2009 年底海外的志愿者可达 2000 人左右，专兼职教职工约 3100 人，其中中方院长和教师 1150 人。汉办赠书 82.4 万册，平均每所 3200 多册。在全球经济状况普遍不佳的情况下，中外对孔子学院的投入不但没有减少还有增加，双方投入现金共计 1.19 亿美元，中外比例为 1:1，平均每所 40 多万美元。2010 年底，孔子学院的专兼职教师人数已达 4109 人，中外双方共同的投入资金达 1.67 亿美元，中外比例为 1:1，每所孔子学院 50 万美元，每个孔子课堂<sup>15</sup>6 万美元<sup>16</sup>。

### 2. 多方办学的模式

孔子学院的章程规定，海外孔子学院的设立模式有：总部直接投资、总部授权特许经营、总部与申办方合作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与西方国家语言文化推广机构较为单一的设立模式有很大的差异，在国际语言推广机构中具有独创性，富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 (1) 总部直接投资模式

总部直接投资模式是指孔子学院总部单独在海外进行投资设立孔子学院。在这种模式下，孔子学院的全部产权归总部所有，总部在孔子学院的人事任命、财务支出及业务经营等方面具有独立、完整的决策权，同时独立承担成立和运营孔子学院的全部成本和风险。

## (2) 总部授权特许经营模式

总部授权特许经营模式是通过特许经营合同的形式，孔子学院总部将孔子学院品牌、汉语教学方式以及孔子学院经营模式等特许权授予被特许者设立孔子学院的模式。根据合同规定，被授权者建立的孔子学院在统一的业务模式下从事经营活动，并向孔子学院总部支付相应的费用。这种模式包括总部授权国内申办方特许经营、总部授权国外申办方特许经营、总部授权国内和国外申办合作方特许经营三种形式。

## (3) 孔子学院总部与申办方合作模式

总部与申办方合作模式是指孔子学院总部与申办方通过资源共享，用各自的优势资源按一定比例对孔子学院进行投资，在孔子学院的设立和运行等过程中形成稳定合作关系。这种模式包括总部与国内申办方合作、总部与国外申办方合作、总部与国内、国外申办方三方合作三种形式。总部与国内申办方合作是指孔子学院总部与国内高校等申办方合作共同设立孔子学院，总部提供相应的财政和政策资源支持，申办方接受总部委托，利用其教育资源优势在国外直接投资设立孔子学院的方式。总部与国外申办方合作是指孔子学院总部与国外申办方合作共同设立孔子学院，总部提供相应的财政和政策资源支持，申办方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教学与管理人员和当地汉语和中国文化推广信息等资源的设立方式。总部与国内、国外申办方三方合作是指孔子学院总部、国内申办方与国外申办方共同发起设立孔子学院，总部提供相应的财政和政策资源支持，国内高校等申办方利用其教育资源优势，提供汉语教学师资、教材等资源支持，国外申办方提供相应必要的基础设施和人员、信息资源的设立方式。

目前海外孔子学院采取的几乎都是孔子学院总部与申办方合作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具体操作时要求较低，现阶段孔子学院发展的现状

完全能满足它的要求。在这种模式下，孔子学院总部牵头，实现了中外教育资源的整合、优化配置和扩张，和其他两种模式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从国外承办方的优势来看，国外承办方良好的硬件和办学环境、丰富的人力和信息资源，为孔子学院的建立和健康运转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孔子学院总部与申办方合作模式中的国外承办方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教学机构。国家汉办针对不同国家不同的教育体制，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办学。海外第一家孔子学院——汉城孔子学院办学模式的确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汉城孔子学院的办院方式，国家汉办经过了大量的调查和长时间的摸索，首先想到的是独资办院方式，但鉴于资金有限以及韩国消费水平、教育成本较高的考虑，这个方案被否定了。以韩国的大学及已有的中文学院为依托开办孔子学院成为第二个设想方案。当地的大学也许可能为孔子学院的成功创办提供必要的保证，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韩国的高校大多是私立性质的，不太可能对中国政府汉语推广机构给予太多关注，能够投资的资源也不由大学的行政部门和教学部门说了算。而与商业性很强的民间汉语学院合作，国家语言文化的推广计划又要冒市场竞争和形象受损的风险。几番周折之后，中方终于选定了韩中文化协力研究院。这是一家承办在韩国举行HSK<sup>17</sup>，致力于推动韩中文化交流的非营利性民间机构，主要成员多为分布在韩国各所知名高校的中文系教授，以及对韩中教育交流感兴趣的，在中国有投资的企业家。中韩双方另辟蹊径不与社会上已经相对成熟的汉语教学机构竞争，走高端路线，以韩中文化协力研究院为依托成立了汉城孔子学院。汉城孔子学院的硬件全由韩方负责，中方主要负责提供标准的现代汉语教学资料、派遣部分汉语教师和志愿者、帮助培训当地的汉语教师<sup>18</sup>。与海外的社团、教学机构合作的孔子学院还有中方与芝加哥公立教育局合办的芝加哥孔子学院、纽约华美协进社孔子学院等<sup>19</sup>。孔子学院还选

择了许多与中国合作历史悠久的知名大学进行三方合作办学。欧洲第一家孔子学院——北欧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就选定了欧洲汉学家的摇篮、最负盛名的汉语培训基地——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来承办。澳洲的第一家孔子学院——西澳大学孔子学院的承办方西澳大学，是澳洲的名校之一，在研究和教学方面曾取得许多重要成就，出过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Barry Marshall和Robin Warren教授。西澳大学与中国许多名校，如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有着横跨九类科系的广泛合作。此外，西澳大学有一个国际上认可的中国研究小组，该小组的研究员承担了有关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传媒、历史和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sup>20</sup>。日本的首家孔子学院——立命馆孔子学院是中国的北京大学和日本的立命馆大学合作建立的，立命馆孔子学院通过严谨认真的汉语教学、谦虚真诚的友好态度切实扎根于日本社会，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2007、2008年连续两年被孔子学院总部评为“世界先进孔子学院”。爱知大学孔子学院是日本爱知大学与国家汉办和中国南开大学于2006年2月建立的，是日本办学规模最大的孔子学院。该孔子学院对学员的人群、兴趣、要求和条件深入调查，对学员采取会员制管理，把学员的性别构成、年龄构成、身份构成、学习目的等基本因素作为安排教学的重要参考依据。针对学员们对汉语、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迅速发展的中国、发展中的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变化的兴趣，爱知大学孔子学院没有照搬一般学校汉语专业的课程，而是注意维持学生的“兴趣”，在选择教材和教学过程中尽可能多融入文化、商贸因素，除了普通的汉语课程和《中国语检定对策》、《HSK对策》《日汉翻译》等针对性较强的课程以外，还开设了《慢慢学起》、《旅游会话》、《时事汉语》、《看电视学文化》、《新人新事》等文化内涵丰富的汉语课程，得到了学员的认可和较高评价。考虑到学员有很多是参加工作的成年人和家庭主

妇，学习时间没有在校学生那么充足，语言接受能力也比较低，爱知大学孔子学院根据年龄和汉语学习的经历与背景的不同，将汉语讲座分为连续性讲座与一次性讲座两种类型。连续性讲座从“汉语入门”到“准高级”共设有33个班。一次性讲座主要是针对有较明确汉语学习目的的公司职员开设的，包括电脑汉语、旅游汉语、口语会话、时事汉语、汉语检定对策、HSK对策、口译入门、汉语翻译等11个班。大部分讲座是全年滚动式进行的，两个季度之间并没有因为学校的假期而中断。众多的讲座为学员的选课创造了充分的条件，提供了更多选择，避免了学员的流失，为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sup>21</sup>。爱知大学孔子学院的成功经验，充分显示了海外合作大学的当地优势和重要性。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合作方的教育资源优势也十分明显。作为一国高等教育资源的集中地，国内高校为孔子学院提供了高质量的图书，配备一流的汉语教师，传授丰富的教学经验。首批承担孔子学院建设任务的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17所高校是从9所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大学和11所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的重点大学中选出来的，都是在国内从事汉语教学或汉语国际交流工作方面经验最丰富、规模最大、资源最充实，能派出驻外中文教师，并招募志愿者到海外孔子学院工作的大学<sup>22</sup>。国内高校常年积累的优厚的教学资源，可以迅速高效地被孔子学院加以利用，为孔子学院的建立与运行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 3. 利益分配的可能性

根据孔子学院章程，孔子学院属于非营利机构，但非营利机构并不是不能营利，而是不以营利为目的。非营利机构的收益原则上都是用来支付项目参与人员工资、机构日常运营费用支出以及自身发展的规模壮大等。和他国语言文化推广机构一样，孔子学院在很大程度上



要遵循这个原则。但必须注意的是，孔子学院灵活而富有中国特色的办学模式提供了孔子学院存在多种利益分配模式的可能性，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有很大的不同。孔子学院目前实行的几乎都是总部与申办方合作的模式，但孔子学院在国外的合作方可能是非营利的，也可能是营利的。不仅是民间组织，国外很多高校以营利为目的。如果合作方是非营利组织，孔子学院可能会按照当地非营利组织的模式运行，但如果合作方以营利为目的，必然会有较强烈的利益分配要求，不能排除孔子学院将部分收益分配给营利性合作方的可能性。此外，孔子学院特许经营的模式也会出现利益分配的可能。

而孔子学院的营利能力可以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教学产品的提供。孔子学院的教学内容与国内有所不同。孔子学院不仅可以应用多媒体及网络提供远程教学，还能根据对方不同的需求为政界、商界、司法界和新闻界等特定客户提供培训。孔子学院在海外提供的是最权威、最正规的教学服务，在日益增长的汉语需求市场上，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二是孔子学院在组织汉语水平考试以及师资能力认定上的垄断性。海外母语非汉语人群的汉语水平考试、认证汉语作为外语教师能力证书的考试均是由孔子学院来组织的，这就意味着孔子学院在汉语水平考试以及师资能力认定的组织上是有垄断权的。这一点远非国外其他的汉语培训机构可比。孔子学院的这种垄断性更好地发挥了国家机构推广语言文化的优势，也造就了孔子学院获得一定收益的能力。

孔子学院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孔子学院的诞生和发展，是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举措。孔子学院吸取了世界先进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经验，既具有一般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普遍性质，同时深具中国特色。当下，孔子学院仍处于建设的阶段，如何保证孔子学院在资金、师资上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在研究目的国语言政策和汉语学习者

动机的基础上不断调整，优化布局，将成为下一阶段孔子学院拓展和优化的重大课题。

#### 注释\*

<sup>1</sup> 中国国家教育部 2010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项目), 编号: 10YJC740005.

<sup>2</sup>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

<sup>3</sup> 资料来源: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http://www.hanban.edu.cn/>

<sup>4</sup> 资料来源: 英国文化委员会网站<http://www.britishcouncil.org/zh/china.htm>

<sup>5</sup> 张帆, 王红梅: 《文化的力量: 德国歌德学院的历史和启示》, 《比较教育研究》, 2006 年第 11 期, 第 26 页.

<sup>6</sup> 张西平, 柳若梅: 《研究国外语言推广政策, 做好汉语的对外传播》, 《语言文字应用》, 2006 年第一期, 第 43 页.

<sup>7</sup> 资料来源: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http://www.hanban.edu.cn/>

<sup>8</sup> 宁继鸣: 《汉语国际推广——关于孔子学院的经济学分析与建议》(博士论文)

<sup>9</sup> 华静: 《法语联盟在中国》, 《海内与海外》, 2006 年第 5 期, 第 27 页.

<sup>10</sup> 刘利平, 蒋鑫鑫: 《从歌德学院看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之路》,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1 年 5 月第 3 期, 第 84 页.

<sup>11</sup> 资料来源: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zh/china.htm>

<sup>12</sup> 国情是指一国的基本情况, 包括政治情况、经济情况以及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等.

<sup>13</sup> 国家汉办是“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

<sup>14</sup> 资料来源: <http://college.chinese.cn/>

<sup>15</sup> 孔子学院一般是中方与海外的大学或教学机构合作建立的, 教学服务对象是成年人, 而孔子

课堂是专门为海外的中、小学生设置的中文课堂。

<sup>16</sup> 资料来源: <http://wenku.baidu.com/view/>

<sup>17</sup> HSK是汉语水平考试(hàn yǔ shuǐ píng kǎo shì)的缩写。汉语水平考试(HSK)是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国内少数民族人员)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

<sup>18</sup> 解澄宇:《以孔子的名义——汉城孔子学院成立始末》,《神州学人》,2005年第9期,第33页。

<sup>19</sup> 宗焕平:《孔子学院的独特影响力》,《瞭望》,2007年第11期,第97页。

<sup>20</sup> 席格伦,华良根:《中澳文化之桥——西澳大学孔子学院》,《华人时刊》,2006年第12期,第61页。

<sup>21</sup> 陆平舟:《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模式的探索——以日本爱知大学孔子学院为例》,《南开语言学刊》,2007年第2期,第138页。

<sup>22</sup> 李侠:《孔子学院落户全球》,《国际人才交流》,2006年第6期,第47页。

# Economic Growth of Industrial Sector and Strength of Environment Regulation —— A Convergent Analysis

Cheng Zhang<sup>1</sup>, Jun Wang<sup>2</sup>, Huiyun Chen<sup>3</sup>

##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urgency of the environment problem, research on issues about environment problem has been a difficult but hot spot. However, there's few scholars study on the convergence in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 regul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ces of GDP per worker and those of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 regulation. Based on this reason, this paper studied above issues by the panel data of industrial sectors of each province in China in 1999-2008, and got conclusions as follows: (1) Among the national group and four individual groups, only some groups existed absolute convergence in the two indexes of GDP per worker an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 regulation, but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of the two indexes was existed in all groups. Specific to the convergence speed, the high-yield low-emission group per worker (group I) was slower than the high-yield high-emission group per worker (group II), the low-yield low-emission group per worker (group III) and the low-yield high-emission group per worker (group IV). (2) While the chasing group narrowed the gap in GDP per worker with group I, it was also narrowing the gap i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 regulation, but the convergence speed of the later is slower than the former's. However, the specific situations of the chasing group in 19 provinces are all different; there are four tendencies that are strong convergence, weak convergence, strong divergence and weak divergence.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environment regulation, difference, convergence

## I . Foreword introduction

From 18 to 19century,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western industrialization began to receive extensive attention and criticism (JinBei, 2009). Later in the 20century,all over the world has stepped into the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led to an outstanding issue-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hich increasingly broke up the tolerance limit of peoples. Eventually, in the

1970s many countries started the movement of protecting and regulating environment.

Scholar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once think that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ould present a “dilemma” pattern, the reason is that: From the static state angle,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ll enhance the production cost of enterprises, then reduce the labor productivity and weaken their market competitiveness (Dension, 1981; Gollop &Roberts, 1983; Gray, 1987, etc.).But this view was questioned by the scholars like Porter, etc(1991;1995); From the dynamic angle, people

thought reasonab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uld stimulate the “compensation with innovating” effect of the enterprises, thus it could not only compensate to offset the “following cost”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improve its labor productiv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Potter hypothesis" proposes let people know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re not certain to show conflicting dilemma pattern, and they have the foothold and possibilities to achieve a “win-win” pattern. Thi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got the attention of the scholars from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round the theme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 scholars at domestic and overseas have gotten quite unanimous conclusions by using distinctive researching angles, different analysis methods and different researching samples.

The investigation by the sampl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hows that our country is facing with the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genital deficiency and acquired disorders, especially the multiple pressures by accelerat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urbanization, which inevitably caused a lot of pollutant emissions before we had not yet reached the historical stage of theoretical inflection point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theory (Zhang Cheng, etc, 2010). Whether the pollution emissions which caused the average annual GDP reduced up to 10%, or the low ranking of the 105-seat in the world’s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in 2008, both of them means the country is carrying the “threshold” of environment. For our country is concern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gulation is imminent.

In fact,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economic growth, China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enhancing the attention of environment and the protection. Back in the early 1990s, China p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a basic national policy and implement it; After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CPC National congress proposed the people-centered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not only explore a new road for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innovation of the socialist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nd also actively explore to build a resource-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and to create man and nature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people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he Party’s seventeenth congress pu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one of the new requirement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faster the growth of the industrial economy is, the more the produced pollution is, and the higher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needed, but will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ve the same convergence trend as economic growth? With the gap of economic growth among provinces is getting narrow, would the gap i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them also converge?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is paper is arranged as follows: the second part i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convergence problem; the third and fourth parts a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vergence models and data description; the fifth part is convergence results and analysis; the last part is the conclusion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 **II. The brief literature on convergence**

Tracing the convergence issues, it generally began from the Solow (1956)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The model is based on some hypotheses such as perfect competition, 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 returns of marginal capital diminishing, etc, and it believed that the backward regions could have a higher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than developed regions. As the time went on, the gap of economic between backward regions and developed regions will gradually shrink, so as to converge to a steady-state level. However, Solow pointed out that the difference of savings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real world led to different steady-state level. The theory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of scholars home and abroad. First they focused on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convergenc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type of convergence. Because of the methods of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models are different, plus the different sample selection, scholars got not so consistent conclusions. In the research with the sample of the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Baumol (1986)、Mankiw et al. (1992)、Caselli (1996) and other scholars believed that there was convergence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tudies of DeLong (1988)、Mauro&Godreca (1994) and other scholars showed economic growth mostly existed divergence trend of . In the researches based on the sample of Chinese regions or sectors, whether on the convergence of economic growth or the form of the convergence has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relevant literatures could be seen from Wei Houkai(1997),Cai Fang and Du Yang(2000), Demurger (2001),Lin Yifu and Liu Mingxing(2003),Teng Jianzhou and Liang Qi(2006), Zhou Guofu et al. (2008), etc.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energy issu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gradually

there are scholars to begin to combine the environment or energy variable to analysis corresponding convergence problems, but the volume of research is still relatively small. The specific research angles are as follows: First one is to us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by considering both “good” output (GDP) and “bad” output (pollution) to estimat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n analyze its convergence (Wu Jun,2009; Yang Long and Hu Xiaozhen, 2010,etc);The second is to set the energy into the framework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o calculate the energy efficiency and analyze its convergence trend (Li Guozhang and Huo Zongjie,2009,etc); The third is to structure the variable of the energy consumption intensity based on national, provincial, industry sector or enterprise data, then analyze the convergence of energy intensity variable (Mielnik&Goldemberg , 2000 ; Wu Yuming and Jia Lin,2009, etc ); The forth is to study how degree of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the differ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bring to the changes of the differences of energy intensity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differences of energy intensity and those of economic growth (Markandya et al. , 2004 ; Qi Shaozhou etc,2007, 2010,etc ).

From the existed literature,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onvergence combined environment or energy issues have become a hot spot of research. However, if economic growth existed convergence trend, is there convergence trend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hich is caused by the pollution because of controlling economic growth? What influence will the convergence of convergence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gap give to the gap of intensity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se problems in the existed literature are rarely involved. We believe

that if economic growth in different economies exist convergence trend in theo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hich is high related with income levels should exist convergence's convergence trend, too. And the gap of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etween two economies will be narrowed as the gap of economic level shrink.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assumption, this paper will use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data to do a variety of convergence test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China's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olicy-making.

### III. The authentication method

#### 1. $\sigma$ Convergence and $\beta$ convergence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there are three analysis of convergence which are often used:  $\sigma$  convergence,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al  $\beta$  convergence (Sala-I-Martin, 1996). Convergence mostly focuses on that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per capita income in the cross-section decline with the time went on. Absolute convergence shows that under the effect of 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on capital, backward regions have a faster growth rate than developed regions, making the backward regions' income per worker converge to the developed regions. However, in reality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y preferences of each economy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making the steady-state of the different economies are not the same, which is the meaning of conditional  $\beta$  convergence. Drawing on existed literature set in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growth, we will apply it to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lated  $\sigma$  convergence model sets as follows:

(1)  $\sigma$  convergence

$$\sigma_t^Y = \left( \sum_{i=1}^n (Y_{it} - \bar{Y}_t)^2 / n \right)^{1/2} \quad (1)$$

$$\sigma_t^R = \left( \sum_{i=1}^n (R_{it} - \bar{R}_t)^2 / n \right)^{1/2} \quad (2)$$

(1) and (2) are convergence models which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GDP per worker in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an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igma_t^Y$  and  $\sigma_t^R$  are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GDP per worker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and that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Y_{it}$  and  $R_{it}$  mean

GDP per worker an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all the provinces' industrial sector in year t. If  $\sigma_t^Y < \sigma_{t-1}^Y$  and  $\sigma_t^R < \sigma_{t-1}^R$ ,  $\sigma$  convergence of GDP per worker an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ould exist.

(2)  $\beta$  convergence

According to the methods used by Barro & Sala-I-Martin (1992)、Miller & Upadhyay (2002) etc, we set the regression model of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al  $\beta$  convergence as follows:

$$(LnY_{i,t+T} - LnY_{it}) / T = \alpha_1 + \beta_1 LnY_{it} + \phi_{i,t+T} \quad (3)$$

$$(LnR_{i,t+T} - LnR_{it}) / T = \alpha_2 + \beta_2 LnR_{it} + \phi_{i,t+T} \quad (4)$$

(3) and (4) are the regression models to verify whether GDP per worker an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China's provinces exist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LnY_{it}$  and  $LnY_{i,t+T}$  are the

logarithms of GDP per worker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I-th province in year t and year t+T.  $LnR_{it}$  and  $LnR_{i,t+T}$  are the logarithms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I - th province in year t and year t+T.  $\alpha_1$  and  $\alpha_2$  are the constant term,  $\beta_1$  and  $\beta_2$  are the fitting coefficients,  $\varphi_{i,t+T}$  and  $\phi_{i,t+T}$  are the error terms. If the two values  $\beta$  are less than 0, then there is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Existed studies have generally adopted Panel Date fixed effect model to test the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and often include some control variables to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areas (Wu Jun, 2009). To modify the equation (3) and (4), we got (5) and (6) to verify the conditions  $\beta$  convergence. However, the fixed effects can already reflect the steady-state form of the different economies on their own, so adding an additional controlling variables is unnecessary (Miller & Upadhyay, 2002).

$$(LnY_{i,t+T} - LnY_{it}) / T = \alpha_3 + \beta_3 LnY_{it} + \sum_{j=1}^m \kappa_j \chi_{it}^j + v_i + \tau_t + \varphi_{i,t+T} \tag{5}$$

$$(LnR_{i,t+T} - LnR_{it}) / T = \alpha_4 + \beta_4 LnR_{it} + \sum_{j=1}^m L_j \omega_{it}^L + \psi_i + v_i + \phi_{i,t+T} \tag{6}$$

So, when we verified the conditional  $\beta$  analysis, we didn't add control variables possible, but took the double-fixed regression form of individual and time.  $v_i$  and  $\psi_i$  are the individual effects of the equations,  $\tau_t$  and  $v_t$

are the corresponding time effect. The representative meanings of the remaining variables are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3) and (4), because of the limited space, we don't repeat them again.

## 2. The convergence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ces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ose in GDP per worker

If GDP per worker in the backward areas has trend of convergence to the developed areas, GDP per worker in the two regions will continue to narrow the gap. However, whatever the enhancing of economic growth process in the backward areas is based on the basis of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or taking the road of sacrificing the environment for growth, are two different mod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ormer means that the backward areas is gradually narrowing the gap of GDP per worker with developed regions, and also gradually reducing its gap on the strength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th developed regions, which is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The latter means that although the backward areas narrowed the gap of GDP per worker between it and developed areas, but they did not put much emphasis o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can not effectively achieve a win-win pattern of both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refore, we assume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trength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the backward areas and developed areas are the function of the gap of GDP per worker in the two areas. In reference of Markandya (2004) and Qi Shaozhou (2007, 2010) and other scholars' model-based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of the intensity of energy and those of economic growth, we built the following model:

$$R_{it}^* = A \left( \frac{Y_{ht}}{Y_{it}} \right)^\eta R_{ht} \quad (7)$$

$$R_{it} = R_{i,t-1} \left( \frac{R_{it}^*}{R_{i,t-1}} \right)^\mu \quad (8)$$

$Y_{ht}$  is an average of the GDP per worker of industrial department of the developed areas in year t;  $Y_{it}$  is the GDP per worker of industrial department of I -th province in the backward areas in year t;  $R_{it}$  is an average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the developed areas in year t;  $R_{it}^*$  is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I -th province in the backward areas in year t;  $R_{it}^*$  is The index which included time-delay. In addition, A is a constant,  $\eta$  is the coefficient of elasticity of the variation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vs. the variation of the GDP per worker,  $\mu$  is an adjustable factor of time-lag.  $\delta_{it}$  is a random error. Taking the natural logarithm and organize the equations (7) and (8), we can get the following formula (9):

$$\ln\left(\frac{R_{it}}{R_{i,t-1}}\right) = \mu \ln A + \mu \ln\left(\frac{R_{it}^*}{R_{i,t-1}}\right) + \mu \eta \ln\left(\frac{Y_{ht}}{Y_{it}}\right) + \delta_{it} \quad (9)$$

Formula (9) described the convergence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ces of the strength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ose of GDP per worker of industrial sector in different areas. What  $\eta$  is more than 0 means that whenever GDP per worker between the backward areas and developed areas in the province's industrial sector

reduced 1%,it will cause the gap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between the two to convergent, the specific reduction in the range of  $\eta\%$ .

#### IV. Description of the data

In this paper, we take the industrial sector for the 1999-2008 panel data of China's 30<sup>1</sup>provinces for empirical research samples, the data used is organized and calculated based on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Statistical Yearbook", "China Environment Yearbook" in 1999-2009.

We selected GDP per worker in each province's industrial sectors as the indicator to measure economic growth, which is obtained by the industrial added value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the general in each province, divided the average of all employees. Among them, the industrial added value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as deflated according to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and the constant prices of each provinces in 1996, but this indicator of the average of all employees does not directly provided in the yearbook before 2003, so based on the equation of full labor productivity: Labor productivity = added value in industry / the average of total number of employed persons, we got the annual average number of employees of industrial sector in each province.

For the variabl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mainly measured from the following points: First, study the level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y inspecting the environmental

<sup>①</sup> Based on data availability, exclusion of Tibet,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to consider



regulatory policy ; second is to use the ratio of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s taking for the total cost or value to measure; Third, to use costs of operating pollution control facilities to measure; Forth, to take the per capita income as an indicator to measure endogen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ength; Five, to use the sewage number of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agencies by enterprises to measure; Six is to measure the changes of pollution emissions under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tc. There are some deficient of the six indicators, based on the indicators' relative improvement and the data availability; we selected the investment per worker on dealing with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each province as the measure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or the vast territory of China, how to divide rationally of provinces was the basic premise for whether the convergence analysis can more accurately reflect the reality. Currently, there are

two basic methods of classification: one is to divide on geographical location, such as three points method, four points method, or the more detailed method like six points or eight ones. The other is to divide by establishing some indicators on their own, such as by income level,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ization. Based On the second method, We construct the level of output per worker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o group China's 30 province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high-yield low-emission per worker group, high-yield high-emission per worker group, low-output and low-emissions per worker group, low-yield high-emissions per worker group. The criteria for the classification level of output is the industrial sector divided by GDP per worker, while the integrated pollution index is to be divided by constructing the entropy law model with SO<sub>2</sub> per worker, dust per worker, dust per worker, waste water per worker and solid waste per worker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groups of provinces as follows:

Table I: the grouping results based on GDP per worker and pollution emissions of each provinces' industrial sector

Group	Number	Province composed
high-yield low-emission group	11	Shanghai,Tianjin,Beijing,Hainan,Jiangsu,Guangdong,Zhejiang,Shandong, Jilin,Fujian,Hubei
high-yield high emission group	4	Hebei, Inner Mongolia, Liaoning, Yunnan
low- yield low-emissions group	4	Heilongjiang, Anhui, Jiangxi, Henan
low-yield high-emissions group	11	Shanxi,Guangxi,Hunan,Chongqing,Sichuan,Guizhou,Shanxi,Gansu,Qinghai,Ningxia,Xinjiang

## V. Empirical analysis

### 1. $\sigma$ Convergence analysis

Figure 1 shows  $\sigma$  convergence of GDP per worker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country group and four subgroups. From the general tre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GDP per worker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national group and four groups of workers didn't significantly reduced, so we could say that the index did not exist  $\sigma$  convergence. However, further studying the changes of the standard deviation, we found the trajectory of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both of the national group and high-yield low-emission group

per worker (group I) is closer, and the leading edge with the advance in the standard deviation is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as the time went on; High-yield high- emission group per worker (group II) in the period 1999-2002 showed a weak trend of divergence, but in the 2002-2005 period, it presented  $\sigma$  convergence path, then after 2005, showed a more obvious divergent trend again; Low-yield low-emissions group per worker (group III) and low-yield high-emissions group per worker (group IV) in 1999-2004 showed a slight consistent divergent trend, but after 2004, the consistency of the two groups in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rack no longer existed, which is that group IV continued to maintain a weak divergent trend, and group III showed a strong divergence trend.

We also examined the convergence i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national groups and four subgroups (Figure 2). The standard deviation i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national groups reduced a little in the individual years, but it showed a gradual expansion trend in the sample year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group I showed an obvious fluctuations in the sample years, the more interesting thing is that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group is very close in 1999 and 2008, so it is difficult to judge from the general trend of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Group II had a greater fluctuations in the initial years, then showed a clear divergence as a whole; Group III showed divergent trends in the four-year period of 1999-2002, but in the 2002-2008 period, showed the convergence trajectory;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Group IV fluctuated the most intensely in Figure 2, and showed significant divergence of trends in general, the group's standard deviation was finally the winner of the maximum standard deviation in the ups and downs in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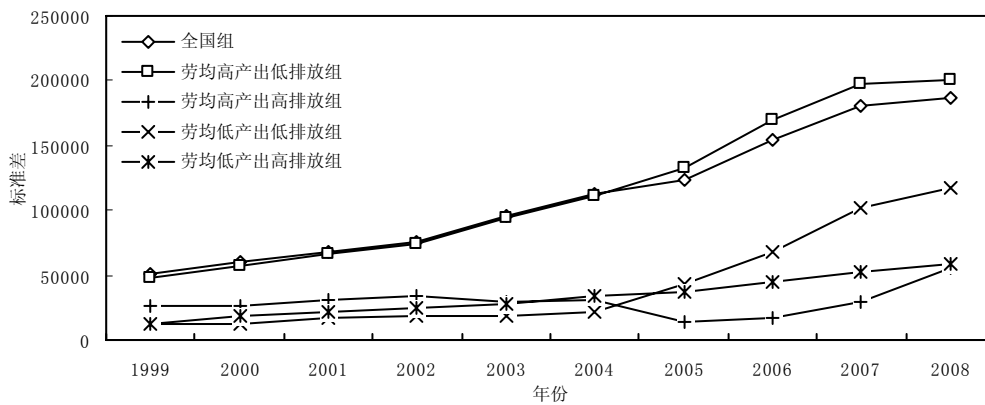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GDP per worker of Industry sector (y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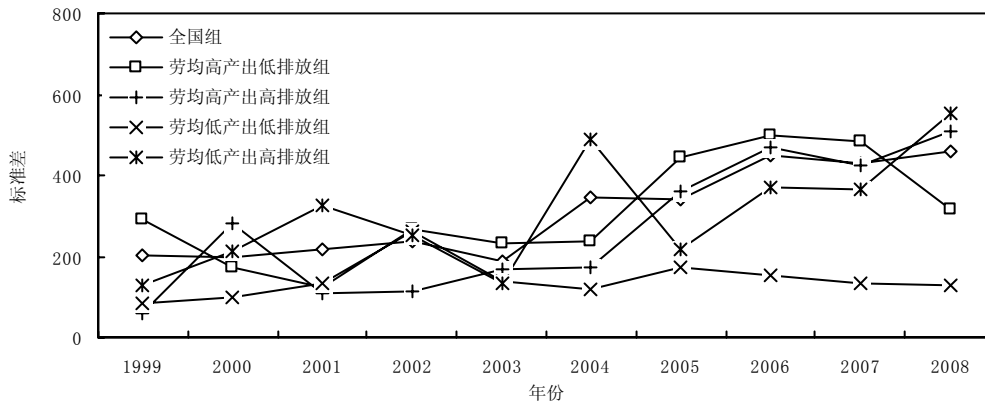


Figure 2: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Industry sector (Yuan)

**2.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analysis**

Table 2 is the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 formulas (3) and (4). On the specific estimates, we defined the annual averages of GDP per worker and the average annual pollution control expenditures per worker of each provinces in 1999-2001 as  $Y_{it}$  and  $R_{it}$ , and the annual averages of GDP per worker and the average annual pollution control

expenditures per worker of each provinces in 2006-2008 as  $Y_{i,t+T}$  and  $R_{i,t+T}$ . The two time periods separated by 7 years, so take the T 7. Fitting to the corresponding model, we found the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of both GDP per worker an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national group and four subgroups.

Table II: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test of GDP per worker an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industrial sector

	GDP per worker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lpha$	Intercept	R <sup>2</sup>	F value	$\alpha$	Intercept	R <sup>2</sup>	F value
National Group	-0.034** (-2.077)	0.558*** (2.911)	0.134	4.315**	-0.044 -1.160	0.338 1.500	0.046	1.345
Group I	-0.056 (-1.269)	0.837 (1.547)	0.152	1.609	-0.092 -1.086	0.595 1.180	0.116	1.179
Group II	-0.175*** (-21.034)	2.233*** (22.925)	0.996	442.435***	-0.024 -0.214	0.270 0.408	0.022	0.046
Group III	0.119 (0.691)	-1.209 (-0.610)	0.193	0.477	-0.219* -2.958	1.252* 3.055	0.814	8.750*
Group IV	-0.065 (-1.597)	0.905* (1.939)	0.221	2.550	-0.015 -0.341	0.186 0.739	0.013	0.116

Note: \*, \*\* and \*\*\* denote on the level of 10%, 5% and 1% are significant

First look at the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on the GDP per worker of the national group and the groups. It can be seen that, except group III, the

coefficient of the initial conditions variable  $LnY_{it}$  of the national group, group I, group II and

group IV is negative, indicating that if the province's initial GDP per worker is higher, its economic growth would be relatively slow, which means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but is this relationship significant in the statistical sense? We found that the national group and Group II could pass the t-test at 1% significance level, but group I and IV could not. The symbol of group III before the variable coefficient of the initial conditions is positive, indicating that the group's initial economy level and growth rate hav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but this result did not pass test.

From the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industrial sector, the national group and four groups' initial condition variable coefficient  $LnR_{it}$  had a negative symbol, indicating that the higher the initial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the

provinces was, the slower the rate of regulation level will be relatively, which reflects the initial level of regulation and growing speed ha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ut only group III passed t-test and F test under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10%, the fitting results of the other groups were not significant statistically. Comparing to and analyzing of  $\sigma$  convergence results of group III, we can find the  $\sigma$  convergence trend of this group from 2002 to 2008 protected its the significance of  $\beta$  convergence.

**3.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analysis**

We also used the panel date fixed-effects model to test GDP per worker an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various provinces if they existed condition  $\beta$  the convergence. In data preparation, in order to eliminate cyclical influence caused by economic

Table 3: the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test of GDP per worker an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lpha$	Intercept	$R^2$	F value	fixed effects	
						individual	time
GDP Per worker	National group	-0.598*** (-9.628)	7.132*** (9.604)	0.575	3.532***	including	including
	Group I	-0.529*** (-5.729)	6.726*** (5.735)	0.587	2.942***	including	including
	Group II	-0.629*** (-4.649)	7.806*** (4.673)	0.774	3.903**	including	including
	Group III	-0.755*** (-4.865)	9.142*** (4.887)	0.773	3.883**	including	including
	Group IV	-0.599*** (-6.202)	7.249*** (6.207)	0.621	3.399***	including	including
Investment Of Pollution Controlling GDP Per worker	National group	-0.657*** (-14.127)	4.006*** (14.159)	0.728	6.977***	including	including
	Group I	-0.434*** (-4.634)	2.641*** (4.625)	0.531	2.347**	including	including

Group II	-0.869*** (-7.217)	5.534*** (7.256)	0.874	7.938***	including	including
Group III	-0.759*** (-4.923)	4.284*** (4.961)	0.869	7.555***	including	including
Group IV	-0.757*** (-12.136)	4.693*** (12.151)	0.848	11.551***	including	including

Note: \*, \*\* and \*\*\* denote on the level of 10%, 5% and 1% are significant

cycle or some other factors, we divide the sample year into five time periods, which is 1999-2000, 2001-2002, 2003-2004, 2005-2006, 2007-2008, and then averaged each time period, thus got the formation of type (5) and (6), and since the time period is 2 years apart, so we chose T for 2. In the fitting, we selected which effect to take through redundant fixed effects test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se both of individual fixed effects and time fixed effects is superior, and got the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test results of GDP per worker an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industrial sector (Table 3).

What can be seen from the fitting results in Table III, was that the final regression results of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of GDP per worker an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national group and four subgroups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ndicating that the country as a whole and the four groups exis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which meant that the GDP per worker an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national group and four subgroups are moving closer to their own steady state. On the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speed of the index GDP per worker, the fastest is group III, then group II, group IV, group I slowest. On the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speed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four groups from fast to slow in terms as follows: group II, group III, group IV, and group I.

With the results of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in national groups and four groups, we found the national group and group II existed both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on the index of GDP per worker, while o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ly group III existed both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In addition to the other groups, there is only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but no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indicating that these groups did not converge to a common value of GDP per worker an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ut tend to their own steady-state level because of the following reason such as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dustrial structure preferences, etc.

**4. The Convergenc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differences of GDP per worker**

Above the length we've verified  $\sigma$  convergence,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of GDP per worker an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and got the conclusions such as convergence, divergence, and not so significant. But for sure, in the national group, the GDP per worker showed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trend, but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howed only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trend. We knew

that, as GDP per worker continued to improv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awarenes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ll be corresponding to increase gradually, Such as Xu (2000), Antweiler et al (2001) and CIESIN (2008) had confirmed that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and income levels correlated highly. However,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many models of GDP growth,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economic growth mode will obviously lead to different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n, when provinces in group II, group III and group IV kept shrinking the gap of the GDP per worker with group I through their growth patterns, would the value strength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onvergent with a same ratio?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analyzed the convergence of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ose of GDP per

worker based on equation (9). The data is the same as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above, the sample was divided into five year time period, and T is 2, too. As the group one in GDP per worker and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re generally ahead of other groups, so we set the corresponding variables' average values of the 11 provinces in group I in year t as the average  $Y_{ht}$

and  $R_{ht}$ . In the fitting, we selected the effect through redundant fixed effects test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only the use of individual fixed effects is superior. At the same time, taking the larg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arious provinces into account, we want to the intercept to reflect some certai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o we use variable intercept model. The corresponding regression results are on Table IV:

Table 4: the convergence test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GDP per worker

	$\mu$	$\mu\eta$	$\mu\text{LnA}$	$R^2$	F value	Fixed effects	
						individual	time
relationship convergence	1.3012*** (13.8744)	0.5173*** (2.9332)	-0.3966*** (-3.6125)	0.6819	5.8951***	including	No including
individual effects of each province				$\eta$ value of each province			
Heibei	-0.0540	Hunan	-0.1869	Heibei	0.3499	Hunan	0.2702
Inner Mongolia	-0.5334	Chongqing	0.5283	InnerMongolia	0.1695	Chongqing	-1.1974
Liao ning	-0.5107	Sichuan	-0.7747	Liao ning	0.1738	Sichuan	0.1346
Yunnan	-0.1305	Guizhou	0.1623	Yunnan	0.2991	Guizhou	0.6729
Heilongjiang	0.4942	Shanxi	-0.0566	Heilongjiang	-1.6150	Shanxi	0.3479
Anhui	-0.2314	Gansu	0.6935	Anhui	0.2511	Gansu	-0.5310
Jiangxi	-0.1503	Qinghai	-0.2605	Jiangxi	0.2883	Qinghai	0.2399
Henan	0.5495	Ningxia	0.2814	Henan	-1.0313	Ningxia	1.3691
Shanxi	0.0205	Xinjiang	0.3707	Shanxi	0.4193	Xinjiang	6.0884
Guangxi	-0.2114			Guangxi	0.2593	Overall	0.3976

Note: \*, \*\* and \*\*\* denote on the level of 10%, 5% and 1% are significant

It can be seen,  $\mu$ ,  $\eta$  and  $\mu \ln A$  all passed the  $t$  test, and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model is strong. With  $\mu \eta$  divided  $\mu$ , got the overall  $\eta$  value (0.3976), which is greater than 0, indicating whenever the gap of GDP per worker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19 provinces of the whole nation except group I reduced 1% each, it will cause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both of them convergent 0.3976%, far slower than the convergence rate of the catch-up group in GDP per worker. This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catch-up group continued to narrow the gap of GDP per worker between group I with time went on, but the corresponding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not the same percentage increased, or that the chasing group had lag of consciousness with economic growth in the management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on the growth.

As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chase group among the provinces,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changing intercept effect to analyze the corresponding individual effects, and then find the  $\eta$  value of the catch-up group of the provinces. In the chase group of 19 provinces, the value of the four provinces Heilongjiang, Henan, Chongqing and Gansu are negative, indicating that  $\eta$  on GDP per worker of the four provinces reduced 1% each with group I, the gap in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ength will expand 1.6150%, 1.0313%, 1.1974% and 0.5310%, the first three provinces'  $\eta$  value is less than 0, which are belonging to strong divergence,  $\eta$  value of Gansu is between -1 and 0, which is weak divergence. The  $\eta$  value of the remaining 15 provinces like Hebei, Inner Mongolia, is positive, indicating that GDP per worker in these provinces reduced 1% each, their gap on the strength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th group I will continue to

narrow. The provinces Ningxia and Xinjiang's  $\eta$  values are greater than 1, showing a strong convergence trend. That is, their reducing speed in the difference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GDP per worker. The remaining 13 provinces'  $\eta$  value are between (0, 1), belongs to the weak convergence. The reducing speed in the difference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slower than the speed of GDP per worker. From fast to slow in the order is Guizhou, Shanxi, Hebei, Shaanxi, Yunnan, Jiangxi, Hunan, Guangxi, Anhui, Qinghai, Liaoning, Inner Mongolia and Sichuan.

## VI. Conclusions

This paper studied above issues with panel data of industrial sectors of each provinces of China in 1999-2008, and divided the 30 provinces into 4 groups by the indexes of outpu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igh-yield low-emission group per worker (group I), high-yield high emission group per worker (group II), low-output low emissions group per worker (group III) and low-output high-emission group per worker (group IV). Then, based on the data of national group and four groups we examined their  $\sigma$  convergence and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in GDP per worker an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inal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onvergence in GDP per worker an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First, through  $\sigma$  convergenc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on the index of GDP per worker, only group II convergent in a short time, other groups and national group had not found  $\sigma$  convergence trend yet. From the entire sample

years, group I and group III divergent faster than the group II and group IV. O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of national group and four groups all showed a more significant fluctuation. However, the trends of volatility are different, after the volatility group I maintained the same level of standard deviation in the initial years, group II, group IV and national group showed divergent trends in the fluctuations. The group III in the sample years showed a first divergent After convergence trend.

Second, by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analysis, we believed that on the indicators of GDP per worker, the national group and group II both existed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group I, group III and group IV only existed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On the indicators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ly group III existed both absolute  $\beta$  convergence and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the national group, group I, group II, and group IV only existed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On each indicator, if the group both existed absolute  $\beta$  convergent and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it indicated that there are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club-convergence on them, but the group which merely existed condition  $\beta$  convergence did not exist the same club convergence trend, and tended to their respective steady-state level.

Third, the tes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ces i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differences in convergence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catch-up group as a whole shrunk the gap of GDP per worker, it also continued to narrow the gap of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th group I, but the latter's rate of convergence was slower than the former's. The specific situations of the chase

group of 19 provinces were of various shapes, including, when the four provinces of Heilongjiang, Henan, Chongqing and Gansu shrunk the gap of GDP per worker with group I, the gap i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between them was expanding; Ningxia and Xinjiang's convergence rate i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with group I is faster than the rate in GDP per worker, while the rest 13 provinces like Guizhou, Shanxi are opposite.

Through the above analysis, we know that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of the national group and the four subgroups in the GDP per worker and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specially when the catch-up group narrowed its gap in the GDP per worker with group I, The speed of improvement fo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tection is not so consistent. Base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group I set a good example on "win-win" situ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the country, and it also contains differe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different provinces in the catch-up group. For the provinces in group II, the industry they should increase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regulatory efforts when pursuing high economic growth to reverse adverse pattern of the high industrial growth and low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For the provinces in group III, further improving the economic level is still the focus of future work, but maintaining and improving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especially guard against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the two provinces of Heilongjiang and Henan on gradual weakening trend; Group IV is the one whose position is the most difficult of four, so it should be developing not only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in the future, this "win-win" situ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on achieving a reasonab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olicy, stimulating enterprises to innovate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of technology, so let the theoretical possibility of Porter's "innovative compensation" effect could be an existence of a reality.

**注释**

<sup>1</sup> Cheng Zhang (张成), 日本爱知大学大学院中国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入学, 现在在学中;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sup>2</sup> Jun Wang (王君),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硕士研究生.

<sup>3</sup> Huiyun Chen (陈慧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Reference**

[1] Cai Fang, Du Yang: The convergence and differences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strategy of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the economy resource, in 2000, the 10 th period.

[2] Jin Bei: The theoretical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of resourc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the no. 3, 2009.

[3] Li Guozhang, Huo Zongjie: China's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convergence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based on the 1995-2006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empirical studies, economic review, 2009, 6.

[4] Lin Yifu, Liu Mingxing: the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world

economy, 2003, 8.

[5] Lu Yang: Did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de of pollution -intensive goods?, the economic research, no.4, 2009.

[6] Ji Shaozhou, lee Kai: The convergence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intensity's differences of regional department, the economy research, no. 2, 2010.

[7] Ji Shaozhou, Luo Wei: The convergence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intensity's differences of the China, the economy research, 2007, 7 th period.

[8] Teng Jianzhou, Liang Qi: Do the China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 ---based on time series random con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study, the management of the world, 2006, 12 th period.

[9] Wei Houkai: the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y, no. 3, 1997.

[10] Wu Ju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nalysis of China's industry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environment, Technical economy of quantity economic, 2009, 11 th period.

[11] Wu Yuming, Jia Lin: The study of the convergent randomness of the efficiency of the regional energy in China' area, the economic science, 2009, 6.

[12] Yang Long, Hu Xiaozhen: Based on the DEA the differences and convergence analysis of China's regional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the economist, no. 2, 2010.

[13] Yu Tongshen, Zhang Che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panel co integration test based on the data China's industrial department, the study and exploration, no. 2, 2010.

- [14] Zhang Cheng, Yu Tongshen: Do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ve influence on the China's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the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DEA and cointegration analysis, the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no. 3, 2010.
- [15] Zhao Ho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impact of Chinese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economic management, 2007 the 21 st period.
- [16] Zhou Guofu, Xia Xiangqian: The convergence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based on empirical data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statistics study, 2008, 11 th period.
- [17] Antweiler, W. , Copeland, B. R. and Taylor, M. S. , 2001, "Is Free Trade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pp. 877~908.
- [18] Barro, R. J. , Sala-I-Martin, X. , 1992,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0, pp. 223~251.
- [19] Baumol. W. J. , 1986, "Productivity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 What the Long-run Data Sh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6, pp. 1072~1085.
- [20] Berman, E. , Bui, L. T. M. , 2001,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Oil Refineri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 VOL. 83, pp. 498~510.
- [21] Brunnermeier, S. B. , Cohen, M. A. , 2003 ,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VOL. 45, pp. 278~293.
- [22] Caselli, F. , Esquivel, G. and Lefort, F. , 1996, "Reopening the convergence debate: A new look at cross-country growth empiric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 pp. 363~389.
- [23] CIESIN , 2008 , "2005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 Internet: <<http://www.ciesin.columbia.edu/indicators/ESI>>.
- [24] Delong, J. B. , 1988, "Productivity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 Comment"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8, pp. 1138~1154.
- [25] Demurger . S . , 2001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xplanation for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29, pp. 95~117.
- [26] Denison, E. F. , 1981, "Accounting for Slower Economic Grow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70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47, pp. 1191~1193.
- [27] Domazlicky, B. R. , Weber, W. L. , 2004, "Do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ead to Slowe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Chemical Industry?",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VOL. 28, pp. 301~324.
- [28] Gollop, F. M. , Roberts, M. J. , 1983,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the Case of Fossil-Fueled 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1, pp. 654~674.
- [29] Gray, W. B. , 1987, "The Cost of Regulation: OSHA, EPA and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7, pp. 998~1006.
- [30] Lanoie, P. , Patry, M. and Lajeunesse, R. , 2008 ,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Testing the Porter Hypothesis",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VOL. 30, pp. 121~128.

- [31] Mankiw, N. G. , Romer, D. and Weil, D. N. , 1992,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7, pp. 407~437.
- [32] Markandya. A. , Pedroso, S. and Streimikiene. D, 2004, “energy efficiency in transition economics: is there convergence towards the EU Average”, FEEM Working Paper, No. 89. 04.
- [33] Mauro, L. , Godrecea, E. , 1994, “The Case of Italian Regions: Convergence or Dualism”. *Economic Notes*, VOL. 23, pp. 447~472.
- [34] Mielnik. O. , Goldemberg, J. , 2000, “Converging to a common pattern of energy use in developing an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Energy Policy*, VOL. 28, pp. 503~508.
- [35] Miller. S. M. , Upadhyay, M. P. , 2002,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Industrializ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Energy Policy*, VOL. 29, pp. 769~775.
- [36] Porter, M. E. , 1991, “America’s Green Strategy”,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64, pp. 168.
- [37] Porter. M. E. , Van Der Linde, C. , 1995,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9, pp. 97~118.
- [38] Sala-I-Martin. X. X. , 1996, “The Classical Approach to Convergence Analysis” , *Economic Journal*, VOL. 186, pp. 1019~1036.
- [39] Sancho, F. H. , Tadeo, A. P. and Martinez, E. , 2000,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 Application to Spanish Wooden Goods and Furnishings Industry”,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VOL. 15, pp. 365~378.
- [40] Solow. R. M. ,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0, pp. 65~94.
- [41] Xu, X. H. , 2000,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How Effective is ‘Eco-dumping’?”, *Economic Modeling*, VOL. 17, pp. 71~90.



## 中国の食肉製品輸出企業における中国国内販売へのシフト要因 —対日輸出に関する規制の観点から—

佐藤敦信<sup>1</sup>

### 要旨

本稿では、畜産物・食肉製品を事例として、近年、中国における一部の日系食品企業等でみられる対日輸出から中国国内販売への転換の要因について、対日輸出にかかる規制と中国産の違反状況から考察した。畜産物・食肉製品の対日輸出については、農林水産省による偶蹄類加熱処理施設の認可が挙げられる。日本では家畜伝染予防法に基づき、2007年に家畜衛生条件として、悪性の家畜伝染病の発生地域から輸入される偶蹄類の食肉については、農林水産省の認可を受けた施設で加熱処理し、輸出国の政府機関が発行した検査証明書を添付することが義務付けられている。しかし、とりわけ加熱食肉製品(包装後加熱)、加熱食肉製品(加熱後包装)、冷凍食品においては、中国産は検査数量に比例して違反数量も突出している。2007年前後を比較しても違反数量の減少といった顕著な変化はみられない。違反の原因についてみると、依然として作業員への指導の不徹底、使用する原料の管理不足といった問題が散発している。違反事例が発生した場合、言うまでもなく、対日輸出量そのものにも影響を与える。つまり、中国の食肉製品企業にとっては、従来の対日輸出のみではリスクとコストが増大する傾向にあり、新たな市場を開拓する取組みが求められ、中国国内販売もその方策の1つとして挙げられよう。

キーワード：食肉製品、中国国内販売、食品安全

### I. はじめに

中国に進出した一部の日系食品企業においては、従来から続く対日輸出だけではなく、新たに中国国内販売に注力する取組みがみられる。この要因として、次の2点が考えられる。1つは、中国市場における高品質食品の需要や食品摂取量の増大である。言うまでもなく、中国では急速な経済成長とともに一人当たりGDPは上昇傾向を示してきた。そして、所得向上とともに都市部を中心に、高所

得者層では高品質食品への需要が増大していると推測される。もう1つは、主要輸出先である日本における規制である。日本は開発輸入を目的に中国へ進出し、日系食品企業は対日輸出用食品の生産基地としての機能を有してきた。しかし、2002年に中国産冷凍野菜から基準値を上回る残留農薬が検出され対日輸出企業において品質管理システムの構築が不可欠になった残留農薬問題や、その後のポジティブリスト制度の施行等に見られるように、対日輸出にかかる規制は強化されてきた。

中国における需要を新たに獲得しようとす

る方策には依然として物流面や特殊な商習慣等の面で課題が残されているものの、中国国内販売への取組みが長期的に継続された場合、中国市場でのシェアをさらに拡大させていく可能性も考えられる。そこで本稿では、先行研究と農業部農産品貿易弁公室、農業部農業貿易促進中心『中国農産貿易発展報告』や厚生労働省医薬食品局食品安全部「輸入食品監視統計」等の関連する資料から、中国産食品の輸出金額の推移や輸出食品の基準違反状況について整理する。その上で、日系食品企業の中国市場進出への今後の展開方策について考察したい。そのため本稿では、上記の中国国内販売に至る両要因のうち、とりわけ後者の要因について整理し考察を加える。というのも、規制が付加されたとはいえ、依然として日本における食品供給において中国産は重要な位置付けにあり、中国国内販売への取組みは中国市場だけではなく日本市場にとっても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可能性もあるためである。また、本稿では主に畜産物・食肉製品に焦点を当てる。それは、野菜等で対日輸出にかかる規制が強化されているのと同様に、畜産物・食肉製品においても規制が付加されている一方で、中国においては、とりわけ動物性タンパク質の摂取量が顕著に伸びているからである。そして、一部の食肉製造企業においては対日輸出だけではなく中国国内販売に着手するという動向もみられる。よって、これらの点の検討は、日中における食肉製品供給の今後の展開を考察するうえで不可欠になると考えられる。

## II. 先行研究のサーベイ

現在、中国に進出している企業の業種は多岐にわたっていることから、まずそれら多くの業種の中での食品産業の動向について整理したい。本稿では、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

トロ）海外調査部[11]における2010年のアンケート調査結果をもとにする。この資料によると、現地市場開拓へ向けた今後の取組み方針について、「現地市場開拓を（輸出よりも）優先する」もしくは「現地市場開拓と輸出に同じ優先度で取り組む」と回答している企業は、食料品分野では全体の90.9%を占めている。製造業全体では81.4%であることから、食料品分野では製造業の中でも中国国内販売への注力に比較的高い積極性が見られると言えよう<sup>2</sup>。そして、高村[8]では2007年に企業所得税にかかる二免三減政策が廃止されたことや人件費が高騰していること等により輸出志向の企業が行き詰まりをみせていると指摘している。

このような状況下で、中国における食品企業の中国国内販売については、研究成果も蓄積されつつあり、以下の点がこれまで明らかにされている。

石塚[1]は日系食品企業の中国進出状況を踏まえた上で、自社のアンテナショップの開設等による中国国内販売の課題について明らかにしている。また菊地[5]は、中小規模の野菜生産企業を事例として、大都市の高級ホテルを顧客とした事例対象企業の販売戦略の課題について言及している。成田[10]では対日輸出企業が輸出環境の変化に伴い新たに中国国内販売に着手した経緯と自社の宅配事業等を通じた販路拡大に関する課題について言及されている。根師[12]は対日緑茶輸出企業における原料調達から販売までのシステムについて、輸出経営権の開放や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産緑茶の需要減少によって、事例企業では対日輸出からの撤退や中国国内販売の拡大等の動向がみられると指摘している。

さらに、黄[6]では、中国国内販売における物流インフラの構築の必要性について言及し、同課題に対して伊藤忠商事は中国および台湾の食品・流通最大手の頂新グループと提

携し、資源開発から小売までの戦略的統合システムの構築を図っていると指摘している。独立行政法人農畜産業振興機構編 [9] は、中国に進出した日本企業が現地で野菜生産と酪農に着手し、各事業部門を跨いだ循環型農法を形成している点と、生産した牛乳を都市部へ販売している点について言及している。

これらの成果のうち、成田 [10] では、残留農薬問題等の食品安全を取り巻く環境が、根師 [12] では上述のとおり緑茶の日本における市場縮小が、それぞれ中国国内販売への転換要因となっていると指摘している。しかし、畜産物・食肉製品の対日輸出から中国国内販売へ至る転換要因については、後述するように食肉製品を対象とした日本の輸入規制もあるため別個に検証する必要がある、未だ研究が不足していると捉える。

### Ⅲ. 中国における畜産物生産・貿易の概況

中国では農村部と都市部で格差が存在するものの、経済成長とともに消費者の食品摂取量が増加傾向にあり、とりわけ都市部において顕著である。佐藤他 [7] では中国の食生活に注目し、同国消費者による食品摂取量は地域・所得層等により差異がみられるものの、概ね、都市部の若年層で高所得者層に位置している消費者において、畜産物、牛乳類等の摂取が拡大しており、動物性タンパク質中心の食生活へと移行していると指摘している。このことから、動物性タンパク質を含む食品において特に中国において需要が拡大していると捉えられる。そのため、食品の中でもとりわけ畜産物に注目していきたい。

#### 1. 拡大する畜産物生産

まず、中国における畜産物生産量について概観しよう。表 1 は中国の畜産物のうち豚肉、鶏肉、牛肉の生産量の推移を表したものであ

る。いずれも生産量は概ね増加傾向にあり、2000 年にはそれぞれ 4,075.2 万 t、906.4 万 t、479.5 万 t であったのに対し、2010 年には 5,172.0 万 t、1,185.3 万 t、623.6 万 t になっている。そして、その中でも豚肉の生産量が大きなシェアを占め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周知のとおり、これら 3 品目を加工して製造されている食肉製品は多種多様であり、統計上の制約から各製品の生産量の把握は困難であるが、3 品目のこれまでの増加率はほぼ同程度であることから、今後も豚肉を中心とした食肉製品の製造が拡大していくと捉えられる。

表 1 中国における畜産物生産量の推移

単位：万 t

年次	豚肉	鶏肉	牛肉
2000年	4,075.2	906.4	479.5
2001年	4,165.4	885.1	472.9
2002年	4,232.3	917.3	485.3
2003年	4,343.3	944.8	514.1
2004年	4,447.9	948.4	529.5
2005年	4,662.2	996.5	535.7
2006年	4,759.1	1,016.5	549.9
2007年	4,393.3	1,061.6	584.6
2008年	4,719.0	1,130.4	584.1
2009年	4,987.9	1,144.3	606.1
2010年	5,172.0	1,185.3	623.6

資料：FAOSTAT (<http://faostat.fao.org/>)  
より作成。

#### 2. 畜産物貿易における日本の位置付け

次に中国における豚肉・鶏肉・牛肉の貿易概況について述べる。表 2 は上記 3 品目の輸出入双方の推移について表したものである。近年、輸出では日本をはじめとする有力市場における需要が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から、2008 年を除き 3 品目の合計金額は輸入を上回っている。ただし、輸入についても 2009 年に鶏肉と豚肉で減少がみられるものの、同年と 2006 年を比較すると大きく増加し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この要因としては、中国においてしばしば「食の洋風化」とも表現される食生活の

変容（動物性タンパク質の摂取拡大）がみられる点等が考えられる。都市部を中心に外資系も含めた外食産業等が拡大しており、これ

らへの業務用加工製品の供給についても製造企業にとっては重要視されることから、今後、輸入についても伸びていくと推測される。

表2 中国における豚肉・鶏肉・牛肉の輸出入金額の推移 単位：百万米ドル

年次	輸出			輸入		
	豚肉	鶏肉	牛肉	豚肉	鶏肉	牛肉
2006年	982.9	932.6	182.6	160.1	480.9	na
2007年	908.3	1,059.9	194.2	469.8	964.5	57.9
2008年	956.5	986.3	203.1	1,101.6	1,117.5	61.9
2009年	895.9	1,022.2	165.7	526.5	1,014.2	135.0

資料：農業部農産品貿易弁公室，農業部農業貿易促進中心『中国農産品貿易発展報告』各年版より作成。

表3 中国の畜産物輸出金額に占める主要輸出先 単位：億米ドル

年次	総輸出金額	香港		日本		ドイツ		米国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1995年	28.3	7.6	26.8	7.2	25.5	2.1	7.4	1.2	4.3
2000年	25.9	6.1	23.6	9.9	38.2	1.2	4.6	2.1	8.1
2001年	26.7	6.0	22.5	10.2	38.1	1.2	4.5	1.8	6.7
2002年	25.7	6.1	23.7	9.3	36.2	0.9	3.5	2.1	8.2
2003年	27.1	6.5	24.0	8.9	32.9	0.6	2.2	2.4	8.9
2004年	31.9	7.3	22.9	10.0	31.4	0.9	2.8	3.1	9.7
2005年	36.0	8.0	22.2	11.9	32.9	1.8	5.0	3.2	8.9
2006年	37.2	8.1	21.8	12.6	33.9	2.0	5.4	2.9	7.8
2007年	40.5	9.9	24.5	12.9	31.8	2.2	5.4	3.1	7.7
2008年	44.1	12.3	27.8	11.0	25.0	3.0	6.8	3.1	7.0
2009年	39.1	11.8	30.2	10.5	26.9	2.7	6.9	2.4	6.1

資料：農業部農産品貿易弁公室，農業部農業貿易促進中心『中国農産品貿易発展報告』各年版より作成。

さらに表3は、中国の畜産物輸出に注目し、輸出金額に占める上位4カ国の輸出先のシェアについて示したものである。本表で注目すべき点は総輸出金額に占める日本の比率の低下である。近年、対日輸出金額は11億ドル前後で推移しているが、輸出先としての比率をみると、2000年には総輸出金額の38.2%を占めていたのに対して、2009年には26.9%となっている。また、2007年までは概ね増加傾向を示してきたのに対して、同年以降では減少傾向になっている。すなわち、先述した畜産物生産量の増加に伴い、輸出金額も増加してきたが、2000年の時点で輸出先第一位であっ

た日本は徐々にそのシェアを低下させており、その一方で日本以外の輸出先が拡大しているのである。例えば、香港をみると、2009年に若干減少したものの、2001年から増加傾向にあり、2008年には日本に代わり輸出先第1位となっている<sup>3</sup>。また、香港、日本に次ぐ輸出先であるドイツや米国についても、上記2地域と比較すると規模は小さいが、それぞれ徐々に増加している。また、総輸出金額が概ね増加傾向を示していることから、上記4地域以外への輸出も徐々に拡大しつつあると捉えることができる。日本は依然として総輸出金額において大きなシェアを占めており、中

国側にとって有力な市場と位置付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が、輸出先としての重要性は徐々に低下していると捉えることができよう。このことから、今後は対日輸出だけではなく、中国国内販売もしくは輸出先の多角化が進展していくと推察される。そこで、次では中国の畜産物・食肉製品の供給先において対日輸出の位置付けの相対的低下がみ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要因について、対日輸出にかかる規制の観点から整理する。

#### IV. 対日輸出の規制によるリスク増大

先述のとおり中国における日系食品企業の輸出環境をみると、2002年に中国産冷凍野菜から基準値を超えた残留農薬が検出されて以降、品質管理システムの構築や日本のポジティブリスト制度の施行等に対する取組みが厳格化されており、これらの課題について言及した研究も蓄積されてきた。先行研究では事例対象として、冷凍野菜をはじめとする野菜類を事例としたものがほとんどである。しかし、食肉製品においても規制が付加されていることから、以下ではその規制内容と対日輸出企業への影響、さらに日本における違反数量への影響についてみていく。

##### 1. 対日輸出における規制

食肉製品の対日輸出については、規制として農林水産省による偶蹄類加熱処理施設の認可が挙げられる。日本では家畜伝染予防法に基づき、2007年に家畜衛生条件として、悪性の家畜伝染病の発生地域から輸入される偶蹄類の食肉については、農林水産省の認可を受けた施設で加熱処理し、輸出国の政府機関が発行した検査証明書を添付することが義務付けられている。さらにこの条件では、①施設認可の申請の際には輸出国の経費負担で立ち入り検査をすること、②輸出国の家畜衛生局

は少なくとも半年ごとに施設を巡回し、指定基準に適合しない場合は輸出を停止すること（当該指定の取消しも含む）、③施設の改築・増築の際には、輸出国の経費負担により調査を実施すること等が規定されている。つまり、偶蹄類加熱処理施設の認可基準の導入によって、輸出側では新たなコストとリスクが発生することになり、かつ認可基準に基づく施設管理が不可欠となった。認可を受けた施設の所在地域は2010年時点で中国、タイ、アルゼンチン、ブラジル、台湾、ウルグアイ、韓国、マレーシアであり、その中でも中国は最も多く、113施設が認可を受けている<sup>4</sup>。

##### 2. 中国産食肉製品の基準違反動向

次に、偶蹄類加熱処理施設の認可基準の導入が対日輸出に与えた影響について、日本における輸入食肉製品の違反状況からみていく。表4はその違反数量を国別に示したものである。日本にとっての主要輸出国であることから、乾燥食肉製品、加熱食肉製品（包装後加熱）、加熱食肉製品（加熱後包装）、冷凍食品のほとんどで中国が検査数量で第1位となっている。その一方で、とりわけ加熱食肉製品（包装後加熱）、加熱食肉製品（加熱後包装）、冷凍食品においては、検査数量に比例して違反数量も突出している。違反率についてみると、中国産はタイ産等よりも若干低いものの、上述のとおりこれらの製品の輸入量において中国産は上位を占めていることから、中国産の違反が日本の食肉製品市場に与える影響は大きいと捉えられる。また偶蹄類加熱処理施設の認可基準導入の2007年前後を比較しても違反数量の減少といった顕著な変化はみられない。そこで、違反数量が減少しない要因についてみてみよう。厚生労働省「輸入時における輸入食品違反事例速報」<sup>5</sup>から違反の原因についてみると、作業員への指導の不徹底等対日輸出企業内の加工段階で発生した要因だけ



ではなく、使用する原料の管理不足等のように企業外の要因（原料段階）によるものも含

表4 中国産食肉製品等の違反数量の推移

単位：t

年次・年度	乾燥食肉製品			非加熱食肉製品			加熱食肉製品（包装後加熱）		
	輸出国	検査数量	違反数量	輸出国	検査数量	違反数量	輸出国	検査数量	違反数量
2004年	中国	14	0	イタリア	128	0	中国	3,018	36
	米国	32	0	米国	25	0	デンマーク	165	0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	15	0	マレーシア	0	0	米国	185	0
2005年	中国	25	0	イタリア	162	0	中国	2,250	15
	米国	15	0	米国	36	0	デンマーク	249	0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	29	0	スペイン	20	0	米国	135	0
2006年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	38	0	イタリア	204	0	中国	2,636	9
	中国	11	0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	12	0	デンマーク	348	0
	アルゼンチン	24	0	スペイン	47	0	米国	260	0
2007年度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	38	0	イタリア	248	1	中国	2,551	1
	中国	31	0	スペイン	68	0	デンマーク	482	0
	アルゼンチン	10	0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	23	0	米国	448	2
2008年度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	29	0	イタリア	268	1	中国	7,077	24
	アルゼンチン	0	0	スペイン	83	0	米国	393	0
	中国	35	0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	18	0	デンマーク	398	0
2009年度	中国	471	1	イタリア	614	4	中国	10,431	16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	36	0	スペイン	88	1	米国	811	0
	アルゼンチン	30	0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	22	0	デンマーク	415	0
2010年度	中国	792	0	イタリア	588	6	中国	13,930	21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	60	0	スペイン	135	5	米国	751	0
	タイ	19	0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	60	0	デンマーク	426	0

年次・年度	加熱食肉製品（加熱後包装）			冷凍食品 （乾燥食肉製品、非加熱食肉製品、加熱食肉製品に該当するものを除く）		
	輸出国	検査数量	違反数量	輸出国	検査数量	違反数量
2004年	中国	22,428	18	中国	15,031	76
	タイ	4,339	0	タイ	709	0
	米国	610	3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	0	0
2005年	タイ	5,457	34	中国	11,852	56
	中国	17,575	46	タイ	895	12
	米国	705	3	フランス	2	0
2006年	中国	16,002	45	中国	8,155	18
	タイ	6,030	9	タイ	578	22
	米国	1,035	29	韓国	4	0
2007年度	中国	10,887	32	中国	8,290	29
	タイ	6,929	4	タイ	498	19
	米国	765	3	フィリピン	1	0
2008年度	タイ	9,099	2	中国	25,066	42
	中国	77,560	186	タイ	1,119	33
	米国	1,131	22	フィリピン	13	0
2009年度	タイ	9,720	3	中国	35,854	136
	中国	102,525	87	タイ	1,172	15
	米国	937	10	フィリピン	0	0
2010年度	タイ	9,964	57	中国	49,601	54
	中国	143,689	46	タイ	1,196	9
	米国	995	0	フィリピン	2	2

資料：厚生労働省医薬食品局食品安全部「輸入食品監視統計」各年版より作成。

注1：輸出国は届出件数の上位3カ国を抽出している。

注2：表中の数値については、0と表記されていても、0の場合と1未満の場合の双方のケースがある。

注3：統計上の制約から、2006年までは年次ベース、2007年からは年度ベースとなる。

まれている。先述の偶蹄類加熱処理施設の認可およびそれに伴う検査体制の構築にもかかわらず違反数量が突出している要因としては、他地域と比較して突出した対日輸出量と、対

日輸出企業内外での管理不備が挙げられよう。そして、このような違反事例が発生した場合、対日輸出量そのものにも影響を与える可能性も指摘できる。つまり、中国の食肉製品企業

にとっては、従来の対日輸出のみではリスクとコストが増大する傾向にあり、新たな市場を開拓する取組みが求められ、中国国内販売もその方策の1つとして挙げられよう。

## V. おわりに —中国国内販売拡大を促進する要因の整理—

中国において、とりわけ日系食品企業が中国国内販売へ注力する要因としては、内的要因（中国国内における高所得者層の増加、動物性タンパク質の摂取拡大）と外的要因（対日輸出における規制の付加）に分類することができよう。そして、本稿では、両要因のうち主に外的要因が対日輸出企業に与える影響について考察した。安価な人員の大量確保を目的とした開発輸入等により中国に進出したこともあり、多くの日系食品企業において対日輸出のシェアは依然として少なくない。そして、日本においても中国産食品のシェアは高いことから、総輸入に占める違反数量の比率は高くはないものの、本稿で触れたように複数の違反事例が報告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のことから、日本における違反摘発や規制の付加は対日輸出企業にとって、今後、対日輸出一辺倒の戦略からの転換を図る重要な要因になる可能性が指摘できる。ただしその場合、今後、以下の点について検証する必要があるだろう。

まず、中国国内販売と対日輸出との品質基準の比較である。中国国内消費者向けの製品についても高品質化が求められており、すでに一部の企業では対日輸出の品質管理経験に基づき輸出から中国国内販売へ転換し販路を拡大させているケースもみられる。しかし、中国国内販売における食品安全管理基準については今後さらに整理する必要があるだろう。

次に、食品企業における輸出の位置付けがどのように変化するかである。従来の対日輸

出から中国国内販売一辺倒の戦略へと転換するのか、もしくは輸出は継続するものの輸出先の多角化を指向するのかがどうかについては、長期的に検証を続け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だろう。なぜなら、中国国内でも需要は高まっていると推察されるものの、中国国内販売においては物流インフラの構築や代金回収問題等依然として課題が残されているためである。さらに、対日輸出についても表3で示したとおり、規制が付加されたものの日本国内において中国産の需要は高く他国と比較しても大きなシェアをもっている。

これらの課題については別途検証していきたい。

### 脚注\*

<sup>1</sup> 愛知大学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ICCS研究員。

<sup>2</sup>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海外調査部[11]では、製造業として、木材・パルプ(中国国内販売への注力・意欲がみられる比率は100.0%)、輸送機械器具(同95.1%)、化学・医薬(同89.6%)、一般機械器具(同95.8%)、ゴム・皮革(同83.3%)、鉄・非鉄・金属(同81.7%)、精密機械器具(同84.2%)、電気機械器具(同70.9%)、繊維(同61.0%)が挙げられており、いずれも中国国内販売への高い意識が見られる。

<sup>3</sup> ただし、言うまでもなく輸出先としての香港は、ゼロ関税であることから第三国への輸出における中継地としての位置付けも考えられる。中国で生産された製品が香港を中継し、どの国・地域へ輸出されているのかについては別途検証したい。

<sup>4</sup> 中国以外の企業数は、タイ28、アルゼンチン7、ブラジル6、台湾5、ウルグアイ5、韓国2、マレーシア1となっており、中国が突出してい

る。このことから、中国では他地域と比較して対日輸出の継続を図る企業が多く、個々の企業が製造している製品と数量によって差異はあるものの、日本の食肉製品の重要な供給拠点として位置付けられると推測できる。

<sup>5</sup> 「輸入時における輸入食品違反事例速報」(<http://www.mhlw.go.jp/topics/yunyu/ihan/>)を参照。

**\*参考文献**

- [1] 石塚哉史「日系食品企業における中国進出と企業行動の今日的展開」『農業市場研究』第20巻第2号(通巻78号), 2011年9月, pp.40-45
- [2] 荒木正明「駐在員の眼 内販を強化する日系食品企業」『中国経済』2009年5月号, 2009年5月, pp.23-34
- [3] 江田真由美「日系企業の食品ビジネス — 国内市場の開拓」『中国経済』2006年6月号, 2006年6月, pp.2-7
- [4] 菊地昌弥『冷凍野菜の開発輸入とマーケティング戦略』農林統計協会, 2008年
- [5] 菊地昌弥「上海市における日系野菜製造企業の販売戦略」『農業市場研究』第19巻第4号(通巻76号), 2011年3月, pp.68-74
- [6] 黄孝春「総合商社における中国ビジネスの進化」杜進編『中国の外資政策と日系企業』勁草書房, 2009年
- [7] 佐藤敦信・菅沼圭輔「中国における食生活の変容の年齢層・所得階層・地域別差異」『ICCS 現代中国学ジャーナル』第4巻第1号, 2011年11月, pp.40-55
- [8] 高村幸典「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企業の今後の動向: 中国を生産拠点から消費市場へ」『中国経済研究』第6巻第1号, 2009年3月, pp.69-76
- [9] 独立行政法人農畜産業振興機構編『中国の酪農と牛乳・乳製品市場』農林統計出版, 2010年.
- [10] 成田拓未「中国産対日輸出量減少と中国野菜輸出企業の事業再編 — 中国有機・緑色野菜市場における内販の現状と課題」『農業市場研究』第18巻第4号(通巻72号), 2010年3月, pp.42-51
- [11]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海外調査部『在アジア・オセアニア日系企業活動実態調査 — 中国・香港・台湾・韓国編 — (2010年度調査)』同機構, 2011年
- [12] 根師梓「対日緑茶輸出企業による中国国内販売への転換と課題」『2010年度日本農業経済学会論文集』, 2010年12月, pp.570-577

## 暴力纠纷的社会意涵

### ——对皖中江庵镇暴力现象的文化解读

邢朝国<sup>1</sup>

#### 摘要

本文详细描述了村落社会中那些发生在亲密关系之中、熟人之间的纠纷、争吵和暴力事件，分析了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些纠葛争执的以及这些纠葛争执在村落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涵。在我们的研究中，无论是纠纷当事人，还是普通村民，在讲述相关纠纷故事时，常常将纠纷、争吵与情理、道义、不公正等具有社会政治意涵的因素勾连在一起。这种讲述方式包含了他们对是非善恶的评价，对一种有尊严的、符合道义的生活秩序的判断。在他们的解释体系中，纠纷和争吵起源于他者的不道义，而暴力则是对这种不正义状况的抗争和惩罚，以修复遭受破坏的正义衡平感觉。

在本文所叙述的这些纠纷故事中，纠纷的产生与人们所认为的想当然的自然态度和生活秩序的破坏紧密相关。当然，对固有的一套意义系统的破坏，本身可能意味着一套新意义系统的生成。这可能意味着现在的中国农村社会正在形成另一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关键词：**村落社会、暴力纠纷、意涵

村落社会中的纠纷事件通常起源于村落的日常生活，其产生的过程以及演变的过程都包含了村落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一套逻辑和规则。就我们的研究议题来看，这种逻辑和规则便是滋贺秀三所说的“情理”——“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1]。而这种情理发端于中国社会的伦理之中。梁漱溟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伦理始于家庭，而又超出家庭的范围，个体在社会中建立的各种关系皆是伦理，而“伦理关系，皆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2]。

村落社会中的纠纷常常与这种情义失衡有关，背后是人们对是非对错的评价、对道义的追求。当然，这里的道义本身需要打上

双引号，因为对于同一个事件或行为是否道义，不同的主体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认知往往会得出相去甚远的判断，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讨论。此处，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当事人是如何看待纠纷事件的，如何对纠纷事件进行解释和评价，以及他们所认为的道义与纠纷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这些讨论旨在回答这样一个议题：村落社会中那些与纠纷、争吵勾连在一起的暴力现象具有何种社会文化意涵。

本文所涉及的案例都是笔者于2010年8月至9月对皖中江庵镇的暴力事件调查中获得（按照学术惯例，此处江庵镇是化名，下文中提及的村名和人名也均是化名）。江庵镇是长江中下游平原上的一个中等规模的镇。目前，江庵镇下辖12个村民委员会和1

个社区居委会，总面积 119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将近 7 万亩。2005 年，该镇有 7 万人口，其中非农业人口约 4 千人，居民中只有 17 个人是少数民族。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下，当地雨水充沛，光照充足，适宜农业生产。江庵镇的农作物以水稻、小麦、棉花、油菜为主，并且盛产各种果蔬，是一个典型的鱼米之乡。2005 年，江庵的工农业总产值为 3.3 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占到了 46.6%，个体、私营企业产值所占比例较大（1.6 亿元），占到整个乡镇企业产值的 91%。当年，该镇财政收入 740 万元，人均纯收入 2300 元，低于周边乡镇的发展水平。

2010 年夏，笔者来到江庵镇派出所和司法所，查阅了当地近几年的暴力案件卷宗等档案材料，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根据当地派出所和司法所提供的信息，笔者走访了江庵镇下辖的 9 个村，调查了 11 起暴力事件。这些暴力事件的具体原因非常复杂，涉及到房屋建设、财产分配、物品归属、婚姻问题以及经济纠纷等，包括了邻里之间、亲戚之间、长辈与晚辈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以及妯娌之间的冲突。尽管这些暴力事件的具体原因以及呈现形式各异，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与争吵、怨恨、委屈、不公以及争端勾连在一起。

### I. 情理

在江庵镇南村的周家，王凤芝和董孝英这对妯娌就因为宅基地上建厕所的事情而产生暴力冲突，导致王凤芝被剪刀刺死。早年的时候，周家的父母在祖宅地上为两个兄弟每人建了一个平房屋，由于地形限制，房屋并不是比邻而建，而是前后错开。老大周健家常年在外地做卤菜买卖，年收入也有五六万，老二周平家做裁缝生意，日子也过得红火。兄弟二人通过自己的打拼也一起在平房

上加了一层，盖起了两层小楼，在当地也算体面得很。2009 年春节前，周健夫妇俩从外地回老家过年。妻子王凤芝觉得之前两家共用的厕所不好用，提议在自家的屋后面修建一个标准化的新厕所。于是周健就到老二家讲了自家的想法，但周平和妻子董孝英并不同意，因为周健家的屋后就是周平家的屋前，在那里修建厕所，就相当于在周平家门前修，这是周平夫妇不能接受的。在村落社会中，厕所作为排泄污秽的地方本身也是有讲究的，一般建在偏僻的角落里，并且离住宅有一定的距离，这不仅有卫生方面的考虑，而且包含了民俗上的污秽禁忌。因此，尽管周健夫妇强调是在自家的宅基地上修建厕所并且会尽量往边上靠，但周平家还是难以接受这种做法。为此，两家吵了几次，原本关系亲密的兄弟生了嫌隙。在亲戚们的劝说下，兄弟两人的态度缓和下来了，用他们的叔叔宝根的话来讲，毕竟他俩是一个妈妈养的，不能撕破脸。但周健的老婆凤芝并不买周平家的账，坚持要修一个厕所，她说在自家的宅基地上修厕所不犯法，谁也管不着。

对于凤芝强硬的态度，宝根这些亲戚也只能是劝说几句，没有办法。宝根跟我说，“凤芝太要强了，他们家做卤菜生意，赚了不少钱，生活水平高了，改善生活条件也能理解，但是在老二家前面修厕所，还是要慎重的，尽管离他们家有一段距离，但那是人家大门口啊，一打开门就能看到，让人看了不舒服，而且夏天的时候，会有味道，一刮风，就不好闻了，你说孝英能答应么？要是孝英在她家门前建厕所，她也不会让的。凤芝有点不通情理了，就算是邻居的话，还要考虑一下子，让一让，更何况是家里兄弟，又不是外人，不应该搞这些名堂。在农村里，不能自己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很容易起矛盾。现在，人就是生活好了，太有个性了，太倔了，不听人劝。凤芝能赚钱，会过日子，在家里

地位比较高，好多事情老大还得听她的，她坚持要建厕所，老大也只能帮着搞。”

后来，在没有经过周平夫妇同意的情况下，凤芝就开始买材料、请瓦匠，张罗着修厕所。周平尽管气不过，但由于春节临近，又碍于哥哥的情面，他不好直接跟大嫂起冲突，就在家生闷气。孝英觉得委屈，在大门口骂起来，指责凤芝如何恶毒、如何野蛮，吐诉自己的愤恨。凤芝也不示弱，开了后门，跟孝英对骂起来，最后俩人相互诅咒，邻居们都不敢上前劝和。孝英回到家里后，看到自己的男人缩在屋子里，遇到事情不出面，让她一个女人去争吵，这种委屈感就愈发强烈了。她骂自己的男人没用，这个年没法过了，但当时正值年底，上门定做新衣的人比平时多了很多，孝英也只能忍着自己的委屈，继续接生意。这场口角也就暂时平息了。

几天后，凤芝家的厕所在新年的氛围中开工了。凤芝请了好几个瓦匠和工人，打算在短时间内完成工程，因为自从跟老二家发生矛盾后，她家已经不去用两家共有的厕所了，她琢磨着赶紧修好厕所，这样也不用在过年的时候还跑去借人家的厕所用。

看着一帮人在自家门前捣鼓，正在做衣服的孝英恼火起来，连手上的剪刀都没放下，就跑出去阻止瓦匠，与正在忙活的凤芝再次发生争执，两人扭打起来。在打斗中，孝英用剪刀刺中了凤芝，旁人见状赶紧将她俩拉开，打了120人，将凤芝送到医院，但因为刺中要害，凤芝不治身亡。结果是，孝英被逮捕入狱，最后判了无期徒刑。就这样，导致两家争斗的厕所最终还是没有建起来，两家的生活也因为这个厕所发生了变故。

在周家的这起纠纷中，如果说孝英用剪刀将嫂子凤芝刺死多少具有一些意外成分的话，那妯娌俩为修建厕所而大动干戈却是可以预料的事情。当凤芝打算在屋后修建厕所时，无论是村落的民俗习惯，还是生活环境的实际影响，都已经为冲突埋下了伏笔。在

自家宅基地修建厕所看似只是家庭内部的事情，但在村落社会中却时常关系到其他家庭的正常生活。村落社会对人们的日常用度尤其是关涉到他者的事项通常有一套“应该如何”、“应当如此”的定义，这种定义在社会化过程中内化为个体的库存知识，个体基于这种知识来理解和评判自己的生活境遇以及生活中的困扰，违背这种库存知识的行为会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失礼的、野蛮的，会破坏人们习以为常的秩序感，纠葛也随之产生。

在皂圩村，张茂生与张茂明两家之间的一场争吵便是因为日常生活秩序遭到破坏而引发的。茂生与茂明两家是邻居，茂明家的墩基比茂生家的墩基高。茂明家平时倒生活废水不太注意，水经常流淌到茂生家的场地上，为此茂生跟茂明讲过几次，但状况依然没有多少改善。在农村地区，由于没有排水设施，生活废水大多是倒在宅基地的边角上，但一般邻里的墩基一样高，倒的水很少流淌到别人的宅基地上，当宅基地存在落差时，墩基高的一家在倒水时会有所注意或者直接挖一个排水沟，将水引导出去，这样彼此也就相安无事。但茂明家倒水随意惯了，也没有采取任何规避措施，让茂生家很气愤。茂生的妻子成慧说茂明家很霸道，一点都不讲理，存心是欺压她家，于是在门口怒诉茂明家的不是。对于成慧的责骂，茂明的妻子祖丽也很生气，说水往低处流，茂生家把墩基弄高一点就行了。但这个解决办法，对于茂生家来说显然是风凉话。在争执中，成慧越发地生气，就咒骂起来，祖丽索性就把门口自来水的水龙头打开，让水哗哗地流淌。见此状，瘦弱的成慧用砖头猛砸自来水的水龙头，祖丽上前阻止，两人就厮打起来，随后两家的男人也加入了打斗，场面好不热闹。虽然在众人的拉劝下，两家才歇了争斗，但茂生的脖子还是被祖丽抓出了几道血痕。两家自此不再说话。

在茂生与茂明两家的排水纷争中，茂明家对村落日常生活秩序的破坏，给茂生的家庭造成了困扰，这是产生纷争的导火索。从茂生和成慧的立场来看，茂明家显然不是一个体贴的、懂礼的邻居。茂明家的不通情理、不顾及邻居家的正常生活，使邻里关系破裂，邻里之间的互动难以为继。

在村落社会中，因为对方没有遵照应有的情理而引发纠纷的事例并不在少数。虽然当事人在意的情理有时在他者看来极为琐碎，但是这些情理本身植根于村落的日常社会之中，体现着村民所认同的草根伦理，只有当这种情理被遵照时，生活的秩序感才能得到平衡，而当这种自然态度遭到破坏时，争吵和纠葛便由此产生。

## II. 命运

在江庵镇叶庙村，壁刚和壁中兄弟俩与他们的叔叔老叶因为建房子发生了好几次纠纷，最终叔侄双方大打一场，壁中的妻子被打伤，老叶也因伤住院。

原先三家关系好的时候，老叶家的一间小屋就搭在壁中家湖边的场地上，壁中也默许了，没有说话。后来，老叶在壁中房子的旁边盖新房，两家为宅基地、公界发生了冲突。当初，壁中家盖房子时，老叶要求壁中房子离公路的距离应该跟他家的老屋一样，两家房子中间要留三尺公界，壁中对老叶的要求也没异议，默许了。后来老叶家盖新房，没跟壁中家商量就把地基打高了，比壁中家的房基差不多高出半尺，而且墙基往公界多挪了一些，使原本三尺宽的公界只剩两尺五。在当地风俗中，村民对房屋的高度很重视，尤其是几家房子在一排时，房子高度不一样或者不在一条线上是一件忌讳的事情。房子矮的人家会认为自己家受了欺负，风水、财运被人家占去了，房子高、靠前点的人家会认为得到了彩头[3]。

壁中当时在外地打工，回家知道情况后很生气，和老叶打了起来，找了村里的杨会计来调解。杨会计知道情况后，知道老叶没理，认为老叶打墙基之前应该和壁中商量着弄，“老叶家的房子高一些就会有饭吃、多发财吗？致富是靠勤劳，不是靠房子。”因此，杨会计的调解结果是三尺公界一家一半，虽然老叶家房子多占了公界，但壁中家仍拥有一尺五的公界，老叶家只拥有一尺。另外，老叶家的墙基已经弄好了，不可能再打掉，房子是要盖的，但为了平息壁中家的不满，壁中家可以把老叶在湖边的小屋拆掉（杨会计对这一调解结果进行了补充，说老叶家在湖边的小屋很简陋，简单搭起来的，成本不高），把土地还壁中家。当时双方都同意这一调解结果。但后来老叶不给拆小屋，壁中要拆，两家又打了起来，以至于小屋一直没有拆掉。再后来，等到老叶家房子盖好后，新房需要粉刷，但在粉刷靠近壁中家的那面外墙时，发现粉刷用的架子搭不了，除非架子越过公界，搭到壁中家的地界上。但因为两家闹矛盾，壁中家硬是不同意，于是两家再次发生冲突。这样前前后后发生了四次吵斗，杨会计参与了其中的两次调解。



图 1 叶庙村常见的民居

原本以为事情到此平息，但后来壁中的兄弟壁刚在壁中家屋后盖新房子时，矛盾再次发生。在壁刚家新屋刚建了一半时，晚上老叶踹开了壁刚家的大门，拿了一把铁锹到壁刚家吵。对此，杨会计跟笔者这样解释，“老

叶觉得当初自己家在盖房子时，壁中跟壁刚一直找他家麻烦，这次壁刚盖房子，作为报复，他也要找壁刚麻烦，让他家房子盖得不顺利。”壁刚很来火，就打了老叶，老叶也把赶到现场的壁中的妻子打了。这次双方打得很凶。结果，双方都到县医院看伤。由于老叶年纪大，伤得比较重，在医院花了六七千块钱。壁中的妻子是小伤，没花多少医药费。之后老叶说这里疼那里疼，没办法干农活，要壁刚家赔偿。后来没办法，壁刚通过派出所调解，赔医药费。派出所和村委会调解的结果是壁刚赔老叶医药费4000元。

对于这起纠纷，村干部璧宏的看法是，“老叶这边没道理，壁刚那边有道理。在河埂上搞房子，在一排上面，必须要一样齐，但一家先搞房子，一家后搞房子，老叶家搞房子放线，没有跟壁刚家商量，地基非要建得比壁刚家高一些。我们去调解的时候就讲，必须搞一样齐，你前一点、高一点，就发财啊。农村有个习惯，建房子房基在前面的话，上手在前，下手不好。他俩之前讲好盖一样高、一样齐，但叔叔后来非要高一些，高一快砖。一般情况下，两家搭界盖房子，都相互商量怎么盖，多高，什么门向，协商着搞。有的人家没跟邻居讲，自己就这么搞了，邻居家后来盖屋子时也就不跟他家商量，盖得比他家高些。纠纷往往就这样发生了。”

在叶家叔侄的建房纠纷中，除了侵占公界之外，产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子的高度和布局。在当地的文化习俗中，房子是与家庭的命运勾连在一起的，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习俗规则对相邻房屋的高低和前后有着特定的设置，以平衡家庭间的运程际遇。违反这种习俗可以说是对他者家庭命运的扰乱，是一种极具危险性的挑衅，不仅会受到村落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会激起被侵犯家庭的反抗。当然，对于这种包含原始逻辑的习俗规则或者习惯法，我们且不作价值判断上的评判，可以肯定的是，在村落社会中，

甚至是在当下整个中国社会，这种与个体际遇或者家庭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纠纷/暴力争斗是相当普遍的。

我们在江庵镇司法所的档案中看到了一起与命运相关的纠纷。

### 调查笔录

当事人甲方：齐昌农，男，71岁，汉族，农民，江庵社区齐村组。

当事人乙方：齐昌枝，男，68岁，汉族，农民，江庵社区齐村组。

纠纷简要情况：齐昌农种植竹子被齐昌枝砍伐（伐），要求齐昌枝不准继续砍伐（伐）其种植自家门前竹子和大门口的桂花树。

时间：2009年6月26日上午

地点：齐昌农家

事由：邻里纠纷

参加人：汪育孟、程益功

被调查人：齐昌农、齐昌枝、齐昌春

笔录：

汪问齐昌农：齐昌枝为什么砍你家种的小竹子和桂花树？砍了多少棵树？齐昌农答：昨天下午砍掉我家小竹子20多棵，当砍我门前的桂花树时，被我及时制止，没有砍掉。齐昌枝称我竹子在起风时打掉他房檐上的瓦，桂花树挡他家门向。齐昌枝到我家多次取闹，所以我才向江庵镇社区调解委员会反映此事。

汪问齐昌枝：你为什么要砍齐昌农家的竹子和桂花树？砍了多少棵树？

齐昌枝答：他家的竹子长得又高又大，每当刮大风时，他家竹子打掉我家屋檐上的瓦，多次找他协商，他不闻不理，我一气之下，砍掉他家20多棵竹子。我身体不适，就是他家门前的桂花树挡了我家的门向造成的。

汪问齐昌春：他们俩人的回答是真实的吗？

齐昌春答：是真的，刮风时，竹子是打掉瓦几片。



### 调解笔录

当事人甲方：齐昌农

当事人乙方：齐昌枝

笔录：汪育孟同志说：我们今天代表江庵社区调解委员会来负责调解你们两家的邻里纠纷。

(1) 已砍掉的二十几棵竹子，齐昌农不要再追究齐昌枝的责任了。齐昌农家的竹子现已长高长大，当刮风时，对齐昌枝家的瓦房的确造成了危害，本应该由齐昌农自己砍掉，现在齐昌枝砍掉也就算了。

(2) 桂花树齐昌枝是不准砍伐(伐)。齐昌枝的认识是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桂花树开花时，大家都能分享其清香。至于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治疗，与桂花树没有绝对关系。

(3) 齐昌农、齐昌枝本是堂兄弟，兄弟两人应以兄弟感情为重，不要为点小事就发生争执，就是邻里关系也应和睦共处，何况还是兄弟加邻居，更应该是相互包容。希望我们调解以后，你们双方要冰释前嫌，恢复以前的兄弟关系。

在齐昌农、齐昌枝两家的纠纷中，除了竹子对房屋的安全造成影响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齐昌枝认为齐昌农家的桂花树挡住了自家的门向，造成他患病。在齐昌枝的认知系统中，桂花树挡门向与身体疾病具有相关性。尽管这种思维模式被调解者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但对于齐昌枝来说，这种关联性却是真实存在的。与那些纯粹的物品归属、空间界限的争执相比，此类涉及个体际遇与家庭命运的纷争更为复杂，更难以平衡和解决，在特定的场域下，甚至会导致激烈的事件。

在江庵镇朱湾村，嫂子陈世颖就因为弟媳邹玲嘲笑自己家没生男孩，一气之下喝农药自杀。陈世颖是大哥朱炳强的老婆，家有

两女。邹玲是弟弟朱炳银的老婆，家有一女一儿。两家相邻而居。平日里，两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但小的磕碰一直不断，比如一家养的鸡鸭跑到另一家吃食，一家小孩打了另一家小孩几巴掌，等等。

在当地，香火观念依然很浓厚，一个家庭是否生男孩直接关系到家庭的命运。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生男孩是生育的一个终极目标。这突出地表现在庆祝仪式上。一旦生了男孩，家庭举办的宴席、庆祝仪式通常会比较热闹、丰富，亲戚们也会积极地道贺，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恨不得让全村的人都知道；而生了女孩的话，家庭通常会比较低调，甚至都不办酒席，亲戚们也会识趣地回避相关话题。按照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一胎生女孩的家庭，在五年之后，可以再生第二胎。对于第一胎都是生女儿的朱家两妯娌，弟媳邹玲第二胎拼了个儿子，而嫂子陈世颖第二胎依然生了个女儿。公婆自然对这个小孙子倍加疼爱，这使邹玲在朱家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许多。世颖的压力可想而知。

导致妯娌俩发生激烈冲突的导火索是邹玲家的儿子在世颖家门前晒凉的谷物上撒尿。世颖看到之后，吓唬小男孩说，再乱撒尿的话，就把他阉割了。这话刚好被邹玲听到。邹玲也不管世颖是不是玩笑话，就破口大骂，于是两人起了争吵。邹玲认为世颖说这样的话，纯属是嫉妒她生了个儿子，并嘲笑世颖只生女儿，没本事生儿子。这些话像利剑一样狠狠地刺向了世颖，让她招架不住。无论世颖是有意还是无心说了这番话，她都无法为自己辩白，毕竟已经讲了这样的话，冤枉也好，委屈也好，她只能往肚子里吞。

朱湾村的村民跟我说，当时的情况是，邹玲得理不饶人，话说得很难听，世颖被气哭了，跟她打了起来。邹玲的丈夫炳银跑出来，将邹玲拉回了家，这才使吵斗停歇。世

颖回去后就喝药自杀了。当时她的丈夫烨强在田里干活，傍晚回家时才发现情况。

对于世颖的自杀，村民们认为，要不是受了邹玲的气，世颖也不会那么想不开。用妇女主任任慧的话说，“邹玲养了个儿子，当然很得意，当宝贝一样。邹玲生了儿子，在朱家平日里就不太把世颖当回事。发生这样的矛盾，不管世颖对不对，你也不应该拿她没生儿子的事情来说，这太伤人了。人家本来就不好受，你还揭开伤口，往上面撒盐，过分得很。谁听了都会生气，我们都听不下去。在农村，由于农民的封建意识，这个事情很敏感，生男生女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很重要，没生男孩的家庭有时候会被人瞧不起，在村子里可能直不起腰板。对于那些没生男孩的家庭，这个事情是很忌讳的，人们一般都不会提，提的话，会引起矛盾。邹玲就是故意提这个事情，让世颖难堪。”

在村落社会中，类似的冲突不在少数。不仅那些滋扰个体正常生活以及家庭命运的行为极易引发争执，而且提及甚至影射那些与个体和家庭命运紧密相关的事情往往也会导致纠葛。

### III. 冤屈

我们在皂圩村做访谈的时候，村民们讲述了一件七年前的纠纷——羽飞被父亲毒打之后喝农药自杀。事情的起因是村子里的陈亮兵家发生盗窃事件，被偷了六百块钱。在七年前，六百块钱在普通农家还算一笔不小的财产。亮兵和妻子陈晴在村子里到处明察暗访，最后怀疑是羽飞偷的。当时羽飞15岁，正在上初二，在村子里比较调皮捣蛋，与村子里的几个孩子在学校里也经常惹是生非。因此，亮兵和陈晴的判断与羽飞平时的行为状况不无关联。为了找出证据，陈晴跑到羽飞念书的江庵镇中学，说自己是羽飞的母亲，向羽飞同学打听羽飞最近在学校的花

销，还跟羽飞的同学说羽飞从家里拿了不少钱，她跟羽飞的爸爸很生气，但陈晴并没有从羽飞的同学那里获得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当天就有同学告诉了羽飞这件事。羽飞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背着书包就跑回了家。当时羽飞的母亲在上海打工，家里就父亲带着他和弟弟两个人过活。陈晴从学校回来之后，就到了羽飞家，跟羽飞的父亲定华说她怀疑羽飞偷了她家的六百块钱，要求定华查问羽飞。在村落社会中，偷盗是一件极损名声的事情，不仅偷盗者在村子里会抬不起头做人，而且偷盗者的家庭也会被人指指点点说闲话。因此，当得知羽飞涉嫌偷盗时，定华非常暴怒，觉得很没面子，跟陈晴发狠愿，一定将事情弄清楚，如果是他家儿子干的，一定赔钱并赔礼道歉。

陈晴离开羽飞家之后，定华就开始审问羽飞，问他到底有没有偷人家的钱。羽飞说没有，但鉴于羽飞一向吊儿郎当、惹是生非的状况，定华并不轻易相信，仍然一个劲地逼问他，罚羽飞跪扫帚，拿棉花枝子抽打他。在父亲的暴打下，羽飞痛苦地叫唤着，但坚决否认自己偷了人家的钱。弟弟羽军在一旁哭喊，让父亲不要再打了，但丝毫不能影响局面。隔壁的邻居虽然听到了羽飞家的哭喊声，但由于是定华教训儿子的私事，他们也不好过问。一番打骂之后，定华罚羽飞继续跪着，自己去煮晚饭了。当晚饭快煮好的时候，定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审问。正在气头上的他用火钳夹着做饭剩下的热木炭烫羽飞的手和胳膊，尽管羽飞恐惧地求饶，但近乎丧失理智的定华并没有心软。在酷刑之下，羽飞仍然没有屈服，坚持说自己没有偷钱。此时，定华方才有些相信自己的儿子没有干偷盗之事，但出于教训羽飞的目的，他毅然不许羽飞吃晚饭。父子之间的这场战争在这种状况下也暂且结束了。

晚上的时候，羽飞给母亲写了一封遗书，在遗书中诉说了自己的冤屈和恐惧。第二天

一早，定华做好早饭之后，便打算到亮兵家告诉陈晴自己的儿子没偷她家的钱，在出门之前，他让羽军在家看门。但当定华离开家不久，羽飞就抓起药瓶要喝药，羽军上去阻拦，但拦不住。惊恐的羽军赶紧跑到门口大声哭唤，喊父亲赶紧回家，但当定华赶回家之后，一切都已经晚了。年轻的羽飞就这样在陈晴的指控和父亲的毒打之下以死雪冤。

羽飞死后，悲痛自责的定华与亮兵、陈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村委会、派出所、司法所以及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村子里来来回回地做处理工作，整个村子一下子喧闹起来。派出所给羽飞的母亲发了电报，派车子将其接了回来，这个失去儿子的母亲哭了一路，在别人的搀扶下回到了村子。羽飞的死在皂圩村引起了极大轰动，成为人们议论的一件大事，很多附近村庄的村民也赶来看个究竟。此时，人们已经十分肯定羽飞是被冤枉的，受到了错怪，而不是畏罪自杀，因为陈晴的调查手段本身就不正当，而且她也没有给出确凿的证据，并且羽飞在父亲的酷刑之下仍然决绝地否认偷钱之事，这些足以让羽飞赢得道德资本和同情。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羽飞是在陈晴的无理指责、羞辱以及定华的毒打下才去喝药的。只有受了很大冤屈而没有办法让人相信的情况下，才会以自杀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只有那些性子刚烈的人才能做得到，因而人们对羽飞多了些敬畏[4]。

在确定死亡的性质之后，派出所开始在已经吵得不可开交的两家之间进行调解。村子里的舆论是向着羽飞的，毕竟把人逼死了，再有理也不对。亮兵和陈晴知道自己理亏，所以也愿意承担一部分责任，只是承担多少的问题。最后，调解的结果是亮兵家一次性赔偿定华三万五千块钱，两家签了书面协议将此事了结。事后，定华带着小儿子羽军跟着妻子去了上海，离开了皂圩村。两个月后，亮兵也举家迁移，搬出了村子。

羽飞的邻居芽子在提起羽飞的死时说，“要不是陈晴和定华逼的，羽飞也不会喝药。陈晴可以怀疑羽飞，但不能冒充羽飞的母亲去学校闹，这太过分了。年轻人都要面子，这让羽飞怎么在学校待下去。你又没有亲手抓到羽飞偷你家的钱，你怎么可以在外面瞎讲呢，这不是毁羽飞的名誉么，让他以后怎么做人的。羽飞本来就受了屈，在家里又遭到了定华的打骂，心里更加的委屈和难过。定华实在太要强了，怎能那样打孩子，大人都受不了，何况羽飞呢。羽飞也可怜，妈妈在外面打工，也没人帮着拉，帮着劝，受了屈也找不到人诉，心里憋屈，死了才能还自己清白。”

从纠纷的角度来看，羽飞的死包含了村落政治中的冤屈和正义问题。这种冤屈往往涉及到个体的人格和家庭的脸面，因而显得沉重。另外，羽飞的死还与家庭政治中的委屈有关，试想，如果没有父亲的打骂和不信任，仅仅只是陈晴的羞辱和指责，羽飞可能不会想不开，不会绝望到喝药。

吴飞说，家庭是一种政治性存在，“委屈就是家庭中的不公和挫败，同时也往往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和人格的失败”[5]。家庭最基本的生活状态是“过日子”。这种状态无需善恶进行修饰，但它本身又包含着善恶的可能。人们的生活必须在家庭过日子的过程中延展方能获得价值和意义。而过日子的关键在于一套方法和规则，即生活中的“理”。自杀所追求的正是这种过日子的道理，并且评价自杀的标准就是自杀是否符合这个“理”。如果自杀能够成就一个有尊严的生活，使日子过得更好的话，那么这种自杀的负面含义就比较小。纵使普通人的自杀所诉求的道理往往不值得一以自杀的方式来表达，而且自杀往往也并不能使自杀者获得幸福，但自杀行为背后包含着自杀者捍卫自身尊严和面子的诉求以及对其所认为的“正义”的争取[6]。

从吴飞的观点来看，家庭是情感和政治的混合，过日子本身也是一个政治状态。这个政治状态与公共政治的一个关键不同在于

家庭政治存在情感因素（不像公共政治存在真正的敌人，以彻底消灭对方为目的）。而“委屈”就来自于情感与家庭政治之间的张力，即情感目标与政治逻辑的冲突。因此，如果把家庭政治看作一种以亲密关系为导向的权力游戏的话，委屈就是在家庭权力游戏中的挫败，自杀就是对这种委屈的报复或矫正[7]。

当然，村落政治与家庭政治、公共政治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尽相同，但却混合了这两种政治类型的一些特征。首先，村落政治中的人际关系虽然不比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亲密，但却不像公共政治中人际关系那样冷漠。村落政治通常是在邻里、同村村民这种熟人之间展开。其次，村落政治与家庭政治一样存在情感因素，只是家庭成员之间注重的情感因素与熟人之间重视的情感因素有所不同而已。另外，与家庭政治和公共政治一样，村落政治本身也是一种政治生活，包含政治逻辑，由一系列的权力游戏组成，涉及正义问题，只是这种正义以地缘关系（或者地缘/血缘双重关系）为出发点。在村落的权力游戏中，家庭之间形成特定的权利义务结构，维系基本的平等和尊重，唯有在这种平衡中，村落生活才能继续下去。

如果我们将陈晴、定华以及羽飞之间的互动看作一场权力游戏的话，那么，陈晴的指责使羽飞及其家庭在村落政治中陷入不利局面，定华的打骂虽然是给陈晴一个交代，但更是缩小自家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的输面，可是定华却没有把握分寸，他的手段摧垮了羽飞在家庭政治中的尊严和权力。羽飞在村落政治和家庭政治中的双重挫败使其采用自杀的方式来扭转自己在权力游戏中的失败局面。他的死去会让他的家人以及村民明白他的委屈和冤屈，家人会悲伤、自责，村民会为他惋惜，陈晴也会受到各种谴责，总之，他在权力游戏中的对手将会遭受惩罚。

当然，在村落政治以及家庭政治中，绝大多数的争吵、纠葛并没有使各方在权力游

戏中彻底失去平衡，没有上升到需要一方用暴力或者自杀来重新平衡政治秩序。一个熟悉村落政治和家庭政治中的规则与逻辑的人，会谨慎地把握这种权力平衡，维系应有的尊重和对待，以使日子得以继续。

例如，在江庵镇塘坝村，安平家与水定家的一起偷窃纠纷就顺利地平息了。这起偷窃纠纷的起源是水定认为安平的两个儿子偷了他家的西瓜。每年的六、七月是塘坝村西瓜成熟上市的季节，因为经常有村外的人开着车子来村里偷瓜，种瓜大户一般会在瓜地里搭一个棚子来看瓜，白天看瓜的任务基本上是交给家里的小孩们，大人晚上去看护。安平家种了三亩多地的早瓜，让两个儿子志达和志通去看。水定家的瓜地离安平家的地不远。

一天傍晚，水定拖着安平的两个儿子气冲冲地来到安平家，跟安平讲她的儿子偷了西瓜，并且责怪安平不好好管教孩子，“**这些孩子哪是看瓜呢，是偷瓜**”。安平听后，生气地问志远和志通有没有偷。志达摇摇头，带着哭腔说没有偷，他们只是在地头钓龙虾，但水定看到他们在地头跑老跑去，就以为偷她家的瓜，跑过来把他们骂了一顿，还把他们的拖回来，说要找大人理论。安平听儿子把事情讲述一遍之后，首先责备了志达和志通不好好看瓜，钓什么龙虾，然后质问水定，“**你到底有没有亲手抓到我儿子偷你家西瓜？被偷的瓜在哪里？你这么大人的人不能瞎讲话，你到村子里问问我儿子的品行，他们从来没干过这些事情。今天，他们要是偷了，我当着你的面狠狠地打，要是没偷，这个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你到我家里来，村子里的人都看到了，让我儿子名誉不好听。我儿子前几天就吵着钓龙虾，我相信他们是在钓龙虾，不是偷你家的瓜。**”水定非常坚持地说自己看到志远和志通在她家地头晃来晃去，鬼鬼祟祟的。气不过的安平当场锁了门，带着儿子跟水定去了地头，在地头的确发现

一些还未收拾的钓虾工具，而且也没痕迹证明志远和志通偷了瓜。之前来势汹汹的水定一下子没了脾气，声音都弱了许多。

在两家的这场权力游戏中，安平成功地扭转了不利局面，并发起了反攻，带着儿子到水定家评理，吵闹了一番，引来诸多村民的围观。安平按照村子里的规矩，要水定到自家门口放鞭炮，赔礼道歉，以此来消解自己的怒气，还儿子清白。面对强势的安平，没有道德优势的水定也只好答应。第二天早上，水定就带着鞭炮到安平家门口放，鞭炮声响彻塘坝村，两家的纠葛也随着鞭炮的青烟一同消散了。

人们在提起此事时，都说安平是一个厉害的角色，赞同安平的做法，并且表示其他人家在遇到同样问题时也会这样处理。言下之意是，安平懂得村落政治的规则，在权力游戏中不卑不亢，按规矩处事，不提不合情理的要求，在维护自家尊严和脸面的同时，小心地平衡彼此的权力关系。在权力游戏的这种动态平衡中，村落社会的秩序和道义在“破坏——恢复”中流变，但无论是破坏，还是恢复，往往都需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有时候甚至是惨烈的。

#### IV. 委屈

家庭中的纠纷往往与委屈勾连在一起，这种委屈因为与亲密关系间的爱恨、恩怨、尊严、道义缠绕在一起而让人纠缠其中。如吴飞所言，委屈产生于亲密关系之间的情感诉求与政治逻辑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当下愈益难以平衡。“中国家庭去除了父权制的权威，政权、族权、神权、夫权都不再成为束缚自由意志的绳索，任何人都获得了独立追求幸福和人格尊严的权利”，[8] 但获得这个权力的代价是“帮助人们过日子的纲常被瓦解了，人们必须直接面对‘过日子’本身，不

能依靠任何外在的优势和依托，而要自己学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过日子的‘理’”[9]。

在家庭政治中，一旦过日子的“理”受到破坏和背弃，日子就很难过下去，受了委屈的人为了纠正这一状况，会争吵、掐架，甚至赌气地做出极端的行为。在前面，我们提到了家庭政治中的委屈是导致羽飞自杀的重要原因。就家庭内部的纠纷和争吵而言，虽然在多数情况下不至于产生像羽飞这样的激烈后果，但引发冲突甚至是暴力事件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江庵镇肖湾村，贤阔的妻子与同村村民先雅发生婚外情，被贤阔捉奸在床，引起了一阵风波。村书记肖强在介绍这起纠纷时说，

“贤阔常年在外地打工，留他老婆米亚和儿子在家里。贤阔是秃子，他和米亚长得很丑。跟米亚搞关系的先雅在村子里开了家杂货店，家境很好，他两个儿子在外地做生意，都很有出息，很有钱，都买了房子和车子。与其他村民不同，先雅平时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只是他有点歪脖子。先雅的老婆秀梅在村子里也算是搞得很漂亮的了，穿着都不一般。米亚长得很难看，真不知道先雅是怎么想的，脑子进了水，跟她搞关系。先雅开杂货店并不是在自己家里开的，而是在路边新建了一间门面房。开小店，晚上需要有人看守，先雅晚上就在门面房里面睡觉。米亚就跟他发生了关系。米亚平时到杂货店买东西都不需要付账。农村里这种事情呀，大家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米亚与先雅这种关系持续了小半年，旁人都不好说什么，私下里有议论。贤阔的堂兄弟贤胜估计是知道了情况，就给贤阔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个事，贤阔很快从外面回来了。贤阔回来之后，米亚并没有收敛，继续与先雅保持关系。后来，还是热天，大概是大家中午睡午觉的时间，我听到贤阔在叫骂，就跑出来看，原来是贤阔发现米亚不在家，就到杂货店找，发现杂

货店门是反锁的，觉得不对劲，就把窗子玻璃砸碎了，扯开了窗帘，看到米亚跟先雅正在慌张地穿衣服，算是捉奸在床吧。贤阔气不过，又打又骂，全村的人都晓得了。贤阔打了先雅，也打了米亚。先雅没怎么还手。秀梅这时候也来了，看到自己的丈夫偷人，她嚎啕大哭，跟米亚扯打起来，整个场面很失控，好多人跑来看热闹。打架从中午一直持续到傍晚，到后来贤阔被他妈妈跟贤胜劝回家了，米亚也跟着回家了。贤阔是老实巴交的人，不可能搞好狠，即使生气，也不能怎么着，打先雅也只是打给他老婆看的，不会打多狠，打狠了还得替他治。回去后，贤阔睡了两天没吃饭，米亚在家里磕头认错，亲戚也来家里劝。这件事也就这么算了。之后贤阔就不出去打工了，留在家里，与先雅家不讲话，买东西都到镇上去买。先雅之前在村子里很活跃，自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觉得丢人，整天闷着，遇人都不怎么搭话。”

在这起由婚外情引发的暴力事件中，米亚僭越了夫妻之间的伦理关系，违背了过日子的理，不仅挫败了贤阔在家庭权力游戏中的尊严，而且让贤阔在村落中丢尽颜面。俗语说家丑不可外扬，按照惯常做法，贤阔在抓到米亚出轨时，会谨慎处理，但贤阔选择了以吵闹和暴力的方式将其公开化，将私人领域的纷争置于村落的公共空间中。这样做起码可以达到三个方面的效果：第一，贤阔太需要这样的一次机会来宣泄自己的愤怒、让大家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扳回自己在家庭政治中丧失的尊严以及在村落中丢失的颜面；第二，为自己积累足够多的道德资本，使自己在夫妻权力关系中占有绝对地位；第三，将事情公开化，使米亚和先雅在村子里难以做人，并借用村落社会的舆论、闲话来对其实施惩罚，并且这种惩罚很可能比贤阔自己施加的咒骂、暴力惩罚更加有力，更具严厉性，造成的痛苦更为持久。就像村书记肖强所言，在经历这次纷争

之后，原先是村子里活跃分子的先雅一下子变得落寞起来。

在诸多情况下，家庭中的琐事、争吵因为混合亲密关系间的情感、伦理、公正和委屈，而具有超乎寻常的重量，甚至是家庭成员难以承受之重。在这份重量面前，家庭成员采取的策略和行动如果不能使权力平衡的话，权力游戏将不能继续进行[10]。

在塘坝村，朱献亮与朱献斌兄弟俩因财产分配问题争吵多年。早年，兄弟俩关系算得上和睦，各自娶妻生子，相邻而居。献亮成家后不久，就把家分了。由于他们的父母亲修康夫妇跟着小儿子献斌生活，献斌分到的东西自然多些，另外，那时候献亮虽然分到了土地，但他并不种地，而是常年在外面做杂活、收破烂，所以土地仍然由修康夫妇和献斌耕种，大部分农具也一并放在献斌家。献斌结婚生子之后，家庭经济比较拮据，就只身一人到外地做服装生意，妻子安菊在家种地，带着一双儿女跟修康夫妇一起生活。

两兄弟反目成仇是在老父亲修康去世之后。修康去世后的第二年，献亮带着一大家子回到了塘坝村，要回了当初分给自己家的土地，过起了耕田种地的生活，但随之问题也出来了。献亮要跟献斌分农具，小件的农具还好分，大件的农具（比如抽水泵）就难以分割了，而且有些农具是分家后献斌自家购置的。由于之前分家分得并不清朗，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俨然是一笔糊涂账，村干部也不好介入。

对于兄弟间的矛盾，献亮的堂弟献发说，“大哥觉得当初分家时，我大伯跟大妈（指修康夫妇）向着二哥（指献斌），一碗水没端平，自己分到的东西少，不公正。另外，大哥认为，大伯去世之后应该留有积蓄，怪大妈把这些钱全都给了二哥，他一分钱没拿到，为这个事情，大哥经常找大妈和二嫂（指安菊）吵闹，不管大妈怎么讲，大哥就是不相信，搞到后来，大妈都被气病了，躺在床上

抹眼泪。亲戚来劝了好多回，都不管用。大哥觉得大伯和大妈对他家不好，帮二哥家带孩子、干活，没帮他家做什么事。这些事情，我们堂兄弟又不好讲多话。后来，两家又为宅基地吵。之前大哥跟二哥虽然分了家，但宅基地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现在两家闹矛盾，大哥坚决要分清楚，二嫂子就给二哥打了电话，二哥从外地回了老家，两家开始分界，分界的过程中为拐拐角角又吵了好多回。原先两家共同使用的道分在二哥的宅基地上，这样的话，大哥一家子进出都需要通过二哥的宅基地。分完界之后，二哥就不愿意再让他们从宅基地上走，在地界边上用竹子修了个院墙，与大哥家彻底断开。院子搭建好后，路就被围了起来，大哥一家子就没路走，就不干。大哥跟二哥起了拳脚冲突，但大哥在这场打斗中并未占到便宜，二哥坚决不让，他也没办法，就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新开了一条道。有一段时间，两家没再吵了。之后，二哥赶回外地照顾生意，但二哥离开后，大哥跟二嫂子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又吵过几次，大妈气得拿拐杖指着他骂，说不认这个儿子。”

此时，兄弟二人对彼此已经非常怨恨，在献斌的眼中，献亮已不具有作为哥哥所享有的地位和尊重。年底的时候，献斌回家过年。对哥哥颇为不满的献斌在路上遇到了献亮，但没有跟献亮打招呼就走掉了。献斌冷漠的态度让献亮很难堪，觉得再怎么自己是哥哥，献斌不该拿冷脸对他。农历新年没过完的时候，献亮乘着献斌还未外出，找到献斌，把自己的愤恨诉了一遍，从自己年轻的时候外出做工养家说起，讲到父母亲在分家时偏向献斌，提及献斌外出做服装生意时，自己借给他一千多块钱，并一直说，如果没有他的帮助，献斌哪会有今天。献亮的控诉重新点燃了两家之间的恩怨纠葛。

安菊说献亮算什么老大，三天两头地来家里吵架，胡搅蛮缠，找她麻烦，把老母亲

都气病了。献斌对于献亮的说辞也不以为然，说献亮睁着眼睛讲瞎话，当初献亮不愿意种地，硬是要跑出去打工，也没给家里寄多少钱，父母都是自己在养，献亮根本就没管过，以前家里穷，没什么家产，父母想偏向自己也没能力偏，现在献亮还有脸讲这些歪理。献斌承认自己做生意时跟献亮借过钱，但挣了钱之后就还给他了，并且还多给了一百块钱作为利息，并不亏欠他。此外，献斌强调，搞成现在这个状况，责任在献亮，是他要分这个分那个，要这个要那个，怨不得别人。

献斌的意思说得很明白，现在两家子各过各的，井水不犯河水，以后献亮不要再到家里来吵，否则就不客气。献斌的态度让献亮暴跳如雷，他拿起屋檐下的锄头朝窗户猛砸，硬是把两扇窗户的玻璃砸得粉碎。老母亲瘫坐在地上哭喊着让献亮做做好事，不要再砸了。献斌把母亲赶紧抱回房里，并未阻拦献亮，只是一个劲敌说，“算你狠，你砸”。虽然有很多村民来围观，但献亮并没有停手。献斌给派出所打了报警电话，之后匆匆跑到村口等警车。民警来后，询问了情况，由于是兄弟俩的纠纷，而且献亮只是砸毁了财产，没有伤人，所以民警对献亮警告一番之后，问献斌的意思，献斌说不要献亮赔偿，只要献亮保证不再闹事，他就不追究责任。献斌的表态让献亮有些意外，更有些难堪，只好当着民警的面，答应不再与献斌发生矛盾。

献斌的这个决定看似意外，却是可以理解的。堂弟献发对此做了这样的解释，“献斌之前就没打算与献亮再有什么瓜葛，过年的时候，两家就没有来往，这次献亮到他家里这么一闹，他是彻底寒心了，狠了心要与献亮断绝一切关系，所以他不要献亮的任何赔偿，如果要了赔偿的话，两家子可能又要再折腾，到时候更扯不清，倒不如就这么干干净净地了结恩怨。”

对于献斌当时的心理状况，我们已无从询问，但他之后的行为似乎印证了献发的解

释。警察处理完事情之后，已是傍晚时分。献斌叫了一辆面包车，把大门一锁，一家老少带着几个包裹上了车子，离开了塘坝村，这前后不过二十分钟。

从事件的发展脉络来看，献斌的外迁与献亮的暴力破坏有着直接的干系。在村民们看来，献亮就是逼弟远走他乡的，是他让弟弟家的正常生活难以继续，日子过不下去，毕竟，要不是迫不得已，谁会愿意连家都不要了呢？因此，献亮不仅要承受自己内心的压力，而且会面临村落社会的嘲笑和鄙视。

在兄弟俩的纠葛中，献斌对于哥哥的暴力行为没有要求任何赔偿，也没有施与任何惩罚，可以说做到了仁至义尽，顾及了兄弟间的情分，这无疑提高了他在权力游戏中的道德资本，以后提及此事时，他至少多了份底气，少了些愧疚。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献斌的举家搬迁无疑是一个高潮，这也是对献亮暴力行为的一个最有力的无形反击。面对这个反击，献亮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因为对手退出了这个游戏，他已经没有还手的对象了，甚至丧失了与对手继续玩游戏的资格。兄弟间的恩怨最终以弟弟一家远迁他乡这种悲情方式结束，兄弟两家的权力游戏也因一方的退出而停止。可以说，献亮虽然以暴力的方式宣泄了愤恨，但却输掉了尊严和尊重，被锁进了道德的枷锁之中，成为这场权力游戏中最彻底的挫败者。

## V. 利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利益与道义之间的关系是先贤们论述的一个重要议题，形成了“义利之辩”这种文化现象。孔丘以义利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宣扬“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价值理念（《论语·述而》），主张“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当义利发生冲突时，孟子更是直言“舍

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章句上》）。当然，儒家并不是否定利，而是主张取之有道，符合仁义，即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出也”（《论语·里仁》）。汉儒董仲舒对儒家的义利观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处理义利关系的准则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

此处，我们无意于梳理诸贤的义利观，只是旨在表明，在中国的文化脉络中，利益与道义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道义是人们评判利益获取是否正当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村落社会中，利益与道义的冲突是引发争吵、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在江庵镇龙庵村进行调研时，就遇到了两起这样的暴力纠纷。

金羽和二保子是堂兄弟。金羽年轻的时候跟着别人到市里做瓦匠，后来自己带几个人承包小工程，用当地人的话来讲，混得不错。金羽结婚之后，妻子和父母都跟他到了市里，家里的责任田给了二保子做。责任田的交接是在开春之后，当时几亩地的冬小麦和油菜长势很好，因为是自家侄子，金羽父母没有向二保子要任何费用，全都白给了他，并且将家里剩的农肥一并给了他。当时的情况就相当于金羽家播种，二保子等着收果，不费多少气力就获得一季的收成。在收割完这一季的庄稼之后，二保子将偏僻难耕种的两块地转让给了村民廖少平，自己家继续种土壤肥沃、交通方便的几块地，但当时并没有告知金羽。廖少平种了一季庄稼之后，觉得种那两块地太费劲，就不愿意继续耕种，退还给了二保子，但之后二保子没有管这两块地，一直撂荒。

三年后，金羽在城里生了个孩子，回龙庵村给孩子上户口，到村委会开证明，村委会不给开，原因是金羽家承包的责任田中，有两块地三年没交农业税。金羽一脸疑惑地找二保子问情况。二保子说他后来没种那两块地，自然也就没有代交农业税。金羽对二保子的解释很不满，骂二保子是白眼狼，当



初自己家看在亲戚的份上，把一地的好庄稼全部白送给了他，光种植这些庄稼的成本就够两块地的农业税了，另外，要不是二保子答应耕种，他完全找不到人接手，没想到二保子挣了钱之后，就耍心眼。

金羽的叔叔祖贵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愤愤不平地说二保子不是东西，“二保子只挑条件好的地种，差一点的地就撂荒，没有这样做事的，要做就全都做，要不就不全都不要做。你捡好的地块种了，差的地块给谁种？少平后来不种那两块地与二保子只种好地有关系，谁愿意种差的地块？看别人把差的给自己，心理都会不平衡，都会不乐意。一提到这个事情，我们都恨得很，二保子太精明了。那几年棉花行情好，一亩地能赚一些钱，二保子种金羽家的几亩地，几年也赚了不少钱，替金羽交那么几百块钱的农业税也是应该的。金羽也不是交不起那几百块钱，就是气，气这个堂哥哥不仗义、不厚道，自己家对他那么好，他却干这样的事情。金羽跟他杠上了，跟他要青苗费和化肥的钱，二保子说这些是送给他的，他也没主动要。两个人说不到一块去，打起来了，金羽打了二保子两个嘴巴子，二保子的媳妇把金羽的脖子抓破了。”

在村落社会中，像金羽与二保子这样因为土地转让和农业税上缴而发生矛盾的事例不在少数。金羽家的有情有义与二保子的市侩、计算形成了鲜明的张力，这股张力破坏了村落社会的互惠原则，最终也激起了金羽对二保子的暴力惩罚。“在乡村，当互惠的原则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破坏时，明显表现出来的是社会关系维持上的危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们对于互惠原则的追求构成了乡土社会公平观念的基础……人们对于正义的理解，往往是指自己‘给予’别人的好处或便利，别人也能够‘回馈’给他们以相应的好处或便利”[11]。这种互惠的公平构成了乡土社会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龙俺村村民廖凡与弟弟廖玉因为生意上的事情发生争斗，同样也属于这一类型。廖凡家的兄弟姐妹很多，家境比较拮据。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姐廖萍结婚之后，将自己收到的80元彩礼给了弟弟廖玉，让他去外地学习禽蛋孵化技术。廖玉从学徒做起，一学就是四年。学成之后，廖玉回到了龙俺村，开了一家禽蛋孵化厂，规模不大，算是家庭作坊。在孵化厂刚刚起步时，需要人手帮忙，哥哥廖凡便把家里的农活让妻子做，自己到孵化厂一边帮弟弟打理生意，一边学习孵化技术。但两年之后，由于受行情的影响，孵化厂的生意非常难做，效益很低。廖玉见生意没有起色，就想到外面闯一闯，把厂子交给了哥哥廖凡，到外地打拼去了。廖凡把这一年的生意做完之后，勉强维持了厂子的收支平衡。来年的时候，廖凡根据市场行情调整了禽蛋孵化品种，凭着自己的勤劳和禀赋，把厂子经营得风生水起，利润有明显的增加。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廖凡扩大了孵化厂的规模，雇佣了两个师傅，在当地成了致富榜样。正当孵化厂的运作日趋稳定成熟时，在外地闯荡无果的廖玉回到了孵化厂，因为厂子最初是弟弟建立的，而且自己的技术也是跟弟弟学的，所以对于廖玉的归来，廖凡欣然接受，两兄弟又重新合作经营厂子。在此期间，廖玉在别人的介绍下，与临镇的姑娘夏玲恋爱结婚。廖玉结婚之后，妻子夏玲也到厂子里学技术，参与厂子的日常经营。由于人员的增加，厂子的利润虽然可观，但人均利润却一般，而且两兄弟在经营理念和方式上的差异愈益明显，合作过程中免不了有一些磕碰。廖玉和夏玲就跟廖凡提出单干的想法，廖凡同意了。之后，廖玉到夏玲的老家租了几间民房，开了一个新孵化厂，并从廖凡这里带走了一些客户。虽然廖凡的妻子对于廖玉从厂子里带走客户的做法有些不满，但廖凡表现得比较大度，毕竟廖玉是到隔壁镇子里做生意，跟自己离得挺远，没有多少

冲突，而且各自可以按照各自的想法来，避免了很多摩擦，也是件好事。两兄弟在各自单干之后，生意上的合作比较多，相互帮忙，发展得都不错。

2007年，之前与廖凡有生意往来的一家孵化厂老板要外迁，觉得廖凡为人实诚，想把厂子转给他。这个厂子在县城，交通方便，区位好，廖凡爽快地答应了。接手新厂子之后，廖凡一家子陆陆续续地搬到县城居住。半年之后，廖玉因为租赁办厂的民房要拆迁，就在廖凡做生意的这条街上寻到了几间房子，也搬了过来。虽说两兄弟各做各的生意，但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尤其是两家的孵化厂相距不到一百米，使彼此之间生了不少矛盾。廖凡的技术过硬，孵化的禽苗成色较好，一般不肯轻易降价卖，而廖玉不管货色好坏，经常低价处理，导致客户们抱怨廖凡卖得贵，尤其在廖凡与客户谈生意时，客户们常常拿廖玉家的价格作为压价的砝码，这让廖凡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状况，时间长了，对廖玉的不满自然增多。在价格优势的吸引下，廖玉家的货走得快，廖凡有时候也被迫降价。另外，两家的厂子距离太近，而且都是同姓所办，客户走错门的事情经常发生，有几次廖玉和夏玲就将错就错地接了几笔单子，这使廖凡很气愤，跟亲戚们抱怨过几次。两家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

年底的时候，南方普降大雪，交通受阻，两家孵化的禽苗积压严重。廖玉为了处理禽苗，在没有与廖凡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把价格压得很低，可以说近乎狂甩，廖凡家的生意受到了极大冲击。廖凡气冲冲地跑到廖玉的厂子里，与其争吵，两人争执不下，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廖凡的意思是，自己先在这里开孵化厂，按理廖玉是应该回避的，不该也跟过来，这明摆着是抢自己的生意，另外，廖玉怎么做生意，他管不着，但两家离得这么近，廖玉这样随便压价，破坏规矩，使他家蒙受损失，这实在不是道义的做法。

在廖家兄弟的冲突中，两人按照各自的方式做生意原本无可厚非，但因为两人是兄弟，使他们的经营活动包含了更多的伦理和道德因素。从廖凡的角度来看，当初自己从弟弟廖玉手上接了厂子，受到了廖玉的恩惠，后来廖玉重新合伙，他爽快地答应，并且同意廖玉的妻子加入，算是对廖玉的回报。尽管廖玉后来要求单干，并带走了一部分客户，廖凡也并未阻拦，对廖玉也算做到了仁至义尽。此时，在兄弟俩的权力游戏中，二者之间的道德资本尚能维系平衡。但之后廖玉将厂子搬到自己的厂子边上，跟自己抢生意，压价卖货使自己遭受损失，这些做法是廖凡难以接受的。对廖凡来说，廖玉没有顾及兄弟情分以及自己对他的恩惠，实在不是仁义之举。这种不道义的经营行为最终引发了兄弟俩的争斗。

当然，在村落社会中，不仅亲密关系之间的利益纠葛被赋予了更浓厚的道德色彩，而且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利益纷争往往也会被贴上各种道德标签。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库存知识、生活经验来判断一种经营行为、政策是否符合正义，当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通过暴力方式进行抗争来维护自己所认同的正义感，是人们的一种惯常行为方式。我们在江庵镇老埂村调查到的一个养猪大户与食品站之间的暴力冲突便属于这种情况。

刘剑宏是当地一个远近闻名的养猪大户，曾经担任过县养猪协会副会长、副秘书长，因为在养猪协会无法实行自己的工作思路，就回家专心经营自家的养殖场。他说，“我干哪一行，我非得要出头，不管干什么，对的错的，我非要出头。我既然在养猪协会，我真的有牺牲的那个心态，但是往往得不到别人的理解。有一年，行情低得不能再低了，养猪户都是倾家荡产地投入进去的，像我们都是几十万地往里面投，我知道这苦处，所以我要为全县养殖业着想。我带头，我们找

县食品公司的人谈判，能不能给我们一个保护价，让我们尽量不亏或者少亏。养猪是有周期性的，价格有时候低得让你无法承受，要跳楼自杀，要是涨的时候，就像股票一样，能成为百万富翁。它是周期性的，任何人无法左右的，但是当我们日子不能过的时候，我们养猪户联合起来以养殖协会的名义找县政府的人，能不能给我们一个保护价，让我们少亏或者不亏。县养猪协会一起游行，法律上不是允许我们游行吗？在规定的区域内来游行。我虽然不能掀起大风大浪，但我要把事情放大，让有关媒体参与进来，我的思路应该讲是相当超前的，但是在养猪协会中，他们根本都不理解我。然后，我就死了心。我回去，为我小范围内的人服务，为自己服务。”

回家之后，刘剑宏扩大了养猪规模，但在这一过程中，他经常与镇食品站发生矛盾。他的解释是，“养猪户和食品站永远是一对冤家，因为，你如果得到你的合法权益，你就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食品站披着合法的外衣，干着不合法的事情。就像定点杀猪，共产党的思路是对的，但到底就假了，就变成商业垄断了，就是他们自己讲要给你什么价格，你自己在家杀猪是不行的，必须去食品站那里杀。他们不给你自己杀，非要你把猪卖给他们，他们来杀，卖给他的话，价格就由他来定了。他一转手，什么三百、两百的利润就到手了。如果自己在家杀猪，一头猪的利润就比较多了。但是食品站有个合法的监管制裁你，不是定点屠宰的肉，就是不安全的肉，必须要定点屠宰，你家养的猪，必须到食品站来杀。但是我要捍卫我的权益。从事长期的养殖业，我就已经有商业风险了，在商业风险的情况下，做出的举动就有些失控了。再说，我倾家荡产地投下去几十万，你转一下手，就蜻蜓点水地一头猪赚几百块钱，而且我认为你干的事是不合理的，我肯定心理上不平衡。我杀猪，食品站不给我杀，我就是硬抗，我就是自己杀猪，

坚决不交一分钱。我刘剑宏是杀猪，不是杀人，不至于好严重。我经常到省里去上访，把他们搞怕了，镇食品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我一个人手里倒掉了，真的，我到省里去上访，写信给省长，但是有意泄露给基层政府。基层政府就怕人上访。当某些事情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我写信上访，只要交上去，离我家近些的村政领导就会到我家里去，说是工作指导，我有意透露我要上访，他们只要一提到上访的事，打死人都不愿意，给你磕头都行，只要不上访，什么话都好讲。我又赢了。”

“就讲猪，我坚决在家杀，自杀自卖，不交一分税，我就来硬的，随你怎么办，大不了，我杀猪不是杀人，你能把我怎么样。就讲以武力来抗衡，拿刀砍他，真的砍，但当你真砍时，他们怕死。不管谁冷静下来，都不愿被人用刀砍。我多次用刀砍他们，但是没砍到。第一次用砍刀砍，他手缩回去了，要不整只手都砍下来了，结果把案板切掉了一个角。我非要干出头，这就是我的心态。当你真的不要命的时候，他们就会怕你。终于爆发了这次。我卖肉时，食品站的一个负责人，姓吴，来收我的肉。平常都是我不给他面子，他让我。刚好那天，他不给我面子，讲非要把我搞服了，问我信不信，他的手就动来动去，我火了，一刀砍下去，他手缩回去了，结果把三个关节盖砍掉了。我的刀不快，快就惨了。如果刀快，手指就砍断了。砍掉了，他就地上找，有一根手筋断了，当时他把手捂着，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

在讲述这起暴力案件时，刘剑宏表达了自己的愤恨。“我家养猪，自己杀自己卖，我的利润都很高，但我卖给你，我甚至不赚钱，我凭什么让你一转手，一头猪就赚了几百块钱。我真伤心。我九七年从上海回来，当时还是百万富翁，到现在，我反而欠了几十万块钱，我心理不平衡，就养猪养的。长期的养猪业，是站在高压风口，所以我有点心理

失衡了，这是我的缺点。但是，食品站的人很不道德，他们自己家里养猪，自己杀，自己卖，他们打着合法的外衣，干着不合法的事情。他们家自己养猪，自己盖章，违规操作，谁来监督？他们家的病猪，盖了章，就变成了健康的猪。我们家里的好猪，没盖章，就变成了病猪。”

对于刘剑宏来说，食品站利用权势，垄断市场，剥夺了原本应该属于养猪户的利润，实属不公正，即使他们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也不符合道义。从日常生活中的道理来看，食品站对市场的控制手段也是养猪户难以理解的，自己家养的猪，不能自己杀，“我们家里的好猪，没盖章，就变成了病猪”。在食品站的剥夺和挤压之下，作为弱者的养猪户，暴力成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武器。

## VI. 小结

从现象学社会学和常人方法学的角度来看，纠纷的出现本身意味着人们的习惯性知识和自然态度遭到了破坏，致使社会秩序感难以建立，而社会秩序感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在村落政治以及家庭政治中，这种“正义衡平感觉”的破坏往往与情理失衡、个体生命际遇和家庭命运受到滋扰、遭受委屈与冤屈、利义冲突等相关，影响到个体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家庭正常的过日子。对于这些嵌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与个体的安身立命以及家庭的命运相关连的纠纷、争吵，当我们将其置于村落的草根伦理、习俗礼数以及初级关系圈中的恩怨义信之中进行考察时，会获得一种新的理解。

在本文，我们详细描述了村落社会中那些发生在亲密关系之中、熟人之间的纠纷、争吵和暴力，分析了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些纠葛争执的以及这些纠葛争执在村落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在我们的研究中，无

论是纠纷当事人，还是普通村民，在讲述相关纠纷故事时，常常将纠纷、争吵与情理、道义、不公正等具有社会政治意涵的因素勾连在一起。这种讲述方式包含了他们对是非善恶的评价，对一种有尊严的、符合道义的生活秩序的判断。在他们的解释体系中，纠纷和争吵起源于他者的不道义，而暴力则是对这种不正义状况的抗争和惩罚，以修复遭受破坏的正义衡平感觉。

在本文所叙述的这些纠纷故事中，纠纷的产生与人们所认为的想当然的自然态度和生活秩序的破坏紧密相关，如在别人屋前修厕所；住在一排的邻居将房子建得高出一截，等等。即使这些做法本身在法律上具有正当性，但在伦理情谊上则是非正义的。正如费孝通所说，“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12]。当然，对固有的一套意义系统的破坏，本身可能意味着一套新意义系统的生成。这正如黄应贵所提醒的，现在的农村社会可能在形成另一种不同的社会形态[13]。

## 注释\*

<sup>1</sup>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爱知大学大学院中国研究科中国研究专攻博士后期课程在读。

## \*参考文献

- [1] [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载《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 [3] J.J.霍洛特认为，风水秩序是村落社会中的一种隐形秩序，对风水秩序的扰乱和破坏是

引发争吵、诉讼的一个重要原因。（日）

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何勤华、李秀清、曲阳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 [4] 关于自杀的研究，可参见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 [5] 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 [6] 参见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 [7] 吴飞：《论过日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 [8] 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44页。
- [9] 吴飞：《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56-57页。
- [10] 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1页。
- [11] 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02—303页。
-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25页。
- [13] 参见黄应贵：《农村社会的崩溃？——当代台湾农村新发展的启示》，载于《乡土中国研究的新视野：国际社会学论坛暨社会学系十年庆论文集》，赵旭东主编，2005年9月。

## 中国乡村时间民俗的变迁

### ——以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川底下村为例

王鹤<sup>1</sup>

#### 摘要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川底下村距京 90 公里，村域面积为 5.33 平方公里，其建筑主要以保存完整的明清四合院，三合院为主，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该村于 2001 年 4 月被评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 2003 年 9 月被列为北京市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于 2003 年 12 月被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定为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成为斋堂镇发展乡村旅游业的一块金招牌，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前来参观。可以说，该村从一个原本以种地为主，靠天吃饭的农业型自然古村落成功转型成为一个以乡村旅游业为主，农副产品为副的旅游村。在此背景下，随着乡村旅游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并通过笔者自 2007 年 4 月至 2008 年 2 月在该村的田野调查，深刻感受到该村悄然却显著的发生着各种变化。其中，本文仅就川底下村的时间民俗在乡村旅游业兴起前和兴起后的变化进行了阐述，通过比较该村村民与居住在镇上的人们在时间民俗方面的历史差异，以及分析调研获得的事例，从而得出两个结论，即尽管该村大多数的村民们已改为从事旅游业，但也不能使村民们废除一些传统的时间旧俗，同时，在该村出现的一些时间民俗的新现象，对改善，丰富村民生活，缩小城乡差别等，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时间民俗、乡村旅游业、川底下村

#### I. 序言

“我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每天都无法回避的体验，其实有太多的方面都与‘时间’，与我们的时间观念和我们社会已经形成的时间框架息息相关。在我看来，像人类学和民俗学这样的学科，正好应该从这些并不怎么起眼但又寻常可见的事实和现象出发，去寻求对于社会及文化的根本原理的理解和揭示。‘时间’正是非常适合于我们这样来考虑的重要课题之一。”<sup>2</sup>

笔者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川底下村进行田野调查中，深感该村与时间有关的民俗确

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非常有意义的重要课题。

#### II. 村与镇在时间民俗方面的历史差异

斋堂镇曾经一直以盛产“黑白”两矿，即煤炭与白石灰为支柱产业，这种产业结构在辽，金之前就已形成，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然而，隶属于斋堂镇的川底下村地下却并没有这两种矿产资源，所以只能靠种地收粮维持生计。这样一来，尽管斋堂镇里与川底下村相距不过十几里路，但是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节奏在时间民俗方面造就了二者之间诸多的明显差异，其具体表现如下所述。

## 1. 观念差异

从民国初期开始，斋堂镇的“黑白”两矿逐步实现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按企业管理模式运行。从此，不仅矿工们几点下井，几点上井，每天工作几个小时，每月哪天上班，哪天休息，每月休息几天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运输矿石的车辆几日几时来，几日几时走，也都按约定好的日期进行。这使得在矿井工作的员工养成了按照阳历的日期、时间来安排作息，行使职责，履行合同的习惯。此外，由于斋堂镇在各个时代都是当地行政管理机构的所在地，因此，这些机构当然也都有自己的办公时间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不仅如此，镇内的所有商店、饭馆、澡堂等服务及娱乐设施也都到点营业，定时关门；学校的学生就更是上下课有钟点，寒暑假有日期；就连家庭妇女、学生家长也要按照这些相关的时间操持家务，接送孩子，并为他们和上班的人准备饭菜。因此，可以说住在镇上的人遵守的是“社会时间”观念。

与此相比，川底下村的村民们则完全不同，那种自古以来就形成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直到以农业为主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本都没有太大改变。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村民们是按照古人所说的“气变悟时易”，即根据天气变化察觉季节更替，过的是春播秋收，晴耕雨歇的日子；在当时的川底下村的村民们的心中，没有斋堂镇居民早已习惯了的“8小时工作制”，“七天一个星期”等这样的生活节奏。这些都表明，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年代里，川底下村的村民们所遵守的是“自然时间”的观念。

## 2. 用语差异

在以种地为生的年代，斋堂镇的居民表达时间的用语往往比川底下村的村民们精确得多，例如表述时间长度的时候，镇上的人会说“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可是川底下村的村民们则说“耨一垄地的工夫”、“抽一袋烟的工

夫”、“烧一柱香的工夫”、“吃一顿饭的工夫”等，说得十分笼统含糊。

## 3. 计时用具差异

镇上主要依靠钟表之类的计时用具，而川底下村在各家各户单干的年代只能看“日头”决定出工收工；农业合作化之后，由于变为全村集体下地干活，因此，早上听钟声出家门，到了田间地头后，休息抽烟、吃中午饭、收工回村则要听队长吹哨。

## 4. 年节差异

在“农民以农为主”的年代，川底下村的村民们只能靠天吃饭，生产方式使他们习惯于使用农历，而不太习惯使用阳历来表述时令的变化，带有浓厚的自然色彩。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村民如今都已是60、70岁的老人，他们都知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和六九河边看杨柳，七九冰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清明前后，下地种豆”、“热在三伏，冷在三九”以及“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等许多诸如此类的农时谚语。可是，在这个年龄层的老人中，却有好几位不知道阳历的5月4日是中国青年节。虽然村民们都知道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纪念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一月一日元旦这些节日，但是绝不会像斋堂镇上的机关、学校那样，在这些节日来临时举办一些庆祝活动，更不会放假休息。村民们只重视与自然节气有密切关系的民俗节日，例如春节吃团圆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农历二月二日吃龙须面、立春吃春饼、清明上坟祭祖、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农历十二月八日喝腊八粥等。因此，斋堂镇与川底下村的年节差异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前者是法定国家节日和季节民俗节日都过，后者是只过季节民俗节日。

### III. 关于川底下村时间民俗的新现象

经过千余年的挖掘,自20世纪末起,斋堂镇的“黑白”两矿已出现矿层变薄、瓦斯增多、生产事故频发、矿产品质量低劣等诸多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北京市市政府自1999年以来多次下达文件命令关闭不合理煤矿<sup>3</sup>,于2003年明确指示门头沟区政府必须关闭不能保证安全生产的矿井<sup>4</sup>,于2007年进一步提出到2010年北京市将关闭所有的小煤矿,并通过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门头沟区政府提出今后的发展规划应是将该区建设成为生态涵养区的指示<sup>5</sup>。因此,门头沟区政府决定将原来的支柱产业从矿产开发转向生态旅游开发,并邀请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资源枯竭型地区如何实现产业转型进行了专题研究<sup>6</sup>。

在上述背景下,斋堂镇及川底下村的原有产业结构分别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调整,从此走上了发展旅游业的道路。这一变化使川底下村的时间民俗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具体情况如下所述。

#### 1. 新的时间观念

川底下村以明清古建筑闻名,于2003年被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评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成为斋堂镇发展乡村旅游业的一块金招牌,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这使该村92%的家庭都介入到旅游业的商业活动之中<sup>7</sup>。村民们已不再完全按照农历算节气,更多的是按照阳历算几月几号是周末,或者是什么节日,预测哪些日子可能会有较多的游客到村里观光;到了旅游旺季,许多农家客栈都感到人手紧张,不得不雇用外来的服务员帮忙,而旺季过后,在为这些服务员结帐时,他们则会看着日历数日子计算酬金等。这些不但改变了村民们计算时间的方法,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时间观念,村民们终于明白了“时间就是金钱”的道理。在人民公社的年代,每年冬季村民们在村部干部的带领下一“农闲不闲,挖渠修田”,其实并没有太

高的积极性,常常是“出工不出力”。可是现在到了旅游淡季,据村干部介绍:“业闲人不闲,培训导游员”,从事导游工作的年轻人都积极参加培训班,培训班不上课的时候,有的人在家背诵导游词,有的人到村里各个景点去现场背诵导游词等;而那些不做导游的村民们,到了旅游淡季也是“业闲人不闲,进城去挣钱”,用村民们的话说:“没人跟钱有仇”,意思是说,谁都想利用冬闲季节多挣些钱。

过去,在中国农村流行“农闲农闲,自家团圆”、“人农闲,蛇冬眠”、“农闲仨月,炕头闷睡”等谚语,充分表达了过去农民对时间价值的认识;而乡村旅游业兴起后不久,这些谚语就很少再被提起。

#### 2. 新的时间知识

乡村旅游业的兴起不仅给川底下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而且也带来了与时间有关的新知识。例如圣诞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等被村民们称作“洋节”的外国节日;国际爱牙日、国际爱眼日、国际节能年、国际卫生年等由联合国相关机构组织的全球性的年度活动;……川底下村的村民们虽然不过这些“洋节”,对他们来说,国际机构组织的那些年度活动就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但是,这些毕竟开阔了村民们的眼界,增加了他们在时间方面的新知识。笔者认为,不在于村民们是否过这些“洋节”,也不在于是否能够参与这些国际年度活动,重要的是,这些进入村民们大脑里的时间新知识,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村民们的思想观念,使他们逐步接受一些现代国际上流行的文化理念。例如每天来村里的垃圾车,为了招呼村民们倒垃圾,所播发的音乐竟然是圣诞节的经典乐曲《铃儿响叮当》,这使一些来川底下村参观的外国人感到奇怪,等弄明白是什么意思时,不禁哑然失笑。虽然村中存在令外人感到不协调的地方,但可以看到,“洋节”、“国际年”这类概念在乡村的出现对于缩小城乡之间在精神领域的差距来说,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 3. 新的时间节奏

要开展乡村旅游业就必须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整治村容村貌，并根据游客的要求调整村民们的生活习惯，这些都势必给村民们旧有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带来很大冲击。其中最大的冲击莫过于打乱了村民们长期固有的生活节奏，请看以下事例：

**例 1：**为满足游客的餐饮需求，村民们需要经常从到村里来卖货物的商贩手中购买一些自家不能生产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等（图 1、图 2）。这些商贩按照夏季 5 点半、冬季 7 点半的时间到达村中，这就彻底改变了村民们过去那种“清晨公鸡叫头遍，背筐拾粪出门转”的生活习惯。不仅起床后的工作不再是“背筐拾粪”，而是忙着打扫庭院，为客人准备早饭，就连催人起床的“物件”也由“公鸡打鸣”改成了家里的闹钟。



图 1 卖肉商贩



图 2 卖菜商贩

**例 2：**大批游客的到来使川底下村的垃圾迅速增多，这就需要专用汽车到村里把各家清理的垃圾及时运出村外。平时垃圾车一天来

一次，时间为每天下午 5、6 点钟，而旅游旺季及周末则为一天两次，即除下午 5、6 点钟外，早上 7、8 点钟再增加一次。村民们知道，只有通过给前来食宿的游客留下清洁卫生的良好印象，才能使自家的客栈吸引更多的“回头客”，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所以，每家无形中养成了时间规律，都努力在垃圾车进村前半小时清扫厨房、院落，以便垃圾车一到就能立即把脏东西全部倒掉。

**例 3：**109 国道的竣工给来川底下村旅游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特别是 929 支公交车的通车，不仅吸引了北京市内的市民前来川底下村休闲度假，而且也极大方便了村民们前往镇上及城里办事、购物。但是，因为这条路线属于长途，所以公交车每天只往返两次，从川底下村返回城里的时间分别为 10 点 30 分及 15 点 30 分。村民们牢记这两个发车时间，不仅提醒那些想要乘车回城的客人别错过时间，而且如果自家有事要进城，那就更要按照这个时间安排家务。可以说，929 支公交车从川底下村发车的时间已然成为许多家庭的“工作时刻表”。

**例 4：**领取养老金的老人，不知不觉地养成了按照阳历计算日子的习惯。这是因为随着村里旅游业的繁荣发展，不仅大幅度提高了村民们的生活水平，而且村委会也具备了更好地赡养老人的经济条件。因此，村委会决定每个月向年满 60 周岁至 75 周岁的老人每人发放 100 元的生活补助费，超过 75 周岁的则发放 200 元。每到发放养老金的日子，村干部便通过村里的广播通知老人们领取。这个令老人们高兴的日子说的是阳历的日期，于是老人们也就养成了按照阳历盼发钱的习惯。

### 4. 新的民俗特征

笔者在川底下村进行田野调查中发现，该村在乡村旅游业兴起之后产生出一些从未有过的民俗特征，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时间民俗的多样性这一特征。如前所述，在人民公社时期，

川底下村依靠农业维持生计，各家各户都按二十四节气这个“自然时间”的观念安排全年的生产及生活，也就是说全村上下一年到头遵守的是同一个时间节奏。但是，这种状况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兴起被彻底打乱，在这个 29 户人家的小村庄中，在时间观念和时间的节奏方面呈现出多样性，其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 (1) 时间观念的多样性

或是因为农家客栈在村内的地理位置优越，或是因为回头客多等原因，有很多游客会提前向这些农家客栈打来电话预订食宿。但是，由于没有像城里人那样使用记事本的习惯，为保证游客到来后都能有吃有住，客栈主人必须依靠记忆准确地记住游客预订食宿的日期及住宿天数，从而养成了严格遵守时间的习惯。与此相比，那些经营得不太成功的客栈则不同，往往是在村里的游客过多，食宿安排不下的时候，由村委会或亲戚把游客介绍或分派过来，因此这样的农家客栈一般当天才能知晓有无游客前来食宿，没有必要提前记住日期及人数，因而时间观念就相对比较淡薄。而那些在身体或年龄方面没有条件经营客栈的村民们的生活节奏则更为缓慢，起居随意，时间观念淡薄。当然，时间观念的多样性还表现在前文中提到的对时间价值的认识等诸多方面，在此仅举上述一例。

#### (2) 计时用具的多样性

在单纯计算时间时，川底下村的村民们既有用手表的，也有用手机的，还有用挂钟的。而在计算年月日时，则既有用挂历的，也有用台历的，还有用手机的。

#### (3) 时间和日期标志的多样性

在同一个计时用具上有多种对时间和日期的标志。例如许多村民家的挂历上既有阴历又有阳历，同时还标示着黄历，这既方便了初一、十五去村中寺庙上香的村民们，也为村民们提供了进行修建房屋，婚丧嫁娶等事务的最佳时机；有的村民家中的挂历上还注释着某一属相的人在此月的运势如何，并有英文译文以及对

中国人属相的英文说明；许多村民家中墙上挂的电子钟的表盘上既显示时间，又显示阳历日期和阴历日期（图 3）。



图 3 村民家中的电子钟

#### (4) 内外节日的多样性

川底下村存在着两套节日系统，一套是民俗节日，另一套是法定节日。在民俗节日中，有的是可以和游客共享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春节。节日期间，特意从城里到川底下村来感受乡村春节气氛的游客与川底下村的村民们一块放鞭炮，一起玩“转灯”<sup>8</sup>，不分宾主，大家共同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是，有的民俗节日则只能由川底下村的村民们自己单过，最有代表性的是清明节。对川底下村的村民们来说，清明节比春节更重要，所以不论是长期在外打工的，还是上学的、从商的，春节可以不回村过年，但是清明节时一定会回村上坟祭祖。而国家法定的节日，川底下村的村民们是不过的，这是因为法定节日时会有大量来村参观的游客，此时正是经营农家乐的时机，村民们忙都忙不过来，怎么可能在节日时休息呢？如果说民俗节日与法定节日是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在这两套节日系统上所表现出来的内外有别的多样性，就只能属于像川底下村这类乡村旅游文化村才有的特殊现象了。笔者认为，尽管 2007 年 11 月 9 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社会公布的《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拟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增设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但是川底下村内外节日的多样性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 IV. 在该村的时间民俗中依然存在的旧俗

除前文提到的川底下村的村民们有时按照阴历办事，只过民俗节日等一些传统的时间观念外，村中至今依然还存在着一些与传统的时间观念有关的习俗。例如村民们非常重视时辰，相信一个人出生的时辰不仅将主宰他（她）终生的命运，而且直到他（她）过世下葬时都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辰；在盖房子时，上梁时间必须在中午 12 点进行；结婚时，根据当地的习俗，必须在天亮前将新娘娶进村里，并在上午 10 点举行结婚典礼，如果新娘或者男方是二婚，那么迎娶及典礼等一切有关事项则必须都安排在下午进行。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在该村中与时辰有关的一些传统习俗并没有因为乡村旅游业的兴起而发生改变。

#### V. 结束语

本文从乡村旅游业的兴起给川底下村的时间民俗带来的改变这一角度进行了上述研究，从中笔者得出以下 2 点认识：

1. 在前文“III. 关于川底下村时间民俗的新现象”中提到的诸多现象标志着时代的发展。例如每天按时倒垃圾，冬季不再“农闲仨月，炕头闷睡”等习俗的改变，表明村庄比以前整洁了，村民们生活内容丰富了；时间制度的多样性和内外节日的多样性，表明村民们在市场经济中有了灵活多样的经营能力；计时用具的多样性，表明村民们的物质生活丰富起来了。可以说，这些对建设小康社会，对缩小城乡差别具有积极的作用。

2. 村中依然存在一些传统的时间观念，这恰恰说明了其存在证实了文化学所主张的“凡不具有稳定性的文化现象，就不成其为传统”的观点。笔者认为，时间民俗尤其是这样，中国人使用的阴历是根据月亮，露水，雨雪，风霜等与自然环境有着极其密切关系的外部世界的变化而制定的，例如“立了冬，拔大葱”，

即一立冬就要立刻将大葱从地里收回家中；到了春节或清明节，村民们都会回乡团聚，上坟祭祖，这些都说明了尽管大多数的村民们已改为从事旅游业，但也不能使他们废除阴历及其由此而来的一些习俗。

#### 注释\*

<sup>1</sup> 北京中盾安全技术开发公司，工程师。本研究得到“2007 年度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青年研究人员研究资助项目”的资助。

<sup>2</sup> 周星，《关于“时间”的民俗与文化》，西北民族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122 页～第 139 页。

<sup>3</sup>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有关部门的通知》，1999 年 1 月 13 日，

<http://www.chinalawedu.com/falvfagui/fg22016/59327.shtml>.

<sup>4</sup> 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2003 年 8 月 7 日，

<http://www.chinaacc.com/new/63/74/117/2006/2/ma44134551571422600226455-0.htm>.

<sup>5</sup> 北京市人民政府，《到 2010 年将彻底杜绝小煤矿》，2007 年 5 月 23 日，

<http://www.sina.net/zy/2007-05-23/323408.shtml>.

<sup>6</sup> 项目名称：北京市门头沟区产业转型与旅游业路径选择；项目承担单位：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社科规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项目负责人：林越英；立项时间：2007 年 1 月 25 日；更新日期：2007 年 3 月 14 日，

<http://www.bjpopss.gov.cn/xxgl/xmk/1849.htm>.

<sup>7</sup> 此数据出自川底下村村民委员会 2007 年度的统计。

<sup>8</sup> 笔者注：该村特有的一种春节游戏。

#### \*参考文献

- [1] 周星,《时间的民俗》,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 [2] 周星,《中国:时间观念与时间制度多样化的国度》,中国民俗学会编《节日文化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6.
- [3] 宗晓莲,《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省丽江市纳西族文化为例》,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
- [4] 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门头沟区民俗协会合编,《京西民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1年.
- [5]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政府编,《皇都古镇斋堂》,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
- [6] 谭烈飞主编,《北京方志提要》,中国书店,2006年.
- [7] 萧放,《岁时记传统与中国人的岁时观念》,电子稿,2006年.
- [8] 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兼论传统中国民众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 喪葬儀式中“傳燈花”的習俗 ——以北京市門頭溝區齋堂鎮川底下村為例

王鶴<sup>1</sup>

### 摘要

筆者自 2007 年 4 月至 2008 年 2 月在北京市門頭溝區齋堂鎮川底下村進行了將近 1 年的田野調查。在調研的過程中筆者發現，當地人習慣用一個由紙片做成的“燈花”來祛除污穢，或是在喪葬儀式上使用。然而經過多次的走訪與調查，筆者意識到由於歷史上多次政治運動的衝擊等原因，川底下村喪葬儀式上傳燈花的習俗出現了傳承失真、方式混亂、趨於簡化，而且相關文字資料匱乏等問題。為能夠調查清楚該村在喪葬儀式上傳燈花的習俗，筆者通過對川底下村與齋堂鎮傳燈花習俗的比較，從中找出了兩者間的共性和個性，進而逐漸梳理出川底下村在喪葬儀式上傳燈花習俗的現狀及獨特之處。該結果也證明了同一民族在同一習俗方面確實存在着地區差異，其形成的原因與所處自然環境，空間環境有着密切的關係。此外，喪葬儀式上的傳燈花習俗只是川底下村燈花習俗中的一個方面，因篇幅所限，本文僅談了這一項，其餘部分及如何全面地認識這一習俗等進一步的深入調查研究，則留待以後完成。

**关键词：**喪葬儀式、傳燈花、川底下村

### I. 燈花的制作

川底下村將制作燈花稱為“捻燈花”，並對在什麼情況下應點什麼顏色的燈花，由什麼人來“捻”等細節都非常有講究。喪葬儀式上用來傳遞的燈花為白色，由長約 9 厘米，寬約 7 厘米的雙層白色紙片制成，分為花穗，花腰，花托三部分。制作的过程大致如下：

第一步，將紙片的一端用剪刀剪出 6 至 7 條約 1 厘米長，約 1 厘米寬的條狀，以便用來做燈花的花托，將另一端也剪出 6 至 7 條約 1 厘米長，約 0.5 厘米寬的條狀，以便用來做燈花的花穗；

第二步，用右手食指和拇指將紙片的中間部位捻成圓柱狀，使之能夠支撐整個燈花，此部分為花腰；

第三步，將做花托一端的每一條紙片均勻

分開，使之可以平穩地立住；

第四步，將做花穗的一端整理成細小的穗狀。這樣，一個燈花就做好了（見圖 1）。



圖 1 喪葬儀式上使用的“燈花”

在捻燈花時一定要注意絕不能沾上自己的唾液，要沾就必須沾清潔的水，這是因為人們認為唾液既臟又臭，會褻瀆神靈。此外，喪葬

仪式中用来传递的灯花，必须由“不全和”的妇女<sup>2</sup>制作。

为了让灯花点燃后燃烧的时间足够长，并且明亮，还需要给花穗沾上些许食用油，但不可沾得过多，以免灯花燃灭后留下油迹。丧葬仪式上使用的灯花在沾上食用油后，需要在一个大盘子里放置一个晚上，以便使食用油全部浸入纸内。在点燃灯花前，还会再将花托尽量分开得均匀一些，这样才能使灯花点燃后能够稳当地立在器皿里。

## II. 葬礼仪式上的传灯花

### 1. 传灯花的准备工作

川底下村所在的斋堂镇的丧葬习俗与汉族丧葬习俗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斋堂镇和川底下村在出殡的前一天晚上要举行一项仪式，该项仪式被称作“传灯花”，属于“辞灵仪式”的一部分。举行传灯花仪式的时间是在“送三”回来，“参灵”之后，即死者的亲戚朋友集中吊唁的仪式完毕之后。据村民介绍，这一仪式来自于当地的民间传说，这一传说称，赴黄泉的路上一片昏暗，死者需要有亮光为其灵魂照明引路，而灯花就具有这个作用。所谓“传灯花”，简单的说就是前来参加辞灵仪式的亲属们按照男女，辈分大小排列，将点燃了灯花一个接一个地传递下去，最后将熄灭了的灯花灰烬倒入棺材前的烧纸盆里。

丧葬仪式上传递的灯花为白色。如前所述，这种场合的灯花一定要由“不全和人”制作，着手制作的时间是在死者过世之后。关于制作的灯花数量存在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要比死者的年龄多做出两个，这两个灯花，一个是献给天的，另一个则是献给地的。例如死者的年龄为75岁，那么就要捻77个灯花；第二种说法是，与死者年龄相一致即可，如果死者是在75岁时去世，那么就捻75个灯花。川底下村所采用的是第二种说法。

在传灯花仪式开始前，人们需要将沾过食

用油的灯花用筷子逐个立着摆放到一个圆形的大茶盘上。虽然对圆形大茶盘的尺寸及每行灯花摆放的个数等细节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但是在摆放时，一般都是从大茶盘的外沿开始，向着大茶盘的中心位置一圈一圈地摆放。摆满了灯花的大茶盘被供在灵桌上，同时还要在大茶盘的旁边放上若干个小盘或小碟。对这些小盘或小碟的个数及其尺寸没有具体规定，不过，因为灯花是放在这些小盘或小碟上一个一个传递的，所以，到底准备多少个小盘或小碟，则要根据参加传灯花的人数多少来决定。具体细节将在后面阐述。

传灯花的准备工作如上所述，川底下村与斋堂镇，及其他斋堂镇所管辖的村落相比，除传灯花仪式的具体细节外，基本没有太大差异。

### 2. 斋堂镇的传递方式<sup>3</sup>

斋堂镇比较普遍的做法是，死者入殓后，将棺材放在院子当中，棺材头对着院内，棺材尾对着正房堂屋门口。在棺材头的前面设置一个放供品的桌子，当地称之为“灵桌”，灵桌前的地上放置烧纸盆，当地称之为“丧锅”。死者的直系亲属及亲朋好友排列的顺序是：死者的长子，面对棺材跪于丧锅前[无长子时由长女代替长子角色（也有由大女婿代替的说法）]；长女面对棺材尾跪于地上，（长女代替长子角色时，由次女代替长女角色）；其余的亲属及亲友以死者长子所跪位置为上，以死者长女所跪位置为下，按照辈分的高低排列，男性跪于棺材左侧，即长子的左侧，女性跪于棺材右侧，即长子的右侧；所有的人都面对棺材下跪，将棺材围在众人中间。此外，传灯花仪式的具体组织工作由两个人负责，一个人被称为“执事主持”，另一个人是其助手，被称为“张罗人”。这两个人是从本村或外村请来的男子，与死者不沾亲带故，只要具有这方面的丰富经验即可。执事主持站在灵桌的左侧，面对跪在地上的死者长子；张罗人站在灵桌的右侧，也面对跪在地上的死者长子（见图2的排列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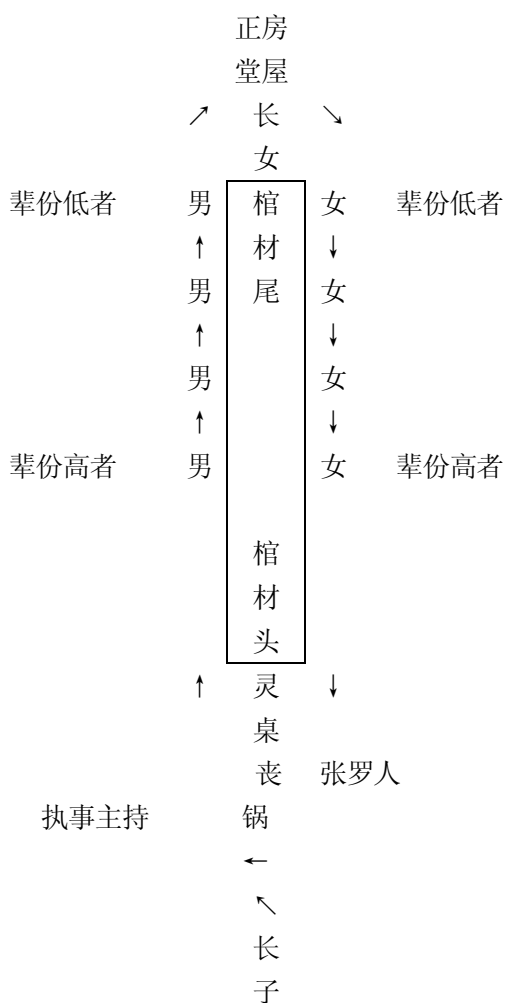


图2 斋堂镇传灯花仪式的人员排列及传递方式

(注：箭头代表灯花传递方向)

众人按照上述规定的位置围着棺材跪好后，执事主持高喊“辞灵开始”，也就是说，从此时起传灯花仪式正式开始，其传递的顺序如下：

(1)死者长子跪着将放满灯花的大茶盘用双手从灵桌上端起，举过头顶举到执事主持的面前；

(2)执事主持用筷子从大茶盘里夹起一个灯花，用蜡烛点燃后放到一个小盘或小碟上，

然后将放好灯花的小盘或小碟递给跪在棺材左边的第一个亲属或亲友，也就是说，灯花是从男性亲属开始传递的；

(3)此亲属或亲友双手举过头顶接过小盘或小碟，并保持此姿势将灯花传递给跪在自己身边的下一个人；

(4)此人也应双手举过头顶，接过灯花并继续向下传递；直到传至最后一个人，即跪在棺材右侧的女性亲属或亲友手中；

(5)最后一个女子双手举过头顶将小盘或小碟交给张罗人，张罗人接过后将小盘或小碟里的灰烬倒入丧锅中。

在传灯花的过程中，人们需将双手高举过头顶，此举意味着对死者的尊敬。此外，执事主持不必等到第一个灯花传到最后一个人时才开始传第二个，而是将第一个传出去后就可传第二个，这样一个接一个地传递出去。如果灯花在传递途中熄灭，也不必更换或重新点燃，而是应不中断地往下传递。当张罗人将大茶盘里所有的灯花全部倒入丧锅中后，执事主持宣告传灯花仪式结束（见图2的传递方式）。在传灯花的整个过程中，和尚一直会在在一旁念诵被称为“观灯焰口”的经文，内容为十个字，即“香、花、灯、涂、果、乐、茶、食、珍、衣”，同时由寺庙里的乐师吹奏“佛乐”。在文革期间，作为四旧，寺庙被砸毁，和尚被取缔，丧葬仪式上念诵经文及吹奏佛乐的习俗被禁止。因此，如今在丧葬仪式上只由当地称为“吵子班”的“乡间民乐吹奏班”吹奏一些普通的民间音乐。此外，当地将为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举行的葬礼称为“喜丧”，这种场合还要吹奏一些欢快的乐曲。

### 3. 川底下村的传递方式

据笔者调查，由于川底下村的房屋依山势而建，因此，丧葬仪式上的诸多细节会受自然环境及空间上的影响，即除对参加传灯花的亲属或亲友采取特殊的排列方式外，在传递的一些细节上也与斋堂镇及其他村落有所不同，具

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传灯花的仪式不是在死者入殓后举行，而是在入殓前举行。因此，不是将棺材放在院子当中，而是将死者的遗体停放在正房堂屋内，其头部对着堂屋门口外。灵桌放在遗体头前，丧锅放在灵桌前。这样一来，大大减少了所占用的空间。

(2) 参加传灯花仪式的成员不同。由于川底下村大多数人家的院子比较窄小，所以传灯花仪式的成员不能像斋堂镇那样，既请直系亲属又请亲朋好友，而是只能以死者的直系亲属为主，以死者的亲戚为次。如果院子稍大一点，或者死者的直系亲属不多，则可以多请几位亲戚参加，相反则少请几位亲戚参加。总之，以优先考虑死者的直系亲属为原则。

(3) 放在传灯花用的小盘或小碟中的灯花数目不同。川底下村的有些人家往往会在小盘或小碟中放入两个或者三个灯花，所以此时使用的容器比斋堂镇的略大。笔者从村民们的介绍中得出两条原因，即①村民们说：“别看川底下村穷苦，可是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加上空气好，吃的东西干净，我们村的人都长寿。”据笔者调查，川底下村的高龄老人确实比较多。如前所述，由于该村为死者点的灯花数目与死者的年龄相一致，因此当高龄老人去世时，相应点的灯花就比较多。②因为院子建的窄小，空间有限，所以参加传灯花仪式的人数也就相对较少。因此，这两条原因就形成了由少数人传递大量灯花的局面，这就导致川底下村不能像斋堂镇那样一次只传递一个灯花，而是为了缩短传递时间，每次便传递两、三个灯花。

(4) 参加传灯花仪式的人员在排列方式上的不同。川底下村是从位于院内的厨房门口跪至位于正房堂屋内的丧锅前。据笔者多次走访调查，其具体的排列方式大致以下三种：

第一种排列方式，死者的长子，[无长子时由长女代替（也有由大女婿代替的说法）]，面对死者头部跪于丧锅前，死者的长女（长女代替长子角色时，由次女代替长女角色）则面朝

停放死者的位置跪在厨房门口；其余亲属以死者长子所跪位置为上，以死者长女所跪位置为下，按照辈分高低从上至下，即从死者长子身后开始跪至死者长女之前；跪下时男女分成两行，面对面排列，男性跪于长子的左侧，女性跪于长子的右侧（见文末图3的排列方式）。

第二种排列方式，有的家庭并不太讲究男女的排列顺序，只要按照辈分高低跪成两排即可（见文末图4的排列方式）。

第三种排列方式，更不讲究的家庭则更为随意。亲属们虽然也分成两排面对面跪在地上，但不分男女，随意排列，既可以男女相邻，也可以三三两两的间隔，因此此时也就没有辈分高低之分了（见文末图5的排列方式）。

很明显，丧葬仪式上传灯花的民俗在川底下村发生的变化是由该村的居住环境造成的。像川底下村这样的将住房与院落都建在山坡上的小山村，空间、面积一般都不大。遇到举行丧葬仪式时，在一间小小的厨房里，不能又为死者准备供品，又为前来吊唁的人们准备饮食，只好在厨房门前往院子里临时接出去搭一个棚子，村民称之为“供棚”，这样一来，院子就更加窄小。如果将一口大棺材放在如此狭窄的院子里，便没有了人们围在棺材四周传灯花的空间。于是，村民想出三个变通方式，第一个是为了扩大传灯花的场地，即不入殓；第二个是利用从厨房到遗体前这个空间来传灯花；第三个是在安排参加传灯花仪式的成员时，以优先直系亲属，灵活掌握其他亲戚为原则进行。

(5) 传灯花的顺序不同。由于川底下村不像斋堂镇那样众人围跪在放于院子当中的棺材进行传灯花仪式，而是跪着将灯花从厨房或者供棚门口传至丧锅前，所以就产生了灯花是如何传递的问题。笔者从村民的口中得到以下三种说法，分别与前述的三种排列方式相对应：

第一种传递顺序的说法来自几位70岁以上的老人和很早以前曾担任过执事主持的村民。他（她）们认为：“因为传灯花是对死者的



祭奠，所以也应该像斋堂镇那样重视，要由执事主持和张罗人两个人负责仪式的具体组织工作，而且灯花的传递方式也不应有太大变动。不过，考虑到川底下村空间狭窄等条件限制，可将斋堂镇围绕棺材传灯花改为从遗体前传至厨房前，再从厨房前传回到遗体前。但是，排列方式也要像斋堂镇那样讲究辈分和性别。”具体的传递方式如文末图3所示，因为与斋堂镇传灯花仪式相同，所以在此不再重复。此外，口述人还讲了另一个变动，即川底下村很少请“吵子班”吹奏音乐，更不记得请过和尚念经。据笔者对该村历史的调查，估计这可能与近代川底下村经济贫困有关。

第二种传递方式的说法与第三种传递方式的说法均来自村中的中年人人口，具体如下：第二种传递方式与第一种传递方式的不同在于灯花的传递起点及传递方式。按照这种说法，灯花是从跪于厨房门口的长女手中开始传递的，即在厨房里的人不管是谁，都可点燃大茶盘中的灯花，并将其放入小盘或小碟里，然后传递给长女，长女再将其传递给按照辈分跪在院内左侧的亲属，然后该亲属再将其传递给右侧的亲属。如此这样面对面相互交叉着传递到遗体前，最后由长子将小盘或小碟里的灯花的灰烬倒入丧锅中（见文末图4的传递方式）。此场合只有执事主持，没有张罗人，并且执事主持不参加传递的全过程，仅喊一句“辞灵开始”。

第三种传递方式有过于简单化的倾向。这一倾向首先表现在前述第三种亲属的排列顺序上；其次，除只有长子的角色而没有长女的角色这一不同之处外，传递方式基本与第二种传递方式相同，并且执事主持和张罗人的情况也与前述第二种传递方式中的情况相同；最后，在传灯花的过程中，人们不必一定要将灯花举过头顶，即使与胸口平行地传递给下一个人也无妨，只要最后将灯花传递到长子手中，由他将灯花的灰烬倒入丧锅中即可（见文末图5的传递方式）。

### III. 结束语

回顾笔者在川底下村对丧葬仪式上传灯花习俗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心情非常复杂。这是因为一方面深感这一习俗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十分宝贵的，但同时又为这一习俗在川底下村的现状感到担忧。目前，20岁上下的年轻人虽然知道丧葬仪式上有传灯花的习俗，但是对具体细节几乎都说不清楚。真正能够讲述灯花习俗的都是70、80岁上下的老人，在50、60岁的人中能稍微做一点介绍的也为数不多，而且这为数不多的几位村民所介绍的也经常是五花八门，这从文中也可看出。此外，对该习俗的调查结果，笔者还存在几点不解之处。例如，以男性为后代传人是汉族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从男性亲属开始传灯花正是这种传统观念的具体体现，而不分性别，辈分随意跪着传灯花，有点不可思议；从长女而不是从长子开始传灯花的说法和做法，也很令人难以置信。其实，村里的老人对这种说法和做法是有想法的，但他（她）们往往沉默不语。

综上所述，调查结果显示，由于历史上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等原因，川底下村丧葬仪式上的传灯花习俗出现了传承失真、方式混乱、趋于简化，而且相关文字资料匮乏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笔者通过比较川底下村与斋堂镇在丧葬仪式上传灯花的习俗，从中找出两者间的共性和个性，从而逐渐梳理出川底下村在丧葬仪式上传灯花习俗的现状及其独特之处。该结果也证明了同一民族在同一习俗方面确实存在着地区差异，其形成的原因与所处自然环境，空间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丧葬仪式上的传灯花习俗只是川底下村灯花习俗中的一个方面，因篇幅所限，本文仅谈了这一项，其余部分及如何全面地认识这一习俗等进一步的深入调查研究，则留待以后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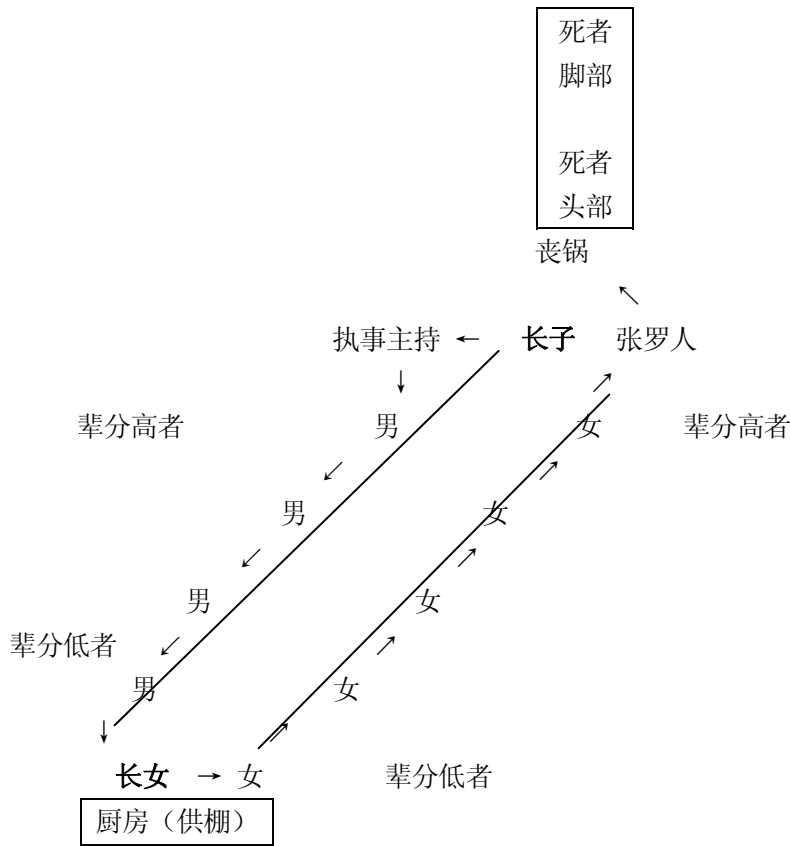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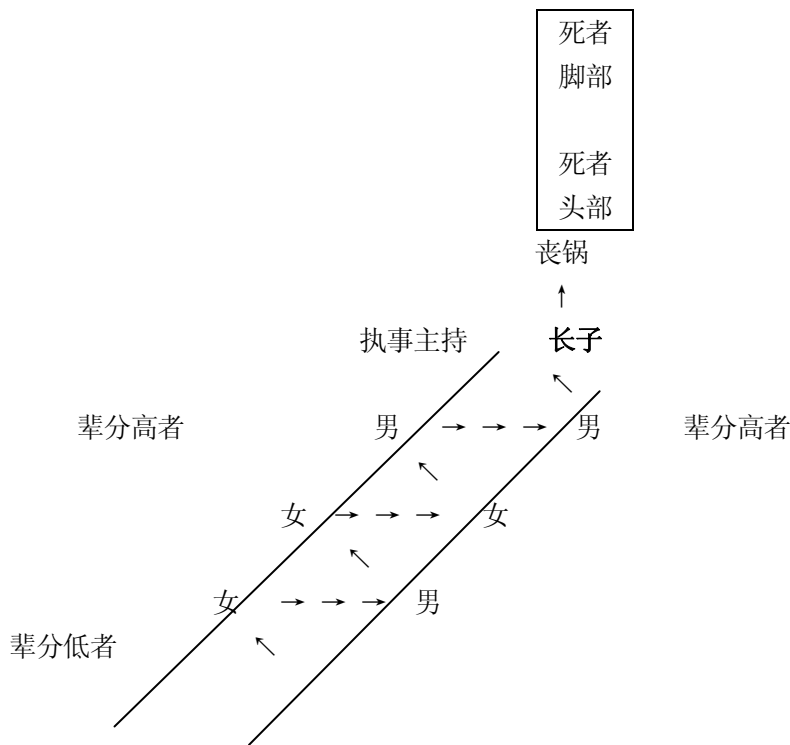


图3 川底下村传灯花仪式的第一种排列及传递方式  
(注：箭头代表灯花传递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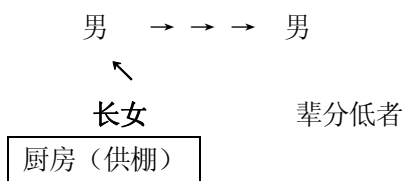


图4 川底下村传灯花仪式的第二种排列及传递方式  
(注：箭头代表灯花传递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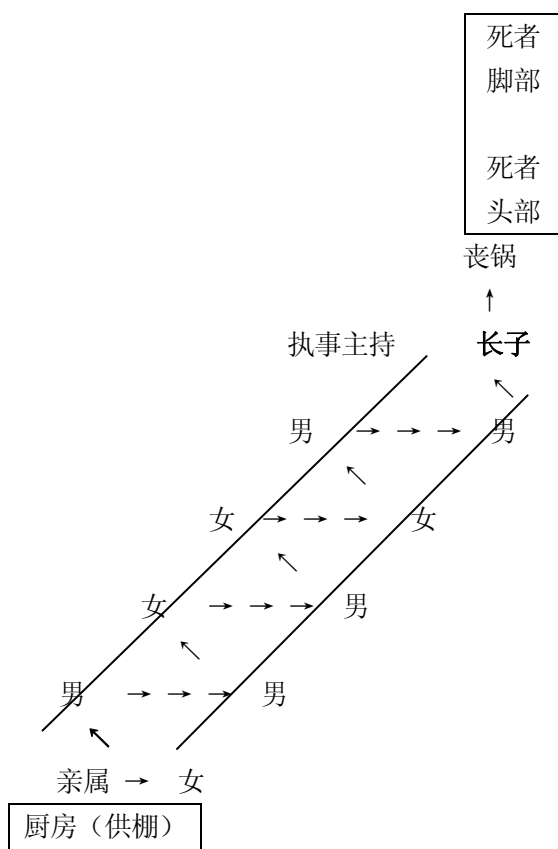


图5 川底下村传灯花仪式的第三种排列及传递方式  
(注：箭头代表灯花传递方向)

注释\*

<sup>1</sup> 北京中盾安全技术开发公司，工程师。本研究得到“2007年度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青年研究人员研究资助项目”的资助。

<sup>2</sup> 在川底下村，“不全和”的妇女指的是原配丈夫已去世，或者已离婚，或者因丧夫、离婚而再婚的妇女。

<sup>3</sup> 政协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门头沟区民俗协会合编，《京西民俗》，香港银河出版社，2001年。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
- [2] 周星，《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上）（下），商务印书馆，2006年。
- [3] 北京市门头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市门头沟区志》，北京出版社，2006年6月。
- [4] 谭烈飞主编，《北京方志提要》，中国书店，2006年3月。
- [5] 韩敏著，陆益龙、徐新玉译，《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 【編集後記】

「…一世異朝市／此語眞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陶淵明）／本号では、昨年末開催された第9回 ICCS 国際シンポにおける報告の一部を特集としてお届けします（2012年度内に開催される予定である第10回国際シンポは ICCS 設立10周年記念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ご期待ください）。第9回国際シンポのテーマは「グローバル社会のなかの中国」でした。この設定そのものから実は企画段階でもさまざまな議論がありました。グローバル社会やグローバリズムをめぐる一連の議論には、ご案内のようにいわゆるグローバリズムの展開をアメリカ社会やアングロサクソン資本主義の展開として理解する立場もあり、「グローバル社会」自体の定義もさまざまです。ICCS では2010年12月には「北京コンセンサスの終わり」論文で有名な姚洋北京大学国家発展研究院・副所長をお招きした国際シンポを開催しましたが、中国が今後世界において独自の規範をどのように形成していくのかは、現在もなお大きな課題となっています。「グローバル社会」がある特定の世界規範の通用する社会という意味であれば、それをアングロサクソンとするのか、中国自体とするのかによって、「中国」の位置づけが異なってきます。「チャイメリカ (chimerica)」から「パックス・シニカ (Pax Sinica)」への移行期であるという考え方も成り立ちますが、新たな価値体系の創設をどう理解していくのかについても、予め思考を鍛えてお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時代にわれわれはいるのだと言えます。ヨーロッパ近代はイスラームの近代を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で隠蔽してあたかも新たな価値システムが人類史上に登場したかの如くに振舞っていたわけですが、アングロサクソン資本主義を経てそれを継承しようとする中国も、いずれ同じようなパターンによって価値システムの移行を正当化し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かもしれません。何れにせよ、パラドクシカルな時代に視座を喪失することなく世界を見通す力こそ学問は鍛えるべきなのでしょう。（鈴木規夫記）



論文

## 過渡期中国はどこへ向かうか —中国の大国化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

加々美光行<sup>1</sup>

### 要旨

中国の東アジア安保戦略は、米オバマ政権の2011年秋以後の新たな国際戦略の転換、具体的には戦略の重点をヨーロッパ及び中近東からアジア太平洋へと移す方向を採ったことに影響を受けるに至った。このため中国の安保戦略は外交的には従来通り対米宥和政策を堅持しつつ、他方軍事的には対米抑止を強化する方向を見せ始めている。

とりわけ2011年11月オーストラリアにおけるオバマ演説で米海兵隊の戦力2500名を数年のうちにオーストラリアに常駐させるとしたこと、さらにフィリピン、ベトナム、韓国、日本との合同軍事演習を実施したことなどによって、オバマの戦略転換が東シナ海、南シナ海の海洋において中国を包囲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中国はこれを「戦略東移」と呼ぶようになった。

中国は既に2000年代に入って、欧米諸国だけでなくアジア諸国からもその経済大国化、軍事的な大国化を脅威視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中国はそうした見方に対して、自国の大国台頭化はあくまで「調和（和諧）」を前提としたものであり、その台頭は平和的なものであって、決して世界に脅威を与えるものではないと主張した。国内的な「調和社会」の実現が対外的な平和協調を実現するというのである。

現実には中国はその高度成長が国内的に格差の拡大を生み、社会的矛盾を各所で爆発させており、また対外的には南シナ海、東シナ海で海洋権益をめぐって隣邦諸国と摩擦を引き起こしている。

陶文釗、王逸舟などの外交専門家は、東アジアの国際政治に中国が平和大国として役割を果たすためには、前提として国内的にその社会矛盾を解決し、真に「調和社会」を実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主張する。

**キーワード：戦略東移、対米抑止、調和社会、平和大国化**

### I. 中国の行方を左右する米中関係 —現在の米中戦略的対抗と 20年前の米中戦略的対抗の異同—

今から20年前、クリントン第1次政権下にベーカー米国務長官（当時）は地域安全保障戦略として、「環太平洋共同体戦略構

想」（1991年11月於APEC出席途次、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で行った講演）を打ち出した。

ベーカー戦略構想の骨子はちょうど20年の時間を隔てて、昨年（2011年）11月中旬のオバマ戦略構想（オーストラリア議会とダーウィン豪空軍基地で行った講話）と酷似している。そのどちらもがアジア太平

洋国家である中国を環太平洋共同体（地域安保）戦略の埒外に置いている。つまりそれは中国を主要なターゲットにしていることを意味する。二つの戦略構想の前提になっている事実は、『環太平洋全般の海域においてアメリカが圧倒的な制海権を有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

それではまず 91 年ベーカー戦略構想とは、

(1) 地政学的に環太平洋を東西に跨って大きく広がる扇子の形の形をした共同体機構を作る。

(2) この扇子の要（カナメ）に位置するのが米国。扇子の縁（フチ）に位置するのがアジア地域諸国。

(3) この扇子の要から縁まで西に向かって 4 本の扇子の骨（二国家間同盟）が走っている。中央の基幹となる骨が「日米同盟」。この基幹骨を脇から支える骨が 3 つ。その 1 が「米韓同盟」、その 2 が「米国・ASEAN 同盟」、その 3 が「米豪同盟」、とされた。

その戦略的意図は 1991 年ブッシュ前政権によるイラク戦争の泥沼化による膨大な戦費支出によって、大きな負担を負ったクリントン政権が新たに世界戦略の重点を中東からアジア太平洋に移す必要があったこと。さらに 89 年天安門事件と 91 年末ソ連崩壊によって、主に残された社会主義大国中国に対する抑止、封じ込めが求められたことにあった。

今般のオバマ戦略構想はこのベーカー戦略構想の修正新版とも言えるものである。

では 2011 年 11 月時点現在のオバマ戦略構想と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か？

(1) 環太平洋共同体（太平洋を覆う扇子）としてアメリカ主導の TPP（環太平洋戦略的経済連携協定）を既存の ASEAN プラス 3

（日中韓）、ASEAN プラス 6 と別途に設立する。

(2) ベーカー戦略で共同体の扇子の基幹骨をなしてきた「日米同盟」について、オバマ戦略ではその前方防衛線の一部を、沖縄列島からグアムを中心とした（中国外交筋が言うところの）第 2 列島線まで、東寄りに軸足を移動する。

(3) ベーカー戦略では基幹骨の「日米同盟」を脇から支える副次的骨に過ぎなかった「米豪同盟」について、オバマ戦略構想では海兵隊を当初予定で 250 人、最終的には 2500 人、オーストラリアに駐留させるなど「米豪同盟」を強化、深化させる。

(4) ベーカー戦略で副次的骨の一つをなした「米国・ASEAN 同盟」に、オバマ戦略構想では米国がより深くコミットすることを目指す。このため、2005 年以来開催されていた「東アジア・サミット」（EAS）が昨年（2011 年）11 月インドネシアのバリで第 6 回会議を開催するのを機に、新たに米国がロシアとともに参加するに至った。それまでの EAS は ASEAN・10 カ国に日本、韓国、中国、インド、オーストラリア、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の 6 カ国を加えた形で開催されていたのである。

ベーカー戦略も、今回のオバマ戦略も、アメリカ国内経済の疲弊から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安全保障面で米国の軍事負担を軽減するために、日本を始めとする同盟諸国に負担分担をより多く求めることを狙いとす点で共通している。

しかし、この二つの戦略構想はこの 20 年間、国際社会のグローバリズムに起きた大きな変化を反映して、以下のような根本的な違いを伴っている。

第1に、90年代初頭の時点で中国は、天安門事件の余波を受けて、先進諸国から経済制裁を受けている状況にあり、かつその国力は、経済的にも軍事・政治的にもなお「大国」と言える状況ではなかった。しかし21世紀に入って中国は歴年9%を超える経済成長を維持し、2010年ついに名目GDPで日本を抜いて世界第2位の経済大国となった。と同時に軍事力においても、国家予算の10%を優に超える軍事費を1989年以来連年続けた結果、21世紀の今日では軍事の大幅な近代化に成功し、軍事大国として登場している。

第2に、90年代初頭の発足当初のクリントン政権は、80年代レーガン政権以来の財政赤字と貿易赤字の「双子の赤字」を抱えていたが、のち90年代半ばには基本的にプライマリー・バランスを取り戻して一時財政黒字となり、プラス成長局面に入った。しかしオバマ政権は、ブッシュ・ジュニア前政権のイラク戦争による巨額な戦費支出から重い財政赤字を負っていただけでなく、政権発足直前の2008年9月にリーマンショックによる金融危機が重圧となって、米国発の世界不況を深刻化させ今日に至っている。

こうしてベーカー戦略も、オバマ戦略もともに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に中国に対する包囲網を形成するという意図を持ちながら、グローバルな国際社会の局面から見ると、後者の戦略においては米国の主導性が大きな衰弱を見せ、かつ世界不況の深刻度が格段に深まっているという点で大きな違いがある。

一方、中国は20年の時を隔てて、米国の二つの戦略構想に対して、当然その突破を図ろうとするが、その突破戦略には、根本

的な違いが生まれている。では中国の戦略はどのように推移し、変化したのか？

## II. 中国戦略構想の原点

### 一鄧小平から江沢民へ、そして胡錦濤へ一

#### 1. 鄧小平の「南巡講話」と超高度成長の幕開け

クリントン政権下のベーカー長官の中国包囲戦略に反包囲戦略として対応したのが1992年の鄧小平「南巡講話」だった。

「南巡講話」の基本は対中経済制裁、対中包囲に対し、消極的に対外封鎖による防衛戦略を採るのではなく、逆に積極的に門戸を大胆に開放して、貿易、外資導入、技術導入などをいっそう推進するものだった。しかもその際、発展途上国としての中国には「発展する権利」があるとの主張の下に、「発展是硬道理」（発展すなわち開発は普遍的な動かしがたい道理だ）と説いたのである。

以降、中国は浦東開発に始まる長江流域開発や三峡巨大ダム開発を筆頭として、大規模な公共投資と外資導入による開発投資を重ね、連年年率9%を超える超高度経済成長を実現してきたのである。

そうした最中の96年を境に、実質的に鄧小平の時代は終わりを告げ、後継の江沢民の時代に移ったが、その江沢民は超高度成長の成果を引っさげて、米国の対中封鎖線を打ち破る全方位外交を展開した。96年まずASEANとの全面对話を開始、さらに南アジア、アフリカ、ラテンアメリカとの外交を展開し、そしてついに97年10月末には江沢民自らの訪米が実現した。クリントンもこれに応じて98年6月に訪中したのである。



1997年の鄧小平死後、江沢民は内政における超高度成長、外政における全方位外交をさらに飛躍的に発展させようとした。

まず内政面で言えば、1999年から2000年にかけての「西部大開発」戦略構想の提起がさらなる高度成長の端緒となった。

根本的に言えば、超高度成長がかくも長きにわたって持続できているのは、中国大陸が日本・ASEAN・NIESなどと比べて、内陸部（東北部・西南部）・西部地域になお広大な未開発地域を残しており、インフラ投資を始めとする莫大な公共投資を梃子とした開発投資の余地を持っているからである。

外政面では2001年頃から中国はASEANとの自由貿易協定を目指し始め、中国を主導とした（米国を含まない）東アジア共同体設立への動きを見せた。のち胡錦濤・温家宝時代になってからの2010年に中国・ASEANのFTA（自由貿易協定）が成立したのは江沢民時代の下地があつたことである。

他方、対米外交面ではクリントンの後を継いだブッシュ・ジュニア政権に対して、2001年9月11日のアル・カイダによるニューヨーク同時多発テロ勃発以後、米国がイラク戦争を起こしたことに江沢民は一時、批判的姿勢をとった。しかしそれも2002年9月には江沢民が訪米し、関係修復を図って対米関係重視の一貫した姿勢を変えなかった。

21世紀以後、こうして開発投資を至上とし高度成長を持続させるべしとする考え（開発至上主義）が生まれて、今日に至っている。ただ、この開発至上主義は高度成長を実現する反面、全社会的な所得分配に相当の格差を生むことが避けられなかった。

圧倒的な開発投資と民間投資によって中国のGDPに占める貯蓄率は60%を越え、逆に個人消費比率が40%を切る高貯蓄低消費の状況を生み出したのである。これは日本を含む先進諸国の個人消費比率が約60%なのと比べれば、所得の分配が恐ろしく不均衡をなし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事実、中国のこの開発主義・成長主義・高貯蓄低消費の三位一体は既に中国社会におおきな不均等発展、格差拡大の諸矛盾をもたらしており、全国各地に頻発する農民暴動、労働争議、住民紛争、民族紛争を引き起こしている。具体的には1994年に全国で暴動、争議、紛争に参加した人数が公式統計で1994年に約70万人だったのが、2003年に約300万人、2009年には約400万人にのぼつたのである。

とりわけ2010年末から中東のチュニジアで独裁打倒を叫び民主化を要求するいわゆる「ジャスミン革命」が勃発し、23年間独裁を続けたベン・アリ大統領が隣国サウジ・アラビアに亡命した事件が起きた。これに続いてアラブ諸国の長期独裁政権に対する国民の不满による騒乱がエジプト、リビア、シリアなど各国であい次ぎ、2011年10月にはカダフィ大佐の無残な死をもたらした。こうした趨勢は、当然中国共産党指導部にも一定の危機感を呼び起こし、そこに米国の「大中東戦略」の覇権主義的な策動が働いているとする観測も飛び出した。

社会対立・矛盾の激発はその趨勢が収まらない限り、いずれは中国共産党の一党独裁体制を危機に陥れる。江沢民体制から胡錦濤・温家宝体制へ移行が始まった2002年10月中共第16回全国大会を転機に、新たに「科学的発展観」「持続可能な発展」「全面的、協調的発展」「和諧社会」などのスローガンが多用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も、

また2005年6月に中国全土を「八大経済区、四大地域圏（四大地板）」に分ける構想を打ち出したのも、激化する社会対立・社会矛盾と拡大し続ける地域間格差を解決し、均衡の取れた発展を目指すためだった。一連のスローガンの基本線は超高度成長路線から穏健経済路線と福祉重視社会への転換を目指すものだった。

しかしながら、こうした転換は決して順調には進行しなかった。穏健路線への転換を根本的に挫折させたのは、四川大地震

（2008年5月）後の莫大な復興投資、北京オリンピック（2008年8月）に伴う巨額設備投資、リーマンショックによる世界不況（2008年9月）、そして上海万博（2010年）をきっかけとする巨額財政投融资にほかならなかった。

胡錦濤・温家宝指導部はそれでも、内需拡大政策への転換を謳って、国内経済の低消費構造を高消費構造へ転換しようとしたが、実際の政策は、依然大型財政出動による巨大インフラ投資が主導する方向を辿り、一層の高貯蓄構造を創り出した。たとえばリーマンショック直後、2008年11月、国務院は5年間で総額4兆元（日本円換算約52兆円）の財政出動を決定し、内需刺激策に当てようとしたが、その結果はむしろ「ハコもの造り」の公共投資を膨らませ、かえって高貯蓄低消費構造を加速させて今日に至っている。

## 2. 江沢民派の抵抗と神話の終焉

2007年10月の中共第17回全国大会を経て、胡錦濤・温家宝体制が2期目に入ったあと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第17期）の9名のうち4名が依然、高成長高貯蓄政策を主唱する江沢民派であり、軌道を修正

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中央政治局委員会名簿参照）。

=第17期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2007年10月)=

\* 胡錦濤 - 序列第1位 中共中央委員会総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軍事委員会主席

\* 呉邦国 - 序列第2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務委員長

\* 温家宝 - 序列第3位 国務院総理

\* 賈慶林 - 序列第4位 中国人民政治協商会議全国委員会主席・江沢民派

\* 李長春 - 序列第5位 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员会主任・江沢民派

\* 習近平 - 序列第6位 中共中央書記処第一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 李克強 - 序列第7位 国務院常務副総理

\* 賀国強 - 序列第8位 中共中央規律検査委員会書記・江沢民派

\* 周永康 - 序列第9位 中共中央政法委員会書記・江沢民派

江沢民派の論理は内政面で、NIES型高度成長路線が一定の社会矛盾を不可避免的に生み出すにせよ、経験的に見て最終的には全体としての国民経済の離陸（テイクオフ）を可能にし、それとともに社会底辺層の所得も向上するのであって、社会矛盾はいずれ解消すると考える点にある。と同時に外政面では、高成長の持続は中国の大国化を実現し、ひいては米国・先進諸国との均衡の取れた和平外交を可能にさせると見なすものだった。

とりわけリーマンショック以後、深刻化する世界不況の中で、穏健路線が主唱するような、高度成長にブレーキをかけその速度を落とすことは、ブレーキの引き具合によっては中国経済の成長を「失速」させ、

さらには「墜落」させる危険をなしとしないと思えぬ考えも働いていた。

こうしたなか、2010年1月中旬、江沢民派の政治局常務委員の李長春が突然、江沢民に宛てて「中央は既に『江沢民思想年編（1989－2008）』と題する書籍を同年春の全人代、全国政協開催以前に発行することを決定した」旨の通知を發し、事実2月24日から3月13日にかけて同名の書籍（中央文献研究室編、中央文献出版社刊）が出版されるという事件が起きた。

だが実際には中共中央政治局は同書の正式出版を決定していなかったため、おおきな波紋を起すことになった。同年3月12日、緊急に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会が開催され、同書の発行の是非が論議され、意見はまっぴたつに分かれたという。李長春ら江沢民派の3名は発行に賛成、1名は留保。温家宝、習近平ら4名は発行には反対したとされる。結果的に胡錦濤の意向もあって同書の刊行の継続はならず、3月13日以後の発行は中止された。

同書の発行がこのような騒ぎをもたらした背景には、1997年2月の鄧小平死去直後の同年9月に開催された中央政治局会議による党内決議があった。同決議は鄧小平の後継となる江沢民指導部の本格始動に際して、新たに集団指導体制をとることを以下のように細かく規定していた。

(1) 今後、思想・理論は一律に個人の名前を冠してはならず、集団的な智恵と意識と思想を体现するものとする。

(2) 今後、現職の指導的同志は、退職、離職、休職後も含めて、その旧居、記念像などを建てて称揚することを一律に認めない。

(3) 今後、現職の指導的同志が退職、離

職、休職したのち、これを慶祝する式典活動を行うことを認めない。

江沢民時代はこうして個人崇拜やカリスマ的指導をやめて、集団指導体制をとることを定めていた。

そしてこの方向は、2002年の第16回党大会以後の胡錦濤・温家宝体制の下でいっそう明確化された。ここでは再び毛沢東や鄧小平のようなカリスマ的指導者が現れたり、個人に関する神話が成立することはあり得ないものとなっていた。2010年2月の李長春らの「江沢民思想年編」出版の試みは明らかにこの方向に反するものだったのである。

その後、本年9月には朱鎔基元首相も自著『朱鎔基講話実録』を人民出版社から出版社から刊行したが、9月8日に人民大会堂で開かれた発行記者発表会には、本人が姿を見せなかっただけでなく、出席を予定されていた中央指導者の誰も同席し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れも「江沢民思想年編」とまったく同様の経緯が働い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

### Ⅲ. 17期胡錦濤・温家宝体制から

#### 18期習近平・李克強体制へ

#### —2012年10月中国共産党第18回全国大会—

現在の問題は、胡錦濤・温家宝が今の高成長・高貯蓄・低消費構造をどこまで高消費・高福祉構造に転換し得るか、その上で習近平・李克強体制に権力移譲をなし得るかにある。

実際には現在、胡錦濤の健康が優れないと伝えられること。それゆえに、このところ胡錦濤は第18回党大会以後の全面的な引退を口にしてしている。また温家宝は前総理

の朱鎔基がそうであったように、やはり任期満了後には全面引退に向かうと考えられること。こうして来年秋の習・李体制へ移行後には、胡錦濤・温家宝がこれを背後から補佐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考えられる。つまり、胡錦濤・温家宝が政策転換を図って権力移譲を完成しうる時間的余裕は来年秋までを期限とする可能性が高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加えて、本年10月9日、北京で開催された辛亥革命百周年記念式典に際し、重病説、死亡説までが言われていた江沢民が姿を見せ、胡錦濤の隣席、党内序列第2位の座席に就いたのである。それは江沢民派の影響力が、今後も続くことを象徴的に示している。

一般に中国現代政治において、最高指導者となるための不可欠な条件は、党指導部内において権力闘争を過度に激化させて、党分裂を引き起こすことを回避する能力を持つことにある。胡錦濤が「江沢民思想年編」の出版の是非をめぐる対立において容易に態度表明しなかったのも、そのためと言える。つまり最高指導者は常に「 balancer 」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次期党総書記すなわち最高指導者に予定されている習近平についても、当然全く同じことが言える。

こうしたことから、習近平は現在も将来も江沢民派を党内中枢から一掃排除することはあり得ないと言える。この点こそ現下の高貯蓄・高成長政策に対する軌道修正が将来とも困難と思える理由である。

## 1. 新幹線事故と地下鉄事故に見る権力移行期の問題

ところでより根源的な問題は、やはり超高度成長が全社会的に多くの矛盾を引き起こし、ひいては反体制的な世論を生み出すという点にある。たとえば本年7月23日、温州近郊での新幹線事故は事故処理の不明朗さが際立ち、中国の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で多くの批判を浴び、それがまた国際世論の反響までを引き起こした。

全国新幹線網の建設を主導した鉄道部は、江沢民派の支配下にある。国務院の「交通・安全」担当大臣である張徳江副首相も江沢民派である。こうして7月28日、温家宝首相が新幹線事故に対する「真相の徹底説明」を宣言し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同じ時期に江沢民派の李長春はこれに真っ向から反する「高速鉄道事故報道禁止指示」を発令していた。

21世紀以後、現在に至るまで中国の新幹線網は日本の新幹線網を追い越す猛烈なスピードで全国レベルに張り巡らされ、その営業距離数は本年6月までで約1万3千キロ。日本の新幹線営業距離数が3000キロであるのと比べると、その建設スピードがいかに驚異的かが分かる。さらに中国新幹線の営業速度も毎時300キロを越える。それはまさに中国の超高度成長政策によるひずみを典型的に象徴するものでもあった。

本年9月28日に発生した上海地下鉄事故についてもまったく同様の経緯が見られる。

2010年の上海万博にあわせて上海の地下鉄網も1号線から11号線に至るまで猛スピードで拡張され、2010年8月時点で総営業距離数が420キロに達し、日本の東京メトロの総営業距離数195キロを遥かに超えて世界の大都市の地下鉄としては1位の座を占めている。

つまり今回の新幹線事故と地下鉄事故は、前述した中国国内における農民暴動、労働争議、住民紛争、民族紛争の激化と同様に、

いずれも超高度成長政策の過剰なまでの「急ぎすぎ」による「ひずみ」にこそ起因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今回の事故を契機に、どこまで胡錦濤・温家宝体制が「和諧社会」の方向へと高度成長政策の修正を図ることが出来るかは、内政面にとどまらず、国際社会での中国のイメージを大きく左右する問題となっている。しかし、その解決をめぐるには、中央指導部内にさまざまな思惑が働いて、その行方はますます不確実なものになっている。

政府外交ブレーンの一人で穏健路線への転換を主張する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際関係学院副院長）は、本年11月16日付け中国誌の『南風窓』で、要旨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中国が国際社会において、平和的大国として台頭することが容認され、また平和的、調和的な世界の実現を単にスローガンとしてでなく現実的変革力を持って要請し得るには、まずはみずから国内において現在のような非和協的な矛盾を随所に抱える状況を克服することが先決だ。そうしてこそ、中国はさまざま国際紛争事件や国際的事案に対し『創造的な介入』を行うことが許される」

前述のように国際社会では、中東地域において独裁にあきた民衆が、エジプトを始めとして次々に民主化を求めて決起し、弾圧の流血をくぐりながらも、独裁政権を倒す事件が続発している。「ジャスミン革命」と呼ばれるものがそれである。その結果、チュニジアのアリ大統領、エジプトのムバラク大統領、リビアのカダフィ大佐が倒され、現在またシリアのサダト独裁政権が危機に陥っている。これら独裁政権はいずれ

も国内に非和協的な社会矛盾を激化させる状況にあり、国内の反体制輿論が強まりを見せていた。

中国指導部は独裁政権として、当然危機感を高めている。王逸舟の発言は、当然そうした国際的背景を意識しながらのものである。

問題は内政面での社会対立・矛盾をいかにして克服するか、超高度成長政策をどのように軌道修正するか、その具体的政策をめぐる見解が依然、大きく分かれている点にある。

ここでは、さらなる政策転換を目指すものとして、本年10月15日から18日まで開催された中共六中全会が、新たに「文化事業、文化産業」の育成に政策の重点を移すとする「決議」を採択した点を検討しよう。

この「決議」は、明らかにこれまで石油化学、鉄鋼、建築などの製造業を中心に、ハード面に重点を置いた高貯蓄・高度成長政策が取られてきたことに対する一定の軌道修正と解釈できる。つまりそれは「ハード・パワー」から「ソフト・パワー」への転換を図るものと言ってよい。

しかし実は「文化事業」の決定権は前述のように李長春を筆頭とする江沢民系の人々の手中にあり、それゆえ「ソフト・パワー」への転換が直ちに高度成長政策の転換を意味するとは限らない。いくつかその要因をみてゆこう。

## 2. 中国の高成長政策と海洋安保戦略

21世紀に入って、中国の海洋戦略における対外拡張路線がしばしば取り沙汰されている。南沙・西沙諸島をめぐるベトナム、フィリピンなど近隣諸国との摩擦。昨年

9月の尖閣諸島沖での中国漁船と日本海上保安庁の巡視船との衝突事件。さらに東シナ海の公海上での中国海軍艦艇と日本側艦艇との摩擦など。

第1には、明らかに中国は海洋戦略上、対米関係における抑止力のアンバランスを強く意識している。日本列島から沖縄列島にかけての第1列島線から、グアム島を中心とする第2列島線を超える海洋進出へと、要求がエスカレートしているのもそこに原因する。前述したように太平洋の制海権は圧倒的に米国に握られている。米国海軍が常時、中国大陸の近海に自由に艦艇を展開できるの比べて、中国海軍は到底米国本国の西海岸に自国艦艇を展開できない。さらに米国が日本を中心として太平洋海域に保有し配置する防衛ミサイル網を考えると、米中間の抑止力には極めておおきな不均衡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第2には、中国の高度成長路線がとりわけエネルギー資源に対する貪欲なまでの欲求を誘発しており、これが海底資源をめぐる東シナ海、南シナ海において「領海問題」をめぐる、しばしば近隣諸国との深刻な摩擦を呼ぶ結果になっていると言える。

その際、中国軍部主力もまた江沢民派によって掌握されていることも重視しておかねばならない。総じて中国の海洋戦略の拡張主義は国内的な高度成長路線と表裏一体の関係にある。

言い換えれば、行き過ぎた高度成長路線に対する本格的な軌道修正なしには、海洋戦略の穏健路線への転換もなしえず、したがって国際的な中国の「ソフト・パワー」としての台頭もあり得ない。

#### IV. むすびに

現在、リーマンショック以来の世界経済不況は、本年のギリシャ危機、イタリア危機そして総じてヨーロッパ危機へと発展し、終息する兆しを見せない。そうした中で本年11月19日にインドネシア・バリ島で開催された「東アジア・サミット」は、ヨーロッパに比して東アジアはなお経済的活力を有することを示し、それゆえ世界経済を牽引する意図を持って開催された。既に述べたようにその参加国メンバーは元来はASEANプラス6（つまり日・中・韓・インド・オーストラリア・ニューギニア）に限定されていたが、今回はこれに米国とロシアが加わったのである。

問題は世界不況が現在も先が見えないほどに深刻さを増しており、解決の糸口が容易に見えないことにある。つまり各国は世界市場を安定的なものと前提して経済財政政策を建てることが出来ず、必然的にその経済財政建て直しのベクトルは国内へ、内向きになりやすい。しかし各国がすべて内向きになれば、世界不況はより破滅的なものになることは誰の目にも分かっている。

こうした中で中国がどのような経済財政政策を採用するかは、国際社会に大きな影響を持つ。

高度成長を継続するべしとする考えの一部の指導者は、世界が全般的な不況に向かっている現在こそ、中国が高度成長を維持することが、ひいては中国の世界における牽引力、指導力を強めると考える。

中国のもう一人の外交ブレーンである陶文釗（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員）は述べる、

「中国が目指す東アジア共同体は、東アジア・サミット（EAS）が今回米国を排除していないように、今後とも排他的に米国

を加え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それは米国が主導する TPP（環太平洋戦略的経済連携協定）が中国を排除するものであっても、中国としては常に米国を包み入れるのである。」（『人民日報』海外版 2011 年 11 月 19 日）

しかし中国の採用する経済財政政策が、より穏健な成長政策をとるか否かはなお不確定である。

総じて日本の世論、さらに国際世論は、一般に中国指導部の政策を一枚岩的に捉える傾向が強い。中国政治の動向をすべて一党独裁によって単一の方向にしか向かわないと見るからである。しかし以上に見たように、中国の指導部には多くの政策上の異論が存在しており、その点は日本や欧米の政治と何ら変わ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を知らねばならない。まして現在、重大な過渡期にある中国指導部の政策がどの方向に向かうかは、安易に即断すべきではない。

この点は中国の国内与論の動向についても言いうることである。中国輿論は既にネット人口が、本年 9 月段階で 5 億人を突破するなど、さまざまな方向性、可塑性をもっており、これを一色のもつと見なすことは到底できない。まして中国共産党の一元的な言論統制によってこれを左右できると見なすことはすでに基本的に誤りである。まして中東のジャスミン革命の行方を見る限り、今後とも中国のネット輿論を先頭とした輿論が、いつ行過ぎた政策を批判して実際行動を引き起こすかは分からない。

それゆえ中国の行方を占うものとして、輿論とりわけネット輿論の政府批判、あるいは民主化要求に注目しておかなくてはならない。

今後の中国の動向は、依然、中央指導部内のいくつかの人脈間の意見の違いによって影響されることは確かだが、そこに最終的な決定力はなく、それゆえにこそ過渡期中国の政策転換には不明朗さ、不確実性が顕わなのである。

#### 脚注\*

<sup>1</sup> 愛知大学現代中国学部教授。



論文

## 关于当今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路径<sup>1</sup>

宋 进<sup>2</sup>

### 摘要

本文主要概述三个问题：认识当今中国的三个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维向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评价尺度。

### I. 认识当今中国的三个视角

对当今中国的认识可以从历史，现实和理论三个角度来认识：

其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今中国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和平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过去 30 多年里翻了约 20 倍，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约 7 倍，当然有的人得到更多或得到少些，但是总体的情况是不能否认的，而西方崛起的过程是一个血与火的过程。现在一些人通过中国黑煤窑等事故指责中国的 GDP 是带血的 GDP，如果这个比喻用在当时的西方，那么他们的 GDP 是血流成河的 GDP。中国发展的第一桶金是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勤劳和努力获得的，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西方历史上都曾面对过。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社会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平之少，贪污腐败之严重，侵略掠夺之血腥令人发指，但是他们都已经化解了。对比之下，当今中国的发展是不容易的，中国在境内消化了所有的问题，我们通过自己的智慧，苦干，创造出了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实现了初步的物质和财富的积累。

其二，从现实角度来看，当代中国处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历史起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没有变，两个深刻的变化”：两个没有变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两个深刻变化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和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两个没有变和两个变，构成了当今中国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最重要的特征，这个特征也可以描绘为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新的历史起点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发展不足问题初步解决，但还没有根本解决。一方面，从乘法效应来看，GDP 总量已是世界第 2；另一方面，人均 GDP 还是位列世界 90 多位。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发展不当问题逐步积累，同时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也更加有利。环境问题，资源浪费，收入差距拉大，腐败这些问题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突出，但这些问题的解决条件不断具备。中国共产党认识不断提高，制度空间不断完善，财力条件不断充分都是有利条件。三是对正当发展（好的发展）的认识更加全面，同时对目前阶段上出现发展不当的风险意识越来越清晰。干部和全社会对全面发展的认识提高了很多。目前阶段发展不当的风险意识认识更加清醒。为什么强调目前阶段呢？目前阶段的全世界现代化都是高风险的现代化，是一个“风险社会”。在我们现代化阶段上，我们不仅面临自然环境，还面临技术环境，而且技术环境更加不确定，加上信息化，全球化，这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能够解决的，具有很高的风险性。



同时，当今中国现在同时面临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位置有时发生变化：一个是发展不足，一个是发展不当。原先是发展不足的问题，现在发展不当的问题越来越重。当下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发展不足问题初步解决，但还没有根本解决。二是发展不当问题逐步积累，同时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也更加有利。三是对正当发展（好的发展）的认识更加全面，同时对目前阶段上出现发展不当的风险意识越来越清晰。

其三，从理论角度来看，当今中国发展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三要三不要”：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要科学社会主义，不要民主社会主义；要具体的社会主义，不要抽象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是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当下中国在《物权法》已颁布实施，资本市场大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当深入的情况下，提出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有特殊的含义，即在承认资本巨大积极作用下，承认和坚持社会主义。中国向资本主义开放能够为自身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例如，有了较大的经济选择的空间；比以前有了更多民主的可能性；第三，有了更丰富的文化选择的可能性。

二是要科学社会主义，不要民主社会主义。科学和民主都是好东西，既然民主是东西，为什么说不要民主社会主义？恩格斯说德国工人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继承人，同样，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高继承人，而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就是“民主”和“科学”。既然科学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民主为什么不能和社会主义结合？问题的关键是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带着特定的历史记忆给人们产生特定历史想象的概念，它们有特定的含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和第

二国际这样一段国际共运史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固然可以说民主和社会主义结合，但是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特定的术语，它有特定的历史含义。

另外，“科学”一词在汉语当中弹性很大，科学可以容纳很多的内容，中国的“科学”可以容纳“人文”的概念，比如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这方面，中国同西方的把科学和人文对峙的观念不同，我们的科学的概念可以容纳人文，也可以容纳民主的含义。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是我们坚持的不能轻易放弃的传统，这样一个传统是和中國思想传统和政治传统联系在一起的。

三是要具体的社会主义，不要抽象的社会主义。每个社会主义都是在不同的民族土地上形成的。德国人威纳尔·桑巴特在他的专著《德意志社会主义》中指出，德意志社会主义“是一个单独并专门适用于德意志国的社会主义，并且是为我们时代的德意志国，因为它是按照德国情形而制订的，所以这社会主义好比是一袭按照德意志国身材裁制的衣服，即是定做的（不是成衣）。”不仅社会主义是如此，现代性也是如此，现代性是具体的。现代性没有和各个国家，民族实际情况分开的情况，学术界“多重现代性”的概念认为，西欧模式和北美模式，乃至欧洲内部的法、德、意都是不同的，资本主义也是具体的，具有民族性。

## II.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维向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道路，理论体系，旗帜三维向度：

其一，在实践向度上，作为中国实践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有其独特的认识路径，学理界定和三层框架。

一是实践向度的认识路径。最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模式即道路来

认识的是邓小平。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从中共十二大最初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标题中均直接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具体提法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直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说明，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从一开始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时相比，认识是不断地深化。

二是实践向度的学理界定。中共十七大以“……，就是……”的逻辑界定句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内涵作出了学理上的界定。它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保证性规定，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性规定，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布局性规定，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性规定。保证性规定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任务性规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布局性规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展开，目标性规定展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景。

三是实践向度的三层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框架上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即一条道路，五条具体道路和一系列具体措施。在宏观上，“一条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在中观层面上，提出与之相配套的五条具体道路，即“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为了使五条具体道路真正落实到实处，针对每条具体道路的特点，又在微观的层面上提出一系列具体

的措施。如对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出了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等一系列措施，这就从微观上进一步丰富了这条具体道路。

其二，在理论向度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有其独特的逻辑进路，逻辑架构和逻辑自觉。

一是理论向度的逻辑进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理论提升过程。中共十三大把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理论探索所形成的新观点概括为十二个方面<sup>3</sup>，并认为这些新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中共十四大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中，把其主要内容概括为十六个方面<sup>4</sup>。中共十五大首次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阶段性形成的理论成果，内在地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理论提升的必然结果。

二是理论向度的逻辑架构。理论体系的建构一般应具备四个基本要素：一是哲学基础，这是贯穿各个理论观点的基本线索；二是中心主题，这是由于理论体系的存在是要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并围绕该问题而进行系统地阐述；三是重大课题，即围绕中心主题由不同实践发展而提出的不同历史阶段所需要解决的具体理论课题；四是基本

理论和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确立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的中心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发展，怎样发展为重大的理论课题，彰显了浓重的问题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借助于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和范畴构成丰富严密的科学体系。它包含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理论：如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等以及改革和发展，公平和效率，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等一系列基本范畴。

三是理论向度的逻辑自觉。逻辑自觉（logic consciousness）指人们不断对对实践经验进行自我超越的自觉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不断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自觉地进行理论提升的结果，是自觉的理论创新过程。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又促进中国共产党人的逻辑自觉性。

其三，在旗帜向度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面旗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这面旗帜有其独特的双重意蕴，认识逻辑和内在结构。

一是旗帜向度的双重意蕴。旗帜是用来引导方向，展现形象的。一般说来，把有号召力，有代表性的思想，理论成果比喻为旗帜。党的旗帜，代表着这个政党坚持的基本纲领，根本指导思想和发展道路等战略性问题，也体现着这个政党展示给外界的形象，面貌和风采。在“思想理论即旗帜”的意义上，恩格斯说：“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毛泽东也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代表着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及前进方向，它承载着双重意蕴：一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我们党不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进行双向提升，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是旗帜向度的认识逻辑。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三是旗帜向度的内在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一体”的“两翼”。旗帜是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结合起来的一个形象表述。

其四，三维向度的关系。道路，理论体系，旗帜，虽然表现形态各异，但其实质内容却是统一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道路，理论体系，旗帜三维向度的统一。

一是统一的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旗帜统一的基础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任何实践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即实践发展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使得道路，理论体系，旗帜的统一得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必然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论，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创新成果，既指导和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新的实践，又凝结和增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新的内涵。正是在这种实践与理论辩证运动中，促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旗帜新的统一。

二是统一的价值取向。为人类谋幸福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取向。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为了实现人民的福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导向，例如“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是有利于人民的普遍幸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的中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归根到底就是造福人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统一的中国社会主义旗帜同样是为了实现人民的福祉。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维向度合规律性要求与合目的性要求融为一体。

### 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评价尺度

评价尺度也称为评价标准，是指衡量客体对主体是否有价值及价值大小的尺度，即衡量客体是否满足了主体需要以及对主体需要满足程度的尺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的评价尺度是双重的，即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发展尺度，是两个尺度的内在统一。

其一，生产力尺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评价尺度。这是由生产力自身的特性及其在社会结构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一是生产力具有客观物质性。生产力既是由物的要素构成的实体，又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物质力量。二是生产力具有进步性。生产力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动的过程中，先进的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的生产力，进而带动社会生产关系的

变革和整个上层建筑以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生产力尺度作为根本的评价尺度。邓小平理论把生产力尺度创造性地具体化为衡量和评判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生产力标准是核心，而综合国力标准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标准不仅是生产力标准的展开和具体化，而且是对生产力标准内涵的丰富和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富特色的是创造性地将发展生产力同党的先进性联系起来，把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置于“三个代表”的首要一条，并指出作为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应有纵向和横向的两个维度，即从纵向看，是指我国当前相对于过去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从横向看，是指要正视我国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并且强调要从当前我国的实际出发，不能完全脱离中国的现实情况，从而在全局性的战略高度指明了生产力尺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尺度。科学发展观把生产力尺度作为实现以人为本的先决条件，其第一要义是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要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条件，坚持统筹兼顾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

其二，人的发展尺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终极评价尺度。人不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因此，人的发展尺度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评价的终极尺度。这是因为：一是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及其对现实的满足程度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正是人类需要无限递增的丰富性和不断再生性，促成了人类社会的持续性发展。二是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社会发展应该是对于人而言的，具有鲜明的人文意蕴，即将人的发展置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美国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

斯在《人的现代化》中指出：“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三是生产力尺度内在地是一种人的发展尺度。生产力并不仅仅是以物的形式存在的历史客体，它还包含了人的历史主体，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人的现代化素质的全面提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是把人的发展尺度作为终极的评价尺度。邓小平理论把“四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发展的尺度，他具体而明确地指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国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健康发展的重要尺度，其中的每一个代表都内蕴着人的发展尺度。代表先进生产力就是通过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性因素的人的全面发展；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通过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就是通过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发展，从而保证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不管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否则，发展就失去了意义。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只有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终极尺度并按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得到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评价尺度是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发展尺度的统一。马克思认为，衡量社会发展的评价尺度是双重的，即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发展尺度。生产力尺度是客观的尺度，它表征的是生产中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人的发展尺度是一种综合的尺度，它表征的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

自身的发展，即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心理素质等的发展。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发展尺度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基础。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发展，人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生产力越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越高，人获得的自由也就越多。只有生产力不断发展，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文化财富，也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人的发展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人是先进生产力的创造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源泉。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社会生产力水平就越高。因此，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人的发展又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种尺度是辩证统一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评价尺度体现了生产力尺度和人的发展尺度的统一。邓小平理论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把发展生产力与满足人的需要统一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进一步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的辩证关系。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并不否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样，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并不否认人的发展。要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以人为本统一起来，并把这种统一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

#### 注释\*

<sup>1</sup> 本文为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历史反思与现实启示”（批准号 11BKS060）的阶段性成果。

<sup>2</sup>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sup>3</sup> 赵紫阳[1]，第 58—59 页.

<sup>4</sup> 中共中央宣传部[2]，第 8—108 页.

#### **\*参考文献**

- [1] 赵紫阳：《沿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87 年 11 月版.
- [2] 中共中央宣传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1995 年 5 月版.

## 乡村诉讼：从事件到文本

### —从一起离婚纠纷看中国法律的运行机制—

刘正强<sup>1</sup>

#### 摘要

在转型期的中国，民间纠纷大量涌现、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发生在乡村社会的这类纠纷因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夹缝而更具特色。对这些问题，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一般立足于从外部来把握其产生与解决的机制，用社会普遍公认的观点去解释他们所看到的文化现象，而对于纠纷当事人之间内部的人际互动关系关注不够，特别是对诉诸于法律的民间纠纷解决过程缺乏深描与刻画。本文采用主体性研究视角，选择一起离婚纠纷作为研究中国当今乡村纠纷现状的进路，从事件和文本两个维度切入，致力于从纠纷当事人的主体角度出发，对纠纷当事人的初级关系<sup>2</sup>互动模式进行分析，揭示出司法机关作为一种“甩干机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作用，以期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它所体现出来的乡村秩序、地方知识以及现代性对初级关系的触动，期望整合出一种新的研判当前乡村纠纷的思路，为建立更为适合的乡村纠纷解决模式提供启发。

**关键词：**乡村诉讼，事件与文本，法律运行

#### I. 个案描述：事件原初

本研究选择的地点是山东西部的鲁西县（化名）。山东是孔孟之乡、礼义之邦。依据该县的县志，鲁西县“地处齐鲁之邦，尊崇孔子学说，遵循儒家教规。”1949年以来官方对传统文化的持续改造、特别是最近30年来急剧的社会变迁，使得中国文化越来越具有混杂、复合、多元的特点，该县的县志也承认，“至21世纪初，青年人已不太讲究”（那些传统的东西），因而在平均意义上很难说在文化上山东与其他省份有什么不同，鲁西县与山东其他县市又有什么不同。但在婚俗方面，形式上的仪式未见减少，甚至在某些方面日见铺张。

笔者要考察的这起离婚纠纷——为叙述方便，我按争议双方的姓氏称其为“李高之争”

——是中国乡村社会一种典型的婚姻纠纷个案。其肇始于家庭琐事，终结于调解离婚，期间双方的初级关系网络进行了数月的动员和交涉过程——从女方的自我人质化策略到男方的隐忍不发再到双方自我预言的实现。对这种过程的跟踪和深描，展现出当事人各方对同一纠纷的不同理解、采取的博弈策略以及司法运作方式。本案主要人物（均系化名）：

李涛——男方（原告）

高艳——女方（被告）

李母——李涛之母

高母——高艳之母

高丽——高艳之姐

高朋——高艳之弟

陈庆——主审法官（女）

李、高皆系鲁西县M镇G村人，系由媒人介绍，2003年8月订婚，同年12月结婚。此

前李曾在东北投靠其大爷学习修车技术若干年。婚后夫妻同去东北打工并于2004年11月生育一女李悦(乐乐)。2年多后,即2006年一家三口返回鲁西县。李在县城以其父名义开一汽修店,主要进行车辆整形、翻新。2008年3月,因生活琐事双方发生争执,女方回到娘家G村,后断续在济南打工。此后双方一直未能自行处理家庭矛盾,持续到中秋节,女方亦屡叫不回,男方提出诉讼。女儿乐乐先是由女方在其母家带看,随后(大约3、4月份)落入男方父母之手,并由李涛藏于县城朋友(或其妹妹)处,案件了结后女儿才返回G村由其爷爷奶奶照看并在本村幼儿园上学。

本案系由男方李涛向女方高艳于2008年9月中旬(中秋节前后)提起离婚之诉,理由为女方回娘家久叫不归。10月30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男方聘有代理人,无人陪同;女方未聘代理人,姐弟陪同。审理未果。11月6日法官约当事人双方进行了交谈,双方不欢而散。11月19日庭前达成调解,双方离婚,女儿随父。对本案的审理名义上组成了合议庭,实际上都是由法官陈庆独自审理和调解的。

李家<sup>3</sup>父母年龄分别是54、53岁。李父老实憨厚、性格内向、说话不多。李母话稍多一些,但不张扬。他们家临街居住,开馒头房卖馒头(该村共两家馒头房)为生。李有一妹嫁在附近村庄,除一度在汽修店照看乐乐外未曾露面更未出庭旁听。高家父母与李家父母年龄相仿。高父因患脑溢血行动不便、勉强自理,而且说话费事、不主家务。高母说话较冲,性格要强,家务做主。高艳尚有一姐一弟,其姐一家三口在县城一城乡结合部租房,靠其丈夫打建筑零工谋生;其弟基本在妻子娘家居住,传是做上门女婿的。

## II. 作为事件的离婚纠纷

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通过一种什么

样的程序致使李高之争发生并延续下去,进而发展到诉讼的地步?无论是静态的事件还是动态的过程,都要通过一个中介才能体现其自身,本文认为这个中介就是人际关系,它是这些社会活动的一个总体性载体。对于离婚纠纷,更牵扯到一类特殊的社会关系——初级关系,因而我试图以初级关系为主线,来发现李高之争的内在逻辑与“隐秘机理”。

### 1. 脱域

G村属M镇,在县城的南部,四面环山,居住区地势不算平坦,除了南北与东西向交叉的(┌形状)两条进出村庄的公路外,其他的都是胡同小道,自然形成,没有进行水泥硬化,因而高高低低、崎崎岖岖。村民居住相对集中,房子大都用石头垒成,屋顶一般是平的,上面可以晒粮食。G村周围以山地为主,因而种植有地瓜、花生、棉花等耐旱农作物。G村现有在籍人口约1300人,属于大村。但青壮年外出打工者居多。像本案当事人这样在县城做生意谋生的情况比较普遍。

由于G村四面环山、地势不平,特别是还要维持耕地数量,致使其居住空间极为紧凑,整个村庄以有建筑物为准东西向最长仅0.77公里,南北向仅仅0.43公里。这种布局 and 空间使村民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处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状况。而李高二家的家族分布在这窄小的空间里更显致密,他们的初级关系叠合度很高,以当事人双方三代以内的直系和旁系亲属来计算,总共22户中,有14户在G村(李高两家在本村分布的户数各有7户,含李涛家,不含李涛家),占了约2/3。见下图:



图 1 李高两家近亲属在本村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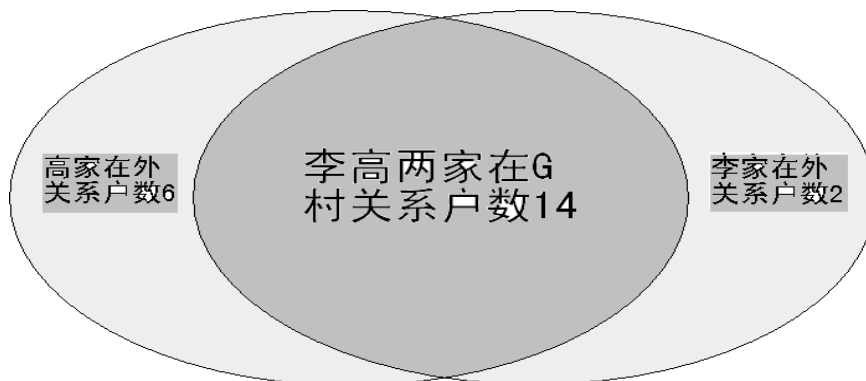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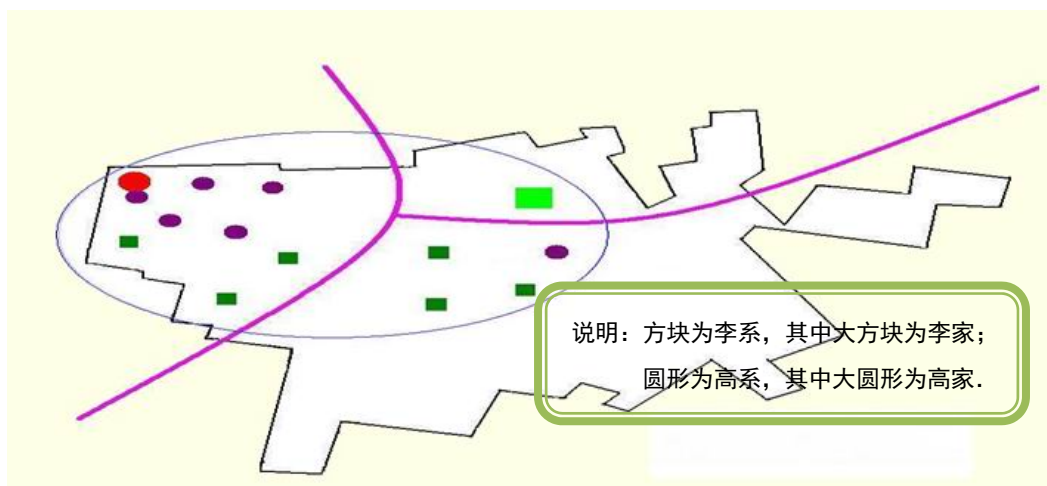


图 2 李高两家近亲戚分布图



而同在 G 村的 14 户口，又相对集中地分布在村西部，以三岔路口为中心，形成一椭圆形的区域，李涛、高艳结婚后居住的房子距高家仅有 50 米左右（图 2）。这种分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活动方式：由于道路的限制，出门时只能依赖几条固定的胡同、小巷，走某些必经之路；由于服务行业的限制，大家只能去一个地方从事某种活动（如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买馒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修自行车），信息交流以相互串门、口耳相传为主等等，这使得他们相互之间见面的频次比较高。

李高两家婚姻关系的缔结，就是在上述的时空范围内完成的。像 G 村这样的村庄，依然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虽历经了整个社会变

迁的洗礼，其传统性的外壳仍得以保持，居住格局自 70 年代以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除了女人嫁入外，基本没有外来人员落户。

李高两家各自的初级关系在这种时空条件下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因血缘、地缘、业缘等的高度重合而得以强化。李高两家结亲，则给他们加上了第四道缘分：姻缘。如果以户为单位，李、高家族各自存在的关系数分别为 21，合计数为 42，而 14 户相互之间则可以产生高达 91 种关系<sup>4</sup>。这其中的差额 49 (91-42) 就是因为李高两家结亲而带来的一种关系“增量”。当然这只是一理论上的分析，两大家之间并不会只因结亲而导致关系的产生，他们或许本来就存在着各种交往活动，社会关系也绝

对不能化约和还原为简单的数字关系。而且，这些关系并不会对所有的关系户产生一致的作用，也不是所有的关系户会努力地、有意识地与他户进行互动。我们的设想是，这些关系至少作为一种观念的形态成为每一家在进行社会交往时予以考虑的因素。

李涛与高艳的结合，实现了一个致密的乡村初级关系网络的建构。女方高艳个人条件不错，长相尚可，不丑不傻；但高家家庭困难，男主人得病已逾 10 年，高艳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没有成婚。男方李涛个人条件一般，个头不高（1 米 6 多），肤色稍黑，但他聪明能干，家境也不错。在这种建构中，自然包括了对诸多现实问题的考量：

**高姐：**（当时）俺家庭不好，俺爸爸 10 多年了，得的高血压。当时让妹妹跟他，可以让他给家里帮帮忙的。

**高母：**（孩子他爸）说话说不清，走路根本不能走，俺就是因为这个把闺女说<sup>5</sup>到跟前的，寻思叫他给俺干点活，要不是这个病俺也不在当庄里寻（对象），就为了家庭没有人干活，当时孩子又太小。那时候就是大人做主了，就是我做主了。

那时候我给包办的，那时候俺闺女就不愿意。我就看着小孩（李涛）吧长得不太怎么样，（但是）说话拉呱的也能会说也能会拉也愣<sup>6</sup>勤的，家庭也不那个么<sup>7</sup>，离得又近，她爸爸又不中用，寻思让他给帮帮忙，媒人一说就行了。

**李母：**当时是媒人介绍的，小孩都不孬。那边（高家）和媒人是邻居。那时俺院里说事的也这样说，他的条件在那里摆着，她爸爸不能干活，要提点什么条件都是理所当然的，咱亲戚成了，咱就是一家人了。

这种婚姻具有浓厚的交换色彩和互惠原则。但在乡村这种生存背景下，高母的选择无可指责，它与整理与构建高家的初级关系体系并不矛盾。从前面我们介绍的 G 村自然环境来看，高母支撑这样一个家庭实属不易；而李家

对此当然知情并且认同这种安排，毕竟以李涛的自身条件可能娶妻困难：

**高姐：**找多好的媳妇了，就凭他那个个<sup>8</sup>。找了高艳就烧了高香了。找个媳妇能找上，要找个好的找上了？就凭你<sup>9</sup>那个样。他要是真是有人有人要才有才也行。站那里愣愣鳖虾<sup>10</sup>，你要是多人物<sup>11</sup>？

但李高两家的姻亲正是建立在这种互补性的差异之上的。高家把一个条件还不错的大姑娘许给了李家，李家则应以长期的劳役付出和物质资助为对价。这种安排，在中国乡村社会里是很平常和很自然的事情，它与初级关系网络之间也是很融洽的。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男女关系，男尊女卑、男权主义似乎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为官方和民间共同认可。婚姻当事人双方都是各自所从出的初级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他们之间的关系时时受两边的力量所牵制。高艳性格直爽，没有多少心计，即便李涛评价她时用的最难听的话，也就是“傻”、“憨熊”；而她的母亲和姐姐则非常精明，并在婚后一直对李家保持一种高压态势：毕竟李家已将媳妇娶到手，而对方所须尽的义务却不是一次性的，要持续进行。李涛则要精明一些，脑子好使、勤快能干，对于婚姻纠纷他独自一人也能打理，因而，其父母和妹妹出面较少。初级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每个人对他人的持续关注并同时关注他人，他们必须规规矩矩才能避免麻烦。从订婚时起李涛便开始为高家干一些农活，直到结婚时止的这一段时间内，高家对此也比较满意。谁能够想像到以后发生的事情呢？

李涛在结婚前曾有 10 多年的时间待在东北，跟着他大爷学习修车。他结交广泛、朋友不少，算得上是一个“社会人”了，自然不会满意于现状，又岂能甘心寄人篱下、仰人鼻息；而高艳在婚前也基本在外打工。他们两人都未必很认同高母对他们生活的安排，也不会太习惯于乡村的这种生活方式。于是，婚后不久，

两人就去了东北。这件事，打乱了高母的如意算盘，但女儿去意已定，她阻挠未成只好放人。李家为长远计自然支持李涛返回东北，继续创业，进而摆脱为高家打长工的地位。为达目的，李母甚至登门给高家下跪：

**高母：** 临走之前不吱声，眼里还有没有这家人？来过十五，我才知道，我说不能走。她老婆婆来了，在大门上就说，就咋呼，“恁着夜儿<sup>12</sup>个还嘻嘻哈哈，还说得好好的哩走，今门儿<sup>13</sup>又不走了？”你说你是来吵架的，你是来做什么的？你是亲家<sup>14</sup>婆、你是客，你坐到这里，好生<sup>15</sup>的，问问，你就是个奶奶的跟吃了呛药似的，来到就嗷嗷的。我说我不叫她走的，因为么因为么不叫她走的。她扑通就给我跪下了，这是亲家婆，你那个膝盖就那么不值钱？她这一跪下我生了气了，我上来火了。拉她她也不起，俺大闺女也拉她，俺小闺女也拉她，拉她也拉不起来，一直在这跪着。我这就上火上了头了。我背过气去了，到后来不用拉，她得一下子就起来了。

李涛与高艳一去就是三年，或许这是当事人当时都没有意识到的转折点：李涛夫妇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实现了对 G 村的“脱域”（Disembedding）<sup>16</sup>，即对于李高两家的初级关系网而言，他们作为李高两家初级关系的核心人物却不在现场，处于一种“缺场”的状况，只是以虚拟的身份、象征性地参与两家关系的互动。在 G 村这样的乡村社会，初级关系的紧密与稳定程度是同时间和空间密切相关的，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结合，其维持有赖于内部成员持续的、面对面的互动。因而，在李涛夫妇“缺场”时期，两家仅仅通过家人维持礼仪上的交往与互动，这显然大大降低了对他们未来关系的可预期性，高家的希望有落空的危险。因而，高母与高姐要求他们两个返乡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

## 2. 蝴蝶

蝴蝶效应表明，事物的发展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李涛与高艳纠纷的起因极其简单和平常，以至于我在上文中一直没有介绍。李高在东北期间曾闹过矛盾，但无碍<sup>17</sup>。从东北返回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居住在县城的汽修店里，双方相安无事。事发于 2008 年 3 月 18 日（高母的记忆是农历二月初六，即公历 3 月 13 日）早，根据各方的叙述，李涛和雇佣的一个师傅去附近一家小饭馆吃早饭，去之前没有跟高艳打招呼。高安顿好孩子就做饭，等他们两个等不来，就去饭馆买饭，没有想到去的正是李涛他们正在吃饭的饭馆，随斥责李不打招呼、自顾自，人家要给他准备饭呢，他倒自己先吃起来了。李涛当时没有发作。回家后开始有争执，并有互殴行为。高没有任何伤情。即以“被李涛打了”携孩子到了其姐高丽处。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拉开了帷幕。

“打老婆”在农村是极其平常的事。虽然李涛他们居住在县城，但他们的身份并没有改变；即使县城，也与农村没有太大的差别。因而，“打老婆”仍然要放回到 G 村的场景和文化中去理解和解读：是李家的儿子打了高家的闺女，而不是某老板打了老板娘。肉体和生理的伤害是次要的，精神上的伤害才是主要的，一旦高艳因被打而离家出走，“打老婆”这一事件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此后，包括高本人、高母等很少提及李涛打人之事，提到了也没有多少不依不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神情，而是把这一事件当做此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的因果链条中的一环而已。在后来的诉讼中，“打老婆”作为唯一一件有法律意义的事实竟然没有为诉方提及，直到 8 个月后的 11 月 19 日，两人以离婚告终，令众多的亲友扼腕。

是哪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引群蝶乱舞，导致了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打老婆”是那只惹事的蝴蝶吗？

### 3. 增量

中国社会的初级关系是高度伦理化和场景化的，只有在特定的时空条件和背景下，初级关系网络才能对其成员产生一定的约束力量，成员间的相互行为才可以与伦理道德的要求相互印证。也只有将李涛置入G村这个特定的场域中、镶嵌到初级关系这个特殊网络中的时候，高母的作为才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她也才可以对李涛的伦理义务进行某种配置，以统筹安排未来生活和生计问题。高家另外二兄弟——高丽和高朋，经济状况并不好。高丽两口子在城乡结合部租住的一套农家房每月租金仅60元，他们正在拼命攒钱买房子。高朋在县城开过一个小饭馆，但赔了。他大部分时间是住在丈人家，据说实际上是做了上门女婿。他本人比较老实，但妻子比较强势，只有她敢于向高母反嘴。李涛从东北回来后，旋即在县城开了一个汽车修理店，主要对车辆进行整容，修复车辆碰撞的外伤等，生意比较红火，从经济条件上来看，或许大家认为李涛该有所担当了：

**高丽：**俺一点光都沾不上，那才上来3年，俺妹妹出去3年多，俺爸俺妈连个过年过节的礼都吃不上。你说回来不骂他一顿怎么着？别说回来都说要揍他。3年了，该送的礼都吃不着，这闺女白拉巴<sup>18</sup>了，叫谁谁不生气？过节哪怕一次给100块钱，一次都没有。一共给俺干了一年活，一回活，那次我也去了。一共干了一次活还挑眼儿<sup>19</sup>呢，还明<sup>20</sup>说“怎么不叫高朋回来（干活）”，那时高朋干着一个小饭店。”

高丽的苦衷无法放到台面上，尽管她最不满足于这种现状。李涛他们在东北期间，是她和高母操持翻盖了房间，张罗了里里外外的事情。高母不同于李涛他们，她要在这个村庄里生活一辈子，不得不注重自己的名声，也认为自家在村里口碑不错，她同样不能把自己的要求直接提出来，甚至从来没有直接跟李家要过钱物——连李母都说，“她不提条件，光这回

不行，那回不行”。即使后来进入了诉讼程序，她对高艳向李涛提出来的有关财产方面的要求，竟一概表示不知情，轻易不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高艳在他们兄妹3人中是直肠子，不爱操心，最实在、最没有心计，别人再点拨也不开窍，无法做到与高家里应外合，有效传递高家的意图。所以当3月18日她与李涛发生矛盾回家后，就居于次要位置，从中心退到了边缘，频繁的交涉发生在李涛与高家其他人之间。

在对高艳起诉之前，李涛已同高家进行了持续达半年之久的忍气吞声的交涉过程。按照他本人提供的材料，购买礼物花销就达2000多元，交涉的次数也有几十次：

**李涛：**她（高母）主要是想要你两个钱。那天人家律师都说了，你是相中的钱，还是人？和人过日子还是和钱过日子？我得看最后的目的，要两个钱，你早说。一开始吧就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让你多跑几趟，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她自己没有来钱的道。她（指高艳）亲五叔说，操，一开始想讹人家点钱来，结果讹不着你还得赔钱呢。她的意思呢，你得见天<sup>21</sup>去叫去，拿着东西去叫去，就是嫌拿的东西少了，今天给她赶头牛去，明天给她赶头猪去，就是这种人。她对她自己爹都很刻薄，俺丈母娘从小没有娘，真就是从小没教养。人家都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你那个治法。她当时就说，“就这样去叫？两个腿、扛着嘴”，是有两趟去没拿东西。她娘就是个财迷。去时带酒、奶、肉，哪次给她少买了？你要不叫了呢，她又怕你不叫了，叫呢又叫不来，就是图东西。

中国社会是以私人伦理关系为本位的，人们行为的依据既不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也不是完全的传统伦理，而是根据具体情境来对自己提出不同的道德要求，因而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也有着极大的变通空间。乡村社会中的这种经济往来，是在一种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络中进行的。中国乡村社会中的礼物往来是包括了实物、劳役、人情等在内的混合体。李家与高家的礼

物往来（确切地说是单向的）就体现了上述复杂的内容。阎云翔认为人情伦理体系有三个结构性维度：理性计算、道德义务和情感联系，“人情在行动上的复杂性和弹性就源于这三个结构因素变动不定的组合。尽管在涉及人情的所有社会往来中，这三个维度彼此共存，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实际的重点可能是其中任何一个”<sup>22</sup>。对于高家来说，这种来往可以看作是调整他们两家姻亲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其在村子里的尊严所必不可少的符号。

而理性计算的内容被小心翼翼地藏匿于道德与情感的话语之下。直到在10月30日下午的庭外调解中，高家假高艳之口<sup>23</sup>提出的与李涛和好的条件就体现了上述的因素：一、李涛今后每月给女方父母200元钱，二、将在其父名下的汽修店过户到李涛名下，三、李涛给所有女方的亲戚赔礼道歉。这些要求似乎超出了法庭审理的范围，所以法官也感到很为难，只能不断地进行调解说和。李涛原则上答应了第二和第三条；他最在意的是第一条，此后双方之间的谈判也是围绕着这一条进行的。甚至我也参与了对他们的调解<sup>24</sup>。但最终双方没有在这一条上达成协议。

每月200元，实际上是要求李涛付给高母的。这有什么意义？它是什么性质的？是资助还是补偿还是孝敬？在法庭里、在法律语境下，这种要求多少显得有些荒唐。然而放在G村李高两家关系的这个维度上亦有它的合理之处。或许高母并不像李涛所建构的仅仅是一个财迷这样简单，或许高家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构想，而是走一步看一步，在实践中展开他们的要求和设想。我们且看李高各方对200元钱的態度：

李涛一开始只接受每月支付100元，后又增加到150元，但拒绝接受每月200元。李母表示：让李涛拿两个钱也可以，（高艳的要求）要是和她说她就得答应了，但拿多少不敢保证。而高家各人的态度则值得回味：高母说这

三个条件她不知道，是他们三个商量的，即使这些条件答应了她还得再提条件。高艳态度异常坚决，自始至终200元的数额一直没有让步，她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每月给母亲200元钱，以后高母就是有病也不伺候她。高丽和高朋的态度是在当天下午调解时表现出来的。在法官与女方协商过程中，为使李涛能够接受每月支付200元的要求，高朋说他也每月给父母200元<sup>25</sup>。高丽则当即反对这个提议，说她不出。高氏三人的态度值得玩味，高艳是否想通过每月支付200元钱的方式与父母划清界限，难道有什么重要的隐情？高朋随父母一起生活，并没有分家析产，在这种情况下，他每月支付赡养费在农村这种生活场景下是不可理喻的。高丽让弟弟、妹妹掏钱，自己却一毛不拔。由此是否可以断定，三人对200元钱的事并没有进行充分的协商？高母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对此，李家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李母：**每月要200元钱，她娘的意思是治把<sup>26</sup>了她（高艳），让另外二个跟着学。她是这么想的，李涛在东北呆了三年，没给她家里帮多少忙，高丽下力了，觉得亏得慌。

**李涛：**算卦的人都说她得指望老二（高艳），她就治把着老二了，只有老二听她的。昨天她说的“我就一个月给她200元钱，她就是有病我也不伺候她”这说的是实话。

李高的婚姻纠纷搅动了許多日常生活中难以发现的东西，它甚至使当事人不再在意纠纷的起因和最终的结局，而是专注于博弈本身。他们每个人的真实想法都用语言精心地包装起来而不能被轻易地提取，如同量子力学所揭示的那样：观察本身会改变被观察者的形态。

#### 4. 策略

初级关系网络往往是一个十分自洽的有机体系，它有着很强的自组织功能和自修复能力。就像大多数中国人的婚姻一样，其稳定性似乎并不取决于“婚姻质量”本身，而是取决于

一种系统的、整体的网络稳定状况。在李高纠纷中，“打老婆”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初始条件，但我们仍然可以把因果链条（如果有的话）向前推移，追索出更多的微小自变量。不过，对事件过程的分析还要从“打老婆”开始。

从3月18日高艳离家（即离开汽修店）开始，她的身份就处于一种或然状态中了。“她”是谁？她自己清楚吗？从法理、学理上讲，她是一个自由的、自主的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受到身体或精神上的强制；从伦理、常理上讲，她的身份从结婚甚至从订婚时起已做了适当的变更，成为了李家的人。她的“不回家”是一种什么行为？为分析方便，我用“自我人质化”来概括高家在此问题上对李家的策略，以及李家对高家这种策略的心理感受。

对高艳的身份，可以有两种甚至多种的解读；但对李高两家来说，她已成为李家的人这一前提则不会有任何异议。由此推论，对李家来说，高母绑架的是李家的媳妇，对高家来说，高家收留的是自家的闺女。这两种身份、两种角色是重合的、统一的，想必不只是高艳本人，别人也会为摇摆于这两者之间时如何摆正自己的立场而苦恼。所以所谓“自我”人质化，是想表明，作为“人质”的高艳与绑架者高家利益上高度一致，期望快快被赎买了了事。同时还要指出的是，高艳走时还带走了女儿乐乐，我们照旧可以将此扩大解释为一种附带的绑架，因为乐乐更是李家的后人。只是在事件的前期，高家未充分认识到乐乐的价值，半推半就地使乐乐落入李家之手，从而使两家的力量对比

发生了重大变化——当然这是后话了。

想必一开始李涛是以“平常心”这种态度来应对这种事态的出现的，他对此不应该陌生且具备一些这样的地方性知识。比如，高丽也曾多次回娘家，而高丽的丈夫韩辉是李涛的同学，李涛与他关系密切，他应该知情。因此，李并没有迅速地采取应对措施：在高离家的第22天，即4月9日（按高母的说法计算出来是第24天），李涛才携礼物登门求见高家人：

**高母：**农村没个鸡没个狗还得找吧，他一个多月都没有找去。一个多月又才找去。俺小孩的意思是别叫我知道，意思是糊弄着把她妹妹叫回去就算伙<sup>27</sup>了。哎，一直迟迟不叫。结果是他一共不叫，到了快一个月了他才去叫去。

这之前，李主要是通过电话与对方联系，甚至高家派高朋来店里暗示李涛去高家叫人。关于蝴蝶效应，罗伦兹还曾强调说，“如果一个蝴蝶翅膀的一次拍打能够产生一场龙卷风的话，那么它同样能够抑制一场龙卷风<sup>28</sup>”。或许，在这期间里如果有另外一只蝴蝶的拍打，李高之争会有一完全不同的结局。但我们不能在事后做想当然的建构，人为地提取出一种因果链条来，否则，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第三只蝴蝶的存在。与高家的策略相对应，李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救赎行动。应我的要求，李回忆了每次与高家协商时带的礼品（未经高家质证），列表如下：

表1 交涉一览表

时间 (公历)	主叫	地点	礼品(价值)	备注
3.18	李高事发			
4.9	本人	高家	奶、香蕉、肉(约100元)	拒收礼品
4.10			奶、水果、肉(约100元)	高家母女打李致腰部受伤

4. 11		高丽家	奶、熟食 (约 50 元)		
4. 11	本人、哥嫂	高家	酒、红梅烟 (约 100 元)		
4. 12	本人		奶、香蕉、肉 (约 100 元)		
4. 13		高丽家	啤酒、饮料、奶 (约 100 元)		
4. 13		高朋丈人家	酒 (约 65 元)		
4. 13		父母 (孩子)	高家	酒、奶 (约 100 元)	
4. 14	本人		酒、肉、水果 (约 100 元)	不让进门	
4. 15		高父三兄弟	烟 (约 15 元)		
4. 17	本人、父母 (孩子)、哥嫂	高家	酒、肉、烟 (约 150 元)	仅李涛得以进门	
4. 18	本人	高丽家	无		
4. 19		高家	无	不开门	
4. 20		高丽家	无		
4. 26			无	高母在此	
4. 26		高朋丈人家	肉、酒、西瓜 (约 100 元)		
4. 27		高丽家	无		
4. 28			啤酒 (约 100 元)		
4. 29			奶、啤酒 (约 100 元)		
4. 30			无		
4. 30		高家	西瓜、奶 (约 50 元)		
5. 1			高家	无	
5. 1			高丽家	无	
5. 2			高家	无	
5. 2			高丽家	无	
5. 3			高家	礼品 (约 100 元)	
5. 3			高丽家	无	
5. 3			高的表哥家	酒 (约 70 元)	
5. 3		父母、哥嫂	高大爷家	奶、酒 (约 120 元)	
5. 3		父母、哥嫂 (孩子)	高家	礼品、肉、酒 (约 100 元)	
5. 5		本人	高的表哥家	烟 (约 5 元)	
5. 5	高丽家		无		
5. 5	高大爷家		无		
5. 6	高的表哥家		烟 (约 5 元)		
5. 7	高的表哥家		烟 (约 5 元)		
5. 21	高家		西瓜、酒、水果 (约 100 元)		
5. 24	高家		西瓜、酒、水果 (约 100 元)		

6. 23		高家	鸡、虾、西瓜、肉 (约 150 元)	
6. 27		高家	鸡、虾、西瓜、肉 (约 120 元)	
7. 23	本人、哥、嫂子	高家	啤酒、烟 (约 100 元)	
8. 17	本人	济南	礼品 (约 50 元)	高拒见李
9. 20	李涛起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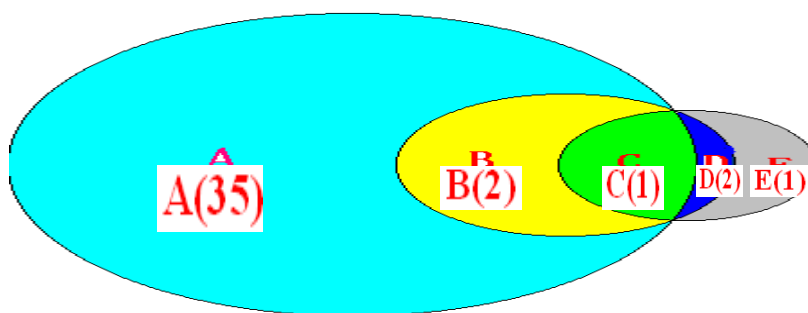
注：统计的时间段是从高艳离家的 3 月 18 日至李涛起诉的 9 月 20 日，李在开庭的第二天（10 月 31 日）还最后一次去了高家，携带啤酒与肉（约合 80 元）。

李家的策略，我称之为对初级关系的动员模式，即李涛在事发后，对李高两家的亲属进行了广泛求助，期求借助初级关系的力量处理此次危机，直至动员与交涉失败后诉诸法律。所以称其为动员模式，是因为尚有另外一种初级关系应对乡村纠纷的模式：介入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初级关系具有强烈的自我维持倾向，具有对于乡村纠纷的抑制与化解功能，一旦纠纷出现，初级关系圈会自动回应，主动介入对纷争进行处理。当然动员模式与介入模式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

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当今社会，这两种模式都广泛存在，只是存在的比例、程度有所差异，具体到每一个个案更是如此。在李高之争中，两边的亲属基本上持观望态度，小心翼翼地防止自己被牵扯进去。

表 1 所列以李涛登门向亲友求助或与女方交涉为准，不包括电话协商的部分。从 4 月 9 日李涛第一次行动至起诉（9 月 20 日）前最后一次行动（8 月 17 日）计 131 天的时间里，李家共出动了 41 人次。构成如下图：

图 3 李家行动组合形式



图示：上图系由 3 个圆交叉而成。左侧的圆为李涛参与的行动（即单独及与他人共同行动的情形，下同），右侧的圆表示李涛父母参与的行动，中间的圆为李涛同院哥嫂<sup>29</sup>参与的行动。其中，A（35）为李涛的单独行动；B（2）为李涛与哥嫂的共同行动；C（1）为李涛、哥嫂与父母的共同行动；D（2）为哥嫂与父母的共同行动；E（1）为父母的单独行动。（）内的数字是该类行动的次数。

从上图可以看出，李涛对于初级关系的动员范围比较有限。尽管在 G 村李高双方的近亲属有 14 户之多，他们彼此之间也没有利害冲

击，但除了父母以外，李涛只选择（或只能选择）同院的哥嫂作为求助对象，甚至其唯一的妹妹从未出面。从行动的频次来看，李涛单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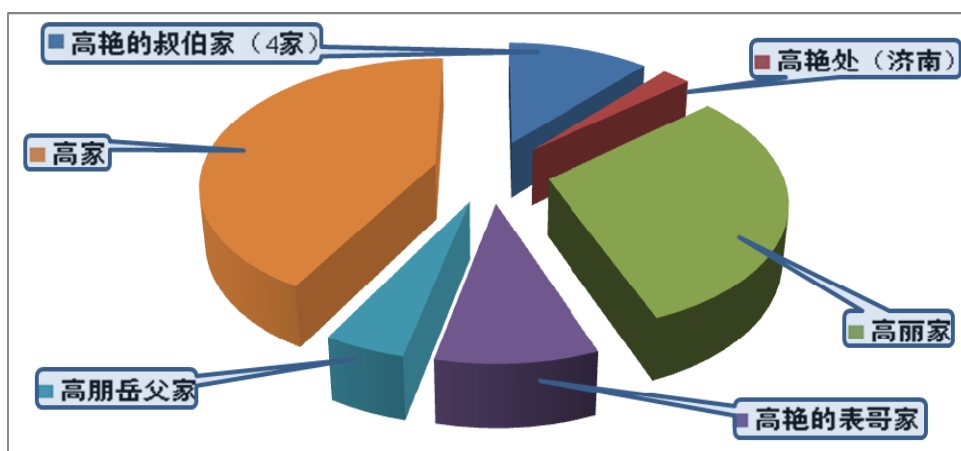


行动 35 次，与哥嫂共同行动 2 次，与哥嫂、父母的共同行动 1 次，合计行动 38 次。可以说与对方的交涉过程主要是由他进行的。李家父母一共行动了 4 次，只有一次是仅父母两人去的，其他的和哥嫂同去的 2 次，和哥嫂与儿子同去的 1 次。而且，李家父母每次行动都要带上孙女（乐乐），可能这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此外，

李涛父母与李涛一起行动的情况没有出现。在图 3 中，表示同院哥嫂行动的圆圈完全被李涛及其父母的圆圈包容，即他们没有单独的行动，一共 5 次行动都是同李涛或其父母一起进行的，在活动中显然只起陪同作用。

从交涉对象的范围也可以分析出李家的行动选择偏好，见下图：

图 4 李家行动选择偏好



很显然，李涛的战略要点是高家及高丽家，说白了就是面对高母与高丽母女俩。李涛去高家计 18 次，仅 3 次没有携带礼品。4 月 9 日，当纠纷发生后他第一次登门时，吃了闭门羹，被拒之门外，并当场受到高艳的怒骂。第 2 日，继续登门，却招致更大的不幸：

**李涛：**我拿着东西去她家叫她去，她娘用擀<sup>30</sup>给我砸断了三根横骨<sup>31</sup>，她娘个×的，她<sup>32</sup>还给我两耳刮子哩。

此后，李涛断断续续上门，虽没再承受皮肉之苦，但也尝尽了高家冷眼。他深知高丽在这个事件中的作用，因而，做高丽工作的努力一点也没有怠慢。他去高丽家共 13 次，不过仅仅 4 次带了东西。去高艳的一个表哥处 4 次，一次带的酒，其余 3 次各带一盒价值 5 元的烟。高的这个表哥与高家并没有多少走动和来往，李涛所以找他求助，是因为他是邻乡一个

中学的副校长，这也是李涛在初级关系圈内物色到的唯一一名工薪人员。此后，他也曾多次引用这位副校长的话来证明高母的不通情理。高父在兄弟中排行老四，老大、老三、老五、老六皆在 G 村居住，对于他们 4 人，李涛也悉数作了拜访。此外，李涛还两次去过高朋丈人家。这样，除了高家老大（高艳的大爷）的儿子高广外，李涛向 G 村中高家的所有近亲属都发出了求救信号。这段时间，高艳以在济南打工居多，间或回娘家、姑姑家、高丽家、甚至高丽的婆婆家居住。在李涛的频频出动中，只有一次是直接去济南找高艳的。

而高家一直不为李涛的作为所动。精明的李涛开始察觉到高母并非如自己所想像的那样简单，却不知道她的真实意图。李涛频繁持续的互动坚持了大约 1 个月就开始松懈了下来：李家总共 41 次的交涉中，有 35 次是发生在第

1个月里，而在此后的100多天里，李家仅仅出场6次。但谈判的大门仍然敞开着：在双方的交涉陷入僵局的情况下，5月18日（高艳离家2个月，李家开始活动第40天）高家托高丽的老公韩辉过来传话，让李涛继续去高家叫人。

“叫人”无疑是一种包含了诸多内涵在内的初级关系调整程序，更是鲁西县农村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一种风俗。它对出嫁女来说，可能是一种救济机制，获得来自娘家的庇护；对已婚男人来说，则可能是一种羞辱程序，就像李涛一样，上门陪笑脸、说好话，回来则气得破口大骂。在某种程度上，高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始终没有把李涛当作事件的主角，因为李涛只听她娘的，而她娘呢，“太孬”，认为事情就坏在了他母亲那里：

**高朋、高丽：**从娶了以后一点也没有帮上忙。头一天他爹（给高家）拉了一车水<sup>33</sup>，第二天见了不认识了。见了面就不理俺妈。我妹妹（闹矛盾）上了济南，他家叫上说事<sup>34</sup>，那种情况见了俺妈都不理她。比如今天上俺家说嫂子你看别生气了叫她回去吧但出了大门接着就不理人了。俺这边倒是把事给压下了，都一个多月了俺妈才知道，但他（李涛）连个妈都不叫。他都听他娘的。

**高艳：**他（李涛）从内心里是想叫我回去，他娘在后边不乐意低头。他现在是今天去叫了，待上个三五天去叫去，然后再待上个五六天去叫去。他没有主心骨，不当家。

高母与李母这样一对“亲家”的关系微妙而又复杂。由于男方性格或身体的原因，她们成为各自家庭的代表，处理邻里、亲戚等各方面琐碎的关系。高母要强、计较、又比较敏感，特别在意李家对高家的态度，细微到日常生活中打招呼的顺序。在处理与李家的关系上，往往以主位的立场来要求和对待对方。访谈过程中，高母对李母耿耿于怀，甚至恶语相向。她对李家的声讨已超出李涛与高艳的事情本身，从而带有一种程序正义的味道：

**高母：**他娘跟他爹去找俺了，去了两趟，去了晚上去了不光不给赔是<sup>35</sup>还得争辩这些事，你说你是去跟俺争辩呢还是去跟俺赔是去？你要是赔是的话说说就把孩子领去了，但还争辩这个不赖他那个不赖他。后晌<sup>36</sup>去，俺不是楞<sup>37</sup>近，白天见了不认得。我还是个嫂，我就是不是个嫂我就是个妹妹，你说，俺闺女，这就是儿女亲家，你这个么你也不能不吱声呀。他也看样是要面子。晚上去叫，去了三趟，白天不理，他爹他娘一共才上来不管，他儿（闹）离婚去他还上俺大门上去正好有个死人的去看死人去呢，这么近我都气得没出来，他们还跟我说，恁婆家还来看死人的来，我说那是来疙<sup>38</sup>我。她老婆婆太孬，她老公公不孬。她知道小孩闹乱子<sup>39</sup>了，她是装不知道、装么。她老婆婆你不得把你儿治回来，熊他一顿，给儿媳妇争个理还有事？嗨，结果是她老婆婆不光不给她争理，反而把她撵出来了。没闹矛盾时就谁也不认识谁。俺儿结婚她也没有人去，俺儿媳妇吃面<sup>40</sup>她也不去，她人性不行。她听她儿的了，你按说你这个做老婆婆的不把儿媳妇留下？留下把你儿叫回来？守着你儿媳妇熊你儿一顿。

李母一直以一种沉着、冷静的姿态对待李高之争，既不激怒对方，又要设法在乡亲们面前保持自家的尊严，不让邻人看到他们家的狼狈相。所以，他们两口子晚上去高家说好话、赔不是，白天则尽可能地避免双方的正面接触。但这种鸵鸟政策并没有化解高家的怨气：

**李母：**去叫了二三十趟。叫都是俺俩都去，开始几次不让进门。小孩闹乱子，大人赔个不是算么，就是大人做的不到呗，不赔礼道歉怎么着。最近一次去叫是八月十五之前了。俺哥哥住的地方离她家近，他也说我，小孩错给人家赔不是吧。（**李父：**咱不能叫妮儿<sup>41</sup>没娘了）。他（李涛）大娘家的哥、嫂什么的都过去。去了，（对方）态度呢一点恶见<sup>42</sup>没有，么也不说，也不表态，只是嫌叫得不勤。李涛自己去得更多。他有什么要求也不说。她不提什么条件，

光这回不行，那回不行。说“你们也不趁热打铁”，还说去的我们太年轻，得找上岁数的。

两位母亲对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处理思路。高母矛头直指李母，如同李母所说，高母工于心计，“她不提什么条件”，以迫使对方主动让步，同时防止落下贪财的恶名。高母注重程序甚于注重实体，注重关系甚于注重事件，注重过程甚于注重结果。对她来说，孰对孰错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就事论事，更犯不上进行讨论，但又不想让他人知悉其真实意图。高母可能把李家的每次登门都当作独立事件，都是因上次不合格而进行的“返工”。李家则把旷日持久的登门活动作了累加，包括出动次数与货币支出额，这在李涛那里有非常清楚的流水帐。他们如同处于“囚徒困境”中一样无法进行信息的充分沟通。

## 5. 拐点

高艳作为“人质”存在的可能性在于对方有“赎买”的意向。我在前面曾提到，高当时是带着女儿一起走的，她先是在高丽那里住了七、八天才到了G村娘家。女儿乐乐作为孙女和外孙女的地位的区别自不待言，她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李家的后人。当纷乱乍起时，高家并没有意识到乐乐可以成为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的一个筹码，即另外一个“人质”。高艳在济南打着工，这使她不能在娘家安营扎寨、长住不走，而是游走于济南、县城与G村之间，对孩子也是大大咧咧，孩子对她也并非百分之百的依赖。高母的孙子（高朋的儿子）不到满月，那才是高家的后人，高母照顾孙子才是正道。乐乐比较调皮，想来让高家没少头痛，但高母又不能明显地表现出厚此薄彼。所以，在3月下旬的某一天，高母半推半就地就将乐乐放到了李家门口：

**李母：**两个人一吵架就把孩子放了大门上，当街中央，都没有人管了，你说我就得抱家来，抱家来养了七八个月。我这又忙。还得

摘玫瑰花，还得蒸馒头。当时不知道，她姥姥是接了传票才去育红班<sup>43</sup>看孩子的，人家没有给开门。

按照李母的说法，一开始小乐乐东撞西跑，他们家又临街，比较危险，就干脆送她去本村的幼儿园上学。当高艳在接了法院传票后（应该是9月底的事了）去幼儿园看乐乐时，乐乐“嗷嗷”地哭。高母后来也提及此事，说她当时对乐乐道，“乐乐，你不认识姥姥了？”并认为这是李母教唆及跟幼儿园老师串通的结果。此后，李涛便把孩子转移了出去。

在此后几个月时间里，李涛之所以在内心里“死不悔改”，与孩子在他手里有直接的关系。他曾这样得意地对我说，你（高母）治把你闺女，我还治把你（高艳）闺女（乐乐）哩。当进入诉讼程序后，乐乐才成为高母考虑的一个因素，但对待孩子她不能过于强硬，否则会打草惊蛇。高母第二次提及孩子是庭审后的第二天，李涛在庭审后最后一次去了高家，高母未置可否，只是说“怎么不带乐乐来，带乐乐来一家乐呵呵多好”。

整个纠纷过程中的拐点就是李涛提起的离婚诉讼。严格地讲，“离婚”之事早在4月10日即李涛遭高母打那天下午就被提起，高艳让李涛去法院，李涛不去，说要去民政（婚姻登记处）协商离婚，双方因细节协商不成又没去。第二天，高朋来店里搬结婚时高家的陪嫁，李涛报警，“离婚”之事不了了之。此事后来在当事人的叙述中很少提及，是因为这实际上是“闹”离婚。“闹”离婚是夫妻间以离婚为要挟手段的一种冲突，它本身并不是目的。按照高母的说法：

**高母：**头回二十多天了才去叫，你想俺闺女不急？一着急一闹就把他撵出去了，撵出去了到了下午就回去了说咱离婚去，当天下午就叫着俺闺女来离婚。到后来又是给俺要三金<sup>44</sup>，又是要这个，得要回去他才签字，当时闺女不给他，不给他就把这个事搁下了。搁下了人家

旁边的又劝他“你看看这么好的孩子，上那找这么个好的媳妇去”……

因此，当时对于离婚这条高压线双方触摸了一下又都把手缩回去了。

李涛正式提起离婚，经过了深思熟虑。他有意选择在农历八月十八这天提起诉讼，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要难为高母，将她一军、让她难堪：

**李涛：**俺丈母娘这一辈子想拿<sup>45</sup>着我但拿不住我。我要真离婚，她娘得感到惋惜，就你闺女这×样的，再找起码是二婚头<sup>46</sup>。首先你没有任何能耐、任何本事。我就是不要你行吧，我就是不让你拿住我。她娘拿着离婚吓唬你，去你娘个×吧，她想背<sup>47</sup>了。她现在没话说了，她现在找她六叔，她大爷她姐姐亲自来，第二天开庭，意思是，兄弟真一点缓和的余地没有了？你要能找着比俺姐姐更好的你就说。我只要提出来就不后悔。

于是，李高之争以诉讼的方式持续下了下来，互动的主要场所也由G村转移法院里来。

## 6. 经官

诉讼是一种特殊的制度设计，它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安排，先天性地使争议双方带有一种对抗性质，迫使他们各执一端、锱铢必较，陷入一种零和博弈的地步。当将生活中的对抗转化为法律上的对抗时，因有国家强制力的象征符号的存在，人们往往更是各不相让。李涛提起的离婚之诉，目标直指高母，想必这是事发以来她受到的第一次重创。按照事后她的解释，本来她是有可能释放人质、结束争端的：

**高母：**他要是不告俺吧，没有这么大气。俺娘儿四个俺五口人儿都商量好了，八月十五（中秋节）只要他来送十五（咱农村不都兴呢），你都回来，把他那边的人再叫他叫回来，把你叫回去，算伙了，为了孩子，可别给他治气了我说，反正治他这时节<sup>48</sup>了。反正是（农历）二月初六出去的。哎，八月十五他没有去，八月十

八他就起诉了。到了这个程度了，还是依着孩子。我自己的看法，这个婚姻是不可能了。又不是什么大事，你上得什么法庭？你说你上法庭干什么，他有熟人，俺没有熟人。和吧不行，离吧还有孩子，和好吧也不理我。闺女说，我嫌丢人，人家都告我了，不要我了。都嫌这一点。

我这气是一时半时地消不了。你把俺闺女揍出来了，我再把她赶走？她娘不管谁管？他太欺负人了，他太拿着这些人不当人了。他就是欺负俺，看着这家人老的老、病的病、残的残。俺又没熟人，咱又没本事。

显然，她从此失去了对纠纷解决的主导权。

李涛案的审理以调解为主。当然，调解的过程是无需记录、也无法记录的，当且仅当调解达成协议时，法官才以制作调解书的方式确认这些成果。显然调解是有成果的。在上午的法庭审理中，高艳的诉求是：同意离婚，孩子由她抚养，李涛每月支付孩子500元的抚养费，分割汽修厂的一半。而在当日下午，高家提出了和好（不离婚）的三个条件<sup>49</sup>。诉讼是李涛的策略而不是他的目的，出此下策当然是希望高艳跟他“回家过日子”。因而，对于三条件，他几乎是照单全收，对于汽修店过户的痛快答应甚至让人感到意外。唯独对于每月200元的“孝敬”钱不太接受，但也没有剧烈反对，只是耐心解释目前困难拿不出这么多，每月100可以考虑。但高艳固执己见。第二天，在李涛上一次登门的百天以后，他又一次携礼品上门。11月6日，法官再次召集双方进行了调解，孝敬钱的数额李涛可以出150元，但高艳还是坚持己见。中午，李涛去了高丽处，但他们没有留下他吃饭。下午稍晚一些，高朋到了李涛店里，要求他带着孩子去叫人，被李拒绝。19日，在先期确定的判决日，双方到庭，在调解基础上达成了协议：双方离婚，女儿归李涛抚养，女方不支付抚养费。21日，高家从李涛在G村的

房子里拉走了结婚时陪送的嫁妆。李涛由3个近亲属陪同(其父母和妹妹未到场),对方是一家四口人:

**李涛:**(昨天拉东西)你骂俺(俺)不吱声。你弄的家什能值1000块钱吗?搬一趟后她娘去骂了。你想去吧,你后悔去吧。人家(高艳)搬东西时还嘻嘻哈哈的,放着手机上的音乐,老大的声音。旁人都说,不是你娘从中捣蛋还有这×事?老高家的人叫你彻底丢尽了。本身他们这一家人缘是村里最孬的、最差劲的,出了名的。她娘的目的就是抠两个钱,慢慢地再治老大、治老二,这是她娘给三个孩子使心眼。

至此,李高之争尘埃落定:李高两家以两败俱伤的方式维持了自尊,实现了“预言”,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

### III. 作为文本的离婚诉讼

文本是事件展开的终结。在有着重宗法血缘、讲伦常关系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里,婚姻关系往往是法律体系中较为保守和稳定的部分,是最无法用一种纯然的理性制度模式加以规制的领域,因而有更多的利益、感情、民俗等等的交织。离婚诉讼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法律文本的修订和形成过程以及对这些事实的重新构建。

#### 1. 李高之争:尘埃如何落定

李高之争,从尘埃乍起、飞扬至波澜不惊、悄然落定。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事件切换到文本,关注一下一起离婚纠纷是怎样经由法律程序固化为了一种符号化表达的。李高之争的卷宗,内容很简单,主要包含了三份法律文件:起诉状、调解书以及李涛应陈庆要求提供的汽修店权属证明,高艳方面则未提供答辩状、证人证言等任何书面资料。起诉状是按法院要求的固定格式填写的,第一部分是姓氏、性别、

住址、出生年月等无实质内容的当事人(李涛和高艳二人)个人信息;第二部分是诉讼请求:

(1)坚决与被告离婚;(2)孩子归我(李涛)抚养,被告支付抚养费;(3)诉讼费、送达费由被告承担。

第三部分是事实与理由:

2003年8月经人介绍与被告订婚,2003年12月8日与被告登记结婚,2004年11月10日生有一女李悦。由于经别人介绍认识,婚前无感情基础,婚后感情一般,经常吵架。2008年3月18日吵架后被告回娘家,至今未归。现和被告感情确认破裂,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诉求同前。

民事调解书的第一部分也是无实质内容的个人信息,差别是两位男方代理人也列入其中。调解书中关于案由的内容:

原告李涛诉称,我与被告经人介绍相识,婚前无感情基础,婚后感情一般,经常吵架,现要求与被告离婚,孩子由我抚养,被告支付抚养费,诉讼费、送达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高艳辩称,我同意与原告离婚,孩子由我抚养,被告每月支付500元抚养费,要求分割吉泰汽修厂的一半的财产。

经审理本院认定,2003年8月原、被告经人介绍相识并订婚,2003年12月18日在鲁西县公安局登记领取结婚证书,原被告双方婚后于2004年11月10日生育一女,取名李悦,现随原告生活。原被告于2008年3月18日分居生活至今。

另查明,被告婚前财产现有两个单人沙发、一个茶几、梳妆台一个、衣架一个、衣柜一组、被子一床,上述财产均在原告处。原被告双方婚后无共同债权债务。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庭审陈述、原告提交的鲁西县公安局婚姻登记证明一份、被告提交的结婚证两份予以证实。

调解书所载达成的调解协议: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

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原告李涛提出离婚，被告高艳同意离婚，依法应准予离婚；

二、原被告之女李悦由原告抚养，原告自愿放弃抚养费，待孩子成年后随父随母由其自择；

三、被告婚前财产单人沙发两个、茶几一个、梳妆台一个、衣架一个、衣柜一组、被子一床归被告所有，原告于2008年11月21日前将上述财产过户给被告。

四、被告高艳自愿放弃其它财产，原被告双方今后别无其它牵扯。

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原告李涛承担。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在本协议书上签字或按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上述协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上述所呈现的作为“文本”的李高之争与作为“事件”的李高之争具有截然不同的面相。尽管之前对于作为“事件”的李高之争的叙述已高度简洁，与其相比，“文本”所体现出的法律装订术和剪裁术仍令人惊叹：情节简略、人物蒸发，特别是曾几何时作为李高之争关键人物的高母被排除出了这个文本之外——如果对事件不了解的话，我们会误以为这是另外一个案件。在起诉状中，李涛按照法律格式对他们的争议所做的寥寥数语的叙述是：“由于经别人介绍认识，婚前无感情基础，婚后感情一般，经常吵架。2008年3月18日吵架后被告回娘家，至今未归。”而调解书所列“被告婚前财产现有两个单人沙发、一个茶几、梳妆台一个、衣架一个、衣柜一组、被子一床，上述财产均在原告处。原被告双方婚后无共同债权债务。”则是由法院唯一查明的内容。诚如赵晓力所言，“法律就是在案卷制作、整理、装订等等这样的琐事中完成了它的想像的统一性，它对生活的想像的覆盖和穿透，发现了自身被实施、被拓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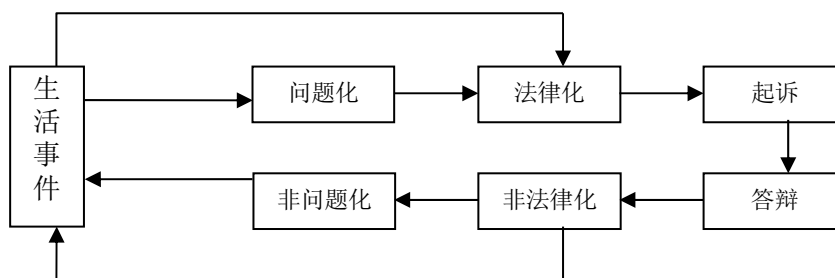
的证据。法律对案件程序、实体、证据的合法性要求，最终落实为案卷制作的合法性要求，因为这些要求实现的证据还要到卷宗中去寻找”<sup>50</sup>。简而言之，李高之争的“法律”“文本”就是这样炼成的。

## 2. 李高之争：文本如何构建

这显然不是李高任何一方想要的结果。然而这个法律文本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是压倒性的而不能不接受，他们无法抗拒那种让他们各自签字画押的无形力量。事实上，李涛和高艳一直保持着对法律的敬畏，双方也都一再声称：“听法律的”、“听法院的”，对于法律文本本身表现出了高度的认同。那么，法律文本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它又是如何建构出来的呢？毫无疑问，国家的强制力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不管它在场与不在场，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法律文本与这种强制性是等价的。但仅仅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是不够的，李高之争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该案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即从表面上看这是李高二人两厢情愿的结果，法院只是对这种合意进行了确认而已。

将一个生活事件搬上法律舞台，至少要经过两个程序：一是问题化，将纠纷、争执或冲突上升到问题的维度，做问题化的解释；二是法律化，将问题解释为可以利用法律来解决和处理，具体地说就是在诉讼中利用法言法语进行符合诉讼程序的表述。而被告（倘反对离婚）的叙述则按照相反的方向进行。由此可以看出离婚诉讼的叙述框架：

图5 离婚诉讼的叙述框架



大量离婚诉讼中的事实，在被建构为一桩离婚案件的组成部分之前，是作为一种生活的常态而存在的，当且仅当基于诉讼的需要，它们才得以成为这样一种法律事实。当一种标志性事件出现时，这样的建构自然就顺理成章——比如婚姻法解释中所列举的若干种情形。然而，生活中充满得更多的是琐事而不是事件，即便是一桩微不足道的琐事，也是那个生活场景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又以何种理由赋予它法律上的意义？在李高之争中，当它作为一个法律上的个案呈现时，连当事人自己都很陌生：发生什么事了？在此前几个月的时间里，双方不曾提出过所谓的感情问题，也不曾使用过这类字眼，怎么现在大谈特谈起“感情”问题了？对于结婚时的家当，连邻居们都清清楚楚，为什么法庭上还要一五一十地清点，什么“两个单人沙发、一个茶几、梳妆台一个、衣架一个、衣柜一组，被子一床”？特别要紧的是，两个不知情的人（李涛的代理人）居然也在法庭上发言，而高丽、高朋成为了“旁听者”，不得言语。高母，作为纠纷中女方的总指挥，却因没有带身份证而没能进入法庭。原来的那些问题呢？那让李涛头痛的高艳“不回家过日子”、“光听她娘的”等问题呢？那让高母闹心的李涛“今天来叫，明天不来叫”、李母见了她“不主动说话”等问题呢？蒸发了？所以，当法庭审理时，头一次走上法庭这个如此庄严的地方的他们，一如美国学者苏珊·索比所提出的那种“法律面前的求助者”<sup>51</sup>真诚而又疑惑地

在极短的时间（18 分钟）内配合完了庭审程序。此后，经过严格的法律裁剪，更具备某种形式上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案件卷宗制作完成，通过对法律话语的凝固形成对于李高案的唯一合“法”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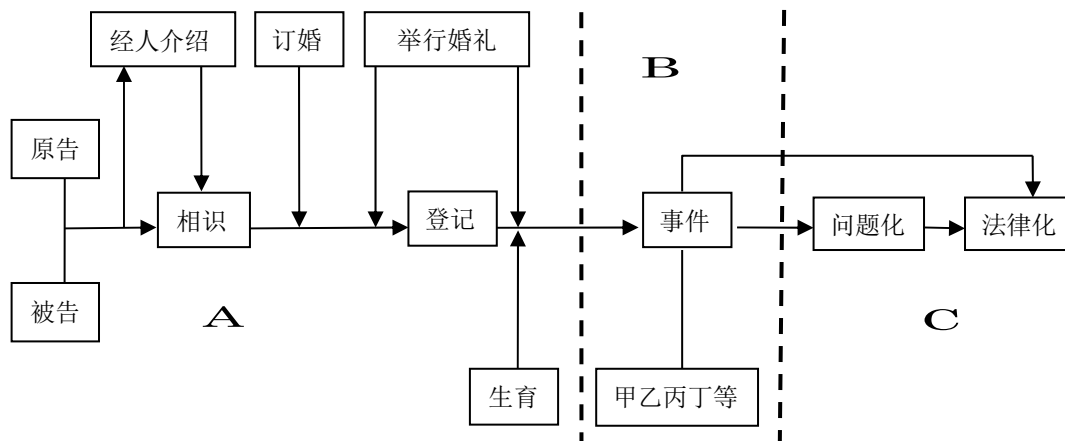
### 3. “甩干机制”与法律世界

中国法律作为一种由官方主导和推动的强势规范，并没有建立在社会充分分化和理性化的基础上，它充其量只是建立了一个关于个人权利的“文本”体系。同样，司法运作的过程也就可以理解为对案件一一草拟并定稿为法律文本的过程。从李高案中可以看出，诉讼程序对于离婚纠纷的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甩干”程序，唯有通过法院这台甩干机的高速运转，一件轻盈的法律外衣才可以做成，一桩纠纷也才可以披上这件外衣并以法律纠纷的面貌呈现。

寻求司法方式解决离婚纠纷并不单纯意味着一种路径选择。更重要的是，这种解决方式需要当事人相应地对法律世界进行一次临时性的建构，想像一种使私人问题“经官动府”的处理方式。在李高之争僵持不下，没有和缓迹象之时，李涛的心身疲惫也达到了极致，具备了提起诉讼的心理条件。但要顺利地提起诉讼还需要具备一个技术条件：要进行一种编程，把自己的问题用法院可以接受和识别的文字表达出来。这一点通过自助就可做到；倘嫌麻烦，请他人捉刀即可。这是这套“甩干”程序的辅助

或前置程序，当事人只有实现了叙事方式的转换，使诉状符合诉讼的形式要求，那么案件才会获得“准入”：

图6 李涛离婚诉状的叙事框架



在上图中，A部分是作为一种铺陈出现的，从这里开始，婚姻纠纷被有意识地从夫妻感情的角度进行建构；B部分是针对婚姻关系破裂的陈述，这种陈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事实导向而非关系导向的；C部分则以问题化和法律化的方式提出了法律诉求。按照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诉讼的主体系与案件事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即诉讼程序只处理争议演化过程最末端一环的因果链条。对于李高之争，一个不证自明的假设是纠纷的产生仅由夫妻双方导致，这样就把当事人以外包括高母在内的利害关系人整体性地屏蔽在了司法程序以外。

生活事实与诉讼事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大量离婚诉讼中的事实，在被建构为一桩离婚案件的组成部分之前，是作为一种生活的常态而存在的，当且仅当基于诉讼的需要，他们才得以成为这样一种法律事实。在这里，法律不再追问当事人的思想与动机，不再过问当事人的来龙与去脉，它只把焦点聚集在外在的行为举止上。于是，当跌宕起伏、旷日持久的李高之争以法律事实呈现时，被凝固成了寥寥数语：“由于经别人介绍认识，婚前无感情基础，婚后感情一般，经常吵架。2008年3月18日吵架后被告回娘家，至今未归（问题化）。现和被告

感情确认破裂……”，除非李涛撤诉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否则案件的处理将遵循一种类似于流水线式的流程。

法律话语是以公共性知识为基础的。因此，“甩干”机制要去除道德之类的水分。李高之争中的道德“水分”其实就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或曰乡土化的正义观。“甩干”机制最终导向的是一种不同的纠纷处理模式。在原有的争议解决模式下，李高之争解决的进程是由他们双方来确定的，只要他们有足够的耐心，争议就可以按照某种预期持续下去。比如李高双方都认识到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个日子的重要性：高母有所期待，希望李涛在节日到来时有所行动；而李涛则按兵不动，以不作为的方式蔑视高母。将争议提交法院处理意味着离婚纠纷解决主导权的转移，这主要表现在诉讼程序的刚性规定上——当事人双方都必须遵守同一的时间和时限要求，听从于法院对于案件审理过程的安排，由其作为第三方来主导这场“诉辩交易”。“当法院的确把一个案件定义在法律范畴之内的时候，诉讼人就失去了对问题解释的控制权，失去了对所提供的解决方式的控制权”<sup>52</sup>。

想像中的“法律世界”的构建正是在这些话



语的逻辑展开与互动活动中完成的。基层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打官司从广义上讲就是“打关系”，诉讼程序的启动导致诉讼各方对自己的初级关系和社会资源进行再动员。但从狭义上讲，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诉讼双方不得不以“证据”化的方式对以前的婚姻生活进行各自的事后建构。在建构过程中，正式的对话与交涉是以法律话语来进行的，它的使用使当事人双方的关系变得简单、刚性而且便于操作。初级关系——不管是基于血缘、地缘，还是姻亲、朋党——是高度情境化和特殊主义的，它所包含的丰富的感情、伦理等内容无法化约为一种精确的法律话语而只有被舍弃。

李高之争就展示了这样一种实践的样式。在法院里，除了那短短的大约 18 分钟的庭审外，双方大部分时间是在走廊、楼梯等处进行着艰苦的讨价还价。法官陈庆更多地显示出另外一副面孔，苦口婆心地进行斡旋和调解，耐心地劝导双方特别是李涛让步，接受女方提出的三个条件：

陈庆（法官）：（笑）（对男方）你也够拧<sup>53</sup>的，你认个可错不行？你低头呗，自己家里人又不是外人，和好行吗？你这边你撤诉不行？给她个台阶下，行吗？我觉得恁得想想孩子，孩子才几岁，你们两个真没有什么问题，又不指望跟老的过一辈子。（男方代理人插话：你两个和了好，咱们都省劲了）你两人单独啦啦吧，别动手啊，这里有监控。我都觉得你们可惜，又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离了的话孩子怎么着也缺个父亲或母亲。（对女方）这些人都向着你，双方啦啦多好。

像陈庆这样的基层法官得准备两套话语体系，在不同的场合交替使用，游走于法律内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两种话语体系的不同风格，而在于这两种话语背后所体现的两种价值理念。与中国传统社会乡村纠纷处理模式不同，现代社会注重法律的普适性价值，排斥地方性知识——尽管在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中包含了调解这种制度安排，但两者之间并未实

现有效衔接。但在正式文本中，法律话语是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形成对于其他话语形式的排斥，甚至使诸多相关者处于“失语”状态。调解书的最后达成则是这一系列努力的最重要的成果：按照法律的规定，它被视作双方的合意，除非证明有违调解原则，否则不可以就此提起上诉。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庆是把李高之争办成了铁案的，她才是李高之争的赢家。陈庆所做的其实就是在案件被“甩干”的基础上再做一种“熨平”的工作，以便尽可能地抹平法律与生活之间的印痕。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案件的审理过程，它如同影视的后期制作一样重要，这可以使李高之争在法律文本上变得更加平滑、整洁和无可挑剔。当然，这种“熨平”本身，自然也包括了法官非“法言法语”部分的剔除。

#### IV. 结论与讨论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宗法血缘、讲究伦常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许多伦理性的、道德性的内容，这使中国人的婚姻不管历经多少次政治改造、法律建构和社会变迁，依旧表现出坚韧的道德品性，保留着诸多传统文化影响的印痕。建国后每次婚姻家庭立法或修订，都试图将法律文化引入家庭生活以解决社会问题或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这不断引起持久而热烈的关于法律与道德问题的争论：婚姻纠纷能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法律来治理？道德控制与法律控制孰优孰劣？在一个变迁的时代里初级关系能否足以应对它内部的危机？对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地做出技术性的回答，而应该追问他们背后那种影响我们道德和精神生活的逻辑与力量。

李高之争案事件与文本的两种展开方式就向我们展示了法律与道德之间这种内在的矛盾与张力。尽管可以认为在婚姻法律制度中已经实现了法律与道德的二元分离，越来越多的人对法律道德主义持批判的立场，强调私生活的自主权，但在现实生活中，道德与法律并非泾

渭分明，婚姻生活与社会生活亦没有一条清晰的公私边界，道德在其中并非仅仅作为一种黑白分明的是非功过判断标准，它还包括了日常生活中一揽子的习惯和生活原则。道德的源头就是生活，就是人之常情、人之常理，一种“地方性知识”，就是大家公认的，不容置疑的生活原则。金观涛认为，中国文化中合理性标准是常识和人之常情，毋庸置疑的常识和人的自然感情（人之常情）一起作为论证道德伦理，社会制度（行动）正当性的基础，“在这种推理方式中，常识（人之常情）首先被认为是天然合理的，是不能怀疑，不必深究的东西，然后用它们来类比，外推产生出高层观念”，他将其称为常识理性结构。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是道德，而常识理性构成道德的基础，“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由道德价值向政治，经济领域投射，以证明某一种社会制度合理与否的深层结构”<sup>54</sup>。李高之争就是作为一个道德事件（或曰生活事件）展开，却以一个法律事件收场的。当法律程序终结，道德性的内容会重新浮现，人们会重新以道德的眼光来打量这一切，包括诉讼过程本身，那些已向法庭提交的“法律事实”也会重新被道德话语解释。

中国乡村大体上仍然是一个关系社会，人们遵从的是地方性的生存逻辑，人情面子，互惠原则等伦理。应对乡村纠纷，建构一套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安排无疑是重要的，这也是我们社会长期努力的方向。但以外力对乡村秩序的整合不但不能替代自发秩序的生成，而且可能为社会运行带来新的风险，“造成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sup>55</sup>。对现代都市来讲，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合法性依据，但在农村，民间文化，宗教信仰，宗法组织等依旧存在并对乡村纠纷的处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法治的引入导致了与本土文化的激烈冲突，“送法下乡”作为体现国家重建乡村秩序努力的企图，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但我们不可能也没有时间和耐心听任，期待一种秩序的自发生成，即使有也是一厢情愿。在乡村纠纷治理问题上，

初级关系的介入从近期来看不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也有利于人际关系的修复，以维持乡村的伦理生态。但从长期来看却有可能延迟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况且初级关系作用于乡村纠纷的正当性理由正在流失。

在这个特殊的转型期，面对乡村纠纷，一种现实的“解纷”机制要具备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是普适性的法律知识还是地方性的乡村道德伦理？这恐怕很难回答。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应该不会和初级关系及乡村伦理有大的冲突，并且又能在同社会总体的演化趋势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实现对初级关系的超越。

#### 注释\*

<sup>1</sup>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sup>2</sup> 初级关系是初级群体内成员间基于血缘、姻亲和邻里等形成的人际关系，它不仅是人们进行感情交流的重要纽带，也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而婚姻关系则是一种最重要的初级关系。因而，婚姻纠纷（尤其是中国乡村社会的离婚纠纷）的发生往往会牵动更多的社会关系，造成更大的社会震动。参见郭星华、刘正强[1]。

<sup>3</sup> 本文中，李家指李涛父母家，高家指高艳父母家。李涛家指李涛自己的家，位于高家附近50米左右。李涛与高艳婚后去了东北，返乡后则住在汽修店，所以，他们在自己家里住的时间很短。

<sup>4</sup> 这里仅仅考虑了两两互动这种最简单的关系，即假设社会关系都是在两者之间进行的，暂不考虑三方及以上互动这种情况。设有A个因素，则他们之间产生的两两关系数为： $A \times (A - 1) \div 2$ 。

<sup>5</sup> 说，方言，意为嫁、介绍。

<sup>6</sup> 愣，方言，意为很；愣勤，很勤快。

<sup>7</sup> 即李家的家庭状况也说得过去。

<sup>8</sup> 个，身高。

- <sup>9</sup> 当地常用“你”指第三方。
- <sup>10</sup> 慳慳蟹虾，方言，意为猥猥琐琐。
- <sup>11</sup> 反话，意思是：你是多大的人物？
- <sup>12</sup> 方言，昨天。
- <sup>13</sup> 方言，今天。
- <sup>14</sup> 当地音读 qing。
- <sup>15</sup> 方言，这里意即李母态度要好一些。
- <sup>16</sup> 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2]，第18页。安氏对脱域的解释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
- <sup>17</sup> 只因有了现在的纠纷两人在东北期间的矛盾才被高母一人提及，作为她对现在的纠纷解释的一个组成部分。
- <sup>18</sup> 方言，养育。
- <sup>19</sup> 方言，挑毛病。
- <sup>20</sup> 方言，直截了当地说。
- <sup>21</sup> 见天，方言，每天。
- <sup>22</sup> [美]阎云翔[3]，142页。
- <sup>23</sup> 当天的庭审迟迟没有开始，法官先进行庭外的调解。庭审时间持续了18分钟左右。中午，一直在法院外面的高母与儿女们一起去了高丽家（距法院只有几百米）吃饭。下午双方继续前来接受调解，高母仍然没有进来。高家的三个条件就是在下午提出来的，对此，高母应该知情。
- <sup>24</sup> 10月30日一整天的庭审，只有18分钟的开庭，其余的时间都是进行调解，搞得法官也极端疲惫。我也对双方分别进行了劝解，甚至一度法官请我主持对他们进行调解，这样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是和李涛、高艳在一起的。
- <sup>25</sup> 如果高朋出了钱，高艳也得出。当然，不管以李涛的名义还是高艳的名义，都得由李涛往外拿钱，诱使李涛出钱就是高朋的目的。
- <sup>26</sup> 方言，管住了。
- <sup>27</sup> 就完事了。
- <sup>28</sup> [英]扎奥丁·萨德尔[4]，52页。
- <sup>29</sup> 李涛大伯的儿子与儿媳，即李涛之父之哥之儿及儿媳。
- <sup>30</sup> 农具，主要用于刨地，一端为金属。
- <sup>31</sup> 我曾看过李涛照料的X片，系“横突”，即软组织类，对身体无大碍。
- <sup>32</sup> 高艳。
- <sup>33</sup> G村没通自来水，饮用水靠用水车去别处拉。
- <sup>34</sup> 说和的。
- <sup>35</sup> 方言，赔不是，道歉。
- <sup>36</sup> 方言，晚上；夜儿后晌，昨天晚上。
- <sup>37</sup> 方言，很。
- <sup>38</sup> 方言，恶心对方。
- <sup>39</sup> 方言，闹矛盾。
- <sup>40</sup> 方言，生小孩后（第9或11天）的祝贺方式。
- <sup>41</sup> 方言，女孩。这里指李女乐乐。
- <sup>42</sup> 方言，不友好。
- <sup>43</sup> 即幼儿园。
- <sup>44</sup> 订婚时的礼金之一，李家当时给女方的“三金”是2600元。
- <sup>45</sup> 方言，控制住。
- <sup>46</sup> 方言，离过婚的。
- <sup>47</sup> 方言，想错了。
- <sup>48</sup> 方言，程度。
- <sup>49</sup> 即上文所述：一、李涛今后每月给女方父母200元钱，二、将在其父名下的汽修店过户到李涛名下，三、李涛给所有女方的亲戚赔礼道歉。
- <sup>50</sup> 赵晓力[5]，538页。
- <sup>51</sup> 美国学者苏珊·索比根据自己的研究，将人们与法律的关系区分为三种类型，即法律面前的求助者，法律游戏的参与者，法律困境的反抗者。参见苏珊·索比[6]，146-153页。
- <sup>52</sup> [美]萨利·安格尔·梅丽[7]，3页（中文版序言）。
- <sup>53</sup> 方言，执拗。
- <sup>54</sup> 金观涛、刘青峰[8]，235-249页。
- <sup>55</sup> [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9]，354页。

**\*参考文献**

- [1] 郭星华、刘正强：《初级关系变迁与民间纠纷解决》，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 [2] 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北京：译林出版社。
- [3]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42页。
- [4] [英]扎奥丁·萨德尔：《视读混沌学》，田德蓓、孙文龙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7，52页。
- [5] 赵晓力：《关系/事件、行动策略和法律的叙事》，载《乡土社会的公正、秩序与权威》，王铭铭、王斯福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538页。
- [6] 苏珊·索比：《为什么美国人相信法治》，王晓蓓译，载郭星华等：《法律与社会——社会学和法学的视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46-153页。
- [7] [美]萨利·安格尔·梅丽：《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郭星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页（中文版序言）。
- [8]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 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235-249页。
- [9] [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54页。



## 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思潮の変容と国語教育改革

武小燕<sup>1</sup>

### 要旨

グローバル化社会における今日の中国では、社会思潮の多様化が大いに進んでいる。特に近代中国の三大思潮と呼ばれる自由主義・社会主義・保守主義が長い年月を経て再び社会の表舞台でそれぞれの影響を發揮していることは、今日の中国を捉える上で不可欠な視点だと思われる。本稿では、まず歴史的な視点を踏まえてこの三大思潮の主張と変容を確認し、その後、改革開放期の国語教育についてその教学大綱と課程基準（日本の学習指導要領にあたる）および教科書に対する分析を行った。それによって改革開放後、一時に言論界から排除された自由主義と保守主義は、その影響力が知識人のなかで衰えておらず、特に90年代以降急速な展開を示しており、その影響が国語教育の改革にも及んでい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社会思潮においても国語教育においても、民族化と普遍化を追求しながら、人文主義の重視と価値観の多元化が進んでいる。

キーワード：社会思潮，国語教育，語文科，価値志向，人文主義

### I. はじめに

21世紀以来、中国社会はWTO加盟にともない、いっそうの変化を迎えている。この変化は前の改革開放期に比べると、グローバル化の更なる浸透およびそれに伴う欧米的普遍主義と民族主義の両方が高まりを見せていることに特徴がある。たとえば、2004年の憲法修正では私有財産の合法性が認められ、2008年に一部の知識人による人権や憲政を提唱する「零八憲章」が出されたことは、官民のいずれにおいても欧米的普遍主義が影響力を拡大し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また、政府主導の孔子学院の世界的展開や民間社会における様々な伝統文化の復興運動は、国力の向上に伴う政府や国民の自信の高まりを示す同時に、自らの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に対する自覚を促す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

こうした変化は制度改革や社会現象として表れるほか、学校教育にも影響を与えている。特に国民教育の基礎である国語教育では、従来の政治教育から人文精神教育へとその趣旨が変わった同時に、伝統文化を反映する中国古典も平和や愛の普遍的価値を反映する外国作品も2000年代以降大いに増えた。

本稿では、まず今日の変化に潜む社会思潮を歴史的な視点からとらえ、それから社会思潮を反映する具体例として、次世代の国民育成を担う学校教育の中で教育の文化志向を最も具現化する国語教育の変容を考察していく。こうした作業を通して、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における中国社会の今日の変化は、どのような歴史的背景の下で可能となり、また次世代の国民育成については今後の中国社会にどんな影響を与えうるかについて検討する。

### II. 近代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思潮の変容

上記に見られる 2000 年代以降の中国社会の変化は、欧米的普遍主義に傾倒する自由主義と伝統文化に価値を置く保守主義の台頭だと見られる。この両者はかつて社会主義イデオロギーによる一元的支配の下で厳しく統制されたが、なぜ今日社会を動かす影響力を持つように成長できたのだろうか。それは 1978 年以來の改革開放政策または 90 年代以降拡大してきたグローバル化の影響に要因を求めただけでは、不十分のように思う。なぜならば、この時期における両者の成長過程を見れば、その論者たちは絶えずに近代中国の歴史をふりかえしながら、その反省から今日の改革の方向性を議論し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つまり、両者の台頭はより根本的に、知識人たちが近代中国の進むべき道に対する模索の一部だと言える。そのため、グローバル化する今日の社会思潮を理解するには、その底層にある歴史的なつながりを踏まえて認識する必要がある。

### 1. 自由主義思潮の変容

近代中国の三大思潮と言われる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会主義のうち、いち早く知識人に影響を与えたのは自由主義であった。イギリス留学の経験を持つ清末の文人である嚴復は、19 世紀末から 20 世紀初めにかけてアダム・スミスやミルの代表作の翻訳を通して古典的自由主義思想を中国に大いに広げた。また、変法自強運動後日本亡命に強いられた梁啓超は、在日中に多くの西洋思想と出会い、その中で特にルソーやロックへの傾倒から共和国的自由主義の考えを広げることに関与した。この 2 種類の自由主義は、新文化運動において「法的自由」(Civeil Liberty) を重んずる英米型と「天然自由」(Natural Liberty) を重んずるフランス型と区別して認識され、それぞれの支持者を擁するに至った。

ところが、ロシアの十月革命後、両方の支持者に変化が生じ、「ユートピア的な社会革命」への支持から一部の自由主義者はマルクス主義者に転向した。それに対し、漸進的な社会改造を重視する英米型自由主義は、デューイ訪中とその弟子の胡適や陶行知による精力的な取組の下で影響力が増し、特にプラグマティズムが中国の自由主義者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さらに、1920 年代以降、資本主義と社会主義の折衷を図ろうとする社会民主主義志向も中国の自由主義者に影響を及び、後に「ソ連の経済的民主を以て英米の政治的民主を補う」<sup>2</sup> という第三の道を提唱して成立した中国民主同盟がその代表格である。

しかし、これらの自由主義思潮は、新中国成立後の政治運動の中で徹底的に批判され、社会の表舞台から姿を消した。それが再び中国社会に登場するのは、改革開放以降となる。1980 年代に自由主義を含める西洋思想の学術書が多く翻訳されるほか、民主や選挙を要求する学生運動も度々行われた。その後自由主義者たちは、1989 年の天安門事件で一時的に挫折を迎えたものの、1992 年以降政府が推進する市場経済路線に積極的にかわり、政権を批判する理想主義者から社会の再構築を図る現実主義者へと姿勢を転換した。その背景には、イデオロギー論を棚上げにして自由主義を受容し始める政府の姿勢転換と市場や市民社会の誕生によって自由主義者が活躍の場が得られたほか、新中国以前の自由主義思潮とりわけプラグマティズムの継承がその認識の根本にあることが見逃せない。たとえば、自由主義者の代表格である前記の胡適に関する研究は、長い間にタブー視されたが、90 年代以降ブームになるほど関心が高かった。さらに 2000 年代以降、「三つの代表」論や党規約の修正の下で、資本家の中国共産党加入が可能となり、実際に私営企業家におけるその党員の割合は 2000 年代後半 3 割台に上ってき

た。自由主義の影響は経済や言論界にとどまらず、政治の表舞台にも浸透を拡大している様子がうかがえる。

他方、80年代には専制政治に対して抽象的な人間の価値を提唱する自由主義は知識人のなかで強く求められたのに対し、90年代以降、具体的な人間像と社会像を求めらるうえでその陣営が分かれてしまう。新中国以前の自由主義者に見られる多様な主張に対する継承と反省が行われ、今日の改革策に対する議論が止まない。

## 2. 保守主義思潮の変容

自由主義者と論争を繰り広げながら、新中国後共に批判の対象となったのは保守主義者であり、その代表格は新儒家と呼ばれる知識人たちである。自由主義が中国に紹介された当初から進歩的な思想と見なされてきたのに対し、伝統文化の価値を擁護する保守主義者の主張は近代中国で長らく陳腐的・封建的といった負のイメージが払拭できず、より激しい批判にさらされた。新文化運動における「孔子を打倒せよ」、文革における「旧思想、旧文化、旧風俗、旧習慣の打破」のスローガンとそれらの運動を想起すれば、その批判の痛烈さが分かる。

もっとも、清末の嚴復や康有為は維新を主張する際に、多くの古典を再解釈し、それに時代変革の意味を与えた。その趣旨は、梁啓超の「復古を以て解放とする」<sup>3</sup>という言葉に端的に表れる。実際に嚴復の訳書も康有為の「公羊三世」論もより古い時代の言葉や原典を再解釈することによって伝統文化に新しい息吹をもたらした。こうした批判的継承の視点に加え、第一次世界大戦後荒れ果てた欧州の現状を含む西洋社会の現状に対する認識が深まるなか、欧米的近代文明の限界を超越する新たな文明の模索から、伝統文化への関心が高まった。1920年代以降こうした関心は次

第に新儒学に発展してきた<sup>4</sup>。1949年まで、梁漱溟や馮友蘭などの新儒家は近代化というコンテキストの中で伝統文化をいかに解釈するかという理論探究を進めたほか、西洋化の論調が高まるなかで民族文化の主体性と民族文化への自信を呼びかける存在としても影響が大きかった<sup>5</sup>。

新中国成立後、新儒学は自由主義と共に批判され、その影響が台湾や海外にとどまった。改革開放後、伝統文化への関心は高まっているものの、80年代にそれを近代中国が遅れた原因と見なす観点が相変わらず有力であった。たとえば、1988年に中央テレビで放送された黄河文明を批判する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の「河殤」がその好例である。1990年代以降、伝統文化を評価し、その復興を推進する言論がようやく社会の表舞台に登場できた。その背景には、政府が伝統文化に対する姿勢が批判から推奨へと転換したことと、台湾や海外における新儒学の言論が大陸本土で急速に影響を拡大していることがある。前者は1989年に江沢民が、中国共産党の指導者として初めて公の場で儒学研究の価値と成果を肯定する講演を行ったことから始まり、後者は海外新儒家の余英時による「中国近代思想史における急進と保守」の講演を発端とした。伝統文化の中に潜んでいる人文性や民族性が再認識され、それが革命的な急進主義及び自由主義者の欧米志向に対する批判として注目が集まってきた<sup>6</sup>。

2000年代以降、グローバル化の加速につれ、伝統文化はソフトパワーとして政策的に位置づけられたほか、伝統文化の再確認を通して自国中心の認識を是正しようとする動きも学者の中で関心が高まった。たとえば、清華大学の汪暉が伝統中国と近代中国を論じる「帝国と国家」において、「帝国の問題を再びテーマにすることは、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記述を強めるためではなく、その記述から抜け出るよ

うにするためだ」<sup>7</sup>と述べ、開かれた伝統文化の再構築が図られている。また、そうしたアカデミックな関心と相反し、一部の儒学者の中で復古主義的な動きさえ現れてきた。たとえば、当代大陸新儒家の代表者とされる蔣慶が読経運動を起し、儒学古典を子どもに暗記させようとし、もう一人の康暁光が社会主義的主張と自由主義的主張のいずれも中国の西洋化を図るものだと批判し、儒教の国教化を唱えた。このような復古主義的な主張はリベラル派から厳しく批判されている。

### 3. 社会主義思潮の変容

三大思潮のなかで、唯一断絶なしに展開しつづけてきたのは社会主義である。ロシアの十月革命と国内の五四運動の下で誕生した社会主義は、近代中国が置かれている内憂外患の中で急速に大きな支持を得るに至った。「十五年間も立たない内に、中国青年たちの議論はほとんど 1917 年以前の西洋文明の否定に転じてしまった」<sup>8</sup>という胡適の 1933 年の指摘がそれを物語る。中国共産党は内部の路線対立および国民党との合作と分裂を経て、農村を拠点とする土地革命を展開し、階級打倒とプロレタリア専制を目指して革命を進めてきた。しかし、日中戦争が勃発後、共産党の一義的な目標は国の独立と民族の解放となり、プロレタリア専制が二義的な目標となった。後に毛沢東が発表した「新民主主義論」では、こうした趣旨がより明確に出された。

共産党以外の政党や勢力を部分的に受容する新民主主義路線のもとで、共産党は日中戦争、第二次国共内戦および建国初期の社会再建に取り組んできた。社会主義路線が再び共産党の一義的な目標となったのは、1953 年以降となる。1952 年末中央指導部は毛沢東の意見に基づいて新民主主義路線から社会主義路線への転換を図る移行期総路線を打ち出し、私有制の公有化などを進めた。急進的な改造

の下で 1956 年から社会主義的社会を迎えたと宣言され、その後工業化をはじめとする四つの現代化が進め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しかし、急進主義的な左傾路線の下で社会主義的近代化の実現を非民主的・非理性的な方法に訴えたが、最終的に社会の近代化を遅らせてしまう結果となった。

毛沢東が死去すると、文革路線に対する批判が表面化し、1978 年以降国策が改革開放路線へ転じ、見習い対象も建国初期のソ連一辺倒から欧米や日本の先進資本主義国に変わった。しかし、こうした転換は社会主義体制の転換を意味していない。たとえば「現代化」の意味は依然として農業・工業・国防・科学技術の 4 分野に限定し、それ以外の分野の現代化の提唱は、しばしば社会主義国に対する西洋諸国の平和的な転覆策（「和平演変」）として警戒された。他方、80 年代の言論界では文革への反省から、マルクス主義への関心が従来の階級闘争論から人道主義論に移り、マルクスの「経済学・哲学手稿」（1844 年）が特に注目された。こうした動きは、当時政府からブルジョア的な関心による「精神汚染」と咎められたが、後に胡錦濤が提起する「人を本位とする」（「以人为本」）論の基礎となった。

1992 年の鄧小平の「南巡講和」後、資本主義か社会主義かのイデオロギー論が棚上げされるなかで、政府はもっぱら経済発展に力を入れ、実用主義的な視点の下でより広義的な現代化に関心が生まれた。こうした背景では、政治的イデオロギー論に拘らない「現代化」の概念が言論界から提起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たとえば、北京大学の羅榮渠が「現代化」を、工業化とそれにとまなう社会の一連の変化という広義的な理解と、後進国が先進国を追いかけ、追い越すために行った広範な社会改革運動という狭義的な理解から解釈を行った<sup>9</sup>。また、ポストモダンについては、中国科学研



究院の何伝啓は「第二次現代化」論を提起し、農業社会から工業社会への転換を「第一次現代化」、工業社会から知識社会への転換を「第二次現代化」と呼んだ。これらの現代化論は言論界にとどまらず、2000年代以降ようやく政府にも採用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sup>10</sup>。

他方、自由主義的な経済政策と保守主義的な文化政策を取り入れて改革を進める政府の姿勢に対し、民間からはむしろ格差などの社会問題への関心から資本主義批判と平等志向の社会主義を主張する声が1990年代後半からあがってきた。新左派と呼ばれるこうした思潮の提唱者は、西洋の左翼社会主義思想の理論を土台とし、中国が市場経済へと移行する過程であらわれた社会の階層分化、社会規範の喪失や社会問題などを資本主義社会化の矛盾が露呈したものとして捉え、格差の拡大は国内外の資本家が手を結んで搾取した結果だと主張し、毛沢東時代の社会主義の道を再評価する動きさえ現れている<sup>11</sup>。改革開放とりわけ市場経済以来「生産力の向上」に転じた政府の社会主義観に対し、毛沢東時代の「分配の平等」という社会主義観が訴えられたのである。

以上、改革開放以降、中国社会では社会主義志向が後退し、自由主義志向と伝統文化志向が高まりを見せているが、そのいずれも近代中国以来の遺産を批判的に継承しながら、今日の課題に対する主張として表れてくることがうかがえる。社会思潮の変化は学校教育にも反映されている。次の部分では特に中等教育の国語教育に注目し、その教学大綱または課程基準（日本の学習指導要領に相当）および教科書の分析を通して、求められる文化志向の変容を明らかにする。

## II. 国語教育の変容

中国の学校教育において国語教育を担う科目は、中華民国期に「国語」（小学校）や「国文」（中学・高校）であったが、新中国以降、話し言葉の「語」と書き言葉の「文」の両方を重視する趣旨から「語文」に統一された。語文科は、言語教育や文学教育のほか、政府のイデオロギー教育の場でもある。たとえば、1956年に出された小中高校の語文科教学大綱のいずれにおいても、語文教育を社会主義的教育を施す有力な道具と見なし、社会主義者や愛国者の養成がその目的と規定しており、また文革期に「毛主席の著作を活かし、毛主席に忠誠をつくし、毛沢東思想や毛主席の革命路線に無限に忠実する」<sup>12</sup>ことが求められていた。

1978年以降の語文教育は、文革期の過激な政治教育の是正から始まり、やがて改革開放路線をサポートする役割が求め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2000年代までの改革開放期に公布された語文科教学大綱・課程基準は、試行版や改訂版を含めて計13もあり、その中で示された語文科の機能によって4つの時期に区分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それらの趣旨は表1で示されたように、70年代末から80年代前半までの第Ⅰ期では、階級闘争の文革路線を修正しながら政治教育の性質を強く引きずる時期であり、プロレタリアの政治に奉仕する人材の養成が求められた。80年代後半から90年代初期までの第Ⅱ期では、国民の文化的水準の向上を図る義務教育の推進につれ、語文教育の実用性がより重視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一定の政治姿勢と文化を持つ社会主義的公民の育成が期待された。また、一部の地域の中学校では新版の教学大綱を試行するようになった。90年代後半から2000年代初期までの第Ⅲ期では、語文科の文化的性質が認められるようになり、民族文化と世界文化の両方から国民素質の向上が図られた。また、義務教育の普及に続いて後期中等教育の改革が中心と

なった。そして、2000年代初期から試行し、2000年代半ばから全国展開となった第Ⅳ期では、教学内容を詳細まで規定する教学大綱がより緩やかな枠組みで構成された課程基準

に取り換えられたほか、語文科の人文性や生徒の発達を促す役割が示され、人間そのものにいっそうの関心を払うようになった。

表1：各教学大綱・課程基準における語文科の性質と機能に関する規定内容の変容

名称	区分	公布期	対象	適用地域	語文科の性質	語文科の機能
教学大綱	第Ⅰ期	1978年(試行版)	中高校	全国	思想性・政治性が強く、特定の階級の政治に奉仕するもの	思想性も専門性も身につける人材の育成。
		1980年(試行版)		全国		
	第Ⅱ期	1986年	中高校	全国	学習と仕事の道具	理想・道徳・文化を持ち、規律を守る社会主義的公民の育成。
		1990年(改訂版)		全国		
		1988年(第1次審査採用版)	中学校	28の実験区		
		1992年(試行版)		実験区から全国へ		
	第Ⅲ期	2000年(試行改訂版)	高校	全国	交流の道具・文化の一部	民族の優れた文化の発揚と人類の先進的な文化の吸収、国民素質の向上。
		1996年(試行版)		2の省と1の市		
		2000年(試行改訂版)		10の省・市		
		2002年		全国		
課程基準	第Ⅳ期	2001年(試行版)	中学校	38の実験区から全国へ	交流の道具・文化の一部、道具性と人文性の統合	生徒の全面的発達と生涯的発達、個性的な発達。
		2004年(試行改訂版)				
		2003年(試行版)	高校			

出所：各教学大綱・課程基準に基づいて筆者が作成。

上記の語文科の趣旨を反映するように、語文教育の目標と教科書に取り入れる作品の採用基準も変化を見せている(表2)。語文教育の目標については、第Ⅰ期においてプロレタリア的な情操の育成など強い政治的姿勢が求められた。第Ⅱ期では社会主義的教養を求めながらも、知力の発達や愛国心の養成が重視されてきた。第Ⅲ期では様々な文化——伝統文化や現代社会の文化、また民族文化や人類の文化——に対する関心が強く求められる同時に、特定の観念に縛られない自由な創造力の育成や文化の多様性への理解が要求された。そして第Ⅳ期では理性的な態度とヒューマニスティックな愛情や美への感受性の養成が重視される同時に、民族振興の使命感とい

う民族本位の姿勢が要請された。

作品の採用基準も同様の変化を見せている。第Ⅰ期から第Ⅱ期まで、思想性が重視され、弁証法的唯物論・歴史的唯物論の世界観が反映された作品が求められていた。他方、第Ⅱ期からは、改革開放への奉仕も求められ、国の近代化に貢献する姿勢や時代の精神を反映する作品の採用が重視されてもいる。そして第Ⅲ期に入ると、伝統文化や民族意識を反映する作品、文化性の豊かな作品、社会の発展を反映する幅広い主題の作品の採用が推奨されるようになり、プロレタリア志向は薄れていった。最後に、第Ⅳ期の課程基準では、自然や人類への関心、個性の発達や人格の形成および文化の多元性の理解と尊重を促す作品

の採用が提唱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表2：各教学大綱・課程基準における語文教育の目標と作品の採用基準に関する規定の変容

		第Ⅰ期		第Ⅱ期				第Ⅲ期			第Ⅳ期		
		中高校		中高校		中学校		高校			中学校		高校
		1	1	1	1	1	1	2	1	2	2	2	2
		9	9	9	9	9	9	0	9	0	0	0	0
		7	8	8	9	8	9	0	9	0	0	0	0
		8	0	6	0	8	2	0	6	0	2	1	4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版
語文教育の目標 (姿勢・価値観の面)	1	社会主義的自覚	○	○		○							
	2	プロレタリア的な情操	○	○									
	3	マルクス主義的な文章の風格を確立	○										
	4	共産主義的徳徳		○									
	5	視野の拡大・知力の発展			○	○	○	○	○				
	6	社会主義的思想・徳徳・品性			○	○	○	○	○	○	○	○	○
	7	健康的で高尚な審美観			○	○	○	○	○	○	○		
	8	愛国主義の精神			○	○	○	○	○	○	○	○	
	9	個性や特長の発展・健全な人格の形成						○	○	○	○	○	○
	10	中華民族の伝統文化への愛情							○	○	○	○	○
	11	想像力と創造力の育成						○			○	○	○
	12	文化的品位と審美情緒の向上						○			○	○	○
	13	積極的な姿勢や正しい価値観の形成									○	○	○
	14	現代社会の文化と生活に関心を持つ									○	○	○
	15	文化の多様性の尊重、人類の文化の継承									○	○	○
	16	精神的世界を豊かにする									○	○	
	17	理性的な態度の養成									○	○	○
	18	文明的な交流と協力の姿勢									○	○	
	19	自然や生活への愛情											○
	20	芸術と科学技術における美の感受											○
	21	民族振興の使命感と社会的責任感の増強											○
作品の採用基準 (姿勢・価値観の面)	1	政治性が第一、芸術性は第二	○										
	2	指導者・党・社会主義国への愛情	○										
	3	プロレタリアの情操・世界観	○	○									
	4	社会主義的自覚	○	○		○			○				
	5	共産主義的徳徳	○	○									
	6	思想性において優れた作品	○	○	○	○							
	7	国の現代化建設に奉仕する姿勢			○	○							
	8	弁証法的唯物論と歴史的唯物論の世界観			○	○			○				
	9	時代精神の反映					○	○	○		○	○	○
	10	愛国主義の精神				○			○			○	○
	11	高尚な道徳や情操							○				
	12	中華民族の伝統文化への愛情・民族意識							○			○	○
	13	視野の拡大に有利							○	○	○	○	
	14	文化性を持つ							○		○	○	○
	15	社会と科学技術文化の発展を反映									○		
	16	自然や人類への関心										○	○
	17	個性の発達・人格の形成										○	○
	18	文化の多元性の理解と尊重										○	○

出所：各教学大綱・課程基準に基づいて筆者が作成。

以上、改革開放後の語文科教学大綱・課程基準を通して語文教育の変容を分析したが、学校教育で実際に使用される教科書では具体的にどのような変化が生じたのだろうか。次は、人民教育出版社が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代に出版した中学校と高校の教科書を通してそれを確認してみよう。

まず、教科書に取り入れた作品の構成については、2点の変化が生じたことが確認できる。一つは、90年代までに中国近現代作品が多く選ばれたが、2000年代以降、中国古典と外国作品の割合が大きく増えたことである(表3)<sup>13</sup>。すなわち、中国の伝統文化に対しても外国の文化に対していっそうの関心を示していることがうかがえる。

もう一つは、この3種の作品のいずれにおいても、革命や階級闘争の視点を反映する作品が人文性や科学を趣旨とする作品に取り換えられている傾向が示されている。中国近現代作品については、従来中国共産党の指導者またはその擁護者による革命的主張や社会主義建設の成果を示すものが多かったが、2000

年代以降そのような作品が急減しながら胡適などの共産主義者以外の人の作品や以前敵対していた台湾作家の作品が多く取り入れ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sup>14</sup>。中国古典と外国作品についても、90年代までに統治者や資本主義社会への批判をテーマとするものが採用されてきたが、2000年代以降愛や平和といったヒューマニスティックなものおよび科学への関心を高めるものが増えてきた。

たとえば、高校の教科書に入っている『詩経』の古典について、80年代と90年代の教科書では『詩経』の中の「伐檀」(檀の木を切る)と「碩鼠」(大きな鼠)が採用された。その2篇はいずれも労働者の苦勞と労働者を搾取する統治者への怒りを反映する作品であった。しかし、2000年代に採用された『詩経』の作品は「氓」(人物の名前)と「采薇」(野えんどうを採る)になった。前者は男女の愛情を繊細に描いたものであり、後者は出征兵士の苦勞と故郷を想う思う気持ちを描いており、平和への祈念が垣間見る。また、外国作品の変容も表4の通りである。

表3：語文教科書における作品構成の変容

		1980年代		1990年代		2000年代	
		作品数	割合(%)	作品数	割合(%)	作品数	割合(%)
中学校	中国現代作品	122	53.04	167	61.40	93	33.94
	中国古典	95	41.30	86	31.62	138	50.36
	外国作品	13	5.65	19	6.99	43	15.69
	合計	230	100.00	272	100.00	274	100.00
高校	中国現代作品	99	51.30	79	50.97	34	34.69
	中国古典	81	41.97	64	41.29	46	46.94
	外国作品	13	6.74	12	7.74	18	18.37
	合計	193	100.00	155	100.00	98	100.00

注：①作品数については、たとえば一つのテキストに二つの詩や文章が掲載されている場合には二つの作品として数えた。②精読文、略読文、授業外閲覧文、授業外暗記漢詩、目録に入っているすべての作品を集計対象とした。

表4：語文教科書における外国作品の変容(高校の精読文の場合)

著者	タイトル	テーマ	1980年代	1990年代	2000年代
エンゲルス	マルクスの墓の前での講話	資本主義批判 または	○	○	
チャーホフ	箱にはいった男		○	○	○
バルザック	守銭奴		○	○	

ゴーリキー	母	革命の		○	
モーパッサン	ネックレス	理念		○	
A.M.ローゼンタール	アウシュヴィッツにニュースがない	平和			○
M.L.キング	私には夢がある	自由			○
カール・セーガン	宇宙の辺境	科学			○
エーリヒ・フロム	父母と子ども間の愛	愛			○
ルイス・トマス	生物としての社会	科学			○

作品採用の他、作品そのものに対する扱いにも変化が見られる。90年代までに、採用された作品の中に教学大綱の要求に相応しくない部分がある場合には、その修正が政治的に行われていた。たとえば、資本主義国の学者を中国の友人だと称えた表現（聞一多『最後一次講演』）や、革命の精神を描く作品における子どもにリンゴを食べさせたり夫婦で散歩したりするフレーズ（魏巍『誰是最可愛の人』）が、その政治的傾向または革命的気概を損なうことによって削除された。また、夜の月光を浴びている蓮を出浴したばかりの女性に譬えた描き（朱自清『荷塘月色』）がエロチックな表現と見なされ、三か月も髪を梳かなかったという人物描写（臧克家『聞一多先生的説和做』）が衛生的な生活を提唱する党の政策に相応しくないとされ、余儀なく修正された。こうした作品に構成された語文教科書は、「体をしっかりと包んでいる婦人のようで、党や国を愛し、貞操を固く守り、品性が高く、主流派の思想を持つが、『人間』としての趣と女性としての美しさが欠けている」<sup>15</sup>と人々に揶揄されている。90年代以降、イデオロギー教育の弱まりと著作権意識の高まりにつれ、作品に対する恣意的な修正が是正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また、掲載作品の変容のほか、同じ作品でもその解釈の視点が変わっている。海門師範学院の楊孝如は、改革開放後の教科書に採用された作品の解釈の変化について、「テキストに対する解釈の束縛が次第に弱まり、生徒により広い読解の空間と自由を与え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く」と指摘し、これは「生徒の個性的

かつ自立的な読解力の育成に有利だ」と評価している<sup>16</sup>。

解釈が変化した典型例として、魯迅の小説を挙げることができる。魯迅の小説は中国の語文教育の古典であり、長く取り入れられてきた。90年代まで、彼の小説に対する解釈は、革命的、闘争的なものであったが、2000年代以後「民族の魂」を改造しようとする魯迅の人文的な視点がより注目され、人物の内面性や人性の複雑さが配慮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たとえば表5は、魯迅の小説「薬」について、異なる時期の教科書で提示された解釈を示している。1982年版の解釈では、作品の趣旨を封建主義と資本主義革命への批判と見なしたが、1990年版の解釈では資本主義革命への批判ではなく、革命家への同情との視点に変わった。また2000年版になると、「悲劇」との解釈となり、強引とも言える革命的な解釈から作品の本来の趣旨に戻った。

ほかに、風景を描くエッセーの中に革命の精神を見出したり、庶民の生活を語る小説から旧社会の統治者に対する階級的な批判を掘り出したりするなど、特定の価値観のもとで行われた解釈が、90年代までの語文教育ではほとんどであった。それに対し、2000年代以後、作品が持つ豊かな要素を生徒自身に感じ取らせるような緩やかな指導に変わっていった。つまり、作品を解釈する視点が、権威主義で特定の価値観への誘導から、主体的で個性的な理解の受容へと進んだのである。

表5：高校の語文教科書で魯迅の「薬」に対する解釈の変容（下線引用者）

教科書	解釈の提示
1982年 版	これは、魯迅が「五四」運動の直前に書いた辛亥革命期の中国社会の現実を描いた小説である。作品は、華と夏という二家族の悲劇を通して <u>封建制度の罪悪を告発し、封建的統治階級が革命を鎮圧し、民を愚弄する反動的な本質を暴いただけではなかった。もっと重要なのは、封建制度を倒すために犠牲になった革命家の夏瑜の血が、まさに貧民の華老栓夫婦が息子の病気を治すための「薬」になったという意味深い事件を通して、辛亥革命における革命家と民衆の関係を提示し、民衆からかけ離れた資本主義の旧民主主義革命の過ちを批判し、一つの側面から辛亥革命が失敗した歴史的な教訓をまとめた。この作品は次のことを教えている。つまり、民衆を動員する以外に革命は勝利できず、中国を救うことは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u>
1990年 版	「薬」は辛亥革命期の中国社会の現実のある側面を示した。作品は、華と夏という二家族の悲劇を通して <u>封建制度の罪悪を告発し、封建的統治階級が革命を鎮圧し、民を愚弄する反動的な本質を暴いただけではなかった。もっと重要なのは、封建制度を倒すために犠牲になった革命者の夏瑜の血が、まさに貧民の華老栓夫婦が息子の病気を治すための「薬」になったという意味深い事件を通して、民衆の愚昧と革命家の悲哀を表したのである。</u>
2000年 版	「薬」は辛亥革命期の社会現実を背景とし、光復会のメンバーである徐錫麟、秋瑾が清政府に殺害された事件を手掛かりに、 <u>革命家たちが民衆のために犠牲になったのに、民衆たちの理解が得られないという悲劇を描いた。</u>

出所：楊孝如「1977年以來中學語文教科書對課文解讀的影響論析」『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27卷第1期，2005年2月，p.111.

以上、語文科の教学大綱・課程基準および教科書の分析を通して、改革開放以降の語文教育は確実に一元的な価値志向と政治的プロパガンダの性格を持つ教育から、民族文化と欧米の近代文明をより評価し、多元的・ヒューマニズム的な価値志向を追求するものへと転換し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

#### IV. おわりに

政治的な国語教育が文化的な国語教育への転換は、教育改革の第Ⅲ期と第Ⅳ期とりわけ2000年代以降図られてきたが、この時期は同時に中国がグローバル化の影響を大いに受けて社会思潮が多様化している時期でもある。それが国語教育への影響は、特に人文主義の台頭とその多義的な理解ということに見られる。

国語教育に対する人文主義的な主張は、80

年代後半から現れ、学校現場の教員、言語研究や文学研究の知識人、さらに民衆の要請の下で進められ、90年代後半語文科の人文性が教学大綱で反映され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る。たとえば、語文科教師の陳鐘梁や若手研究者の韓軍の論文、言語研究者の申小龍による一連の主張、90年代に言論界における人文精神に関する大討論、さらに、90年代後半国語教育に関する国民的大議論などにおいて、そのいづれも国語教育におけるプロパガンダ的な作品や知識注入的な教学を批判し、感性豊かな人間の育成または民族文化の伝承について国語教育の役割を求めた。

他方、人文主義の主張に多様な理解が存在し、大きくは「民族性」と「普遍性」の二つの傾向がある。それは自由主義志向と伝統文化志向の高まりを社会背景としながら、個の解放と尊重を主張する民主主義の理念と民族や文化に価値を置くロマン主義の理念の両方

を内包している。「普遍性」の傾向では、西洋的な普遍主義を受け入れる部分と自らの文化の普遍性を主張する部分の二つが含まれ、「民族性」の傾向では、西洋的な普遍主義そのものおよび西洋理論の枠組みで解釈された中国の文化や言語に対し、自ら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や特徴が主張される。

但し、自らの特徴とその普遍性を主張することは、必ずしも西洋との「敵対」を意味するのではなく、そこには西洋も自分も対等の存在としてとらえようとする姿勢もうかがえる。たとえば、申小龍は中国語の個性を主張すると同時に、人類の言語に共通性が存在することも強調し、真の共通性を見出すために、個性研究の意義があると指摘した<sup>17</sup>。また、グローバル化の時代において、西洋文化の影響力が拡大するなかで民族文化の周辺化を懸念し、自ら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確保と他文化との融合という対立を解消するように、民族文化における普遍的な価値を持つ部分を国語教育によって強化する意見が上がっている<sup>18</sup>。こうした「民族性」と「普遍性」の両方に進む傾向は、人文主義の趣旨が反映された2000年代の教科書で、中国の古典も外国の作品も両方増えてきたことから確認できよう。

今日、国民教育の基本として国語教育の改革はますます社会から注目され、掲載作品の変更はしばしば大きな議論を巻き起こすことになる。たとえば、革命を扱った作品の定番である「狼牙山の五勇士」（抗日戦争での英雄像を描いた内容である）が削除された時、魯迅の小説が人気のある義侠小説に取りかえられた時、私的な利益を肯定する経済学者の文章が取り入れられた時など、世論はいつも沸騰してしまう<sup>19</sup>。国語教育は政治的イデオロギーや権威主義から自由になる一方、今後は社会思潮からの影響をより大きく受け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ろう。

#### 脚注\*

- <sup>1</sup> 名古屋経営短期大学子ども学科講師。
- <sup>2</sup> 許紀霖 [25], p.482.
- <sup>3</sup> 朱維铮 [33], p.6.
- <sup>4</sup> 「新儒学」には、第一期の秦以前の儒学に対し、宋と明において新しい解釈が行われた第二期の儒学および、五四運動後現れた西洋化の主張に対して伝統文化の価値を主張する第三期の儒学がある。そのうち、前者が「宋明新儒学」、後者が「現代新儒学」と呼ばれるが、今日一般的に使用されている「新儒学」は、特に説明がない場合に後者を意味する。方克立 [2], pp.10-13.
- <sup>5</sup> 方克立 [2], pp.56-57.
- <sup>6</sup> 他に、中国社会に実際に根強く存在する伝統文化の影響をいかに克服または活用するかという社会学の視点、または日本やシンガポールのような儒教文化圏の経済発展に注目する経済学の視点など、思想や文化論以外の観点から伝統文化への関心を促した要因も存在していた。
- <sup>7</sup> 汪暉 [21], p.12. 但し、汪暉は保守主義者というよりは、新左派の代表論者と見なされている。
- <sup>8</sup> 胡適 [5], p.311.
- <sup>9</sup> 羅榮渠 [14], p.17.
- <sup>10</sup> たとえば、2000年代初期政府のシンクタンクである中国科学院に中国現代化研究センターが設立され、国家戦略として総合的な近代化研究がスタートした。そこでは、羅と何の理論を元に、西洋と中国の「現代化」理論をまとめている。中国現代化報告課題組 [31].
- <sup>11</sup> 簫功秦 [24], pp.9-10.
- <sup>12</sup> 朱志勇 [34], p.52.
- <sup>13</sup> 他の注がない限りに、本文で分析対象の教科書が注 [35] の通りである。

- <sup>14</sup> 武小燕 [23], pp.8-10.  
<sup>15</sup> 潘曉凌 [16].  
<sup>16</sup> 楊孝如 [29], p.114.  
<sup>17</sup> 申小龍 [18].  
<sup>18</sup> 劉忠華 [12].  
<sup>19</sup> 璩毅 [17].

\*参考文献

- [1] 陳鐘梁「是人文主義，還是科學主義？——語文教學的哲學思考」『語文學習』1987年8期，pp.2-4, p.56.
- [2] 方克立『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長春出版社，2008年。
- [3] 高力克「『新青年』與兩種自由主義傳統」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論·上卷』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pp.126-139.
- [4] 何佺啓『第二次現代化——人類文明進程的啓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 [5] 胡適「建國問題引論」（1933年）羅榮渠監修『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p.311.
- [6] 康曉光「我為什麼主張『儒化』」<http://history.book.163.com/10/0124/17/5TQEO0GF00924472.html>（2012年2月24日閱覽）
- [7] 課程教材研究所編『20世紀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匯編 語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 [8] 李世濤監修『知識分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
- [9] 李世濤監修『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
- [10] 李世濤監修『知識分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
- [11] 劉增人·馮光廉編『葉聖陶研究資料』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8年。
- [12] 劉忠華「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漢語文教育的思考」『當代教育論壇』2007年10期，pp.97-99.
- [13] 羅榮渠監修『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 [14]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增訂版）商務印書館，2004年。
- [15] 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 [16] 潘曉凌「教科書：刪得掉的文字，刪不掉的秘密」<http://nf.nfdaily.cn/nanfangdaily/nfzm/200906250123.asp>（2012年2月24日閱覽）
- [17] 璩毅「中學語文教材改革網上民意爭鋒」<http://news.sina.com.cn/c/2007-10-31/115014204023.shtml>（2012年2月24日閱覽）
- [18] 申小龍「關於語言的共性問題——漢語人文性答復之一」『語文建設』1988年3期，pp.12-18.
- [19] 申小龍「漢語的人文性與中國文化語言學」『讀書』1987年8期，pp.114-121.
- [20] 申小龍『語文的闡釋——中國語文傳統的現代意義』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
- [21]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三聯書店，2008年。
- [22] 汪瑩「我國中小學語文討論的回顧與啓示」『全球教育展望』2001年3期，pp.28-33.
- [23] 武小燕「中國の学校教育における愛國主義教育の変容——政治・歴史・語文に見られる価値志向の分析——」『中國研究月報』第65卷第12号，pp.1-14.
- [24] 簫功秦「現代中國の知識人の思想分化とその政治的影響」『現代中國における思想、社会と文化——中國文化とアジア世界の文化共生研究会 COE 最終報告書——』愛知大學國際中國學研究センター，2007年，pp.3-25.



- [25] 許紀霖「社会民主主義的歷史遺產——現代中国自由主義的回顧」李世濤監修『知識分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時代文芸出版社，2000年，pp.474-486.
- [26] 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国思想史論·上卷』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
- [27] 許紀霖編『二十世紀中国思想史論·下卷』東方出版中心，2000年.
- [28] 薛涌「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評蔣慶的讀經運動」<http://gb.cri.cn/3601/2004/09/15/342@300951.htm> (2012年2月24日閱覽)
- [29] 楊孝如「1977年以來中學語文教科書對課文解讀的影響論析」『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27卷第1期，2005年2月，pp.109-114.
- [30] 余英時「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与保守」李世濤監修『知識分子立場——激進与保守之間的動蕩』時代文芸出版社，2000年，pp.1-29.
- [31] 中国現代化報告課題組『中国現代化報告2001』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 [32] 「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意義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電宣傳解釋大綱」[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1/30/content\\_2276776.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1/30/content_2276776.htm) (2012年2月24日閱覽)
- [33] 朱維铮『梁啟超論清学史兩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 [34] 朱志勇「我国小学初中語文教学大綱的演進——價值取向的分析」『上海教育科研』2002年11期，pp.50-54.
- [35] 中學校用教科書：8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編輯室編『語文』(中學校)，1981年(第一，三冊)／1982年(第二，四，五冊)／1983年(第六冊). 9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一室編著『語文』(四年制中學校)，1992年(第一冊)／1995年·第2版(第二冊)／1993年(第三冊)／1994年(第四，五冊)／1995年(第六，七冊)／1996年(第八冊). 2000年代：課程教材研究所·中學語文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編著『語文』(中學校)，2001年(7學年上冊～八學年上冊)／2002年(八學年下冊)／2003年(九學年上冊，下冊). 高校用教科書：8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室編『語文』(高校)，1983年(第一冊)／1984年(第二，三，五冊)／1985年(第四冊)／1985年(第六冊). 9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二室編『語文』(高校)，1990年(第一冊)／1995年·第2版(第二～五冊)／1991年(第六冊). 2000年代：人教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中學語文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北京大學中文系語文教育研究所編著『語文』(高校·必修)，2004年(語文1～5).